

Guy Sorman

索爾孟·著 許益源·譯

吳志中·導讀審訂



謊言 L'année du Coq 帝國

西方一群國家元首及商人，將很快就會絡繹不絕前往北京，再度參加血腥兇手的宴會

——西蒙雷思(Simon Leys)

作者的洞見和拒絕鄉愿的勇氣，很讓人警醒和敬佩

——卜大中

打開潘朵拉的盒子，讓我們看見一個與想像截然不同的真實中國

看得到的大地，看不到的希望

魏京生 魏延年 凱度頓珠 曹長青 茱莉
金恆煒 林衡哲 朱立熙 卜大中 (依姓氏筆畫排列)

動容推薦

Guy Sorman

索爾孟·著 許益源·譯

吳志中·導讀審訂



謊言 L'année du Coq 帝國

中國雞年紀行



作者

索爾孟 Guy Sorman

在法國自由知識份子的傳統中，索爾孟Guy Sorman是一名具有領導地位的學者。在1983年，他率先於其著作《美國保守革命》中，強調新保守運動在美國之重要意義。自此，他出版了約二十幾本書解釋自由主義之概念在如印度（印度思潮，2000）、穆斯林國家（麗法的子孫，2003）、中國（雞年中國行，2005）等傳統社會中之衝擊。索爾孟也是預言社會主義之消逝（從社會主義中找到出口，1995）與全球化之發展（世界是我的部落，1997）的先鋒。其著作已在全世界十五個國家翻譯出版，得到熱烈的回響，其記事也在發行全世界的雜誌上刊行。現年62歲，現居巴黎和紐約。

譯者

許益源

1965年生，台灣台南人

中央大學法文系畢業，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駐外國際新聞人員乙種特考及格，行政院新聞局駐比利時新聞秘書，行政院新聞局聯絡室第一科科長

★ 謊言 ★ L'année du Coq 帝國
中國雞年紀行

Guy Sorman

索爾孟 著

許益源 譯

謹將此書獻給

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及政治犯師濤

中國的想像與真實

自十七世紀起，法國人便不斷地造訪中國，無論往昔造訪的理由為何，今日大抵是宗教、軍事、商業或藝術。法國對中國的這種狂熱，並未將台灣排除在外；十九世紀末法國遠征台灣未竟其功的經驗及今日與台灣的文化經濟交流，都讓西方發現台灣是一個中華文明未受革命摧殘的真正中國。從西方造訪中國此一傳承所產生的許多巨著，被視為西方漢學的根基。此一豐富的積累，至今依舊對西方有關中國的思想及視野，產生巨大的影響。

因此，許多法國政治思想特質，如科舉制度癖好、傾向開明專制而非民主、過度信任高級文官體系等，倘非取材自真實的中國，至少受往昔法國人對中國所持特有意念所影響。此一特有意念只是由這群衆多造訪中國的敘述者、愛好者或是學有專精之人士，針對自身所持的正反偏見，相互印證所造成。因此，在法國想像中，此一特有意念的中國便經常取代真實的中國。

以上對中國美化的想像，雖解釋了浸淫在神話巨著及西方元首及外商對偉大中國展現出驚豔，甚或卑屈的態度，但根本毫無意義可言。

本書所採取的論述方式，可說本人三十年來雲遊中國之總結：本人長期旅遊中國大陸及台灣之驚奇遊記。我相信，我的論述方式十分特別，針對中國各區及各個社會階層人士，傾聽他們的心聲。藉此作法，我讓那些受苦受難、無法推選代表發聲，未受經濟發展眷顧，以及被剝奪所有公民或心靈權力的沈默中國人發出內心之言。我的鄉野調查也擴及台灣，係因台灣亦代表中國，且提供世人有想像一個更自由的中國大陸之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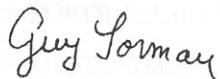
「謊言帝國—中國雞年紀行」此一法文原版書，已逐譯成許多歐洲（波蘭）及亞洲（南韓、日本）不同語版，在各國引起許多意見及論戰。為何會引起如此多的洶湧波濤？簡言之，肇因我所描述的中國，其真實悲慘的現狀與中國共產黨所聲稱的成功政績清單，對比過於強烈所致。

「謊言帝國—中國雞年紀行」法文版出版迄今近一年，現在已是狗年，我先前在該書對中國所作的觀察及相對悲觀態度，是否依舊如此？很令人遺憾的，答案依舊。中國人民的貧富差距日益嚴重，民主及言論自由毫無遠景。所有期盼2008年北京奧運的到來，促使中共放鬆鎮壓箝制的人們，全都誤判。

我藉此書在台灣出版中文版的機會，與讀者分享北京共產黨高層對本書之準官方回應態度。中共高層透過私下管道向我表示，該書所描述的一切，「雖屬正確，但並非正面。」說得

更坦白些，中共看過我的書後坦承，我在該書所描述的中國經濟困境、醫衛貧乏及道德淪喪等窘境，正確無誤，且確實存在。但我卻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居然不信任共產黨有解決以上問題的能力！」此即為何本書無法被北京視為「正面」之因。至少，此節我同意中共的看法：我的確不信任中共有解決該等問題的能力，因為中共根本就是製造這些問題的本源！因此，箝制新聞及缺乏民主，讓中共根本不把任何批評看在眼裡。既然發展沿海省份外銷經濟模式，比著重全中國衡平經濟發展，更能讓中共獲得財政利潤，為何共產黨要採行那些可能削弱其權威及阻斷財源的政策？專制政體本身的特性，即是無法與時俱進，無法永續生存。中國大陸難道是例外？中共會與時俱進？我們大家應該衷心祝福中共，倘能實現，無論是中國人或是全世界，均蒙其利。儘管我期盼此一時機能夠到來，但我至今仍不太相信。

索爾孟



2006年9月18日

神話中國的除魅

「請不要神話中國，中國只是一個正常的國家！」這是本書法國作家索爾孟要告訴世界所有讀者的中心概念。作者索爾孟在本書嚴厲批判西方的中國專家，認為很多這些所謂中國通將中國人視為一個特殊的民族，以致於盲目支持現有的中國共產黨政權，進而忽略民主、自由與人權這些普世價值對於中國的重要性。

中國特殊嗎？她是否與世界其他國家有如此巨大的差異？使得全世界各國均漠視中國共產黨的威權獨裁，不在乎毛澤東所屠殺的中國人數已遠遠超過日本帝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所殺害的中國人，更已經遺忘為了爭取民主自由，在鄧小平下令屠殺那些在天安門廣場上數千位自由鬥士的英靈？由於世界各國神話了這一個國家，大家雖然無法原諒希特勒與列寧殺人的暴行，但是卻接受中國共產黨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政策屠殺人民的必要性；世界各國懲罰了當年在圍牆射殺前往西德投奔自由人士的東德士兵與軍官，但是卻對中國士兵在中印邊界射殺逃難的西藏居民充耳不聞。這些都是生活在中國土地上的中國人民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沈痛指控。

事實上，中國一點都不特殊，印度的人口10億，是一個重

視人權的民主國家，也維持著不輸給中國的經濟成長率。美國、加拿大都與中國一樣，均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但是美國與加拿大能夠實施民主制度，尊重地區的差異。反觀中國的國土橫跨七十五個經度六個時區，但是全國卻在同一個時區下運作，也就是中國以一套威權的制度來統治 13 億人民。與中國同為歷史悠久的法國可以結合歷史經驗與現代觀念，發展出注重傳統的民主自由現代化國家，然而中國共產黨則認為唯有威權獨裁才能發展中國的經濟與社會。中國共產黨為什麼可以如此篤定，只有共產黨的政策是正確的，並且是有益於中國人民的幸福與發展？那是因為，在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權力基礎並不是來自於人民，因此，人民沒有權力也沒有能力質疑政府的政策。由於人民沒有選票，不能要求不好的領導人下台。但是，執政的共產黨政府有軍隊以及警察，可以鎮壓不同的聲音，再加上西方強權社會與共產黨政權的合作（例如最近被雅虎 Yahoo 出賣，而遭到判刑 10 年的記者師濤；或者與中國共產黨合作，過濾資訊使得中國人民無法查詢有關民主、法輪功、西藏等資訊的 Google；甚至一直拒絕接見達賴喇嘛與魏京生的法國總統席哈克），結果使得人民的聲音遭到嚴重的打壓。

在中國上海、北京做生意的外國人，會認為中國很進步、富裕並且自由，因為做生意只要在商言商，只談共同的利益，不需要涉及政治理念。然而，北京與上海不能代表中國的全

部，作者甚至以親身的經驗斷言，上海是中國管制最嚴的城市，因為她是中國共產黨對外宣傳的櫥窗。

然而，除了共產政權與西方政府無道德的現實主義政策之外，中國人民難道是那麼無辜嗎？也不盡然。中國境內的民主捍衛者，馮蘭瑞女士就認為，中國人最短缺的東西，就是記憶。低於四十歲的中國人已經對過去共產黨屠殺人民的歷史真相毫無記憶。而且，雖然毛澤東手上所沾滿的鮮血比日本軍閥還多；中國共產黨對法輪功成員的迫害，以及強迫進行人體器官移植的惡行不亞於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的人體實驗，但是，仍然有許多人選擇遺忘與視而不見。因此，現代的中國的共產黨政權，就在人民被洗腦的狀況之下，與外國強權合作，殘酷的剝削大多數窮苦的人民，使得他們成為現代的奴工。在全世界一致短視近利，姑息惡勢力的現實主義政策指導之下，中國變成一個窮兵黷武，剝削勞工，壓榨農民的野蠻國度。

那中國的未來何去何從呢？索爾孟認為，再進行一場血腥的革命是不可行的方法，也非中國人民所願。第二個可能性，則是要求世界各國放任中國，等待其破產崩潰。而這樣的作法也不行，因為中國的瓦解會對世界秩序帶來過大的衝擊，並且也無法保證會帶來一個民主和平的新中國，倒是反而可能建立一個軍事政權的中國，如此將對世界帶來更多的禍害。

或許，比較可行的未來，是希望中國在經濟發展的同時，

能努力自我進行政治改革，走向民主制度的國家。但是，中國共產黨以及其黨羽正持續享受著一黨獨自享有權力，以及快速致富的歡愉。此時要求其放棄權力，將財富用於人民的誘因並不存在。但是，索爾孟認為，以資本主義戰勝蘇聯的社會主義體系的歷史為鑑，西方國家其實可以不如此諂媚中國共產黨，是可以協助中國人民獲得民主與自由的。西方世界必須將人權政策與貿易政策做結合，就如同冷戰時代與蘇聯交往的方法。中國的共產政權不會比過去的王朝更具合法性，因為在中國統一之後的22個世紀裡，26個朝代相繼因為人民的不滿而隕落。中國共產黨如果沒有現代政府的合法性，沒有國際社會的支持，是有可能結束其在中國的統治生命。

在華人世界裡，索爾孟更認為，台灣民主化的成功是中國未來的希望。雖然，中國不斷嘲笑台灣的民主亂象，西方各國拒絕承認台灣的民主政府，但是台灣只可能被中國的武力摧毀，而無法被征服。索爾孟在結論中重申，世界各國必須對未來負責。北京的奧運是會成為1938年納粹德國「害人危世」之柏林奧運的翻版，還是會成為1988年南韓「還權於民」之漢城奧運的再現，全賴我們做決定。因為中國的經濟成長是依賴在世界各國的外資及市場，而非掌握在中國共產黨的手中。在2005年的時候，中國的對外依存度，也就是其對內對外貿易總量佔其GDP國民生產總毛額的近80%，而像美國與日本這兩

個世界第一與第二強的經濟強權的對外依存度，則只佔大約20%。事實上，是中國需要世界的市場，而非只是世界需要中國的製造。

更重要的是身在台灣的人民，必須重新好好認知台灣對世界未來命運是有影響力，並且有其偉大角色扮演的空間。台灣政治民主制度的成功，對中國的未來發展有極大的引導作用。事實上，中國認為其對台政策最成功的地方，並不是壓制了台獨的聲音，而是非常具體的將台灣的民主影響力隔絕在中國之外。中國未來的發展也深深影響著世界的未來走向，如果台灣的民主制度垮了，中國共產黨必然額手稱慶向世界以及其人民大聲說出，華人不適合民主，也不需要自由。中國人民只有聽從共產黨的領導，才能走向繁榮。這將不僅是台灣的失敗，也是中國的悲哀，更是人類世界更巨大衝突與紛亂的開始。時值北韓進行核武試爆，中國的朝鮮政策失敗，整個東亞局勢陷入緊張不安當中。而，所有國際政治專家均同意，台灣海峽與朝鮮半島是目前世界上最可能引發強權直接衝突的地區。因此，台灣的世界使命，就是捍衛其獨立自主的民主制度，做為中國的燈塔，以及世界追求民主國家的模範，如此東亞的和平才得以保障，人類文明才得以更加的進步。

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

吳志中於台北

2006年10月10日

目錄

Contents

- 序 言 中國的想像與真實 / 索爾孟 5
- 導 讀 神話中國的除魅 / 吳志中 8
- 前 言 虛構的中國 15
- 第一章 反抗異議分子 29
- 第二章 毒草雜生 61
- 第三章 神秘的信教者 87
- 第四章 遭羞辱的農民 117

★ 謊言 L'année du Coq 帝國 ★
中國雞年紀行

目錄
Contents

- 第五章 被剝削的勞工 151
- 第六章 虛假的發展 173
- 第七章 民主的陰影 199
- 第八章 野蠻國度 221
- 第九章 共產黨末日 249
- 第十章 共和主義者 291
- 第十一章 人世間的道路 313

★ 謊言 ★ L'année du Coq 帝國
中國雞年紀行



Preface

虛構的中國

中國一甦醒，世界便顫抖。世界之所以會顫抖，是因為我們無法瞭解中國的真實面貌；而這也不是第一次。西方鑽研漢學的觀察家經常展現特殊本領，他們眼中的中國根本與實際的中國不符。從帝制時代的中國到共產黨統治的中國，中國領導人哄騙西方的才能，向來非凡。中國強權是否會超越西方？事實上，中國整體經濟力只能與歐洲單一國家，如義大利或法國相比，而且中國依舊是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世界會顫抖，是因為世界所夢想的中國，比實際的中國要好得多；這可得話說從頭了。

耶穌會教士、法國哲學家沙特，以及西方老闆們

4個世紀以前，當義、法的耶穌會教士發覺所觀察的中國十分美好，從此他們對中國的敘述觀點，便長期在歐洲樹立一個根深蒂固的中國形象：中國人沒有宗教信仰，而受一位哲君統治^①。1702年，法國耶穌會教士即在《教義及奇特書札》（*Les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此一暢銷書中，將中國人形容成個性不鮮明且迷信的群眾；唯有信奉孔子的官員，讓西方的文人過客對中國留下精緻優雅的印象。此一中國形象令啓蒙

譯註1：柏拉圖的名著《理想國》中，蘇格拉底心目中的理想國度，便是由一位深受哲學薰陶的君王所統治。

時期的哲學家，尤其是德國的萊布尼茲（Leibniz）及法國的伏爾泰（Voltaire），心生嚮往之情。他們期盼在歐洲也能有開明專制的領導階層，及無神論的道德觀引領大眾；伏爾泰的《至神》（*L'Être Suprême*）一書，即有濃厚的中國思想色彩。在他的書房中，掛著一幅孔子畫像，畫像上題寫「至聖先師孔子」，由此可見，真實的中國已被某些特定的中國意象所取代，而漢學也成了某種意識形態。

那麼，真實的中國社會究竟為何？可和一般人想像的迥異？實際的情況是：人民屢遭官員勒索，而這些官員有時並不是循正規科舉考試獲取官職，反而靠賄賂或捐錢買官。而儒學呢？它通常被視為一種反宗教信仰的意識形態，完全與民間信仰佛教佛陀及道教諸神相左。至於君王，假如中國歷屆朝代均具有正統的合法性，那又該如何解釋26個朝代，直至1911年的共和革命，雖遭無數次改朝換代的政變衝擊，卻依然能被視為一脈相承的道統延續。

但誰會對這個真實中國感到興趣？直到近年，法國漢學界仍大多專注於研究「孔子哲學」及宮廷風俗，少有人對探討中國現代社會有興趣。這種偏好研究古代中國士大夫的典範，遵循耶穌會教士及伏爾泰的研究方式，雖然退燒，但仍嫌緩慢。直至最近一個世代，我們學習中文，就如同任何一種外語，除了成為漢學家外，終於有其他無限發展的可能。經濟學家、法

學家、社會學家紛赴中國探險，就像中國已是個正常國度——而中國原本就是個正常國度一樣。但他們的研究成果尚不足以呈現實際的中國面貌，來取代西方人所想像的中國；再也沒有漢學家能像法國貝菲特（Alain Peyrefitte）一樣，在1973-1994年間，受到如此廣大群眾的青睞。但貝菲特其實是將中國置放在另一個星球上，其3本書標題為《當中國甦醒，世界顫抖》、《僵化的帝國》、《中國的悲劇》（*Quand la Chine s'éveillera le monde tremblera, L'Empire immobile, La Tragédie chinoise*）。作品中根本沒有探討到中國人民個體。據貝菲特的看法，無論是沈睡或是悲慘的中國，都是一個偉大的組織體。如此的美夢及惡夢，試問我們膽敢將此投射在世界其他任一國度之上嗎？

如前所述，有關中國的第一個「虛構」，是出自保守派傳教士的觀感；而自1970年起，有關中國的第二個「虛構」，則由「激進主義者」接續傳承，但他們並未更注重中國的實際現實面，並加以觀察。那些夢想普世基督教化及哲君統治的耶穌會教士，在北京找到心目中的夢土；而西方那些以知識分子自居的人士，則熱中尋求一個普世革命及絕佳領導。如果不是北京，他們又可在何處找到符合此一條件的地方？

在耶穌會教士考察中國後經過3個世紀，法國作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索勒斯（Philippe Sollers）、拉崗（Jacques Lacan）及同類型的許多其他人，也對真實中國視而不

見。義大利女性主義者馬希歐西（Maria-Antonietta Macciocchi），雖在法義兩國被視為知識分子權威，她卻將中國內戰稱為「偉大的文化革命」，並撰寫：「在3年混亂局勢後，文革將開啓千年至福的時代。」法國的哲學家新秀，如拉多（Guy Lardreau）及姜貝（Christian Jambet），將毛澤東視為耶穌復活，其「小紅書」（即《毛語錄》）則為福音書之翻版；他們對毛澤東主義的隱喻作法，像極耶穌會教士一趟中國想像之旅後，對儒家所下的詮釋。而一直對暴力美學感興趣的法國作家沙特（Jean-Paul Sartre），根本無須親赴中國聽聞，顯然就己是一位毛澤東主義者了。法國喜劇作家莫里哀（Molière）曾寫道：「一位博學蠢蛋，可是比一位無知的傻子，更為愚蠢。」

當然，並非所有人均被第二個「虛構」所蒙蔽。同樣在七〇年代，比利時作家李克曼（Pierre Ryckmans），又名西蒙·雷思（Simon Leys），以及拍攝《他們辦事，老百姓不放心》（*Chinois, encore un effort pour être révolutionnaire!*）（該片是以影像破解毛澤東教條文宣之秘）的法國電影工作者魏延年（René Viénet），他們兩位則觀察到，在中國有許多屍骸彼此綁在一起，順著珠江流至香港海灣之事實。此外，也不乏有許許多多描寫共產黨屠殺的文字資訊，可供有意研究者參考。但這些瞭解真實中國的人，其對毛澤東主義的控訴言論，比起那些耶穌會教士及西方左派人士的幻想，似較顯不合時宜。1971年，魏

延年與陳慶浩出版「東亞叢書」系列專書中，由西蒙·雷思（Simon Leys）所著的《毛主席新衣》（*Les habits neufs du président Mao*），此後則變成研究毛澤東獨裁專制的經典書籍。這一切就如同蘇聯古拉格勞改營（Goulag）及納粹集中營般的年代，只要罪證確鑿，要對毛澤東主義者的罪行視而不見，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或許在七〇年代，要追隨「毛澤東」才是符合時尚潮流，就如同中國古玩在十八世紀風靡歐洲，到二十世紀中葉則時興要當史達林的同路人吧。現在也是如此，沒什麼大變化，以下所述就是第三個中國的「虛構」。

相形之下，如今的西方元首及商人代表團絡繹不絕前往北京，是否會比古早的耶穌會教士及昔日的激進知識分子，更能看清楚中國的真正面貌？那可不一定。他們在商業利益及國家利益的驅使下前進中國，這不就跟早先的耶穌會教士一樣？利益至上的考量並不必然是會洞察機先。就像1970年的激進主義知識分子一樣，這些西方過客，雖已過一個世代的光景，但依然認為參訪中國是件不尋常的經歷，因此不以對日本及南韓等其他亞洲國家的同樣標準，來評判中國這個國家。造訪北京的西方代表團總是心存某種驚訝之情，共產東道主專長營造身處異地的氛圍，而中國歷朝君王及毛澤東亦是操弄演戲的高手。我們對造訪中國的西方官員缺乏批判精神，感到困惑不已：中

國並不會比非洲或是印度，更具有「異國風情」；二十多年來，中國的異國風味已更加淡化，但對偉大中國的幻想依舊遮遮掩掩中國的真实面貌。

現在的西方代表團，如同早先的耶穌會教士，只跟中國宮廷及官員打交道；而今日的中國官員比起往昔，可沒那麼溫文儒雅：共產黨領導人的待人接物及統治國家的方式，十分粗暴。我們或許不應對這些急促的西方訪客要求過高，因為真實的中國是如此廣闊，某些地區禁止造訪，資訊遭封鎖，受訪者不是躊躇猶豫，就是遭受監控。雖然現在中共可容許中國人以個人名義批判時政，但需符合以下條件：訊息不得傳播，不可籌組集會。任何非商業性的組織，不管其動機為何，是社會性，宗教性，或是文化性，一律被共產黨禁止，而組織的號召者，其下場通常是不經審判便直接遭囚禁。中國人居住的真实中國，是遭專制共產黨、國安局及文宣部爪牙所擺佈的。而文宣部堪稱中國效率最佳之部會，他們可以讓外國人對該部提供的資訊照單全收，例如：無法查證的經濟統計數據、選舉舞弊、隱藏重大流行疾病訊息、聲稱社會祥和，人民對民主沒有任何渴望……等等。

傾聽真正的中國人心聲

這些佔全中國九成五人口，非屬共產黨員，總數達10億之

譜的貧農及保有自由心智的中國人，他們心中究竟在想些什麼？在這個獨裁國家，我們實在無法具體衡量人民對共產黨的不滿意度、反對及怨恨程度究竟有多少？但我們仍可走入中國民間，與每一位勇敢的中國人會面，讓他們有機會表達對自由的渴望：這也就是我們目前所做之事。在中國從事鄉野調查實令人心動，而其所預期遭遇的困難亦非不能克服。許多記者、社會學家、經濟學家等，也曾對此致力研究，並達成一致性的結論：中國人不喜歡共產黨，廣大的多數民衆期望有另一個較不腐敗，且更公正的政體取而代之。因經濟發展受益的中國人比例實在很低，絕大多數中國人對共產黨不公的埋怨心則日益加重，且對未來亦不懷抱任何進步發展的希望。

為傾聽這些具有自由心智的中國人民的心聲，我花了雞年整整一年的時間（2005年1月至2006年1月），造訪中國各地，傾聽他們的心聲，這不是件最起碼該做的事情嗎？某些人冒著生命危險跟我交談，而我本身卻無任何風險。對那些追求中國民主的人士（我此次調查所優先面晤的對象）而言，他們對西方政府與中共串連勾結的行徑，感到難以理解。他們最常向我反問：西方怎麼可以這麼快就把天安門屠殺事件給遺忘了？受害者的屍骨至今甚至還未還給家屬。我們是否有一刻懷疑過，假如中共自覺遭威脅，很可能會再度動用軍隊的決心？我們是否知道，在中國各地，鄉間農民，工廠工人，均已挺身反抗中

共統治？我們難道不知道，中共壓迫宗教，無論任何宗教，數以千計的牧師、神父、信徒未遭審判，就被拘禁在「勞改營」之中？我們對那些被拋棄且無任何照護的數十萬名罹患愛滋病的受害者，以及那些為吸引外資而淪落風塵的數百萬年輕農婦，難道就沒有一絲憐憫之心嗎？從每年數百萬的高級文憑畢業生到最卑微的普通工人，在中國各地遷徙奔波，我們對此又該如何看待？我們是否知道，那些受僱於中國外商企業的受薪者，在中共貪腐及訛詐後，每月僅能靠百餘歐元（約合新台幣4,400元）過活？我們又是否知道，共產黨幹部已先將從外商及中國勞工所竊取的數十億資金，轉匯到其親屬所居住的中國境外國度，以預防政變的爆發？

上述提問，無論是閃避回答或是以中國內政為由搪塞，均不適當。因為中國的未來命運走向，絕大部分是由西方來主導決定，沒有外資，沒有進口中國產品，中國的經濟發展勢必中斷。中國六成的外銷均靠外商完成，中共藉與西方決策者間維持特權對價關係，賴以殘存。這也說明中共文宣部為何要積極迷惑或收買西方民意的原因！

有必要害怕中國嗎？

西方對中國所採取的現實主義政策，顯然是不道德的，要採取此種作法，至少也要有利於我們自身的利益吧！但中國產

品的「入侵」，雖令人擔心，卻並非中國對西方最危險的威脅。這些廉價的進口品甚至可以改善我們的生活水平，西方雖會因為企業採取國際分工策略，流失某些本地工作機會，但也會迫使企業新革，此一挑戰還是在西方因應能力範圍之內。

跟共產黨維持良好伙伴關係的真正危險是：我們居然允許一個獨裁國家建構一個威脅鄰邦、亞洲以及其他各國的軍火庫。現在沒有任何一國足以威脅中國，為何中國還要追求成為軍事強權？擁有700架戰鬥機及射程遠達台灣、甚至日本、南韓及美國的核武，目的究竟為何？而更立即的危險是：中共為何在福建及江西山區，部署數百枚中程飛彈，瞄準台灣人民？我們猜得到中共的野心。真正對中國人及世界各國具有危險性的是中共，而真正的中國人是跟所有人類一樣，渴望和平，而且不會威脅任何人。

西方可對中共採取另一種替代方案，其中，支持中國民運人士實具可行性。從現在到2008年北京奧運期間，依賴外商的中共，尤其脆弱。共產黨雖期盼藉北京奧運獲得舉世認同，但也擔憂發生人民反抗、重大流行疾病等意外事件，可能會讓此美夢化為泡影。有關2008年北京奧運的重要性，讓我想起兩個歷史前例：一是認可納粹意識形態的1936年柏林奧運；另一是將南韓推向世界舞台，開啓民主化進程的1988年漢城奧運。2008年的北京，將會是柏林還是漢城？端賴西方立場而定。我

們是要依然對偉大中國心生驚訝之情，或是要跟真實的中國人分享我們的自由價值觀？

目前是西方向中共施壓的適當時機：要求中共停止囚禁民運人士及神職人員；要求中共同意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重返家園；要求中共在法庭中，落實中共憲法明文規定的人權條文；要求中共開放黨禁，允許成立反對黨；要求中共不再透過文宣部箝制資訊。就如現在流亡美國的民運人士胡平所言：「我們不要求中共做任何事，只要求中共什麼事都不要再做。」而且既然中共對其民意支持度如此有自信，就要求中共辦一場普選以探知真正民意所在。西方曾對實施「種族隔離制度」的南非施壓，現在要求中共比照辦理，應該不是件不適當的事：「一人一票」的要求，對中共應該不會不得體吧。唯有如此，無論是中國人或是西方人，我們才能在一個終於回歸正常的國家中，一起慶祝2008年的奧運！

中國人是否真心追求自由？

假如中國人有表達意見的機會，勢必會要求自由。為什麼他們要滿意共產黨的壓迫統治？為什麼他們要喜愛獨裁統治，而且跟所有其他國家有所不同？西方對中國人民先入為主的偏見、重視經濟及外交利益，以及中共領導人的文宣刻意誤導下，讓我們誤信：在中國實施民主是謬誤的想法，或是現在談

論中國民主，時機仍太早，甚至民主根本與中華文明無法相容。但身為現代公民的中國人，對何謂民主，知之甚詳；他們受夠中共勒索統治，一心只盼中共早日下台。

難道中國人沒對中共現在放鬆社會箝制的作法，心懷感激？當然有，雖然自從中共允許人民有全家團聚、選擇生活形態，以及少數人有致富權利後，中共的確不再像往昔那樣粗暴對待人民。但中國人深知其一舉一動仍遭共產黨牢牢掌控，而且隨時有政策改變及遭派系鬥爭波及之險；無論是在城市、鄉村、或是企業中，每一位中國人依然遭地方小幹部任意擺佈。假如中國人有能力的話，一定會將這些共產黨幹部丟進歷史的垃圾桶裡。但中國人要將此付諸行動，可得先要有無比的勇氣才行……。

西方將這些民運分子稱為「異議分子」。此一詞彙實過於簡略；這些異議分子並非生活在社會邊緣的少數人，而是中華民族的代言人。自從中國遭共產黨宰制以來，這些民主使者便代代相傳下去。共產黨的傳聲筒竭盡所能要覆蓋他們的聲音，但我們在這裡建議傾聽他們的心聲：他們是中國的榮耀，可能也是中國的未來！

「一個正常的中國」——這是中國民運分子所追求的目標。請透過本書傾聽他們的心聲吧！這不是另一本有關中國的專書，因為概括性論述中國並無意義，就像概括性論述西方的

專書，俯拾皆是。中國人民無聲無息，惶惶終日過活，其處境史無前例的艱辛，要想預測中國的未來，實在令人難以想像！因此，我們很高興本書所傾聽的對象，是每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國人的心聲。而這些獨特的個人之所以被擇選，是因為他們均確信自身追求目標的正當性，個性鮮明，在中共朝野兩方對立的辯論中，具有代表性。這不是一本有關中國的專書，我們這裏所建議的只是：我於雞年期間與那些堅強不屈的中國人的面晤實錄彙編。花一整年的時間，傾聽中國民運分子及反抗獨裁者的心聲，對我而言，似乎是最起碼的義務。這也是讓我們不再重蹈西方面對暴君時心存幻想，因而慘遭覆轍的另一種方式吧。



Chapter 1

反抗異議分子

魏京生就坐在「禁止吸菸」標誌下，用別人吸剩的菸蒂點起菸來；沒人會責怪這位在中國蹲十八年苦牢的人違反法律。在雞年開春首日，這家位於華府中國城的速食餐廳老闆及顧客，都很高興他的光臨，大家爭相和他打招呼。魏邊吃湯餃邊向我解釋：「法治國家給我有可違反法律，卻不用冒太大危險的自由空間。」依照魏的論點，能享受法律的保障及可能違反法律的空間，這即是民主。他流亡美國，喜愛民主，也包含民主的缺失及不完美之處。他雖期望中國能實施民主，但並未將之理想化；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已到窮途末日，沒有任何修正替代的可能性。

魏京生是中國最知名及最堅貞的民運異議分子，他的民主運動之路始於1978年12月5日：那天早晨，他在北京西單的民主牆上，以「第五個現代化」為題，貼上大字報。「西單民主牆運動」係由當時共產黨新任領導人鄧小平一手鼓吹。鄧只是想藉此讓大眾支持其「四個現代化」（農業、經濟、國防、科技）改革理念，並將毛澤東遺孀江青的左派勢力剷除而已。魏當年僅29歲，以水電工為業（跟波蘭華勒沙職業相同），認為有必要向當局建議採行「第五個現代化」：政治民主化。直到那天以前，這個年輕人只在每週五下午，跟他的工作伙伴在北京動物園交換意見，從未曾有明確的政治立場。他只在私生活領域表達過個人意志，並且跟一位「反革命」家族的藏女同

居。同居在中國是非法行為，而且任何婚姻均需工作單位許可。既然魏及其伴侶無法獲得婚姻許可，只好當精神伴侶以符合社會主義法律之規範。惟此一道德規範自然約束不到共產黨領導人，眾所皆知，毛澤東可是個嗜性狂人。

說真話的漢子

魏在大字報中如此寫道：「他們應當有民主，如果他們向誰要民主，那他們只不過是要回本來就屬於他們自己的東西。如果誰不給他們民主，誰就是無恥的強盜，比搶走工人血汗錢的資本家更純粹的強盜。……我們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不要神仙和皇帝，不要相信有什麼救世主，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對任何人的信任都必須有一個限度。任何想換取人民無限信任的個人，無一例外地都是野心家。重要的問題在於選擇甚麼樣的人寄予信任，更重要的在於如何監督這些人執行大多數人的意願，我們不能輕信任何人會自願地為他人利益服務，我們更不能輕信任何人會為他人利益而損害自己的利益。我們只能相信那些在我們監督下向我們負責的代理人。」

這篇文章在西方根本平庸無奇，卻在中國造成震撼。民眾湧向民主牆前，有人高聲朗讀，好讓別人聽見；更有許多人感動流淚。在中共30年的教條洗腦後，魏講出每個中國人內心深

處的想法；該篇文章更是以簡單的散文體撰寫，沒有深奧難懂的馬克思主義或其他詞彙。魏署名發表大字報，被中共視為極度的挑釁行為。25年後，他向我解釋，他之所以署名，是為了要找回中國人的尊嚴，擺脫奴性象徵。

共產黨讓該大字報張貼數週。鄧小平成功打擊異己後，便將民主牆拆除。魏遭逮捕，被控「洩漏國家機密」；他那時只接受一位英國記者專訪。他的公審雖經事先設計，但公審經過卻被一名中國記者盜錄，流傳海外。這位記者——劉青還為此被判10年勞改。在新華社所公佈的照片，我們看到魏京生理著光頭，雙臂羸瘦，朗讀條文，訓斥法官。他援引中國憲法，要求法官獨立自主判決，法官雖顯困窘，仍將他判刑15年。

法國漢學家多蒙納克（Jean-Luc Domenach）將密閉單人囚室，簡陋的床，以及勞改營（中國的「古拉格」）等，稱之為「遭遺忘的群島」（L'Archipel oublié），魏即在此一處境下承受極大屈辱及無法想像的人生試煉，那種恐怖悲慘程度，堪與史達林及納粹囚犯相比。在西方，我們已接受「納粹殘殺猶太人」的歷史獨特性，但中國知識分子則將文革的勞改及屠殺比成波蘭奧斯維茲（Auschwitz）的納粹集中營。我不由自主地觀察起魏臉上的傷疤，想像他如何經歷黑牢的孤獨、虐待與拷打；他的牙齒因營養不良均已蛀壞，現在戴的是廉價假牙。至於其他，他似乎身體康健、精神抖擻且面露紅光，像是個中國民間

宗教的不朽神祇。多年的孤獨黑牢、絕食抗議，及強迫苦役經歷，難道沒在他身上留下任何痕跡？當然有！他現在雖已對精神或肉體折磨免疫，再也沒有受苦之感，但仍保有愛與熱忱的情懷：假如他脫離民主奮鬥之路，他則成槁木死灰。

他究竟如何堅持下去？如同南非總統曼德拉（Nelson Mandela）般，憑藉的是堅持信念的力量。他在黑牢中自我覆頌「我比獄卒自由」，因為他可以說出內心真正想說的話。「我比他們更快樂，因為我可以過一個真實的人生，而不是一個遭別人擺佈的人生。」在1994年服完刑期後，魏又再度被捕；他被控「試圖籌組工會」罪名送往勞改，「在人間蒸發」兩年。由於西方人權組織要求中共釋放魏京生，使他成為中國最知名的異議分子；1997年，中共以「健康因素」為由，將他驅逐至美國。此種作法，讓共產黨及魏雙方均有下台階，保住了顏面。

他當年僅29歲，生在共產中國，對民主又瞭解多少？他解釋道：「當時，我從未讀過西方哲學思想，如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Montesquieu）、或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但我所獲得的資訊還夠瞭解民主的優越性。」魏16歲時就當起紅衛兵，走過大江南北，親自體會過讚頌文革的八股演講，與文革實際醜陋、饑荒、恐懼及屠殺間之落差。他補充說：「我當時就和今日所有中國人一樣均認同民主：他們的知識足以認知到

民主的優越性。」

「魏京生不就是個中國一段已結束過往悲慘時代的見證人而已嗎？」只要有人膽敢提起他的名字，這就是我們在中國所聽到的回應。共產黨藉由此一官方說法，試圖擺脫魏的糾纏。他所代表的是所有人都想忘卻的一個年代，還是他對共產主義者還具有威脅的可能性？真相可能是一半一半：2006年的中國，雖不再是魏以前所認知的中國，但中國依舊遭共產黨獨裁統治，仍然排拒自我反省。因此，魏的民主奮鬥之路，師出有名，為的是打擊刻意忘卻，打擊違反人權，以及為迎接正常的未來預作準備。

聽起來，魏京生可能比任何一位派駐北京，且靠共產黨安排參訪路線的記者或外交官，都更瞭解中國的民意現狀？魏接受「美國之音」專訪後，所收到的聽眾電郵及電話回覆，成了他體察中國民意的測溫計：全中國均向魏回應，因為只有「美國之音」的廣播值得信賴。它是否真是收聽率最高的傳媒？當有人在中國如此提問，就會收到搪塞其詞的回應，如「播報員說一口標準中文」，或「在全中國的收音品質還不錯」。也有人回道：「我從不收聽，這根本是美國總統布希的代言人！」在廣東中山大學，有一位教授向我表示：「我所有的學生都在收聽。」但另一位教授則說：「沒有一位學生收聽。」整體而言，可知「美國之音」在中國還算知名，其聽眾（或許少數有

機，造成西方行為膽怯。不過，西方這樣的偏差對他而言只是暫時：「美國人遲早會發現共產黨無論在智慧財產權、人權議題、台灣議題、北韓議題，均欺瞞美國。」如此說來，美國與中國間的衝突，是否就無可避免？魏糾正說，是跟中共，而非跟中國。他強調，中國已歷經26個朝代統治，民主世代勢必來臨；中國終將重返民主國家之林，中國人將可過著平日企盼的正常生活。對那些混淆中國及中共概念，屈從共產黨壓力及誘惑的人，魏是否會加以原諒？那可必須將魏想像成總統，或另一位跟他類似的人才行……。

天安門的倖存者

在台北，當我提及跟魏京生的面晤時，吾爾開希的反應雖稱不上有點保留，但至少顯示兩人路線不同。吾爾開希表示，「魏是我尊敬的一位指標性人物，但他從未有機會付諸行動，而我則親身站上天安門示威群眾的第一線。我曾『指揮』過天安門革命；我曾是天安門革命的『指揮官』。」吾爾開希一談起自己，很喜歡使用當時西方記者所給予他的指揮官職銜。

對於這位曾於1989年5月「號令」50萬名學生，質問中共總理，與全世界記者對話，發動絕食抗議，以及不自覺將學生導向災禍的瘦弱青年，要將這些影像與目前這位壯漢作一連結，實在必須花點時間適應。

吾爾開希在台灣娶妻生子，過著安穩平靜的生活。但他一開口講話，依舊有鼓舞群眾及震撼權力的辯才。他黑色眼神依舊，有成吉思汗的影子。吾爾開希不是漢人，而是維吾爾人，出生在新疆的伊斯蘭家庭，但是卻認同中華文化。吾爾開希係其土耳其原名 Urkesh Davlet 的漢字譯名。他令我聯想起 1968 年 5 月，靠相同局勢而聲名大噪的法國巴黎學生運動領袖柯班迪 (Daniel Cohn-Bendit)。

他們兩位都是局外人：一位是德裔猶太人，另一位則是土裔亞洲人，兩人均在引領一群群眾下脫穎而出；他們的領袖特質或許是脫穎而出的主要關鍵。兩人均蔑視執政當局，否定其尊崇性及合法性。因為他們出身來自別地，要與當局保持距離，應較容易些；柯班迪沒被法國人尊重國家的傳統所癱瘓；吾爾開希比任何土生土長的中國人，更容易擺脫身分陷阱，不被恆久中國的威權所馴服。吾爾開希堅信，追求民主必須擺脫其「中國特質」的意識形態所糾葛；獨裁者隨時會援引「某一個中國概念」，來禁止異議之聲，或頂多容忍一下不平之鳴。中共故技重施，聲稱共產黨之所以要擺脫民運分子糾纏，並非因他們主張要求自由，而是因為要求自由就不再是真正的中國人。在吾爾開希「指揮」天安門廣場的時代，法國漢學家貝菲特 (Alain Peyrefitte) 便曾告訴法國讀者，六四學生運動領袖「並非中國人」；貝菲特在此運用「中國特質」意識形態時，

應會想起他擔任法國教育部長時，所面對的另一號「外國」人物——柯班迪吧！假如吾爾開希是個正統的中國人，他應該不會像中國文人一樣，只會向君王上書勸諫，甚至以死明志抗議而已吧。況且孔子學說雖已有2,500年的歷史，但中國人的反抗則從未間斷過。

跟柯班迪一樣，吾爾開希也是落得流亡海外的下場，但兩人命運的相似處也僅止於此。柯班迪繼續從政，吾爾開希則否。他雖身處台灣海峽的對岸，但深為祖國劫難所苦；他夢想一個更偉大的中國及進行一場合乎所願的革命。他說：「革命或許過於理想化！」吾爾開希捍衛他的天安門記憶，等待偉大時機的到來。他相信北京政府終究會承認學生運動的政治合法性。學生當時並沒有要推翻共產黨政權，他如是強調，學生只是要求共產黨對話並尊重憲法所賦予的言論自由。這是否過於天真？當時共產黨中，的確存有一股以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為首的自由力量。彼時正逢東歐「天鵝絨革命」及蘇聯「重建」時刻，在北京，學生企盼中國的戈巴契夫出現，而不是想進行政變。只不過他們錯估共產黨本質，實際上中共比蘇聯更獨裁專斷。

儘管中共不願承認錯誤，吾爾開希仍期盼六四天安門學運，至少能被中國民運分子視為一正面事件。但此一期盼並沒成功，無論身處中國或流亡海外的民運分子，對六四學運的歷

史意義立場分歧。1989年的學生抗議究竟是加速或是延緩中國邁向自由的進程？此一理論上的問題，便讓流亡海外的中國民運分子爭辯不休。

吾爾開希認為，天安門之後，「無論是中國人看待自己的觀點，或是全世界對中國人的看法，中國人再也不是奴隸！」這個北京之春也讓我們注意到，每一次中國人動員聚集，總是要支持爭取政治自由：1919年5月4日天安門發生第一起學生運動後，直到1989年4月，只要有人高揚民主大旗，便能號召示威者群集。若想號召支持中共，可門兒都沒有！每當中共在天安門附近的人民大會堂召開常會時，周圍總是佈滿數萬名公安及軍人。中共是否害怕人民的力量？2005年3月，為讓共產黨每年一度的橡皮圖章「人民代表大會」能順利召開，中共需動員65,000名公安維護會場安全。

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共總是以「現場」只有一位死者為由，否認到底；但3,000名示威群眾試圖逃離現場，卻被周邊巷弄的軍隊掃射。17年後的今日，中共依舊禁止提及或研究此一議題。丁子霖籌組成立「天安門母親」組織，試圖重建六四失蹤者名單，卻遭公安迫害。甚至在文學創作提及六四事件亦被中共禁止。就像文革經常在文學創作或電影情節中出現（但教科書可從未提及），我曾向以《紅高粱》一書及改編電影紅遍海內外的中國知名小說家莫言請問，何時

考慮將六四事件情節納入創作題材，他略顯困窘，向我彎身低聲細語表示：「15年內是不可能！」

跟中國內戰、大躍進、文革、勞改所造成的數百萬條人命相比，天安門屠殺實無足輕重；下令槍殺學生的鄧小平，對西方的反應居然如此強烈，感到震驚。歐美民意對昔日毛澤東時代所發生的事情，似乎比較不那麼錙銖必較？因為六四屠殺是在電視中眾目睽睽之下進行。天安門事件無論是在中國或是其他國家，終將是共產黨難以抹滅的印記。中國實施民主的一天，六四終將成為全國紀念日；共產黨對此心知肚明，每年每到六四祭日，即加強北京的公安措施因應。離該日愈近，首都市中心，公安便風聲鶴唳，民運分子手機故障，手機簡訊及網路通訊難通，「敏感」網站也無法瀏覽。儘管中共政府如此強大，但似乎總是對一小撮反抗者心懷戒懼。

我們的記憶力短暫

我們如何能否認這些事實的存在？1989年6月4日（這可不是很久遠以前的事），西方世界曾對中共屠殺學生滿懷憤怒之情。當年7月14日，適逢法國大革命200週年，當時倖免於難逃離中國的民運分子參加香榭麗舍大道遊行。對中國人而言，民運學生參加法國遊行，就如同那位不知名學生手無寸鐵擋在坦克車前的景象，在西方所引起的震撼，是同樣強烈。那

時很顯然無論歐美均不願重蹈姑息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史達林主義及赤棉之覆轍。西方政府最起碼都決定以武器禁運制裁中共。在法國，雖唯有貝菲特試圖替中共領導人緩頰，但也不支持武力鎮壓學生。他認為，寧可不公不義，也不要造成混亂局勢，寧可屠殺小眾，也不要引發內戰。比利時漢學家西蒙·雷思雖曾是歐洲第一位譴責文革，頭腦也一直比別人更為清醒，此次則認為西方的憤怒終將只是短暫記憶。自1989年6月起，他即以墓誌銘紀念往生者，宣稱「西方一群國家元首及商人將很快就會絡繹不絕趕往北京，再度參加血腥兇手的宴會。」先前擇選巴黎為寄居地的中國民運分子，瞭解法國的商業考量終究高於人權，於是他們便紛改赴美國及台灣各地。

流亡海外的異議分子在中國是否還有影響力？對那些經歷相同事件的同一世代，是有影響力；此外，其他人對六四的印象則日漸模糊。有些民運分子選擇融入西方社會，過著一般常人的生活，如教書的方勵之（有「中國沙卡洛夫」(le Sakharov chinois) 之稱），從商的柴玲，唸書的王丹。誰能責怪他們？吾爾開希表示：「在中國，我們不知何謂個人主義，愛情與消費，一切都是群體性與政治性。一旦有機會到美國，發覺這一切美好的事物，當時年紀輕，僅20來歲，自然會當下品味起來。」共產領導人也算準這些異議分子彼此無法和平相處，就算流亡海外也無法組成有公信力的組織來威脅中共。事實上，

中國民運分子隨著不同的世代、策略及野心，各有各的看法。再加上中共在海外積極運作，已讓這些民運分子無法有充分的影響力。對那些想接待魏京生、吾爾開希或達賴喇嘛的政府及組織，中共只要施壓解除商業協定或拒絕核發簽證，就足以讓他們望之卻步。當達賴喇嘛及魏京生造訪法國時，現任總統席哈克（Jacques Chirac）總是拒絕與其會面。而當時擔任巴黎市長的席哈克卻曾發表專文頌揚同一個達賴喇嘛！另外，共產黨也處心積慮防止海外華文媒體支持異議分子；在美國華人圈甚具影響力的紐約華文報刊，在2004年被中共秘密購併後，其政治立場也隨之改變。儘管魏京生及吾爾開希或許備受孤立，但只要中共說謊，他們便可即時說明真相。對此，中共實也無可奈何。

我們以上所遇到的流亡海外的民運分子，他們均非自願選擇如此。以下還有其他民運分子，留在中國繼續為民主之路奮鬥。

民主老兵——馮蘭瑞

時值北京一月，30道菜在中央轉盤迴轉，菜色並不特別知名。醬汁凝固，衛生條件普通。我們用塑膠筷子在公碗中夾來夾去。跟主人一樣，我們也吃得嘎嘎作響，醬汁灑滿桌布。自從中國人專注拼私人企業，此類型的小吃店到處都是，在這家

北京小吃店用餐，令我想起參加中國正式宴會的往事：毛澤東當權時代，尊崇侍奉西方訪客，賓客均對訪中留下深刻印象。當時有許多中國百姓餓死荒野，但西方參訪團（當時均是集體參訪）則是酒足飯飽。除了各種口味的佳餚外，宴會中還有演講朗誦：「中國菜與法國菜是全世界兩大美食。」這些雖是陳腔濫調，逐字翻譯成法文後，仍引起在座賓客驚豔，而且不斷以法語覆誦，再逐譯成中文，雙方舉杯盡興暢飲。中國的宴會禮儀，要求乾杯，並向同座證明已喝完；這項儀節並未消失。學會逐桌向每位賓客敬酒，一飲而盡的風俗，也是在中國必學之「不二法門」。

對中國賓客而言，由於外賓的到訪是吃飽飯的唯一機會，個個興致高昂。法國外賓的反應又是如何？在中方甜言蜜語及燕窩美食攻勢下，法方已遭迷惑；他們隨時準備全部概括承受，無論是盤中美食，或是文宣八股。將中法美食捧上天，傲視群國，雙方對各自文明的優越性，均心有戚戚焉。中國既然如此看重法國，法國如何能不喜愛中國的一切，甚至淪落成一丘之貉？當時，法國親中的代表團、以知識分子自居的人士、共產黨的同路人，以及其他輕信無定見的人士，在大啖中國美食的同時，亦接受其意識形態，而共產黨屠殺幾億中國人的事實，也沒令他們覺得難以下嚥。我們當時應該多關心廚房旁的粗活小間，好好監督主廚的一舉一動。西方商人及旅客雖繼政

治人物造訪中國，但中共主廚的戲碼是否更換過？表面上有，但實際還是由中共的小廚們主掌一切。當日的女主人——馮蘭瑞女士則讓上述幻覺破滅。馮女士獨自一人，便可代表追求自由中國知識分子未竟其志的長征之路。

她表示：「民主是所有文明的共同點，也是全人類不可分割的祖產。」假如這句話不是在公共場所發出，或許聽來十分平常。第一個令人驚奇的觀察：馮女士在公共場所高談闊論。難道在共產體制下，是可容忍人民讚頌民主？她表示，獨裁體制從未鬆綁，只是日益靈活。共產黨已放棄毛澤東時代洗腦似的作法，只要人民不群聚集結，就算異端邪說，共產黨均能容忍。中共猜測，就算10億中國人認同她的民主論點，她也鼓動不了群眾群起反抗。她回憶道，假如這發生在六〇年代，她早就被十五、六歲的紅衛兵抓起來刑求，強迫她承認錯誤。她可能會被打到承認對黨不夠堅貞，被迫對其反進步、反歷史、反中國的罪行懺悔，也可能被冠上美國間諜罪名。今日，共產黨不再攻擊遲暮老人，昔日的劊子手都轉業從商。中國人忘卻悲慘過去，實有其必要……。

馮女士說，中國人最短缺的東西，就是記憶；40歲以下的中國人幾乎對過往一無所悉，除非他們自己專研追求歷史真相。因為今日的獨裁者即是昔日獨裁者的直接繼承者，共產黨今日的所作所為，刻意要讓教科書對文革的恐怖及衍生的災

難，隱晦不明，並加以美化：共產黨在1964年所引發的饑荒被遺忘，文革被簡化成高中生的騷動行為。毛澤東雖已過世，但仍一直統治著中國。馮女士表示，中國的歷任國家主席，應可改稱為毛澤東三世或毛澤東四世，這一切都促使為人父母不敢向子女傾訴太多往事；或因屈辱的過往難以傳承，或根本不願再回想。

這位正義凜然的老婦人，冰雪聰明，看盡人間百態，往事歷歷在目，但她所屬的世代，已逐漸凋零。自1940年起，馮女士當時僅20歲，即跟隨毛澤東，她還曾是中共歷史的指標性人物。她表示，當年她可是一位「職業革命家」。因為她當時深信革命，服膺毛澤東主義的三項堅持：知識分子為共產黨工具、毛主席人格神聖崇高、人類進化是階級鬥爭下的產物。此一毛氏意識形態將儒家思想一點一滴從根拔除：孔子認為，人類本性，首重孝道，君王犯錯，文人應勇於指正。毛澤東則否定人類本性，奴役文人，唆使子女與父母反目，控告尊長，夫婦對立。馮女士之所以如此強調毛澤東主義否定儒學之鐵證，是因為西方許多親中人士誤信共產黨承繼中國歷朝傳承，在這個幻象下，毛澤東主義成了中華文明的化身，無可詬病、批判，幾乎受到普世的尊崇。事實上，馮回憶道，中共仇視中國哲學思想，摧毀歷史祖產及堅持消滅古典中國任何遺緒。因為北京的建築師曾乞求毛澤東保存古城區，但未獲同意。毛澤東

自滿地摧毀北京古塔，改建工廠煙囪，其他城市群起效尤。各城市先在革命名號下慘遭蹂躪，後復遭現代化之名所破壞。〈國際歌〉中「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的呼籲，沒有任何國家比中國執行得更徹底。毛澤東承認，這是因中國革命主義者中，沒有文人階級，因此推行起來更為容易。

在經歷這些苦難事件很久後，馮女士曾試圖瞭解為何當時會相信革命之言。她坦承：「年輕之所以相信革命，完全出於新奇……當時的革命似乎可將中國自官僚體系、貪污腐化及外國殖民中解救出來。」那時沒有人思考過日本現代化的模式是：進行經濟革命，但保存君主體制；只有俄羅斯及法國大革命令人嚮往。「我們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前，就已是革命者；當擅用革命性語言的共產主義者出現時，我們便紛紛響應加入……，」她在50年後的今日自我辯解，「我那時只是跟所有中國人一樣，只想追求自由而已！」

追求自由的中國人？這根本不是西方對中國的認知！馮女士認為，西方對一個世紀以來追求民主的中國人及因追求民主而喪命的中國人漠不關心，對此她甚感憤怒。在有權抗議的華人國度裡，人民會要求些什麼？在尚存自由空間的香港，25萬港人於2005年12月上街向北京政府要求普選香港特首。中國人不是喜愛所謂的開明專制君主嗎？馮蘭瑞強調，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對民主理念十分熟悉。1912年，孫中山的共和政府

籌組普選，當時除了婦女被排除在外（和歐洲相同），吸食鴉片者及佛教僧侶亦無投票權。1/4 中國人投票的結果，多數同意國民黨執政。當時，中國跟西方民主國家比起來，似乎毫不遜色。馮女士表示，很不幸地，中國文人「琵琶別抱」；當時最流行的西方意識形態攫獲他們的心。因為共和體制在他們眼中，無論是要進行經濟現代化，或是抵禦日本外侮，均效率不佳，因此1919年5月4日，學生走上北京街頭要求以「賽先生（Science，科學）及德先生（Democracy，民主）」之名，進行革命。而對科學及民主的渴望何以會演變成既不民主、又不科學的極權體制？箇中原因，眾說紛紜。

西方最常以文化傳承角度來解釋：毛是中華帝國新王朝的創建者，雖以馬克思主義為表象，但實際上承續天朝傳統。而要將這些亟力摧毀中國的農民及工人，視為昔日中國官員的繼承者，實在需要一個大躍進式的想像空間才行！

馮則提出另一種更虛心的說法：中共利用自身軍隊的優勢及蘇聯強力的後勤支持。她表示，跟1917年的莫斯科一樣，1949年在北京掌權的並非共產主義，而是軍隊。她要求不要將此種政變的標籤，貼在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之上。她坦承，中西方受騙的知識分子，著重探討知識分子的激情，而忽略研究革命的本質。八〇年代初期（此一智識自由時期，自此後便不再重現），馮女士出版一系列自由經濟專書，象徵與共產主義決

裂，邁向民主的非革命之路，此後便被視為改革主義派的教科書。這就是為何當北京學生於1989年春天反抗時，她當時跟許多自由派知識分子同顯遲疑不決的原因；她譴責學生流於口號激情，浪漫式的扭捏作態及幻想救世主的烏托邦國度！她認為，六四學運的學生，似乎不瞭解中國歷史，與昔日學運前輩太過類似，只不過口號訴求顛倒錯置而已。六四悲劇結尾更印證馮蘭瑞論點的正確：學生根本不瞭解共產黨的本質。

假如不是依恃革命，進行民主化究該走那條路？「從上而下。」馮女士如是認為。跟中國大多數的知識分子一樣，民主化淪落成探索共產黨政治局派系間的歧異，只好期待中國的戈巴契夫或葉爾欽出現，從共產黨內部摧毀僵硬的體制。也有人認為這種態度過度謹慎，而其他人則坦承，中國人最害怕爆發內戰。

不瞭解毛澤東及其繼承者統治的中國，將無法感受上述簡單對話的特殊意義。在現代歷史中，從未有一整個民族被如此緊密禁錮：中國人不僅不可暢所欲言，而且還被迫要思想一致。一般而言，在極權體制下，只要人民住嘴，通常還能享有內在自由空間，但毛澤東主義則要求人民思想「正確」虔誠。社會控制擴及私生活領域：臥房、婚姻、性愛均需服膺共產黨路線。七〇年代，人民麻木不仁，大家變成人云亦云的鸚鵡，整日復頌教條口號。私人間的對話，總以引述《毛語錄》為開

場白。人民所能接觸的盡是內容乏善可陳的書籍，及共產黨推崇的八齣「革命」愛國歌劇。各城市的廣場、車站、火車、辦公室、工廠裡，擴音器自清晨至深夜，整日播放軍樂；軍樂的震天嘎響，讓人民無法彼此交談、傾聽及思考。毛澤東主義與史達林主義最主要的不同是：蘇聯領導自知說謊，蘇聯人民亦知共產主義招搖撞騙，漫天大謊雖被說成事實真理，但少有人相信；中共領導人則不以人民接受官方版真理及活在謊言中為自滿，更藉洗腦手段，迫使中國人將謊言內化成真。毛式謊言的信奉狂熱，較似天主教宗教裁判所的打擊異己信仰，而不像無神論的史達林主義。由於中國並未去毛澤東化，因此這一切均成禁忌。1983年，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鄧小平的主導下，將毛澤東定位成「七分功勞，三分失誤，功大於過。」毛澤東以前曾將這套說詞用在史達林身上。為何是七分功勞？相信世人自有公斷。至於三分失誤部分，毛澤東可是罄竹難書：1949年大規模屠殺地主；1959年至1962年「大躍進」造成二千萬人喪命，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則奪走三千萬條人命……僅這三分失誤便足以讓毛澤東被控告違反人道罪的罪名。

馮女士的劫後餘生，以及中國人依舊保持理性，顯示中華民族對抗粗暴專制的決心。毛澤東無法創造中華新民族，史達林亦無法如願創造蘇聯新人類。無論在中國或在俄羅斯，只消停止共產黨文宣教條八股騷擾，便可找回人類的真正尊嚴。在

2005年1月間，此次與馮女士的面晤，促使我下定決心在中國度過雞年，傾聽中國民運人士心聲。這可是最起碼的禮貌回應。

新秀輩出：具有耶穌及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特質的道德世代

中國異議作家余杰年僅30歲，他應該算是馮蘭瑞的後輩。他在北京克紹箕裘，承繼她的志業，繼續奮鬥。問他何不流亡海外？他拒絕流亡。他表示：「中共是在這裏殘酷獨裁，壓迫人民，因此就要在現地將之打垮！」

這一世代係1949年革命以來，堪稱第三代民主反抗運動，其所冒的險可比先人少得多。余杰沒經歷比公安密室訊問更可怕的遭遇：而此僅止於恐嚇而已。戴副作家夾鼻眼鏡，舉止天真的他，或許沒被中共視為嚴重的威脅：這只是位沒有組織群眾能力的孤單知識分子而已。桀驁不馴的他，只有筆桿武器及學生、畢業生、年紀相仿的男男女女的讀者軍隊。只要作家沒有組織群眾能力，共產黨尚可容忍，睜隻眼，閉隻眼。但中共並不樂於見到作家擁有太多讀者；出版余杰創作的書商，有時迫於壓力，或拒絕手稿、或限制發行人數，或出版後被迫關門。

跟「戰士」魏京生及「指揮官」吾爾開希不同的是，余杰僅具反思能力：他以中國靈魂為訴求，中國即是其創作素材。

他請大家多讀二十世紀浪漫作品，好將作者及人物的人道主義及個性特徵作一連結。讀者藉著對比，將可推論出遭中共禁錮的社會是多麼粗暴，而這個社會則極力否定每一位中國人的身分及其內在的真實世界。甚受右派知識分子（亦即是非馬克思主義者）推崇的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余杰則是透過研讀現有的翻譯書籍，與之神交。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所下的詮釋，對右派知識分子而言，似乎可適用這個中國的歷史。余杰也以同樣主題寫下一篇短評。

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一書中，說明法國大革命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舊制度無自我改革能力所致。余杰認為中國過去所發生的事，也有相同因素。當慈禧太后拒絕改革派大臣建立法治國家的建議時，便曾在1898年發生中國歷史上首次革命；他們原本有機會將中華帝國改革成日本式的君主立憲。余杰認為，當鄧小平拒絕1989年學生的民主改革建議時，便發生第二次革命。而第二次拒絕改革的結果，便將共產黨體制判了無期徒刑。如同托克維爾對法國的觀察，余杰也觀察到在中國的革命已將菁英摧毀殆盡，中國文人無法通過1949年革命的試煉，已無法真正重生再造。儘管有教育界人士，但遭共產黨挾持，遭受僱的學校限制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甚至構思中國需要新觀念的自由。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中共為確保他們順從，慷慨提高薪津待遇收

買人心。而六四天安門發生前，教育界人士的無產階級化經濟狀況，曾促使他們心生反抗之心；不穩定且有限的收入使得他們心態保守，雖在必要時會支持革命，但十分謹慎小心。

余杰雖可代表中國青年的心聲，但無指揮號召力量，因此並不相信政治鬥爭會有所助益。與共產黨正面為敵，對他而言，不僅白費力氣，還會遭惹殺身之禍。他認為，魏京生的時代已經結束，年老民主戰士的文革年代顯然過時，當時善惡不兩立，絕無模糊選擇空間。余杰相信，魏京生不知道中國及共產黨均有改變；中共雖依舊殘酷，但變的更為靈活。余杰認為，因為公安及軍隊將「異議活動」扼殺在萌芽狀態之中，馮蘭瑞或魏京生等前一代所期盼的民主革命，將不會發生。中國各城市居民對在雞年期間所發生焚燒工廠及村莊的暴動，幾乎未曾聽聞。阻隔城鄉，箝制資訊，這些作法使得地方反抗勢力的總體力量，將永不可能匯流成革命洪流。即使透過網路，它也逃不過共產黨資訊箝制的命運。那麼中國就註定要被共產黨永久統治嗎？余杰表示，改變終將到來，人權亦將戰勝，但並非透過革命之途或共產黨蛻變之路來達成。「共產黨不可能會進化，只會不擇手段，就算動武，也要捍衛政權。」余杰表示，改變將透過祈禱以竟其功：中國第三類型的異議分子相信道德救贖之路。

雞年期間，中國雖對道德、宗教、精神空虛等談論甚多，

但該如何填補此一真空？的確，中國人過去總是篤信宗教（或追求神秘主義，或迷信，無論用什麼字眼形容均可）；他們可從未長期遠離廟宇或神祇。共產革命後，祭壇及宗教神品一一被摧毀殆盡，毛澤東立即把自己神化以取而代之；推出「小紅書」（《毛語錄》）取代神聖經書，並要求所有中國人奉如佛經及道典般復誦。中共更構築聖人崇拜：在共產黨主導下，革命的殉道者成了聖人。在毛澤東當政期間，每一位中國人被迫要針對內心反抗共產黨的罪惡懺悔。毛澤東的一神論，除廣令眾人受苦受難，還佔據人民心靈。毛死後，個人崇拜消失無蹤，而個人化的毛澤東主義也隨之褪色隱退；中國人又得被迫面對鄧小平「你們富起來吧！」政策。但單靠消費並不足以讓人生有意義，而此也僅能圖利少部分中國人而已。中國人是否該重尋傳統的宗教信仰？

余杰將古老宗教排除在外，因為道教及佛教千年以來，均與當權者妥協，不足以作為當代所需的道德典範。他認為，這些宗教的工具性比精神性還高，且較屬內在性，並無超越性；中國人祈求佛陀或諸神只是為獲得具體利益，而非重建人道社會。在余杰的眼中，基督教義的普遍性十分鮮明，可藉此重尋道德精神本源，但他排除天主教。他表示，「官僚體制」的階級制與共產黨相仿，此一官僚特質，解釋了為何羅馬天主教在中國無法成功拓展之因：雖經一世紀的傳教，天主教徒仍僅千

萬之譜。最適合中國的基督教模式，應是無須牧師引領的福音新教，透過研讀聖經，直接與上帝對話。

余杰是如何改換宗教信仰？他的妻子，一位美貌的年輕女子代他回答，她表示：「我就是上帝所選的。」余杰5年前在北大決定改信福音新教。校園裡，新教徒衆多，而來自美國的英語教師對福音傳播，有默默促進之功。余杰所凸顯的道德渴望，說明了此一信教風潮。在這群知識分子中，也關切中國為何發展落後。何謂西方的優勢？1919年五四學運及1989年五月學運均認為，西方的優勢即在民主與科學。但在民主與科學的背後，基督教不就是西方文明的根基？此一反思，解釋了人民為何傾向擇選此一基督教義模式之因。我們可否將此一傾向與追求長生不老藥的傳統拉近距離？將耶穌充當神仙金丹？或是人生啓示？但如此一來，所有這些因素混雜一起，恐怕就連我們本身或是新進教徒，都無能力予以辯識區隔。

在妻子信教2年後，輪到余杰被耶穌選中。這對30歲不到的年輕夫妻，每週2次在不同情況下所租的一間公寓裡，參加群體禱告及研讀聖經活動。一間地下教堂？有時候，一位所謂的地下牧師也會前來協助。他來自温州，因温州係福音傳教士的歷史大本營，所以有「中國耶路撒冷」之稱。參加的人有哪些？學生、教育界人士、藝術家，及同一世代的自由派教授。福音新教是屬於新興菁英及富有住宅區的宗教嗎？它的活動範

圍其實更廣，我們預估在中國約有4千萬「居家」新教徒，脫離共產黨掌控，聚會研讀聖經。另外，還需加上經中共官方認可的「愛國」基督教徒，約有2千萬之譜。余杰認為，假如這6千萬新教徒及千餘萬的天主教徒，能將批評力量群聚起來，將有利推動爭取人權的訴求。想想基督教在亞洲民主中所扮演過的重要角色：孫中山就是天主教徒，南韓第一位民主總統金大中也是天主教徒，另外在台灣及香港，民主領袖通常是新教徒。從中國這波福音新教信仰熱潮中，余杰夢想中國能出現像美國人權鬥士金恩（Martin Luther King）博士一樣的人物：他可能帶領中國社會脫離革命及暴動之泥淖，而將整個局勢完全改變。

我們觀察到福音新教在全世界普遍發展，在所有宗教中，福音新教堪稱是在世界各國征服最多信徒的宗教。福音新教雖來自美國，但是否可稱為美式的宗教？美國文明對中國反抗分子確有某些吸引力，而他們也坦然接受。藉加入福音新教之便，讓他們宛如參與個人主義及民主社會的美國夢想。除了美國夢想的原因外，福音新教在中國及其他國度的發展，鼓吹每個人成為自己心中的聖堂，說明此一個人化宗教的個人化特質。一個脫離共產黨掌控的個人化聖堂，有與共產黨正面交鋒的機會：公安為轉移余杰對反抗運動的注意力，經常會以長時間的訊問加以騷擾，余杰表示：「假如沒有耶穌襄助，我恐怕

無法在 10 至 15 小時的訊問下熬過來。」

有了耶穌，他便可毫無懼怕地活在「真理的陽光下」。這讓他不斷地挑戰共產黨箝制資訊的空間：雞年 8 月，正當中共大肆慶祝共產黨 1945 年對抗日本法西斯主義勝利時，余杰便在香港發表文章提醒，這些日本法西斯主義者可沒像毛澤東屠殺如此多的中國人。而他也認為：「文明的奧運比賽居然會在窩藏屠殺者遺骸的北京舉辦。」實在令人不可思議。

余杰的言論自由是否可以代表今後任何人在中國均可暢所欲言？你看，人民可自由表達心聲，那麼我們可得要相信共產黨！但由於中國對其作品箝制，他並無法在中國發表此一言論。假如不是因為他在國外的知名度，尤其是在美國的名氣保護著他，這位年輕作家可能早就關入大牢了。從現在起直到 2008 年北京奧運，余杰無須冒太多險便可暢所欲言，因為共產黨害怕將他監禁，可能會引發美國捍衛人權組織抵制北京奧運。

共產黨害怕老鼠

共產黨為對付幾位遭孤立、藉電腦與外在世界相連，既無軍隊，亦無組織的民運分子，所擺出來對付的規模陣仗，實令人瞠目結舌！中共政府及其鎮壓工具是如此的強大，但居然會因擔憂劉荻的言論及著作，未經審判便將她判處 1 年徒刑？

劉荻是位北京學生，二十來歲，身材嬌小且有近視，在網路上以「不銹鋼的老鼠」筆名發表文章。這隻老鼠將捷克前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波蘭記者米尼奇克（Adam Michnik），尤其是前東歐共產國家異議分子的作品，逐譯成中文，在「自由與民主」的網站上發表。中共國安局認為她出言不遜，具危險性，便封鎖網站，阻絕網友瀏覽。劉荻後在中國捍衛人權律師的抗議下被釋放，但仍遭監視。因此，我需要透過很多次的嘗試，才能與她會面晤談。公安透過電話監聽，只要我與她約好會晤時間，便禁止她外出赴約。國安局針對「中國的敵人」，採取「軟禁在家」手段。其他的網路異議分子可沒像她如此幸運：2003年，何德普因在網路上推薦籌組一個民主反對黨，被判8年徒刑。

劉荻對共產黨所投注的關注十分訝異，她認為，中共根本不像表面看起來那麼強大，個性尤為懦弱。她表示，「甚至有些大人物，有時候還會害怕老鼠！」

除諷刺外，這隻不銹鋼老鼠似乎對她真正的險境並不十分清楚，必須要瞭解，只有當老鼠變成哈維爾，共產黨才會真正懼怕：中共害怕步上蘇聯、東歐，尤其是最近的烏克蘭、喬治亞等共產黨衰亡的後塵。中共將每一個共產黨國家的衰亡，均賦予一項簡單原因；致命的錯誤，絕不容再犯！

蘇聯的錯誤，即是在經濟改革前，先進行政治改革。蘇聯

並不全然腐敗，而是遭戈巴契夫容忍政治多元主義的粗心所扼殺，此一錯誤絕不可再犯！此一詮釋可避免探討蘇聯瓦解的真正原因。


那麼波蘭呢？假如波蘭共產黨過去能禁止組織工會，箝制天主教的話，波蘭今日依然會是個共產國家：此即我們在中國報刊的所見所聞。在培育中共幹部一條鞭思想的黨校裡，也是持如是看法。總之，中共監視宗教，尤其是服膺外部權威的天主教，禁止籌組任何工會，以免日後要與中國的「團結工聯」相對抗。

而捷克呢？則是肇因於共產黨容忍自由派知識分子有害的言論自由；中國可沒此問題。

至於喬治亞，這個民主最新的犧牲者呢？中共派遣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專家親赴考察，認為喬治亞共產黨之所以失守，是因為非政府組織的致命影響所致，而有些組織甚至接受美國基金會，尤其是索羅斯（George Soros）的金援。而這一位索羅斯卻以外商身分出現，在中國十分受歡迎，他今年成了海南航空的主要股東。

雞年期間，以上中共診斷一出，任何具公民社會雛形組織的模式，均遭制止：無論是追求環境保護，打擊愛滋的非政府組織，甚至北京及上海大樓的住戶會議，均遭禁止。任何可能導致集會自主的一切，均遭共產黨幹部監控或消滅。

當然，以上有關東歐共產瓦解的表象分析，從未將當地的複雜情勢考量在內。這些分析稀釋對獨裁政體的本質及其命運之詰問，此種辯論在中國根本無法想像。藉將共產主義的失敗歸咎於粗心，中共自信能恆久統治：捕捉老鼠僅屬策略運用。我們實在懷疑這些老鼠有推翻共產黨的能力，但有劉荻及何德普一輩新秀，我們應可看到中國新時代的來臨。



Chapter 2

毒草雜生

高耀潔在65歲以前，一直生活規律且默默無聞，只是位任職河南鄭州醫院婦產科的醫生。但高醫生的命運，自1994年2位來自上蔡縣的農婦求診後，便起了變化。高起初很驚訝，上蔡縣是中國最貧窮的縣治之一，那裡的居民通常一輩子都沒看過醫生，由於負擔不起，就算生病也不會求醫。河南鄉間，既沒醫生，也沒醫院，更無診所，所以根本沒有求診的習慣。此外，上蔡縣又距鄭州200公里之遠。10年後，她回想起這段不預期發生的往事，她表示，她的一生被打亂，某種程度來說，並非出自自己所願，因此就算是多麼微小的細節，往事亦歷歷在目。自此之後，扶持眾生的使命便一直引領著她，也將伴隨她直至離開人世為止。假如還為時未晚，她仍願意奉獻拯救中國免於愛滋病肆虐之水火。儘管年歲已高，行動不便，有心臟宿疾，她依然全心全力投入這個自內點燃希望的使命，促使她憤筆疾書，上網撰文，及照料那些遭遺棄的河南愛滋病患。高也因此與共產黨發生齟齬爭辯，被冠上一株「毒草」——此一政治性話語的稱號。

「鋤掉毒草！」此即中國在「百花齊放時期」，享有短暫言論自由後，毛澤東在1959年向中共黨員所下達的終結指令。百花齊放的結果令毛震驚，他緊縮政策，並藉此機會引蛇出洞，鎖定不服專制統治的知識分子及藝術家。他下令，10%的異議分子應自社會中「鋤掉」，遣送牢改營或就地正法。此一

詞彙與文革時代的「壞分子」，沿用至今，令人想起中共清洗社會的狂熱往事。「壞分子」及「毒草」均係指無可救藥的反革命分子。在血腥暴力的年代，中共會除之而後快；在和緩平穩的年代，如同雞年期間，公安幹部便採孤立策略：軟禁在家，重複拘捕，未經審判便直接囚禁，好讓他們無法污染社會純潔的心靈。很不幸，毒草無窮無盡，只會愈鋤愈多！

高醫師反對「血頭」

由於異常發燒難耐，2位上蔡縣農婦決定要進城求診；河南鄉間，肝炎、痢疾、結核病十分普遍。但此種發燒及疲累現象，在病理學上並不常見。高醫師並沒有花太多時間診斷，便判定2位農婦已罹患愛滋病！高對此尤表難以理解，她知道何謂愛滋病，但可從未真正碰見過。她過去深信，愛滋病甚至根本不會在河南存在。八〇年代初期，正當愛滋病先後在美歐等國出現時，中共衛生部還曾將愛滋病描述成資本主義社會墮落沈淪，道德瓦解的明證，自認為中國不會有愛滋病。之後，當中國出現愛滋病病例時，其病患還僅限於那些雲南共用針頭吸食海洛因的吸毒者，以及上海或北京等大城市的同性戀者。高醫師，身為共產黨名人之妻，是位清教徒，還曾堅信以上說法：愛滋病就是個「髒病」，中國民衆可是一直如是認為。

因此，這2位農婦罹病過程，就成了難解之謎。高問診

後，發現她們手臂針痕處處：15年來，她們平均每週賣血兩次。跟上蔡縣的所有村莊一樣，賣血成了她們賴以為生的主要財源。高開始恍然大悟，這個堪稱中國可怕重罪之一的愛滋病，便是以此在該地蔓延開來。血販傳染人數也達數十萬人之多。高想探究愛滋病是在何種情形下開始爆發開來，為何持續存在，以及為何直至2005年才肆虐全中國各地？

高曾向河南衛生單位提出警訊，但遭命令不可對外張揚：愛滋病在1994年還是歸類為國家重大機密。少數發現此一真相的醫生，以及膽敢對外報導的記者，都遭囚禁入獄。高往昔即遭公安監控，至今還是如此。共產黨幹部向她解釋，洩漏愛滋病消息，會讓河南蒙羞，而且同遭愛滋病肆虐的還有其他省份，若河南首先承認會令人感到遺憾。透露此一訊息，不僅會讓河南農產品無法銷售，廣東工廠也會拒聘河南人，而且河南人也無法從軍報國。但河南的幹部並未向高坦承，自1980年起，血漿販售業曾為私人企業賺進大把鈔票，要當「血頭」還需要有共產黨幹部配合才行！（「血頭」一詞，係新聞傳媒援引販賣人口「蛇頭」之義，所創造的專有名詞。）這些企業賣血致富後，多逃至美國定居。

這些受害者本身不也靠賣血獲利？我們在今日還會聽到此種論點。在河南最貧窮縣治之一的上蔡縣，對那些無法東進沿海各省打工的村民而言，賣血的確成為他們生活主要收入財

源。血漿盤商以每40厘升血漿1歐元（約合新台幣44元）的賤價蒐購，村民賣血所得報酬，只夠讓他們留在村莊過活，繳交各種稅款，而繳交稅款即是中國農民的主要支出大宗。

許多受害者向我解釋，假如逾越地方當局所制訂的二胎化政策時，賣血收入也需用來支付相關罰鍰。這些地方幹部可是比稅務官員更為嗜血：他們監視懷胎婦女，懷胎6月，依然強迫墮胎；而非法生胎，則沒收家當。賣血報酬恰好用來供養這些惡劣官員。河南哪一個官員不貪腐？中國河南著名作家張宇，便以鄭州為故事背景發生地，創造一位因過於正直致前景黯淡的可笑公安角色。張宇寫道，幹部不貪腐，其動機可疑。小說主人翁有點類似法國探長梅格烈（Maigret）的角色，單憑肉眼即可鎖定宵小。他雖是惡霸可怕的對手，由於拒絕受賄，無賴成了頂頭上司，自己也成了全市的笑柄。

高實地造訪上蔡縣，發現為何會傳染如此多賣血人的原因：所有醫療器材均由一台農業牽引機運送，每個村莊只共用一個針筒抽血，抽血後現場分離加工，區隔血漿、紅白血球及血小板。但只有保存血漿，血球及血小板則又再注射回賣血人的身體中；因為有人向他們解釋，透過此種方式，較易恢復體力，每週才可以賣血二次，甚至更多次。為了要能多次賣血，村民幾乎將原先所抽血量的半數，又注射回去。

「血頭」及地方官員，何時知道愛滋病在河南蔓延？自

1986年起，西方已知道愛滋病的傳染途徑，河南官員至遲也在1990年獲知相關訊息。不過當時賣血風潮正達巔峰！中共之所以會在1996年明文禁止賣血交易，與其說是共產黨良心發現，倒不如說是因高醫師按對鈕，運用國際媒體所致。美國《紐約時報》及法國《解放報》實地的採訪報導，撼動中共高層，終使賣血交易完全遭禁。

共產黨對這個事件的因應模式，更令人感到毛骨悚然：若經證實，歸咎西方；若遭控訴，否認到底；烏鴉閉嘴，鋤除毒草，絕不能在掌握經濟發展之鑰的西方面前，卑躬屈膝，丟了面子。

然而，高醫師的使命根本尚未完成，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愛滋病患的未來如何？共產黨採取孤立政策，讓他們自生自滅。公安圍守，禁止他人進入。河南風景明信片再也看不到上蔡縣，該縣居民宛如在人間蒸發。當愛滋病肆虐全中國時，高醫師及外國媒體均不向當局的恫嚇屈從讓步。或許是擔憂或害怕引起外商反彈撤資吧？中共在2000年便承認愛滋病是個正常疾病，告知（很少的）群眾，並引進療法。2005年元旦，中共總理造訪上蔡縣「愛滋村」，在電視攝影機面前，與罹病村民握手致意。他宣佈，上蔡縣將建造成愛滋病治療及預防的「模範村莊」。中共居然可將一個壞消息，處理成正面新聞，我們對中共文宣部的伎倆知之甚詳：一切以維護國家秩序至上。媒

體則轉播經治療恢復元氣的愛滋病患，及上蔡縣新設的醫療診所等鼓舞人心畫面。一座村莊，一口水井，雖所提供的是平日用水，無法生飲，但對這個為愛滋病、肝炎、痢疾所苦的悲慘省份而言，根本就是個奢侈品。每一水井上，從遠方便可瞧見斗大紅字：「政府給你幸福水源！」這些宣揚共產黨榮耀的水井，卻被周圍鄰區當成愛滋界碑，宛如現代版的癲瘋病院。身康體健的人們則避免跨越水井界碑紅線探險，外國傳媒對此議題也興趣缺缺。但高醫師依然堅持如昔……。

高醫師與我一起造訪上蔡縣。第一站參訪的是鋪有柏油，容易到訪的文樓村。該村堪稱具有模範診所、模範醫生，及模範社工的模範村莊。從鄭州調派至當地的幹部，下令大興土木，建造病患住所，從其奇特的希臘廊柱便可一眼辯識，或許是為展現西化程度。由於愛滋病患並沒有被真正視為正常病人，就算是知識分子也不例外，因此他們通常是足不出戶。

2005年夏天，以積極對抗愛滋病自許的美國前總統柯林頓，造訪河南愛滋村，笑容滿面地與地方當局所特別挑選的「愛滋孤兒」合照。柯林頓到訪的「笨拙」理由，卻使某些西方領導人與共產黨當局間的貪腐協議曝了光：中共同意美國前總統所主持的反愛滋基金會前進河南救援，但柯林頓本人不可造訪太過悲慘的愛滋災區。拍完照後，該基金會可以捐贈藥品給地方衛生當局，但無權干涉如何分配。由於分配不當，導致

幾位愛滋病童幾週後便過世。世人看到了柯林頓的照片；而那些受害者的照片，卻永遠也看不到……。

參訪完文樓村此一「樣版」後，我們續訪南大吳村，由於路面太差，一般車輛無法通行。加上為逃離崗哨公安注意，我這個老外只好躲入牽引車後的帳篷拖車裡，幸好此時公安尚未輪班巡視，一旦進入村內，就不怕被攔截。公安畏懼愛滋，根本不敢越雷池一步。此地，村民3,500人中，已有300人死於愛滋病，600人遭感染，因沒有強制檢驗血液，恐怕感染人數應會更多。高試圖勸導頑抗檢驗的村民。她雖曾引進藥品救人，但卻遭公安蓄意抹黑成毒藥，河南農民太過純樸，輕信謠言。她於是只好改配發衣物給那些一無所有的民衆，賣血無望，所種蔬菜也無法輸往鄰省販售，背井離鄉成了最後解方，但需假造身分證件，掩蓋聲名狼藉的出身籍貫。村莊本身，為了殘活，只能靠菜園及豬隻為生，以排泄物施肥，面積雖小，但還有些生產力。我發現在村莊中央，有座大型的現代房子，高聳磚牆，鍛鐵大門：屋主究竟是位富農，或是公務員？村民笑著向我解釋，這房子可是由某位河南老鄉，遠赴廣東行乞，省吃儉用所興建的！他去廣東原想找結婚對象，但因職業卑賤，毫無所獲，回鄉後便用積蓄蓋了這棟樓房。愛滋病可沒把傳統階級觀念給掃光，就算死於悲慘之中，還得保住面子！

政府有無發放愛滋受害者補償金？中共聲稱有發放，亦經

媒體證實，每位病患每月可收到120塊人民幣，約合12歐元（新台幣528元），這在當地可算是筆不小的數目。實際上，村民每月僅收到10元人民幣，約合1歐元（新台幣44元）。政府所發放及病患所收取間的價差，究竟落入何方？由於行政體系及共產黨幹部的薪津微薄，大部分補償金早已落入他們的口袋之中，這在中國可是十分普遍！

這裡有八成家庭感染愛滋，幾乎每戶人家，每間破柴泥房，都有長期臥床不起的病患在垂死掙扎。眼前的真實景象，夾雜過往畫面，實在令人不能不想起納粹死囚牢房。一位婦女準備幫她夫婿注射點滴，他臥床兩年，全身佈滿痘痂，她一不小心，就弄傷了他。瓶中裝些何種液體？她並不知道。標籤寫著葡萄糖字樣。她注射點滴的目的為何？只是想有所作為而已吧。她向我們表示，「醫院及電視都說要注射點滴才行。」因此她就注射點滴。

難道沒有醫生來看過他？她很厚道地表示，醫生太忙。她口中的醫生，就是所謂的「村醫」。高醫師聳聳肩膀，面露愠色。此時，這位村醫正好過來向我們打招呼。這是一位倖免於難的村民。他向我解釋：「我是基督徒，而且《聖經》也禁止販售血漿。」他對基督教義一竅不通，如何成為基督徒？他回答：「因為家中信教。」他的醫學及福音知識，同樣蹩腳：他在鄭州醫院受訓3週後，便獲得執業醫生證照。但這個傢伙可

不笨，他笑著敘述中國醫藥演進歷史，毛澤東時代，他只受訓3日，便晉陞為「赤腳」醫生。從3日到3週，中國可是進步神速！他坦承，他主要擔任的工作，是陪伴垂死病患及安慰倖存病人。沒多久，醫院將僅剩愛滋孤兒。由於父母供不起學費，儘管號稱是義務教育，但沒有一家學校願意收留。無論他們是身體健康或是愛滋帶原，老師及未遭愛滋侵襲的人家均拒絕接納這些孩童。北京青年李丹試圖創設愛滋病孤兒救助學校，但遭中共當局囚禁，李丹解釋，中共想抹去河南那段令人困擾的歷史，而這些孤兒卻成此一歷史的見證人。

但愛滋病並未因此消失，反而隨著村民所賣的血漿，在全中國散佈。只有高醫師觀察到新愛滋病例已在所謂疫區外的省份出現；河南政府則採地理檢疫政策，試圖圍堵愛滋，將受害村莊控制在37個，1個也不可多。此一荒謬可笑的否認政策，卻讓河南政府將愛滋病受害者（無論過世或仍在世），預估在25,000人之譜。實際上，單就該省的愛滋受害者，就至少有250,000人之多。北京中央政府也據以仿效，將全國的愛滋病患預估在110萬人之間。但各地醫院每年所統計的病患卻逐年增加100萬人。而河南人四處打工，早已將愛滋病毒擴散至北京或廣東，為將愛滋局限在河南所撒的漫天大謊，根本是荒誕不經！愛滋受害者，還擴及那些收購河南愛滋病血漿醫院的受血者。賣血業在官方明文禁止前早已存在，禁止後也依然續存。

中共在1996年明文禁止販賣血漿，但高卻在1998年發現一批遭愛滋病感染的河南血漿，先向西安醫院兜售遭拒，後卻被上海醫院以低價買入並使用。由於沒有任何一家媒體敢報導此一醜聞，為了拯救生靈，高於是上網公佈真相。女鬥士雖抗拒其義行遭政治化抹黑，但有心人士仍將高抹黑成一株「毒草」。

道德新生代陸續接棒

恐怖販血及背棄病患並未激起河南人特別的互助之心；個人致富早成主流意識，同情憐憫已蕩然無存。但這一事件卻打動幾位北京學生的心坎，自動放棄學業及前途，前進河南，支援高醫師及病患。李丹及胡佳這2位學生捨棄假期，犧牲奉獻，值得讚揚。這2名年輕人如同高醫師的學生，而高也視之如義子。北京—河南兩地夜車奔波，河南氣候嚴峻、衛生不佳，讓她對義子的健康叮嚀再三。另外，任意詰問、審訊及威脅，也成家常便飯。李丹放棄在北大研讀天文學的機會，在2004年，24歲那年，他毅然創建一個非政府組織，在中國罕見但卻合法立案，以協助愛滋孤兒為念；胡佳年紀稍長，31歲也籌組機構，協助愛滋病患。礙於他的機構立案時並無非政府組織身分，雖非以營利為目的，但在中國法律眼中，仍被視為需繳稅的私人企業。中共當局深諳企業本質，與之相處融洽，但對非政府組織則難以定義，擔心其有支持民主活動之嫌，讓

共產黨渾身不自在。

胡佳信奉佛教，為達賴喇嘛信徒，展現天地大愛胸襟（很令人遺憾，我在中國實在遇不到幾位類此人物），他膽敢將河南悲劇歸罪於政治體制。儘管年紀輕輕，胡佳從事民主運動的紀錄輝煌：1990年6月4日，六四天安門事件週年，他身穿黑衣，別戴白花，獨自在現場悼念；他當時僅14歲。2004年6月4日，六四天安門事件15週年，他又獨自出現現場，面對數千名公安，隨即遭逮捕。胡佳批判河南領導人，先鼓勵村民賣血為生，出事後又抵賴，至今依然否認到底。他很驚訝，居然無人為賣血醜聞負責、認錯或遭追緝。難得有幾起向河南法院提起的國賠訴訟，則在共產黨主導下，遭檢察官以缺乏證據為由一一駁回。據胡佳觀察，河南在九〇年代，賣血風氣達到巔峰，當時的省長就是李長春，此後在共產黨平步青雲；2004年，他進入中央政治局，在中國權力核心中排名第八，目前是負責文宣事務。

從賣血醜聞中，我們如何能不察覺到中共真正的本質？我們很驚訝，胡佳大聲疾呼認清此一恐怖事實，卻沒遭共產黨如毒草般鋤掉。他現在只靠其西方知名度保護過活；在北京籌辦奧運前夕，逮捕胡佳，恐會引起美國媒體抨擊中共。我們必須解救胡佳、李丹、高女士這三根漂浮在中共血海中的麥桿。這些毒草的存在，是中國的驕傲，或許，也是中國的未來。

一位反對新聞箝制的嚴姓記者

針對中共領導貪腐，嚴君提出另類解釋：共產黨黨員瞭解國家真正處境，知道共產黨末日已到。因此儘速致富，匯往國外，尤以美國最受青睞，他們已將舊金山、夏威夷及溫哥華的許多社區買下。

嚴本身消息靈通。他在省報撰寫專欄，是位經驗老道的記者。但他同時又擔任共產黨「內部刊物」編輯，以「筆名」發表文章。這個內部刊物堪稱中國奇事之一，發行兩類刊物，其讀者群，一是針對普羅大眾，另一是針對共產黨幹部。第一類報刊只登載文宣訊息；共產黨幹部瞭解消息來源，知道該類報刊只刊登謊言。他們期盼獲告實情，於是針對讀者此一需求，嚴則擇選中國及外國通訊社的電訊、無法在中國出版的文章、外國刊物節錄，及上網搜尋資訊，複印結集成冊後，在中共高階幹部間流傳。在中國的每位幹部，依據職等及所在地之不同，均被列為內部刊物贈閱對象。其內容主題不外是農民造反、工人反抗、幹部及公安遇襲，工人謀害工頭、法輪功在美示威、中國銀行瀕臨破產、生態浩劫、疾病災難迫在眉睫。共產黨幹部假如浸淫在西方新聞自由社會，可能會對上述批評免疫，但身處中國，他們已被事實真相與官方謊言間的差距，弄得六神無主。根據嚴的看法，中國民運分子雖期盼中共垮台，但共產黨幹部早從這些真實事例，確信中共末日遲早將臨。

內部刊物與公共訊息間的差距對比，的確驚人。共產黨所公開的訊息，均是正面報導、激勵人心及鼓舞士氣。如果報導貪腐醜聞，目的是勸人引以為戒，並凸顯共產黨打擊決心。這一切都經中共文宣部門精心策劃。中國各報刊編輯部，每十天就會收到明確指示，要求報導哪些主題，應如何報導，以及不可提及哪些議題。此一指示通常會張貼在編輯室，為保住飯碗，記者只能屈服現實。膽大妄為的記者，雖鑽指令漏洞，報導一些呈現中國社會黑暗殘酷面的社會新聞，但既沒直指問題核心，亦無抨擊共產黨體制。還好有這些以冒險為樂的記者，地方報刊才得以報導欺瞞詐騙、非法交易及敲詐勒索的新聞，中國社會粗暴，對弱者更是不公不義！

在合法尺度邊緣遊走的新聞工作充滿危險。2005年9月，湖南記者師濤因洩漏國家機密遭判刑10年。事實上，他僅將中共文宣部一份不具機密性的資料，上載網路而已！但此一判決主要目的，是為維持社會秩序，傳達新聞需在共產黨監控下，才能運行良好的訊息。師濤的判決亦揭露中共公安與美國企業間的共謀關係。師濤將文章上載雅虎網站，卻遭出賣。這位美國華裔總經理，針對美國媒體抨擊向中共洩漏記者姓名，提出以下辯解：「我們是為了尊重當地民情。」民情？雅虎既沒屈從於法律，也沒遭公安具函要求，就附和共產黨箝制新聞及攻訐密告的慣習。而中共為感謝雅虎「尊重民情」，同意雅虎收

購中國「阿里巴巴」電子商務公司；柯林頓也應雅虎之邀，再度訪問中國慶祝此一併購投資案。對於師濤案，柯林頓則略而不提。同一時期，另一家網路搜尋引擎公司 Google，為在中國發展，居然同意刪除「民主」字眼，並將台灣劃歸中國管轄之下！以上兩大投資中國商機案所揭露的跨國企業與共產黨間的貪腐協議，可都經過美國前總統祝福背書。

嚴評論道：「中國之所以威脅西方，不是因以低價紡織品傾銷西方，而是腐蝕西方社會尊重人權、重信然諾及遵守契約等創建原則。」柯林頓表揚出賣記者的美國企業，並不是因面對強力競爭下，所作出的簡單商業退卻行為，而是代表西方精神的潰敗；這也是戰略失策，不思附和中國真正民情，卻屈從遭中國人民鄙視的共產黨政權「民情」。嚴自認被西方懦弱行徑，弄得窘困不堪；難道不是西方呼籲中國人要保持冷靜，要拒絕給予共產黨統治之合法性嗎？

在該日訪談時，除師濤外，尚有 42 名中國記者被控「洩漏國家機密」而遭囚禁。其中 2 位：一位是膽敢在廣東政府坦承 SARS 病例前幾個小時，對外宣佈消息；另一位則是事前掌握國家主席致共產黨幹部的講稿，內容述及憂心民主及宗教對中共的威脅。結果，兩個人都被關起來。

幾個月過去，嚴發覺我是真正支持中國民運分子，一位法國人有如此作為，實難能可貴。因此，他向我表白所從事的第

三種職業：他以假名，將無法在內部刊物登載的實地調查，上網刊載。他講述在中國所見所聞，時而正面鼓舞，時而悲慘莫名的簡單故事，還有意義深遠的軼事趣聞，想刊於內部刊物過於卑微，想載於民衆報刊可能又太過醒目。他為何要冒此風險？因為唯有在網路上，他才能真正善盡記者職責。讀者群有誰？他並不知道，只知己對中共文宣部造成壓力，不得不强行封鎖網站。被封鎖後，嚴再另架新網站。這倒像是個無窮無盡的官民鬥法！當局封鎖不合時宜的網站及電郵，散播有毒郵件及過濃「禁忌詞語」。只要網站膽敢提及台灣，立即遭破壞。在中國，想發送述及中國或台灣國家元首名諱，或「民主」字眼的電郵，門兒都沒有。網路成了中共當局及民運分子的煙硝戰場，就技術及詞彙之靈活，較一高下！中共文宣部雖籌組數萬名審核網軍，打擊特定網站，但面對隱形敵手的人海及靈巧戰術，也逐漸顯露疲態。

網路成了中國人資訊的首要來源，網友數是比平面媒體的讀者數要來得多。嚴總結表示，他的同胞消息靈通，就算細節不是很清楚，至少大方向可都能掌握。如何把訊息傳給無上網設備的人？村莊中，可藉為數可觀的教師及共產黨幹部上網，將訊息轉傳鄉里。官方報刊本身，對熟諳解碼之術的人而言，本身就是個資訊來源：老練讀者即可從審查端倪中，找到許多線索。

嚴對我講太多密辛，我該指名道姓嗎？嚴當然只是個假名而已……。

潘反對性偽善

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潘綏銘未遭情報人員監控，這在北京與我交談的人中，可是稀有現象。或許他專長領域的反叛性，還在中共可容忍的範圍內吧。他是中國首位性學專家，雖對當權放肆無禮，但仍豁免審核。他曾將研究美國人性行為的《金賽性學報告》，逐譯成中文，並據以研究奉行。

潘既沒在公共領域曝光，也沒上網發表高見，他幾乎成了隱形人。這一株「毒草」，少見稀有，隱匿在中國人民大學校園，最斑駁建物的走廊深處角落。拖把及水桶的臭味，讓人想起毛澤東統治的中國，雖髒亂不堪，又要求人民禁慾貞潔。他對此種次級待遇，並不太在意。現齡60的他，以及同一世代的大學教授，昔日所歷經的羞辱，他的學生們毫無概念。為避免淫蕩言論脫口，他刻意安排老婆在辦公室內準備晚餐，並請博士班男、女學生各一名陪伴，一起與我會面。此一小團隊對探討影響中國社會最新革命風潮的「性革命」甚感興趣……。

潘表示，中共從不會以禁錮心靈為滿足，自1949年起，它也約束身體。在文革下，肉體愁悶，情色禁戒。中共在1949年所稱的「解放」，並非指道德風俗。依照毛澤東的論點，真正

的革命家應是「乾淨無瑕」，沒有物質貪念或肉慾遐想，與貪婪的日本或國民黨軍隊相比，毛軍戰士堪稱尊重或假裝尊重他人之妻。1949年後，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即是個性愛沙漠，至少表面上看起來是如此。根除娼妓之瘤，可是中共在六〇年代所大肆宣揚的「成就」。但奇怪的是，性病並沒有消失。難道革命中國，還殘留獸性遺毒？潘表示，當時，只要外遇，便送入集中營；同性戀，則處以極刑。集權政體不容非政治的歡娛彼此競爭！1980年起所施行的一胎化政策，更證實中國人無性生活之說。夫妻被迫分配相隔遙遠的兩地工作，每年只在新年假期重逢12日。1990年，婚外情仍被視為中產階級犯罪，需入監囚禁。直至1985年止，中國古典小說中的情色情節，或提及男女性器字眼，均一律刪除。由於香港所出版的是完整版，因此讀者期盼據以比較走私進口版及官方核准版間，有何差異。

此一枯燥乏味的體制並未完全消失。軍中菜鳥應謹守禁慾自持，嚴懲任何淫行，青年精力得完全藉自瀆發洩。在美術學院亦然，研讀或呈現裸體的圖像限制重重。情色與色情，在中文字面上難以區隔，中國最有名的杭州美術學院，有人向我解釋，此端賴教師引導學生，以免衝撞良好道德風俗。以上清教主義之唯一例外就是毛澤東：從其私人醫生回憶錄得知，毛氏與眾多女友，翻雲覆雨，尋歡作樂。神化的舵手，獨享採陰補

陽專屬秘方，延長老年青春。

潘將文革視為性壓抑時代，進而決定在社會學院創設性學系所。他鼓勵道德風俗解放，並非為了放縱慾念，而是想重回正常模式，賦予中國後極權體制，更多的人道關懷。但性愛縱慾後，是否就會得到自由？

他帶著學生下鄉調查。調查團隊從校園起家，現已深入廣東底層及盲流勞工。潘結語道，中國人人反覆尋求性愛經歷。40歲以下的中國人，婚前、婚後及婚外，均勇敢嘗試任何事；比起女人，男人較重視當下享樂或濫情。我的對話者詳細描述性愛，令我的傳譯臉紅心跳，矜持讓她無法翻譯，就算她知何所指，也不知如何用中文及法文表達。因為有些字眼具有普遍性，潘便協助她完成傳譯，2位學生神情嚴肅，點頭稱是。這些事情在中國不為人知？中華帝國時期，曾有過讓西方收藏家趨之若鶩的情色文學及稀有版畫？利瑪竇在17世紀所居住的北京，當時娼妓有40,000名，而且變性人還為數眾多。潘解釋，這一切是發生在十八世紀以前。康熙皇帝自1661年登基君臨天下後，曾下令銷毀所有情色書畫，唯有外國收藏家的珍藏逃過一劫。但還是有些內容淫穢的性愛教本，以提供教導年輕夫妻之名，擺脫了內容審核。康熙皇帝的繼承人，對性愛一樣採取禁錮手段，並自我壓抑，強迫親友及百姓奉行貞節至上，唯有生兒育女，始能違背此一鐵律。皇帝為管控道德風俗，還管到

夫妻私生活？除非是亡命之徒，否則在古老中國，居住空間侷促及無所不在的社會控制，是不容許產生放蕩荒唐行徑。雖仍有港口富人專屬的尋歡場所，但整體而言，人民對此興味索然，情色既是生理衝動，亦是社會的產物。

潘說，中國人趕上進度了。一胎化政策強化夫妻分隔兩地的正當性，今日，該政策完全區隔享受性愛與繁殖後代之不同，且將情色合法化。一位學生表示：「中國的男人比女人更會享受性愛歡愉；比起西方，中國女人可是矜持依舊！」我的傳譯，終於找到知音，贊同表示：「大多數的中國婦女，仍少有性解放經歷。」毛澤東統治時期，她們被訓練成「勞工」，跟男人擔負同樣粗重的工作；而在新中國，如偶像廣告，她們則被物化成消費物品。做個中國人不太容易，但要做個中國女人，則是更難。潘結論道，中國性革命尚未完成：新興道德風俗僅是對過去禁錮的反撲，還稱不上解放。解放將伴隨西化而來，不僅是性愛習慣與姿勢的西化，而且還包括男女關係的重新平衡。中國離此境界尚遠，除了藝術圈，女性運動甚少聽聞；同性戀運動也是如此。10年來，同性戀被視為一精神疾病，現除上海及北京，其他地方仍難以接受。

現在我們談談法律明文禁止，但大城市處處可見的娼妓。她是否亦屬中國社會的「正常化現象」？潘將此一全民發展視為共產體制的邪惡：禁止娼妓只為便利共產黨及公安（貪腐）

管理。在廣東，有惡棍與公安共營的賓館，掛著三溫暖招牌，豔幟高張。共產黨看好娼妓吸引及套牢外資的潛力，取締娼妓，罰鍰金額太少，無法遏阻歪風。潘在廣東實地調查發現，這些高級妓女如何被發掘及引領進入此行：台商有包二奶的陋習，歐商、日商及美商偏愛高級奢華的妓女，還有滿足工廠工地貧窮盲流勞工生理需求的女農及待業婦女。一位北京女學生，偶而下海客串，樂於論證此一工作的正當性：「我促進國家發展。」她告訴我們，既沒消耗石油（在中國可是十分稀有），也沒造成環境污染（另一項全國性問題）。

台北一家研究機構所做的調查證實潘之推論：九成中國台商有包二奶。這些數量眾多的價廉待租婦女，的確是吸引台商投資中國的主要誘因。以上對台商習性的觀察，不也可適用於西方商人身上？或許有人已對此一議題加以研究；或許共產黨已請專人研究，並可能也做出歐美商人跟台商同受相同誘因赴中投資的結論吧。

一位反法西斯主義的猶太人——劉霞

「我是猶太人。」劉霞向我如是宣稱。她外表看起來並不像。理著光頭，臉龐清秀，身穿黑麻長洋裝，看起來倒較像是位禪宗和尚，或是流行時尚人士。她是否就如美國小說家賽珍珠（Pearls S Buck）在1948年所出版的《牡丹》小說中，所描

述的最後一批中國猶太人？該書結語係獻給河南開封的一群因通婚而消失的猶太族群，賽珍珠寫道：「我們只要遇到一位額頭堅毅、眼神銳利及音調清澈的人，或是看到可讓圖畫更為清晰的靈活線條，或是剛勁幹練的雕刻，均即代表以色列。以色列精神即靠世代相傳，生生不息！儘管該猶太族群已消失，但精神永存。」

劉霞既不認同賽珍珠此一論點，亦無法在《牡丹》一書找到自我。對她而言，做為「猶太人」，就是要設身處地想像一位猶太人如何在納粹德國壓迫者統治下殘活。她明確指出，共產體制與納粹主義或法西斯主義並無什麼不同。誰是所謂中國的猶太人？他們就是異議分子、自由心靈者、知識分子、藝術家、工會分子、帶頭反抗的農夫，以及獨立自主的神職人員。上述均是共產黨隨時隨地處心積慮，想自社會中鋤掉的「毒草」，他們就像納粹德國的猶太人，先被鎖定，貼上標籤，密集監視，最後斬草除根。

「何謂文革？它與波蘭奧斯維茲（Auschwitz）的納粹集中營，又有何差別？」劉霞如是問道。所有生活優渥，未經工作磨練，及具有學業文憑的中國人，均遭紅衛兵逮捕，施虐，枉送3,000萬條人命。奧斯維茲與文革的真正差異是什麼？歐洲，有人探詢罪惡之源，期盼預防此惡重生；但中國，因是由當權的共產黨下令進行文革，根本禁止此種反省。現今中共當

權者，均曾是昔日的紅衛兵。

就跟納粹德國一樣，在中國也是依照血緣或婚姻來判定何謂「猶太人」，劉霞即是其中一例。她自身並無從事政治活動，也很少公開發言，只是針對自己不對外展出而僅限親密友人觀賞的攝影及（抽象）繪畫作品，偶發感言。當她的夫婿，中國異議作家劉曉波被捕入獄時，她曾藉洋娃娃創作，風格尖銳，拍攝囚犯遭刑求凌虐臉部變形之一系列照片。對抗共產黨，他們手無寸鐵，但劉曉波是「猶太人」，他是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曾參加1989年天安門學生運動，遭判刑10年。劉曉波拒絕流亡海外，藉上網撰文發表支持中國人權的專文，留在中國繼續奮鬥。中共憲法雖有明文納入人權，但僅為滿足西方要求，在中國並無實際的法律效用。他偶而也在香港報刊發表文章，但香港報刊面對共產黨壓力，已逐漸喪失獨立自主能力。劉曉波一被捕，劉霞自然成了「猶太人」，一株「毒草」，亦即從此刻起，為與囚禁的夫婿精神同在，她同樣理光頭。劉曉波出獄後，反抗決心依舊，並已蓄起頭髮，但劉霞則否，她堅持保留「猶太人」印記，直至中國法西斯主義倒台為止！

她是否將局勢給抹黑？她邀請我到北京郊區的小住所作客。樓底下，有4位民兵站崗。咔嚓！有人自駐留在旁的車中，對我拍照。劉霞表示，「每天早上，我打開窗簾，看到的

第一幕景象，就是窗底下的國安人員。」壓力一直都在，有時候，劉曉波會無故被召喚到國安局訊問示警。這對「猶太」夫婦之所以沒被囚禁，全仰仗他們在國外的名聲所保護：劉曉波是國際筆會成員，而該會係由一群關注國際人權的作家所組成的協會。劉曉波及劉霞夫婦被國安單位發現跟老外交往，也有保護作用。至少當下是如此。共產黨可以隨時決定鋤掉這些「毒草」，只需指派一名法官，就如同對待其他民運人士般，指控洩漏國家機密及圖謀顛覆政府即可。這是打壓中國所有「猶太人」的慣用手法。

「請向我解釋歐洲法西斯主義與我們的共產主義有何不同？」她如是問，我無言以對。劉霞更舉另一實證向我逼問：「三〇年代，直至1950年，法國知識分子紛赴莫斯科，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亞拉岡（Aragon）、馬勒侯（André Malraux）⁹紛向史達林政權朝拜。現在，同樣的人或他們的繼任者，則喜愛中國。」這令我們想起這位喜愛史達林（為期甚短）及毛澤東的馬勒侯；同一個馬勒侯，曾在1933年出版《人類處境》（*La Condition humaine*）一書，創造一位中國英雄——陳氏，此書在法國文學史上，堪稱第一部跟中國有關的文學作品。但陳氏只是個中國人，他沒有容貌，沒有個性，不是個個體，就以中國人稱之即足以定義。馬勒侯作品所創造過的人物，可從未如此描述，或許這是他對難以捉摸的中國認知，所

呈現的一種下意識反應。劉霞表示，三〇年代，只有一位法國作家保住聲譽，那就是紀德（André Gide），他在《蘇聯歸來》（*Retour d'URSS*）一書中，控訴蘇維埃法西斯主義。但對中國來說，另一個紀德似乎遲遲未出現。法國知識分子未曾在中國內部親身經歷，因此偏愛毛澤東及文革。我提出另一種解釋：或許他們嗜愛暴力，而此暴力又是以令人心動的革命之名為之吧！法國作家沙特及毛澤東均非人道主義者。劉霞結語道：「倒不如說是他們的暴力幻想，促使暴力的產生」。

中共文宣部有系統地向西方媒體發佈荒謬理念，如共產黨的確不是個民主政黨，但它阻止中國陷入法西斯主義的泥淖之中。劉霞對此論點知之甚詳，此一論點也在共產黨一聲令下，在中國各大媒體廣為宣揚。在她的眼中，此一說法根本不值得回應。

我們心情沈重地向中國這位被判緩刑的「猶太人」及法西斯體制人質——劉霞告別。事實上，今日的中國可能已比昔日的中國更為法西斯主義吧。

譯註1：馬勒侯（André Malraux, 1901-1976），法國政治家、小說家。曾在中國參加革命，後參加西班牙內戰。二次大戰時，從德國集中營逃出，參加自由法國抵抗活動。1945-1946年，在戴高樂政府中任情報部長，1960-1969年任文化部長。以小說《人類處境》獲龔固爾獎。

「上帝只有一位，就是耶穌！」老李對神學理論雖認識有限，但信仰很虔誠。我在陝西寶雞巧遇老李。儘管沒有刻意安排，但時不時都會遇上基督教徒。或許基督教徒為數較多？或是他們本來就是比較喜歡與別人交往？

寶雞居民雖有 80 萬人，但在全中國僅屬「中型城市」。它與其他城市一樣，都十分平淡無奇，1960 年以前的遺跡，已所剩無幾。值得注意的是，寶雞只將街頭攤販大碗辣麵美食傳統保存下來。共產主義摧毀了地方建築，但各省地方小吃則殘存著。我是在參訪寶雞老人院時與老李結識。老人院在歐洲是個旅客不會有興趣探訪調查的地方，但中國有養兒防老的傳統，設置老人院，簡直是項革命性作為。孝道，永別了！在此一胎化社會，物質主義瀰漫，傳統價值喪失。老人遭棄置在老人院，子女頂多每年元旦前往探視一次。寶雞的老人院，十分簡樸，沒有任何公款補助，只歡迎有能力支付費用的老人進住：老人清一色都是退休的公務員。

老人院的女主管向我保證：「這裡沒有任何一位老人，有政治問題。」我實在不知道她為何要如此強調，但全中國所到之處，或大或小的歧視心態，如影隨形。儘管他們是退休公務員，但其退休俸並無法支應開銷，尚需義工協助攙扶久病臥床的老人，或照料菜園，提供三餐。

老李就是在養老院服務的義工，體形瘦小，已上了年紀，

但眼神透露著不平凡的神秘目光。他喜歡耶穌，讓他心靈平靜，「讓祂追著到處跑！」為了要與我們平常在中國所遇到的那些歷代傳承的基督徒有所區別，老李則自認是位「新」基督徒。之所以為「新」，一則他是剛信奉，另則「新宗教」，其中文意涵，就是指改革派教會。以一般中文字義而言，「基督徒」係指改革派，與「羅馬天主教」正好相反。至於我們在中國北部所遇見的東正教派，則以「真正宗教」自居。

老李改信基督教前，信仰毛澤東主義。他強調：「我可是個毛澤東主義者，而非共產主義者！」這可是他自己的看法，他教育程度不夠，無法加入共產黨，只好在寶雞工廠出賣勞力為生。一提到毛澤東，他就面露讚賞之情……我問他，是否同意鄧小平對毛氏「七分功勞，三分失誤，功大於過」之評價？他憤怒回答：「毛對中國是百分之百的好！」他以自身經歷為例，從一無所有，自工廠基層逐步升級，一直幹到第7級高階的勞工，屆齡60，安逸退休！他擔任教職的太太也退休，而且也信奉基督教。他們的退休金，換算成歐元，實在微不足道，還好寶雞的生活消費並不昂貴。顯然，他沒吃過紅衛兵的虧，也沒吃過紅衛兵的苦。對我所談的事情，僅知皮毛。他所在的「工作單位」，有住、有吃，也有薪俸，根本不知文革為何物！他表示，是有聽過別人的悲慘遭遇，但這僅限於地主、人民公敵等「黑五類」。老李沒認識半個黑五類，他印象模糊，只記

得學校不知何因就關門，學生整日無所事事，但在年少氣盛的年紀，「作些蠢事」，難以避免。還好，有毛澤東將所有人趕回學校，使社會回復平靜。老李這位在六〇年代，堪稱勞工貴族的7級高階勞工，也就在此時勢下經歷毛澤東主義的洗禮，而學童們也是藉同樣的方式，從課本中研讀毛澤東主義。

美式風格的中國基督徒

老李一退休，就患有難以吞嚥食物的疾病，遍尋名醫都無法治癒。他太太聽說有位王姓主教，神通廣大，將雙手置於老李頭頂，心中默唸耶穌之名，老李居然不藥而癒，夫妻倆於是皈依聖門，在福音聖歌祝禱下，集體洗禮，成為基督活泉教會成員。寶雞基督活泉教會計有2,500名信徒，每週日早上，信徒都心情愉悅前往位於市中心的全新教堂聚會。年屆97歲的王主教，雖主持早課，說經講道，但避免以靈恩派教會主祭儀式的方式，鼓勵歸化或引起不安。共產黨也發佈一套行為準則，供牧師遵循。

王主教表示，基督徒「樂善好施，仁父仁子。」在他眼中，基督福音即是孔子《論語》。對此，王主教並不覺得有何不妥，並表示：「耶穌是歐洲人，也是中國人。」此係承襲自一位美國牧師於1924年促使他皈依基督教的啓蒙。當時，在全家信奉基督教之前，王主教曾是位陝西農民。他強調：「佛陀

雖是印度人，而非中國人，但佛教還是個中國宗教。」他據此推衍，基督教「現在是，而且也將會是個中國宗教。」這話究竟有何含意？中國的任何信仰及民間傳統，均無原罪概念，究竟，中國人為了皈依基督教，而接納原罪概念？還是，基督徒為了成為中國人，而捨棄原罪概念？王主教當老李之面，重複強調：「上帝只有一位！」信徒老李，對主教演說活力，讚佩不已，但形而上學部分，則懵懵懂懂。

面對如此重要的宗教團體及如此廣大的教堂聚會場所，地方當局居然會有所容忍，我實在感到驚訝。王主教強調：「基督徒行善至上，地方政府只會多加鼓勵。」儘管王主教所屬教派前已經共產黨允許在案，而他本身也是個受薪者，但他對此並不道破。為對中共有所交待，他承諾遵守中國宗教「三不自治原則」：不可有外國傳教團成員、不可收受外國資金補貼，以及不容許非中國教會組織干預運作。講道誓詞需先經共產黨黨員審核，並配合當時政令口號宣導。雞年期間，每逢週日，王主教即會抨擊法輪功為邪教，而法輪功對基督教，根本沒有任何質疑之處。一般而言，共產黨管控天主教是比基督新教來得嚴厲。至於天主教，王主教則與共產黨同一陣線批評說：「天主教祈求的不是上帝，而是教宗；而且教宗不承認真正的中國，反而承認台灣。」

寶雞基督新教的教堂聚會場所，不就是依賴台灣基督徒之

助所建成的嗎？王主教澄清，他們原籍是陝西人，只不過現在「迷途」在台灣。另外，用來演奏聖歌的鋼琴，也是由一位移居美國加州的寶雞人所捐贈。建物室內裝潢之所以會很有美國味及少有中國味，是因王主教要求當地工人，依照一張從雜誌剪下的洛杉磯教堂風格來施工所致。這究竟是一座福音會，浸信會，靈糧堂，或是任何其他支派教會的教堂？王主教對此則一無所悉，並對同屬基督新教的所有支派間之區分，也無概念。談論過多細節，實無必要。他表示：「對真正的基督徒而言，天主教徒，根本就是異端主義分子！」而針對余杰先前所定義，一群無需牧師在旁引導，自發聚會研讀聖經的「沈默新教徒」，他們的看法又是如何？無論是李或是王，均表示毫無所聞。他們的答覆很平實：按教徒聚會（house churches）通常是由大城市的知識分子所擔綱主導。而無論是上述所稱的沈默新教徒，或是官方許可的愛國主義派教徒，最終是否可如余杰所願，殊途同歸，匯流成一股革命性及批判性的靈修勢力？若從他們信教的動機南轅北轍來看，這一推論，毫無所本。

向以信奉毛澤東主義為職志及以愛國分子自居的李，接著便對羅馬教宗的行為表示憤怒：「這些遠上帝，近教宗祈禱的天主教徒，根本不配稱為基督徒。」他批評：「天主教教義，只對陝西農民有吸引力。」而他們根本就是輕信愚昧。他還補充說：「某些農民甚至還會相信法輪功！」這正可證明農民是

多麼的「無知及無能來瞭解真正的上帝。」李、王遵循黨意，左批梵諦岡，右打法輪功，對我而言，倒像個同好結盟，而非異議分子。

但這些新教徒究竟將前往何方？有何終極影響力？沒有人可以預測。李跟中國各地同類分子，均不以信奉為自滿，反以宣揚信仰為念。當他宣稱「耶穌讓他追著到處跑」時，就必須瞭解，他的足跡可真的踏遍全中國。這些新式基督徒可是個個心懷宣揚教義熱誠，這也說明了官方基督教會勢力快速拓展的原因了。當李不在老人院充當義工時，則或搭火車，或乘巴士，雲遊中國，四處拜訪教徒，勸人改信新教。他表示：「中國應該與一個真正的上帝結為一體，共組大家庭。」他回溯過往，認為這似曾是毛澤東主席所追求的終極理想。

李信仰之堅定，足以撼動山岳，但是否足以動搖共產黨？我們自問，到底誰成為對方要脅的人質？我們在此或許可回想一件具重要意義的傳聞軼事：1899年，新教牧師理查（Timothy Richard）在上海出版《全球雜誌》（*The Global Magazine*），將馬克思主義引進中國；孫中山有機會研讀〈共產主義宣言〉，中共至今仍對這位外籍傳教士，心存感激之情。現今官方新教徒與共產黨間所存有的奇妙聯盟關係，倒也喚醒人們對往昔耶穌會與中國宮廷間利益糾葛的記憶，無論是昔日的耶穌會教徒，或是今日的福音傳教士，兩者均以摩登現

代為掩護表象，將他們所信仰的上帝引進中國，為簇擁天主教教義充當中華帝國國教，昔日的耶穌會雖功敗垂成，但今日的新教徒則仍有可為空間。美國教會在幕後著力甚深，他們財力可雄厚得很。

中國人的無神論迷思：耶穌會教士的虛構

儘管中國的神祇衆多，但為何我們會如此難以辯識清楚？他們的廟堂中，有菩薩、有聖像、有諸神，數目之繁多，堪與印度相比擬。會辯識不清，其來有自。我們對中華文明的認識，先遭往昔義、法的耶穌會教士遊記著作所局限，後又遭我們的文學創作及哲學思想壟斷長達3世紀之久！我們可談談漢學學派的創立者勒康德（Louis Lecomte）神父，或許應改稱為法國親中學派的創立者吧。當法國耶穌會教士勒康德神父，尾隨漢學先驅義大利神父利瑪竇（Matteo Ricci）足跡，於1689年至1691年間造訪中國時，早已決定既不參訪廟宇，也對相關祭禮興趣缺缺。他的《中國現狀新版回憶錄》（*Nouveaux Mémoire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著作，雖強化了啓蒙時代的哲學理論，但中國人卻被描述成一群以無神論者孔子為尊，奉行無神倫理道德教義的人們。我們這位耶穌會教士總結，這群道德意識高張的中國人，只能活在等待基督崇高至神降臨之中。他們以前不就被視為一堆空無一物的器皿，只待西方填滿即可？

自利瑪竇以降，所有耶穌會教士均藉此手法，博取教宗及歐洲宮廷的支持……。

這些論述完全相同的勒康德神父及其他所有傳教士們，是否曾真誠過？他們居然可對日夜擠滿信徒的寺廟、引人入勝的儀典、冗長耗時的喪禮、貢香、群鐘、道士及和尚，視而不見！而佛、道這堪稱今昔中國，最主要的兩大宗教勢力，根本與儒家毫無干係。在勒康德神父旅居中國期間，寺廟僅在北京一處就達三千餘座，其分佈之密遠超過當時歐洲任何一座城市的教堂，北京簡直可稱為聖城！但他卻只以暗喻影射說：「中國人的『迷信舉止行徑』，不值得列為宗教信仰。」而這個被視為「迷信舉止行徑」的道教，無論是勒康德神父，或是其後直到二十世紀末的任何一位法國過客，均興趣缺缺，更遑論中國佛教。

我們可以想像，一位旅行歐洲的中國人，途中觀察到歐洲人為了祈福，在耶穌受難像前手畫十字架，或在聖像前點燃蠟燭，他是否也可據以論斷，歐洲人沒有宗教，只有迷信？

這些前輩探險家，在中國之所以什麼都看不到，究其原因根本是不願意用心看。他們在中國優先交手的對象，更助長他們此一盲目心態。耶穌會教士在中國所交往的官員，鄙視甚至迫害這兩大民間宗教；他們多是尊奉社會秩序、階級、穩定、敬老及崇君的孔子信徒。孔子是哲學家嗎？利瑪竇深信在儒家

中，可嗅到一種能讓耶穌教徒據以附和的文人學派。但這些儒家規範，究竟來自何處？孔子聲稱來自中國遠古的黃金美好年代（指堯、舜與夏、商、周的太平時代，簡稱三代）的啓發，若要社會安定，只需恢復三代之治即可。儒家是宗教？或是哲學？或可說儒家是個怪異哲學，不太俗世，設有廟堂，施行祭禮，殺牛為供品，祈求上天庇佑，並崇尚慎終追遠。還是我們該將之視為無神論宗教？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Leibniz）、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Montesquieu）及伏爾泰（Voltaire），均認同此一哲學思辯。伏爾泰在其《普世歷史》（*Histoire universelle*），將中國描述成一個倫理道德意識甚強的國度，雖無宗教信仰，但係受上天此一抽象神祇庇佑的社會。此與法國哲學家所追求的「至神」，相距不遠，而此一境界也是起源自中國。它一直是如此，法國知識分子，只要他們是無神論者，都會對中國抱持莫名的好感，因為在他們眼中，一個無神的文明，是無法令人憎恨！

以下則是與上述法國的中國意識形態對立相左的實證：荷蘭籍過客及敘述論者，在中國不以傳播福音為職志，反以經商至上，十七世紀起，便採另一種觀點看待中國，他們較關注民間社會的平民信仰，而非朝廷的儒家思想。他們的交談對象是中產階級的同業公會，而非官員。2個世紀過後，北歐各國雖仍維持與中國經商的傳統，但並不經營特別的外交關係。在這

個重商的歐洲地區，其民意對中國人權缺失甚為關注。法國，則是相反：承續耶穌會及開明專制觀點，我們的主政者附和北京「強硬」政權，對中國的平民社會及民運分子，支持不甚有力。法國之所以會對中共政權逢迎獻媚，雖出自利益考量，但其實也是因對中國另一平民化、個人式及抗拒性的道教，懵懂無知所致。

道教，桀驁不馴者的宗教

上層中國社會與底層中國社會，昔日各有宗教信仰，今日雖面貌迥異，彼此間的爭端依然存在。往昔儒家宰制核心權力及其周遭公務體系，堪稱「上層社會」的無神論宗教。儒家的宇宙觀，天人之間，即存有某種階級概念；為保持此一世界秩序，人類必須順服此一崇高法則。但除了君王及官員外，又有誰會知曉相關運作規範？平民宗教，所謂「底層社會」宗教，就是道教及佛教。歐洲對佛教知之甚詳，但對道教則少有接觸。它的起始係老子《道德經》。道教堪稱中國真正的大宗教，影響中國所有其他宗教信仰，甚至包含基督教及佛教。

道教的宇宙觀，與儒家大相逕庭，主張天人合一，肉體本身即是天地，藉喚醒自身，維持世界秩序。道教宮觀，到處可見賢人及諸神影像，其主要追求目標為長生不老及財源廣進，但對當朝權貴卻又有點漠視。

儒道宇宙觀之歧異，衍生出兩大不同意識形態：儒家主張國家主義，道教則崇尚個人主義。老子主張「無為而治」，道教論者，抗拒既定成規，直至今日，依然硬頸，不屑臣服於執政當局。道教盛行的黃金年代，天人和諧，社會祥和，此即東晉思想家鮑敬言「無君論」之主張，但經法國漢學家勒維（Jean Levis）逐譯後，簡直等同無政府主義……。

道教也具民主素養。在中國歷朝君王統治時期，信徒仍可自由擇選道士代表。民選道士則需擔負等同於維護秩序及保障民生的地方官員角色。清朝時期，尤其是在婆羅洲，更有許多道教社團組織，逐漸蛻變，粗具民主共和國模式。儘管這群信仰道教的可憐華人，於十九世紀遭荷蘭殲滅，但也讓世人對中國人遭儒家及耶穌會禁錮所呈現的被動刻板形象，為之改觀。道教寺廟不僅曾是對抗行政官僚的公民社會縮影，也曾是友愛互助及經濟創業的據點，此一特點在其他華人國度，仍存在著：在台灣，無論今昔，在許多商業活動中，都可嗅到道教團體資助的痕跡。美國萬家華人餐館中，大多是靠道教團體募集資金。法國有位既稱不上哲學家，也不算是漢學家的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於2005年便曾撰述表示：「假如不懂儒家，就無法瞭解現在的中國。」但如果對道教一無所知，又如何能瞭解中國？

道教十分寬容。受其薰陶的中國人，混雜各宗各派，賦予

中式新面貌。在印度，唯有看破紅塵的僧侶，始能皈依佛門，但在中國，就算俗世分子，亦可常伴青燈，只需敬佛守戒即可。中國的佛陀，以道教諸神之姿，變成一位慈悲為懷的神祇，而道教本身也融入佛教的悲憫精神，而更顯豐富。中國人也自道教，學習堪輿風水之說及慎終追遠之習。荷蘭籍道教社會學家席波（Kristofer Schipper）強調，宗教之間，即使基督教及伊斯蘭教亦不例外，存有神奇祥和的氛圍及某種和解共存的共識。一直以來，中國各城各鄉的信徒均和樂共處。

西方人經常自問，中國是否瞭解個人自由的真諦。答案從他們的宗教信仰中，即可窺知：在諸神及繁文縟節之外，所有宗教均是植基於內心自由之上。無論是信奉道教、儒家或是佛教，都是為自己所作所為負責，個人善行（通常）終獲回報：儒家及道教是現世報，佛教則是另世報。總之，我們期望根除有關中國人無權自決及不適施行民主此一虛假文化的立論。

你錯了！共產主義可不是儒家主義者

儒家曾在中國歷朝具有國教地位，而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可不僅是儒家的變身而已？中共此一另類說辭，在西方甚為盛行。事實上，這根本是個迷思！對中共而言，此一迷思有利弱化其負面形象：假如共產黨深植於傳統之上，基於尊重傳統，無人會責怪或是控訴其惡行……中共亦知，孔子不僅在中國的

正面形象優於馬克思或是毛澤東，在海外更不容贅言，匿藏在孔子背後，實是高招！

為讓上述文化傳承之說有說服力，中共最近動手修復幾間「孔廟」，有些或具廟宇外觀，但實際僅是昔日文人追求仕途應考的教室而已，僅存硬體外觀；昔日廟堂內牲祭儀禮，已不復見。中共藉根除原始儒家內涵，而以不具神性及奧秘之抽象哲學記憶取而代之。在同一思考邏輯下，中國雞年期間，中共下令重建孔子山東曲阜故鄉城垣；孔子出生於25個世紀前，當地所有居民均姓孔。曲阜成了華人及外國人旅遊聖地。嚴肅的儒學，已被喪失本源深義及注重行銷的儒學，所取而代之。

為了要達成混淆視聽，讓世人誤解「儒家」真義之目的，中共或逕引孔子名言，或自創仿孔詞句；自雞年起，我們可經常聽到「和諧」及「簡樸」等創新字眼，而這二個詞彙意義模糊，可與東方任一宗教相融合。但真的需要援引孔子，以「和諧」之名，才可達到孝順父母、尊師重道，甚至順服黨意的目的嗎？

儒家魚目混珠的另一實例是：自國家元首以降之各層共產黨領導人，要求中學及大學開班教授道德課程，灌輸「正確價值觀」。胡錦濤在元旦文告中表示：「青年需接受道德教育（亦即指儒家思想）及強化意識形態（亦即指馬克思主義）」，宛如儒家及馬克思是互補共生。在此種將諸說集大成的心態

下，培育幹部的共產黨黨校則廣邀儒家哲人來校演講。共產黨領導人期藉重整「價值觀」，提升黨員道德及打擊貪腐之目的，但成效未知。共產黨領導人是否真的相信道德演說，即可改變共產黨此一結構性問題？此已觸及神秘教派禁地，實非局外人所能體察：此教派成員是否已被重複灌輸的祭禮儀式所催眠？

為駁斥雞年期間所興起的此一冒牌道德說，我們特別指出，根據共產黨與儒家關係發展史，兩者根本無法並存；現代中國所進行的所有革命，從五四學生運動（1919年）至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均執反孔大旗。「打倒孔家店！」即是此二項中國激進主義創始運動的主要訴求口號。由於儒家將遠古時代理想化，而共產黨則是嚮往未來美好的時代，因此被中共刻意打成反動派。由於儒家人士排斥任何進步概念，共產黨便對正牌儒家不斷打壓，甚至不惜以順服的贗品代之。真正的儒家是植基於祭禮、祝禮及牲祭之上，一旦忘卻禮節、殲滅祭司，則無人想讀也無人會讀儒學。所剩存的道德論述，也僅是選擇性的刻意摘述。熟諳儒學的中共領導人坦承，會刻意避免引述孔子或孟子主張君權民授、反對專制的篇章。在下共產主義繼承永恆中國文化傳統及延續披戴帝國新裝的結論之前，必須要提醒各位注意：中共真正唯一承續的遠古傳統，就是反教權主義。

反教權主義如何肆虐中國

反教權主義在中國並非新點子，共產主義者沒有蓄意編造。昔日大清帝國與西方接觸，體認歐洲先進技術後，認為有必要進行道德重整改革。但對於日本於1868年所進行的國家體制改革，則認為無此必要：中日兩國亦自那刻起，路線大相逕庭。正當日本帝國甩脫老輩菁英，培植新秀之際，北京的文人顯貴則將中國衰弱歸罪於傳統及迷信，而非國家體制。因此中國自1898年起，中央及地方當局，便廣徵各地佛、儒、道寺廟，號稱要改建成學校，遭褻瀆及毀壞的祭祀聖地不可勝數，僧侶被驅趕，道士遭滅絕。但實際上，真正開張的學校並不多，只有幾所中國大學，如北京大學及福州大學，至今還佔據昔日廟堂及花園為據點。而通常遭指責毀壞聖地的文化大革命，則只是承續「激進主義分子」破壞聖像狂熱而已。中國此等行徑，只有1793年的法國恐怖統治及1917年後的蘇維埃革命，可與相比；反之，中國鄰近的日本、南韓，則將宗教與現代相互融合。

中國政治菁英為何會如此憎恨平民所信奉的神祇？在儒家本身遭迫害之前，儒家官僚體系便對佛、道持有民間「迷信」之成見，的確助長中國反教權的傳統。另外，此或許是中國政治菁英遭西方「優越」羞辱的反撲行徑。自1840年起，西方輕易以鴉片奴役中國人民，更讓中國文人深信中華文明的腐朽必

須革除，以便開展新貌。於是刻意摧毀老人，以具有現代思想及決斷魄力、甩脫傳統及迷信包袱的新秀代之，此一毀滅性偏見即始於當時。此種偏見，說明中共為何以暴力革命反對任何舊事物，到處摧毀廟堂、古城、紀念碑及典籍。北京古城遭摧毀而重建新城，這就是為何外國人在北京再也嗅不到古老中國痕跡的原因。古老中國已遭刻意搗毀，所剩遺跡，今日僅被充當懷舊憑弔之用，而非生意盎然之地。

中國人憎恨自我，搗毀祭禮及先祖遺產，無論是在日本或印度，根本無此現象：日本未遭西方殖民統治，無人會想到毀宗滅祖；印度部分領土雖遭西方殖民統治，但也未像中國淪落成吸毒中蠱般滿懷屈辱。印度宗教派系之多，簡直可與古老的中國相比，但沒人會為追求進步，而摧毀宗教祭禮。

中國公權力介入反教權的結果，與激進主義分子原先所預期的正好相反。的確，各派宗教勢力已大為削弱，尤以僅具外在祭禮儀式，但喪失內在信仰精義的儒家尤甚。佛、道寺廟也受難頗深：道場遭徵收、典籍遭破壞、修道者及信徒均遭驅離。以進步之名，抹去整段中國宗教歷史的記憶，此一中華文明的浩劫，實可與拉丁美洲古馬雅、印加文明的消失相比擬。同時，這也造成中國社會的分崩離析。佛、道社團組織曾是中國社會中，僅存之慈善機構。搗毀，造成社會慈善空窗，讓窮老孤寡等弱勢族群自生自滅。雞年期間，中共雖曾鼓勵佛教徒

重建老人院及醫療診所，但為時已晚。同時，也讓中國經濟破產：道教社團組織曾是資助中國及海外華人企業之金主，中共迫害宗教，也剝奪中國大陸承續華商數世紀來所藉以經商致富的傳承。

中共是否會因此放棄迫害宗教？絕不會！中共因應對策，已日益精進。如同對待民運人士般，共產黨鎮壓宗教的方式，也日益靈活。只要信徒不聚會，中共便可允許有信教空間。信徒若違反此一先決條件，則遭共產黨鎖定。只要信徒遵守官方的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相關「愛國」宗教組織之規範，相關宗教祭禮便可舉行。而這些經共產黨授權成立的宗教組織，凡事均會介入干預。另外，官方宗教組織只要覺得某一宗教神學教義不具理性，即會介入干預。中共官方道教組織所出版的道士教義守則寫道：「藉提煉丹藥達致長生不老之完美境界，根本完全不可行。」此一論點的確符合科學知識，只不過卻質疑到道教精髓的真實性。

中共另一項毀滅宗教的作法，就是將宗教「博物館化」。1990年允許開放參觀的道教寺廟，係歸觀光旅遊局所管。此即證明宗教之於共產黨的真正價值所在：所開放參觀的這些寺廟，外觀宏偉，可替中共賺進不少財源。湖北著名的道教聖地武當山，5世紀以來均是隱士逃離俗世的避居之地，現已成觀光聖地。古人需自山腳下步行，穿越叢林，跨越數千石階，始

能攀登金頂。現在，觀光客可搭乘索道纜車直接登頂，迎面所見的是販售明信片及宗教飾品的商人，昔日管理宮觀的道士已不復見。遠方雖瞧見幾位頭戴黃帽的虔誠朝聖者，但卻遭吵雜的觀光客包圍，相機咔嚓聲不停。「你看，中國宗教是多麼自由！」中共領導人如是說。北京在文革前，約有七百餘間道教宮觀，而現在碩果僅存的白雲觀，也是同樣的情形。中共在西藏亦是故技重施，將民族及宗教情感，化為觀光資源；觀光對西藏佛教之破壞，可是比中共解放軍更為厲害！

身疲力竭的中國神祇

我在中國看了許多修復的古代寺廟及新蓋的教堂，但走近一瞧，根本都是些贗品：不是博物陳列館，就是共產黨分支機構，或是老人院。或許是我事前搜尋不力？在中國某一地方，應該會有一個真正的道士，力抗中共反教權及寺廟博物館化政策？經專家建議，於是我造訪福州，終於遇見一位既熟諳金術之學，亦擅道學及宗教儀禮的道士。

長期以來，福州曾是中國最大的港口。法國作家克洛德（Paul Claudel）曾在二十世紀初期在此地擔任法國領事……在一間位於福州市中心，醜陋大樓圍繞的玉帝道觀，有一位年約三十餘歲的道士，口誦經書，自我修練，祈求世界祥和：他是否是中国最後僅存的道士？從他的長髮在頭頂上所盤旋成的髮

髻看來，可看出他謹守道教教規。道士蓄髮從不剪理，佛教僧侶則剃光頭，蓄髮長度等同歲月磨痕，剪髮處置代表犯下大罪。說真的，沒有人會注意到他的存在：棄絕紅塵，隱居山洞，靜坐冥想，苦心專研，戒葷守齋，凡此均與中共所頒佈的新教規完全相左。以古文朗讀及鐘鼓齊鳴的早晚課誦經，已抓不住信眾的心，信眾似乎對這位黑冠藍袍的道士，耳聾目盲。他們圍著他，只想接近香爐，祈求玉帝，焚香祝願，財源廣進，身體康健，愛情如意，並盼儘速應驗。由於道教個人主義甚濃，沒有道士會為此責怪信眾。我發現信眾多屬年青人及老年人：前者祈求早結良緣及考試順利，後者則是身體康健。至於壯年人，因歷經文革思想灌輸，則遠離任何宗教信仰。

而道士本身是否會關懷信眾？他眼中似乎也沒有信眾的存在。他專注內在修煉，追求長壽，甚至身心的長生永存。或許他登仙之日到來，會化為飛鳥而去？道士在中國今昔歷史中，均被視為國家威脅，此並非肇因於道士的有所作為，而是其無所作為，與國家及共產黨對其子民的期待相左之故。

這位福州道士代表何種重要意義？他遠離紅塵，歸隱道觀的模式，較能體現「新穎中國」，而非「古老中國」。誦經3小時後，他向我解釋道，有一天他們全家觀看電視時，看到一位道士，於是他心生嚮往之念。自該日起，便擇定此一天職。這個實例，我們或可稱為「道教復蘇」，或是道教尚可依其原先

古老模式殘存至今。同樣的情形，也可適用在民間傳統。春節期間，人民仍會將佛、道財神貼在門上，只不過今日會再帶點新意，將百元大鈔懸掛其上。清明節期間，家族因為掃墓而齊聚一處；但這是為了祈求心靈平靜，或只是為了赴鄉間散心？

古代中國的神祇，大多衰亡，而身經反教權主義及共產主義蹂躪的殘存者，似乎也已身心俱疲。這就是為何新興基督教堂能風靡中國的原因。反而在另一個華人國度，台灣，倒能保存中華文明精髓，道教生命力依然強韌；此即說明宗教並不會因華人社會的現代化而退縮（台灣可是比共產中國進步）。基於肆虐中國大陸廟宇的反教權主義，在台灣並未如此嚴重。遠離中國的國民黨領導人往昔雖不喜歡道教，但也不至於會像中共一樣將之殲滅。因此，反教權主義對宗教之危害，可遠比社會現代化為烈。

神秘教派傾巢再現

既然滅絕古代神祇，卻又可以衍生神祇新秀，那麼從覆滅的傳統宗教中，再試尋宗教復興之道，又何嘗不可？只不過中共將之統稱為神秘教派。這並不是個新現象。每逢中國歷朝當局打壓宗教，地下神秘教派便繁榮興盛。1898年，清朝反教權主義，促使一貫道興起，於上個世紀期間，吸引數百萬名信眾，甚至還有共產黨信徒。近10年，約有五千餘萬華人改信法

輪功。儘管實際信眾數目不詳，或許可從遭逮捕迫害的法輪功信眾，反向間接推斷。

中共迫害法輪功：囚禁信眾，嚴刑拷打，使他們「意外」死於獄中。而他們所犯下的唯一罪行，就是信奉宗教及相信教主神聖領導。由於法輪功精義不甚合理，我們要與相關殉道者同一陣線，似顯困難。無論是在中國，或是海外，法輪功在知識界募集幹部，擔任相關發言人的通常本職是大學教授及律師，我們很容易就可跟他們會面接觸。首先，他們述說法輪功學員遭中共迫害現狀，我們心生憐憫之心。另外，他們也會述及信奉經過：修煉因果法輪，遠離邪惡，研讀法輪書籍，治癒癌症。另外還涉及額頭第三隻眼的議題。台灣有位大學教授以流利英語向我解釋（法輪功跟其他所有宗教，在台灣均可自由信奉）：「起初，除了鬼魂，尤其是在農曆七月，我什麼也不信！」我起初很詫異，接著恍然大悟，原來在台灣，每個人都相信鬼魂之說。他接著說：「我的妻子原本罹患癌症，但修煉法輪大法後，便不藥而癒。」自此，這位大學教授也加入法輪功，並啓蒙新學員體認神秘之境。

Secte 一詞在英語中，並無貶義，而僅是泛稱某一宗教歸屬，且與其他宗教並無不同之處。假如要以貶義稱之，應要使用 cult 一詞。因此，中共即用英語將法輪功視為 cult。

儘管他出於好意，試圖勸服我加入修煉，但並不太堅持。

我與他話別後，便帶回許多文件資料，也獲告知可上網瀏覽。

我上了網，也研讀了資料。這門教派是由李洪志所創，他擷取佛教精義，譴責物質世界表象，提倡悲憫關懷，另再融合道教精義，尤其是修煉氣功，藉此臻於不朽之境。他又吸納美式科幻精神，教導學員為世界末日作好準備。此外，怪誕荒謬部分，也不足為奇。人脈網絡的組織，則有創新作法，資訊均透過網路互通有無，學員聚集私人場所、公寓或公園，靜坐冥想或修煉法輪大法。法輪功平和，訴求非暴力手段；加入或退出，毫不困難。我們未曾聽聞法輪功斂財情事，彼此間金錢流通並不常見，只會要求學員花點小錢，購買經書。隱居美國的李洪志僅靠經書版稅為生，沒有其他財源收入。他不常公開亮相，營造個人神秘形象。

正如與西方大部分支持民主，但無宗教信仰的人士一樣，我也無法接受中共終結迫害法輪功的動機。但支持非理性的法輪功，亦讓同為支持人權的理性捍衛者的我，內心百感交集。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就算有人癡言妄語，也要支持保有另類思考的權利吧。現在，只需探究中共為何將法輪功視為政權頭號敵人，及中國為何有數百萬人民，如此風靡法輪功。

反對共產黨的法輪功

起初，李洪志曾是共產黨黨員，也是一位經中共支持的氣

功老師。1970年到1980年期間，氣功被捧為軀體科學，崇高地位與中藥及針灸並列。中共當時認為，這些愛國學科可將西方知識取而代之。七〇年代，大學實驗室廣邀氣功師傅示範集中內力，遠距移物；八〇年代，氣功風靡整個中國。數以百萬計的學員聚集公園，練習此一被共產黨視為「可淨化人心」，且不具宗教色彩的緩慢動作運動。共產黨員則在一旁監視參加此一體育活動的群眾。這會僅是個吸引民衆的運動嗎？民衆對佛教及道教的懷舊，則隱然暗藏其中。某些人憶起童年祭儀往事，與相關古老宗教信仰互相連結。李洪志除了融合中國傳統宗教，並效法毛澤東之法，將學員聚集在運動場，重複呼喊口號，並指派證人上台證道。一切均如舞蹈表演般流暢，李大師的開釋，永遠都是合理正確。對大多數學員而言，群聚在一起練習氣功，只是個克服中國社會成員孤立無援的藉口而已。中國經歷半個世紀所刻意營造的暴力、攻訐及憎恨統治後，李洪志教授互愛與關懷之說，風靡民衆。學員彼此間重建信任及互助之情，與真正的共產主義完全相左。

法輪功學員中，退休人士或許為獨居所困，佔了最大宗。但法輪功也吸引公務員、軍人、大學教授加入，甚至有共產黨員相信李洪志之言，引起中共驚覺法輪功藉怪異信仰腐蝕共產黨組織之慮。連我本身也對共產主義者、物質主義者及無神論者均加入法輪功感到訝異。有人向我坦承，法輪功學員間可建

構親如手足之情，而共產黨黨員間則無。這讓我們想起昔日中國幫會，也曾有入會及互助機制。我們因此瞭解法輪功為何能在中國推展成功，甚至他雖未想推翻共產黨政權，但仍讓中共感到難以忍受：害怕法輪功就是個反對共產黨的組織。

1999年4月17日，10萬名法輪功學員透過網路聯繫，在北京中央政府所在地前靜坐抗議，反對報刊雜誌羞辱李洪志。共產黨領導人驚覺，法輪功居然能透過網路聯繫，逃過公安法眼，籌組組織性活動。中共對那些不是受其掌控的組織性行為，尤其害怕，只要不是籌組性的活動，中共均可容忍，但只要是籌組性活動，可就不得了！自該日起，中共展開迫害行動，法輪功學員不敵公安，均遭追捕入獄。

中共中央政府不想在北京再看到法輪功學員，指派首都及各地的共產黨基層委員會負責逮捕行動。只要北京截獲任何一位法輪功學員，其原籍地的共產黨基層幹部須為此負責，繳交罰鍰，黨員生涯告終。此舉引起共產黨地方幹部警戒，到處鼓勵告發。假如一有學員被發現，就算以人身威脅、不經判決逕予行政拘留、囚禁監牢、嚴刑拷打、處以極刑等強力手段對付，無人會加以指責。因此，法輪功成了「勞改營」的成員大宗，公安自身即可不經法院審判、無須律師在場及不循上訴程序，逕行以擾亂公安為由，處以4年以下有期徒刑。法輪功學員在獄中，與流氓無賴、妓女、吸毒者及同性戀者，囚禁一

起。雞年期間，遭囚禁的基督教牧師及天主教神父人數，也大幅增加。所有身心異常者，都不值得讓法院來判決。透過道德講學及手工勞動，引領他們重回正道。但沒人視察過這些牢獄中心，外人實難以瞭解犯人在監獄的生活條件。根據有些倖免於難，得以離開監獄的人士所言，法輪功學員尤遭濫施酷刑，直至放棄信仰為止。2005年12月間，中共因無法拒絕「聯合國人權組織委員會」派員造訪監獄，該會所派遣的奧籍法學專家諾瓦克（Manfred Nowak），才得以證實中國濫用酷刑之說。

另外，對付法輪功學員，還有一非暴力的作法，但有點滑稽可笑。你得好好站在共產黨地方官員的角度來觀察，若有某地的老人們持續聚集修煉氣功情事，而他們專心修煉氣功已逾十五餘年，並深信可藉此保有健康，這事可不容忽視！但一位將修煉氣功當成運動的老者，及一位服膺李大師而修煉氣功的法輪功學員，該如何辨識區分？就因為外表無法區別，共產黨地方幹部則另想妙方。首先，鎖定氣功學員聚集場所，如公園、湖邊、河堤及廟旁。另外，安置體育運動器材供學員使用，並宣導現代運動設備比落伍的氣功更具健康效益。我們不久後應可看到老者盪鞦韆，及使用其他運動器材的畫面。在這些民衆傳統聚會地點，共產黨鼓勵人民學習跳華爾滋，伴隨放送來自西方的現代音樂，老人成雙成對搖擺舞姿，古老的中國已不復見。只要共產黨高層不再聽聞到法輪功訊息，要採取何

種作法，一切聽任其便。儘管法輪功表面上已消失無蹤，但已轉入地下變成龐大的秘密組織。我不斷地遇見透過網路及簡訊所招募的法輪功學員，彼此間竊竊私語。

由於法輪功所專長的宗教及信仰領域，中共無法掌控，於是被視為具有威脅性。在中國歷史上，有許多朝代遭神秘宗教叛亂所顛覆；自稱上帝之子的洪秀全，假託天父、天兄（耶穌）之名吸收教眾反清，信奉白蓮教，篤信身體刀槍不入，創立太平天國，曾經撼動滿清政權。法輪功的特質與之相去不遠，惟此並不意味著歷史將會重演；只是無論是在北京，或是流亡海外的自由知識分子，均不諱言，會將法輪功視為一個客觀結盟對象。

如何評斷中國人的信仰？

中國修復重建佛道寺廟及信奉基督教的新興熱潮，讓人相信中國有信仰復蘇的感覺。中國各行各業人士，閒話家常總是會問及道德或是神秘議題。由於後毛時代的意識形態真空、狂熱追求物質主義及倫理道德普遍墮落，往昔信教懷舊記憶便激發一股追尋自我的風潮。但這僅屬個人感覺，並無實據可供佐證。至少，我曾經相信過……因為中共一切均可數據化，就連宗教也不例外。

北京有一間宗教研究機構，我們原本認為是個研究宗教信

仰的組織，但其功能卻是公安性質。研究員不以專研神學為務，卻思如何防堵宗教。表象無法欺瞞世人，兩位分屬不同世代的研究員接見我，一位經驗老到，權威十足，代表昔日的共產黨，另一位則是思維較為現代，代表今日的共產黨。

經驗老到的那位，怕我忘記，便時時提醒我相關法則規範：只要符合愛國且組織性活動需經共產黨核可之先決要件，中共即可承認這些宗教存在的合法性。自1949年革命以來，計有天主教、基督教、道教、佛教及伊斯蘭教等5個宗教，獲得中共官方認可；其他無法被官方歸類的各宗各派，不是被視為非宗教組織，就是被冠上反革命神秘教派之名。這些「愛國宗教組織」，除管理各種宗教場地外，並有宗教行為的審核同意權。熱心勸人信教是否合法？是的，但須經愛國宗教協會的會員認可，而且這個組織必須由中國人出面籌組；此一規定，便得以驅逐梵諦岡的天主教傳教士、韓國牧師及日本佛教徒。這位年輕的現代研究員笑容滿面地向我解釋：「這可不是中國沙文主義作祟，是中國信眾要求由中國人傳授教義。」哦？那麼佛教、伊斯蘭教，或是基督教，昔日是如何傳進中國？如果我們以此自問……。

我與他們分享在中國各省的宗教觀察心得，請教他們：「目前的狀況是否可稱之為宗教再生現象？」兩位同僚竊竊私語。輪到年輕的研究員，要給我一個簡化的回答，他向我表

示：「由於我們是知識分子，我將給予一個誠懇的科學答案。」在進入長篇大論之前，他請人端茶上來；一位鄉下女子，身穿不合身的宮廷侍女服飾，將熱水瓶中滾燙的熱水，倒入綠色茶葉之中，必須要等到茶葉沈入碗底，才是最佳品茗時機。我們邊吹氣邊品茗，除需忍受燙唇之苦，也要避免喝入茶葉。

「沒有，我們並沒有觀察到宗教再生現象。」年輕的研究員如是說。這家研究機構將5家愛國宗教組織的成員加總，2005年的信眾人數可達1億人之多。只要信眾沒有成為該等協會會員者，為避免影響數據的科學性，就不納入計算之列。1億人這個數據，不就跟1950年中共政權創立初期的數字一樣！1966年至1976年間，文革造成信眾人數大幅減少；1985年，重新開放宗教自由，信眾人數又重回到1億人之譜。只不過中國現有人口數，比起1950年，已成長2倍；因此，半個世紀間，中國信眾的比例還需減半計之。兩位黨工滿臉笑意：還有什麼無法讓我信服？

既然13億中國人之中，只有1億人有「宗教信仰」，此即意謂共產主義及經濟進步的的確確消滅了中國宗教。兩位特使得意洋洋。於是，我開始反擊：

一基督教教徒不是有明顯增長？

一它出發起始較晚；急起直追，趕上天主教。這是很正常的事！

事實上，基督教教徒比天主教教徒多了10倍之多，但中共對福音新教小團體的容忍度，似乎比具組織性且受中國境外指揮的天主教，要來的高。在美國佬的基督教與梵諦岡的天主教之間，中共似乎對美國較為偏愛。

兩位為禮貌地擺脫我的糾纏，於是對我後續參訪行程提供些許建議：既然有研究機構能夠針對議題提供科學性答案，我必須注意不要被主觀印象所誤導。

或許我如同昔日的耶穌會教士，在驚訝之餘，受自身偏見所局限？他們看不見中國的宗教；我則是看了太多。

然而，我並不想跟許多北美觀察家一樣（他們本身就是基督徒）下此結論，認為：中國人將集體改信基督教，狂熱推翻共產黨統治，創建民主制度。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還是太過中國化，其程度遠比基督教化為高。假如要從中國宗教歷史提供世人某些啓示，不要讓任何一個宗教宰制另一個宗教。中國宗教及各宗各派很可能持續分散各地，但就是這種多元主義，才可以帶給中國擺脫一條鞭思考的契機。



Chapter 4

遭羞辱的農民

現在我們向中國沿海各省道別，往西轉訪中國內地，在追溯往日時光的同時，驚覺中國經濟奇蹟的背後，實際卻慘不忍睹。

從首都北京搭機離開時，古老的中國似乎顯得煥然一新，連機場的服務效率都更甚歐洲。而昔日那尊歡迎旅客到訪的毛澤東巨像，已不知在何時被拆除。其實，除了北京及上海，在中國大部分的大城市，雕像依然到處林立，雕像文化根本未在中國消聲匿跡！

兩小時過後，我們抵達西安，一切運行如常，這裡還是運作順利的新中國。但這一切似乎過於美好。眼看通關機場及高速公路，面積超大，卻門可羅雀。這些硬體建設，基本上是在統一中國的目標下，團結各省凝聚力，為共組中國單一市場所建的。但直到最近幾年，中國各省市場其實仍各行其是，自我封閉。地方政府一方面各自發展農業及工業，自給自足，一方面又巧立名目，課徵關稅及設立各式各樣的行政障礙，以保障自身利益及保護地方企業。只是，現在歷史的新頁已經開啓，建構一個史無前例的真正大中國市場，已不再是幻想。高速公路，到處可見。我們猜想，也許建造這些公路讓某些幹部荷包滿滿，但對於一般中國平常百姓及搬運工人來說，根本無力給付過路費。況且，建造公路的財源究竟來自何方？這也啓人疑竇。中國中部及西部的的主要公路，通常只見政治領導們的德國

奧迪黑頭車，在其間穿梭不停，最終又是誰要負責償還這筆建設投資費用？

熱衷建造高速公路的怪癖

在中國最貧窮的省份，使用機場及高速公路的機會原本就很低。但國營銀行只能遵照地方共產黨部指示，出資興建，造成呆帳的累積。即使在較繁榮的省份，過路費也不足以填平借貸缺口。於是，官股佔多數的高速公路局，便大幅徵收公路兩旁的農地，轉成建地再低價賤租，把投機風險轉嫁到求償不足的農民身上，讓企業坐收漁利，並吸引毫無知覺的外商銀行投資。

西方旅客驚豔於中國聯外公路網絡開發如此迅速的同時，是否關心過當地勞工的工作條件？受僱的鄉間挖土工人，每週工作 80 小時。他們的住所簡陋，伙食奇差，而且無權遠離工地，將此開放性的苦役監牢稱為「集中營」，實不為過。成都大學法學教授王怡則諷刺地表示，德國納粹在三〇年代，也曾建造許多令歐洲人嚮往的宏偉高速公路！

在一個幅員廣闊但民不聊生的國度中，居然有人獨尊高速公路及私人轎車，實在本末倒置。若在城市發展鐵路及大眾交通系統，除對運輸各省龐大人潮與貨物的效益會好上千倍外，亦有利西部及中部各省的工業化，並能將貨物運往沿海各省。

中共最近僅投資興建連結西藏的鐵路，並於今年正式啓用。青藏鐵路¹經濟效益雖低，卻可讓中共更易以殖民的方式反制叛亂的省份，並在必要時派遣大軍壓境。對此，藏人實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中共之所以將高速公路列為優先建設項目，除為了讓主政者有機會快速致富外，面對緊急亦較能快速應變。中共領導沈不住氣，無論對自己或對整個中國，他們所追求的，一向是立即利益，而不思長遠規畫。在中國，很少人會慮及未來。難道是因為沒人相信有未來？其實資金之所以會投注在大型建設，而非教育普及與全民醫療衛生上，是因為中國經濟發展並不奠基於人力資源的培訓及精進上。剛好與日本及南韓發展經濟的經驗相左。有時，北京領導人在字裡行間也會承認錯誤，並保證未來會盡量改善，允諾在貧窮省份提供學校、醫院、工廠及火車服務。凡此種種，據我們以下的觀察及描述，目前看來實仍屬空言。

譯註1：青藏鐵路起自中國青海省會西寧，終點為西藏首府拉薩，全長1,956公里，是目前全世界海拔最高的鐵路。全線建成歷時近50年，其中，西寧至格爾木段共814公里，於1984年完成，格爾木至拉薩段1,142公里，自2001年6月動工，2005年10月全線貫通，2006年7月1日正式通車。

從中國沿海省份到西部內地，宛如重返上世紀。

在西安市西郊，我們曾參訪一座日夜趕工建造的高速公路工地，只有混擬土用罄時，才會讓上工速度放慢下來。我們雖還身處在已開發世界，但從旁急駛而過的卻是如上世紀老舊且超載的砂石車隊。隨後的行程，中國的歷史場景不斷在我們眼前一一浮現。我們看到毛澤東時期的工廠崩塌後，新穎工廠取而代之。昔日公營工廠，現則由私營工廠取代。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持的「創造性破壞」理論，正在中國發生效應。我們所路經的村莊中，天主教及基督教教堂均見證過當地曾經歷西方宗教洗禮，如陝西省就有中國第一座教堂遺跡，約建於西元七世紀。該教堂隸屬波斯景教，早已失傳，或許已和佛教融合為一。基督教義開始在中國流傳時，便採行兩種方式傳播福音：或採納中國習俗，與之共融；或以外來宗教之姿，打動人心。

沿著公路，可瞥見墳頭的墓碑，依照風水習俗，散立於麥田及玉米田中。由於適逢初春清明節，多數墳頭的雜草已清除，子孫緬懷祖先，紛往焚香祭祖。透過掃墓，讓因文革四散各地的遠方親人，得以再次重逢敘舊，重建公民社會，並藉以維繫後代子孫情誼。由於中共鼓勵集結屍骨，推行火葬，以釋放更多的可耕地，因此，這裡每一座墳頭及墓碑均代表著成功反抗威權體制的卑微象徵。農民仍堅持在墳地四週播種收割，毫不畏懼權勢。

車行約200公里後，高速公路逐漸變窄，路況變差，路面不再鋪蓋柏油，造成有些卡車身陷困境，動彈不得，或掉落山溝深淵之中。我們一跨越陝西省及甘肅邊界後，立刻有人向我們解釋說，由於地方高幹私吞公款，使得公路最後只好以豆腐渣來堆砌。雖有些涉案人士入監服刑，但共產黨幹部則未受司法機關追究。只要涉案者是共產黨幹部，就算犯罪，司法機關也很少會加以追究。藉公共工程回扣提供政黨獻金，舉世皆然，中國當然也不例外。倘若貪腐情形過於囂張，共產黨則會找個低階的代罪羔羊受過，展現打擊貪腐決心，但絕對不會損及貪腐共生鏈！

過了豆腐渣橋，有一條石子路通往山上。因為途經幾個收費站，使得前進速度有所耽擱。面對收費站身穿制服的監察員要求過路費或索討禮物時，若拒絕則可能遭課徵高額罰金。曾行經中國各大公路的旅客，都會有遇到身穿制服的公務員勒索莫名其妙的過路費之經驗，而所收的過路費最終還是落入私人口袋。從中共所公佈的資料來看，針對農民所課徵的各項稅務，約有四成既不合法，也從未繳交國庫。

途中，我們見有新穎工程中斷停建，而村莊中，仍到處可見數世紀以來，從未改變過的土牆瓦蓋屋。最後，我們終於抵達此行遠征之目的地——鳳凰塔村。該村居民約有12,000人，分居10個莊落，莊名十分別緻，如鴨潭莊、毛家莊等。由於我

與當地共產黨書記的女兒就醫於寶雞醫院時巧遇認識，所以受邀參訪便無須向公安報備。在中國，不期而遇的友誼是最好的入境隨俗之道。

遠看中國鄉間的刻板印象，通常是亙古不變，或如詩如畫。但其實並非如此。以貧窮字眼來形容陝西或甘肅的情況，尚無法真正體現當地物資的匱乏。家家戶戶的房子內除必備的床、火爐及凳子外，幾乎空無一物。土牆及炕床既無法抗拒酷夏，亦無法抵禦寒冬。衛生條件不佳，水源稀少。村莊之間，沒有公共聚集場所可言，更遑論社交生活。另外，村莊也沒有和諧靜謐的氣氛，各村莊的角頭時起衝突，破壞鄰里關係，每戶人家都自掃門前雪。只有到夜幕低垂，始能重拾寧靜。不過中共在當地仍有些正面建設，如市鎮間有電力供應，可觀賞電視，但居民只收得到中央電視台訊號，收看官方政策宣導及綜藝節目。儘管如此，居民還是藉此擺脫了離群索居的糾纏。

但是男丁們都上哪兒去了？在小巷中，只見到學齡的幼童及叼根菸坐著休息的老人。此地孩童之多，顯見其父母應不太遵守家庭計畫之規定：陝西省，每對夫妻可生2胎，而其他人口密集的省份，則奉行一胎化政策。但在鳳凰塔村，平均每對夫妻生3胎，這表示他們隱藏多生一胎的事實，或支付高額罰金了事。此行是我第二度造訪，第一次在4月，而現在已是入秋，年輕人手工收割玉米穗後，便以木耙犁田整地，準備播灑

麥苗。每戶人家在山側平地均擁有1公頃土地，除了人力外，既無工具，也無肥料，只能耐心依賴貧瘠的土地過活。運氣好時，倒可收割蘋果及胡桃，賣錢為生。中間商憑藉卡車運輸的優勢及利用農民組織渙散，將居民這唯一的收入來源，從中剝削殆盡。

此地看不見男丁及年輕女子的原因，是共產黨刻意讓鄉間貧窮困頓，前途無望，迫使根留鄉土的農民無力改善自我命運，除了外移到沿海城市、尋求打工機會外，根本別無選擇。中國與印度、巴西及印尼等其他開發中國家最大的不同是，雖然同為人口密集及以農村型態為主，其他國家的農民能發表意見，有時還能上達天聽，但在中國則非如此，農民只能極辛苦地冒險打拼、學習新知及自求多福。

8億農民命運，悲慘永久相隨

有人認為，中國農民過多，而可耕地過少又收益不大，註定會貧窮潦倒一輩子。這根本是陳腔濫調，無法說明農民處境為何年復一年日益困頓不堪的原因（此點中共也承認），除了離鄉背井打拼外，別無他法。六〇年代，中國曾引進新研發的農產品種及農業技術，大幅提升穀物收成並根絕饑荒與缺糧問題。而七〇年代實施工廠下鄉政策，農工合一就地發展農業及促進轉型之經驗，也曾證明實際可行性，可惜上述相關經驗並

未充分傳承延續下來。反觀如印度、孟加拉則採行農產商品化政策、組織私營合作社及核撥小額銀貸給個體戶等措施，成功就地改善農民生計，無須離鄉背井。但在中國，靜默無聲且無法推派代表發聲的農民，仍舊一無所有，既無耕地所有權，亦無抵押擔保品，申辦銀貸無門，命運註定悲慘永隨。中共雖深知改善農民悲慘處境，可藉採取土地私有化政策化解，但因恐可能衍生一批無須寄生共產黨的新中產階級，所以至今仍無法解套。

另外，共產黨限定每戶農家小耕地的使用方式，阻擾了耕地整併及採行機械化生產的可能性，導致十五年來，中國米麥總產量一直停滯不前。儘管農民有意整併耕地，商業化生產蘋果，甚至建造果汁工廠，但這麼一來，共產黨就得被迫思考一些現實的問題，如放棄土地分割化政策、辦理農民銀貸、杜絕中間商剝削及建造村莊內外連結道路等問題，因此興趣缺缺。雖然上述種種措施都具有正面意義，卻令地方共產黨書記十分「頭痛」，必須向縣級長官反應。地方共產黨書記向我坦承，還是維持現狀的好。

遭羞辱的農民們，前途無望，只好寄望孩子能透過教育改善未來。但藉此是否就能夠擺脫目前的窮困？天下父母心，為了孩子，農民就算犧牲現有的微薄收入，也在所不惜。鳳凰塔村設有一間經官方認可的學校，目的在提供該村2,000名孩童9

年義務國教。但全村仍約有 1/4 孩童，或在街頭閒逛，或下田幫忙工作，並非所有孩童均可入學。該校主任表示：「學校目前的設備，不足以接納這些『殘障』孩童！」但就我的觀察，孩童真正的「殘障」，應是父母親無力供給學費所致吧。

然而，義務教育不是應該免費提供嗎？在城市，公立學校的確是免費或靠公營企業捐助；但在鄉間，可不是這麼一回事。父母親除需分擔學校教學用品、暖氣、粉筆、餐廳及其他名目等費用外，還需送禮給老師，好讓孩子獲得關照，順利升級，完成學業，進入中學就讀。而老師每月 80 塊人民幣的微薄薪津，以及入住學校破宿舍（1 張簡陋的床及火爐外，空無一物）的待遇，只會讓城市畢業的準老師們望之卻步。而鄉間所稱的老師，通常是由上過 2 週培訓課程的農民出任，根本沒經過正規訓練。他們仍然保有種田工作，經常在學校及農地間來回穿梭。而這些準教師只會教孩童朗讀、寫字及算數。中共大肆宣揚的 9 年義務國教，又是另一項虛擬事蹟！這也說明為何中國有 25% 的文盲率了。

但農民可能遭遇的最慘狀況，還是疾病侵襲。要就近找個醫生，必須搭大客車在顛簸石路行駛 5 小時，才能抵達寶雞就醫。加上在中國所有醫院，無論是緊急或一般醫療照護，通常會要求病患繳交 800 塊人民幣充當保證金，以支付未來任何可能需付費的醫療行為。而較現代化的醫院，會要求事先付帳。

藥品部分，則由醫師另以高價販售。對絕大多數的家庭而言，看場病可是會負債好幾年！但醫院所提供的收費昂貴的醫療服務，並不能保障醫療品質，有時候反而愈醫愈糟，如縣級醫院居然有人使用二手針筒來注射或輸血，提供過期藥品等。許多病患因此染上可能惡化成癌症的肝炎。村莊內的寡婦一大堆，又有誰關心過？

正當中共及其他各國擔憂SARS及禽流感疫情（目前受害者仍有限）的同時，又有誰關心過上千萬甚或上億中國人民可能感染的肺結核、瘧疾、肝炎、霍亂、痢疾等問題？預防及對抗禽流感疫情的過程，十分複雜，而且所費不貲，甚或會徒勞無功。但是，只需教導中國人民基本衛生常識，就可以解救眾多生命。中國鄉間，不習慣洗手及與動物同住等不良衛生習慣，是造成疾病傳染的三大媒介。但共產黨基於投資改善衛生環境，無法立即獲益而不加聞問，實在令人不恥。中國西部鄉間與沿海各省的平均壽命相比，約少了10歲之多，而其間的差距，實有日益擴大的趨勢。

平常百姓既然得不到基本的醫療照護，只好求助村莊道士，希望能提供精神良藥，對此，共產黨則以「人民鴉片」稱之。

鳳凰塔村的趙道士，是位正牌的道士嗎？雖然他出示中國道教協會所認證過的證書以資佐證，但獲頒該證書，根本無須

具備豐厚的神學基礎，只需賄賂該協會，維持良好關係，就可拿到。在中國，沒有不可賣的物事，就連宗教聖職亦可販售。趙道士蓄口長鬚，態度熱忱。「由於共產黨德政」，他得以重建於文革期間遭搗毀的鳳凰塔村的道觀，外觀現雖耀眼，但仍忠於原味。他再三向我強調絕不涉足政治。他主要工作雖是作法超渡、解救亡靈，不再糾纏生者，但平時遇有頭痛、癌症、虛弱病患求診時，他則以草本香柱及念咒解醜等方式處理。每一項療法，可無一不收費。但此種療法，因從未經科學驗證，不僅效用令人懷疑，有時候藥方的有毒物質，甚至還有奪走人命的危險。

在「自由化改革」前，所謂的真正共產主義年代期間，這裡的醫療衛生水準是否有比較好？毛澤東時期，該村曾設有衛生所，文革期間曾派遣一位城市年輕女子進駐服務。但耆老憶起昔日這位「赤腳醫生」時，還是認為現在的趙道士能力比較好。

我曾造訪過中國許多地方，卻以這個村莊為例說明，是否會過於偏頗而以偏蓋全呢？誠然，現今的一切，與六〇年代，共產黨沒收農民穀物收成，迫使農民吃樹根及樹皮之慘境相比，顯然好得多。1950年至1978年間，中共實施「大躍進」時，鼓勵農民根留家鄉打拚，農民也尚足以殘活。1979年起的「經改」，重行土地使用權私有制（可不是土地私有制），也解

救了農民饑荒於水火中。中國的確不是處處晦暗，但是現今有1億農民生活於饑餓邊緣，卻是不爭的事實。1億人民對整個中國而言，可不是輕如鴻毛。

針對上述中共正面進步的措施，我們是否也該對其英明大肆讚揚？其實中共廢除農民大鍋飯制度後，實施農改成功與否，端賴農民的理性，而非鄧小平的天縱英明。儘管共產黨曾因沒收農民私有財產及穀物收成，造成數以百萬農民喪命，但如今共產黨要求農民工作，他們還是任勞任怨地工作。因此，共產黨實在沒有足以自滿的餘地。而我們需要為了證明在共產黨領導下，中國有所進步，就將現今的中國永遠與昔日的中國相比？難道我們不應將中國與遭遇相同挑戰的其他國家相比嗎？難道我們不應該將農民認真工作及努力求學的因素納入，將昔日的中國與未來可能的中國相比？我認為最後一種方法應是最適切的。但對共產黨而言，也是最不利的。因為開發農業、改善8億農民生計，絕不是中共當局的優先考量目標！

青少年被迫離鄉背井

盧甚至在我開口提問前即解釋：「共產黨現在既不下令，也不管理，提供的僅是建言！」擔任鳳凰塔村書記一職的盧，應該早被長官告知，有位老外未事先申請就到處在中國探險吧。盧看來似乎蠻誠懇的，至少他本身就是務農出身，而不是

由共產黨自城市指派的黨員。村莊的共產黨書記蠻橫及作威作福的例子，雖不勝枚舉，但村民對年輕的盧倒抱怨不多。的確，村民要應付共產黨書記及其配偶所需，包括為其建造一間現代白瓦建物，支應其日常所需及其他開銷，如香菸及盧赴城市公幹的車資。共產黨在鄉間一向靠農民供養過活，因此很容易成為魚肉鄉民的地方惡霸，當他們邀請親友作樂時，這些非正式但也最沈重的相關開銷也轉嫁到農民身上。另外，共產黨書記強取豪奪農民土地建造房屋情事，也時有所聞。農民們有些忍氣吞聲，有些則請願抗議；甚至有人遠赴北京，伸張權益，但途中，或遭公安痛毆，或遭囚禁監牢。當請願者在首都聚集人數日益龐大時，公安則迅即將之囚禁，等待時日再遣返回鄉。當有人赴京請願成功時，傳媒則據以稱頌黨中央領導英明，批判地方幹部漫不經心。其實這根本是一場戲：只要沒人上告上級，基層共產黨幹部有什麼事不敢作！

但盧對村民的要求並不多，有人向我表示：「他識字，讀寫均佳。」他上過高中，能夠看懂官方文書，並將之譯為家鄉話與村民溝通。盧對能在80位候選黨員中脫穎而出，感到十分榮幸。但這不就僅是個村莊低階幹部而已嗎？而所服務的人數也只有2,000人。他坦承，共產黨在挑選人選時實應更為謹慎，只不過符合「同意致力服務人民」資格的並不多。共產黨書記中，有多少女性代表呢？被我突然一問，盧在承認沒有以

前，似乎曾在腦中數過，但後經思考表示，可能有一席吧。

盧曾收到高層指令，需向我說明政府政策，他表示：「共產黨係以發展中國為唯一己任。」他負有向村民解釋此政策之任務。是的，我的確聽得很清楚，要發展的是中國，而非村莊；而要發展中國，則要讓價廉及溫馴的鄉間勞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俾供工廠使喚。

鳳凰塔村的少男及少女一滿16歲，盧即催促他們離鄉背井，販賣勞力。人口外移現象根本就是共產黨蓄意唆使，而不是自發性行為。縣府共產黨每年依照年齡、性別及職能，訂定所需的勞力配額後，告知盧據以招募。而這些名額反應了中國沿海各省、城市甚或鄉間之工業及服務業，所需的勞力概況。假如盧當年無法確實執行配額，下場不是遭罰鍰，就是遭降級處分。實際上，甚至在盧開口催促前，少年們就已紛紛表達離鄉意願，因此要完成上級所交付的任務，根本不是件難事。

跟共產黨一樣，家長也認為根留家鄉，無所事事，這更助長離鄉背井的風氣。少年離家後，家裡則盼望收到部分薪津補貼，有些人會寄回，有些人則自此音訊全無。回鄉接父母親同住的事例，更是少有。中國傳統孝道，已讓市場經濟給破壞殆盡。父親遠赴外地謀生，了無音訊，寡母無力扶養子女，或亦被迫出外謀生，或服毒自殺，致孤兒人數日益增多，且無人關注孤兒教育問題。當他們長大成人後，將遭中國尋找打工機會

的龐大盲流所淹沒。而天知道，目前中國盲流究竟有1億人或2億人？

此時，我們觀察到共產體制有一個令人驚訝的巧合：1958年，毛澤東下令工業產能「大躍進」，地方幹部負責將2,000萬農民送往工廠勞動。3年過後，「大躍進」失敗，饑荒遍野，這2,000萬農民又被遣返回老家。毛澤東歡頌著：「能在彈指間調動2,000萬中國人的共產黨，可是個多麼偉大的政黨啊！」但這世界上也絕對沒有任何其他政黨可以做出同樣的事情。

我從老王口中，得知村莊學校概況、農田生活、自殺悲劇、離鄉背井、一去不返等實例。老王參選獲勝擔任村長，同時也兼任該村勢力最大的角頭領袖，權力之大，無須買票，即可當選。但村長及共產黨書記，究竟是誰在主導呢？老王的主要工作是調解家族間的糾紛，儘管他支持整併農地、種植蘋果、建造果汁工廠，但年輕的盧反對。老王承認，盧決定一切。權力層級組織在全中國的城市、村莊、企業及大學，均採中央一條鞭模式，即共產黨決定，行政單位執行，軍隊或公安監視。老王遵循共產黨路線，也催促年輕人赴城市發展：「女孩從事服務業，男孩則是勞力工作。」以他的女兒為例，也遠赴西安，在餐廳當服務生為業。但她的近況如何呢？老王則沈默不語。或許在老外面前表達感傷之情，會沒面子吧。這個中國固有的文化特色，使得我的田野調查難以進行。訪談內容可

自行扭曲，但面子可千萬丟不得！

盲流勞工，二等公民

鳳凰塔村子弟的長途遷徙實例，或許可據以寫成悲壯史詩，但其中大部分已音訊全無。有些是一個工地，接著另一個工地的接；一個工廠，接著另一個工廠的換。薪津有時拿得到，有時則否。雞年年初，中共估算僱主積欠盲流勞工3,600億人民幣工資，並要求務必在該年年底以前支付還清。盲流勞工們挨餓受凍，還動輒遭同儕痛毆，盜匪劫財，公安罰鍰。但在中國歷史上，現在的一切沒有變得更好嗎？

半世紀以前，農民需要申請獲准，始能在城市搭乘火車觀光；直到1984年，農民還需準備飯票才能就食，而且僅限當地使用。此外，要赴城市工作，可得事先申請通過才行。從這些內部許可證件直到最近才明文廢止看來，農民以前所遭受的勒索威脅情況，令人難以想像。

此後，農民可自由遷徙，出賣勞力，讓工廠及工地順利運轉，並建造大樓及公路，服務市民。市民及農民，透過穿著、舉止、習慣及鄉音，肉眼即可辨識。市民鄙視農民，可毫不遮掩。無論是北京或上海，其市民倨傲對待河南省或陝西省的農民，就像歐洲人鄙視非洲黑人一樣。甚至在《山東日報》的讀者投書，有人表示，盲流勞工身上氣味難聞，建議公共交通工

具，應設置分級車廂。但他們不全都是中國人嗎？至少從外表看來，的確是。

城市人及鄉巴佬間的不同，並不局限在地理位置或經濟能力。這根本就是「合法歧視」，其實就是共產革命的產物，也是最不為外界所知的一面：五〇年代，毛澤東將人民區分為2大類：「紅五類」（工人、貧農、下中農、革命幹部和革命軍人）及「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簡稱地富反壞右）。每個中國人一出生就得報戶口，戶口名簿上則註記人民類別及省籍地。出身血緣則透過母親一代一代傳承下去。每一位中國人的命運，與戶口密切相關。每個人的權利範圍，因血緣出身不同，會有很大的差異。而此血緣出身，就如同印度種姓制度，與每一位中國人的一生緊密結合。美籍華裔學者王飛凌曾探討專研此一敏感議題，惟在2004年研究期間，即遭逮捕，遣返美國。2005年11月，共產黨宣佈完全廢除戶口制度。但這遲來的措施，已無法阻止地方當局另設合法門檻，阻擾鄉巴佬們融入當地社會。

鄉巴佬們，請止步！

大部分的農業外來人口無法與市民共享公共服務設施，諸如受市府或企業補助的社區住宅、初級教育、醫療照護等。市府以他們並非納稅人或平時無扣繳分攤費用為由，排除適用。

2005年，由於300萬外省移民的孩童，向北京申請就讀現有學校未果後，北京市府乃宣佈另成立特殊學校容納。但上海市府則處心積慮，防止外省移民與城市居民相互融合。

上海1,700萬居民中，有1/3係外省移民，但他們幾乎不可能獲得上海公民身分。上海公民憑身分證，即可使用公共設施。上海跟中國其他城市一樣，都存有以血緣身分決定「另類國籍」的現象。雞年期間，「改革」風潮壓倒一切，上海市府雖同意放寬規定，同意通婚可獲得當地身分，但需符合一堆荒誕不經的條件為前提：上海人的老婆，若非上海人，即日起通婚15年後，即可自動獲得上海市民身分，因此，該兩人婚生子女，亦可藉母親獲得的身分，傳承下去。起草此項大膽革新的創始者，則向我說明，會娶「外籍女子」的上海人，通常是「非貧窮，即殘障」。那麼非上海籍的男子，要娶上海姑娘，其命運不禁令我擔憂起來。市府人員表示，由於「上海姑娘從不會下嫁上海以外，任何一位外省籍的中國人」，因此新法並無相關規定。但要在中國規避禁令，應該還是有可能的，從牆上到處可見保證提供假證件的廣告，即可見一斑。不過這可是一項高昂的投資，很少外省移民能負擔的起。

上海就如同北京及中國其他大城市一樣，1/3人民在城裡工作，卻居住在城外，註定成為二等公民。身為城市邊緣人，居無定所，也無法適應城中生活。由於無法在城裡讓孩童受教

育，找到適當住所及工作不確定性高等因素，適應不良的外省移民紛紛放棄離去，但隨即取而代之的又是另一批涉世未深的苦力。北京社會學家韓琪女士研究盲流勞工議題表示：「盲流勞工對中國的發展，所付出的代價甚大！」她認為，只有少數外省移民，如大學畢業生及致富商人等，得以合法成功地融入城市生活。由於需要靠文憑或鉅額投資，才得以改變戶口烙印，使得其他的外省移民注定要重返家鄉或在城市間不斷地飄移。

靠自修擺脫農民烙印，到底有多少成功的案例？如同我們所看到的，鄉間學校教育品質低劣，就算成功通過大學入學考試，接下來上大學可又是一筆鉅額開銷。中國社會間的流動性原本就不高，隨著城市菁英彼此近身複製，流動性又變得更低了。鄉間人口雖佔總人口的80%，但北京大學的學生，約只有20%來自鄉間。且此一比例現正不斷下降中，而他們也被同儕視為二等學生。在中共背書下，城市的中國人以合法歧視之姿，剝削鄉村中國人，於是造就了中國今日的經濟發展。

毛澤東仍是偉大的舵手

如何想像中共能蓄意創造兩種人民，而且幾乎是在中華民族內，將之區分成兩大族群？我們之所以會如此驚訝，完全是因為沒有正確瞭解共產黨的本質。法國歷史學家比昂科（Louis

Bianco) 表示，毛澤東的說辭曾讓人相信，革命是由農民發起，但實際上農民在共產黨游擊戰中只是個「小角色」，他們從未能主導，更談不上從中獲利。北京社會學家李路路表示，「如同1789年法國大革命，放火燒毀法國貴族城堡的是農民，但掌權的卻是律師。」在中國，權力則是落在文官、軍人及工人前衛隊身上。在毛澤東時代，工人（而非農民），即是所謂的特權人士。而且毛澤東心中的中國，並不是鄉野烏托邦式，而是一個工業軍事強權。1959年，就算中國「大躍進」失利，遍地饑荒，中共仍外銷穀物來投資建造核武，及提煉酒精發射火箭。我們可得好好的記住這些前例，毛澤東時代所賺取的外匯，均挹注在建構軍事強權上。那麼在毛澤東繼承人所遵循的共產體制主導下，今日中國的作法會有所不同嗎？

毛澤東所推行的經濟發展計畫之所以會失敗，是因為該計畫植基於國營企業、計畫性經濟體制及鎖國封閉心態上。儘管如此，其工業計畫藍圖仍是一脈相傳。自鄧小平起，改行自由化經濟的目的，並非要改變策略，而只是改採經驗證有效的另一種方法而已。但無論是毛澤東統治時期及後毛澤東時代，或是解放革命前、後時期，農民在其工業計畫藍圖中，一直只是個無產階級分子而已。這種情形，至今依然。每年每1,000名農民中，只有不到2名，得以成功擺脫農民烙印，合法晉升為市民階級。

身為長期受到忽視的一群，農民們的處事態度，是否依然被動？雞年期間，農民已忍無可忍，鄉間群情騷動的狀況不斷發生。

抗暴及鎮壓時刻

2005年5月，中國河北省繩油村百戶農家拒絕無償放棄耕地，供發電廠建地之用，當地政府即僱用民兵，強迫驅離，農民手持長叉，奮力抵抗，結果12名農民命喪黃泉，發電廠則如期開工。

假如村民沒有以簡訊通知北京記者，此次抗暴及鎮壓可能僅是件不為外人所知的平常事件。當記者趕到時，一切均已結束，村莊已遭公安團團圍住，採訪記者遭逮捕，新聞完全被封鎖。但口耳相傳及網路流言四起，引起北京中央關切，由中央所核撥的徵地補償金居然被地方幹部掏空，只將極少金額發放農民。為此，農民四處請願，至地方黨部抗議未果，只好決定採取日夜輪班看守家園，並絕食抗議。於是，地方共產黨幹部便僱用打手介入。值得注意的，並非抗暴事件發生的原因，而是在事件發生後，消息居然傳播迅速！在幅員廣大的中國，每日都會發生或無證人，或沒有願意作證的證人，挺身而出的類似事件。

2005年9月，浙江省東陽市當局未遵守承諾，關閉5座具

污染性的化學工廠，引起農民設障阻擾，發生警民對峙數小時的事件。工廠四周農地，佈滿含毒污水，無法耕種，農民感染皮膚惡疾，甚或癌症重病。數月以來，村民們曾反應及抗議多次，終於2005年6月，獲當地政府允諾關廠而平息了事。但直到9月，化工廠居然運作如常，引發農民心中怒火。在此次農民抗爭事件首領引導下，一位香港記者來到東陽市，實地拍攝雙方對峙情況，並於網路傳送。中國當局雖禁止傳媒報導，但香港記者依舊詳實刊載，也引發美國刊物後續關注。12月6日，也發生類似的事件：東州當局強迫徵收農民土地，建造發電廠，引發警民對峙，公安向示威群眾掃射，死亡人數不詳。此係1989年天安門屠殺事件以來，首次發生公安開槍掃射民衆，且透過村民通知港媒，也讓中國以外的國家報導此事。但只有一小部分的農民抗爭事件，得以經由香港媒體而為世人所知，絕大部分則否。有些事件因發生在中國人跡罕至的內陸遠方，既缺人證，又無畫面，而且香港也愈來愈難擺脫北京中央政府的掌控壓力了。

在幅員廣大的中國，以上種種究竟僅屬難以避免的零星事件，還是可代表鄉間普遍起義之先兆？共產黨對此提問無法回應。2005年7月，中共公安部部長在政府秘密會議中坦承，2004年，中國發生74,000起民衆反抗事件，計牽連376萬人，而且事件蔓延速度也日益增快。由於地方不會凡事往中央呈

報，因此實際的數字絕對更高。官方傳媒獲告此一「機密」訊息後，便善加運用並加以報導，雖遵照共產黨指示，命令農民「遵守法令」及運用「適當方法」請願（指透過請願辦公室途徑請願），惟並不否認農民請願之正當性。面對抗爭事件，共產黨似乎贊同農民見解，與之同一陣線譴責地方貪腐幹部、投機建商及不誠實的企業主。

共產黨長期小看了鄉間暴動的嚴重性，並將之視為城市化及工業化發展的必然結果。直至雞年，這些反抗事件似乎在地方有蔓延的趨勢，而彼此間卻又毫無關聯。農民抗暴是否屬於中國歷史傳統的一環？從遠古時代至今，歷代中國農民都曾手拿長叉，先後反抗歷朝官員、查稅官員及共產黨幹部。而中國鄉間唯一有過一段靜默的時期，就是毛澤東恐怖統治時期。自1990年以來，因中共不常動手鎮壓反抗事件及傳播資訊管道更為多元，讓我們瞭解為何中國抗爭事件會陡增，及西方更能掌握事件前因後果之因。透過網路及手機傳播資訊，的確能夠讓農民間互通訊息及籌組行動，但是否會從反抗，轉變成抗暴，甚或革命？

在中國東部省份的鄉間，較為繁榮富庶，無論是自城市衣錦榮歸的村民，或由退伍軍人所出任的農民領導人，均十分擅長籌組抗爭行動。假如抗爭行動驚嚇不了共產黨，那麼整個聯繫網絡倒是可以令其生畏。就在2005年得知反抗事件數目如此

龐大的同時，共產黨也採行新策略試圖阻止頹勢。對此，我們並不感到意外。此種戰略是依據意識形態而非事實，來詮釋抗爭事件。而我們也發現，所制訂的相關法令，都是為了鞏固共產黨控制而訂，並不是讓農民有發聲的機會。

共產黨永遠是對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所研究員党國英，身兼中共中央政府顧問，負責灌輸共產黨幹部新穎的正確思想。共產黨現已蛻變成由專家，而非革命家所組成的政黨，因此目前是由鄉間的專家們，藉分析衝突及數字化體現，來訂定正確的因應之道。但是難道就沒有考量過要訂定解決之道？我們姑且聽聽他的看法吧。他劈頭就簡介，農民抗議有五大原因：

一、稅務部分：除了8.48%所得稅外，地方共產黨幹部還巧立名目，將村莊公共設施費用，轉嫁到農民身上。有些農民認為，共產黨幹部挪用地方稅款，購買轎車，建造住宅、結算賦稅，令人難以忍受！而中央政府並不認為農民有錯，並於雞年年初，宣佈取消向農民徵收任何稅捐。党國英結語道，藉由共產黨與農民站在同一陣線，農民反抗的主因即消弭於無形。對此種說法，我是否應該照單全收？北京可能已被党國英自己的推論所蒙蔽了？儘管農民稅務已正式廢止，但地方共產黨仍以不可勝數的其他名目向農民訛詐金錢，而其所引起的民怨，

可比官方昔日所明訂的稅目要大得多！

二、控制幼兒生產數：比起稅務官員，農民可更憎恨家庭計畫官員了。他們造訪時，經常引起雙方鬥毆。黨國英則表示，控制幼兒生產數十分成功，因此，這項因素所引起的不滿情緒，應會自行嘎然而止。這種話，他居然說得出口，我實在不知道應相信什麼了。中國人口成長速度，明明比一胎化政策所預定的目標快2倍：難道共產黨早已經放棄一胎化政策？或是在沒有掌握可信的人口數據下，他還堅信，事實會與他說的內容恰巧相同？

三、農民「由於不諳會計規則」，超估村莊企業所獲取的利潤：這些集體企業，在鄉間為數眾多，在農民空暇時，聘僱許多農民勞動，隨著利潤分配，也改善了農民生活水平。其實，假如真有利潤的話，也只有地方幹部知道真正的利潤到底有多少；但自認遭欺瞞的農民，則上街抗議。黨國英認為，共產黨只要將這些企業改成私有化，未來所有可能的衝突，將自然化解。不過我們對此感到困惑：私有化將使共產幹部變身成私有企業主，而這些企業昔日又歸他們所督管，我們也懷疑會有其他解決之道，但既然從社會主義變成資本主義，官民對抗也將會變成企業主與勞工間之對立，此一爭議便可在形式理論上獲得化解，共產黨無須再為此負責。

四、財產所有權部分：農民土地無論是遭房地產建商，或

遭工業企業主強徵，所獲得的補償金均過少，甚至遭強取豪奪。中央政府未來將會注意補償金應確實反映土地的真正價值。党國英表示，重點是：「農民一獲得補償金，就會大肆消費——大吃大喝、沈溺玩樂、美女環伺，最後又落得貧窮困頓、工作無著的處境……。」但這些本來就是會發生的。

第五，也是最後一項最具關鍵性的原因，根據党國英的說法，即是所有問題的根源：地方共產黨幹部執行中央指令時，根本既無忠誠，也無效率可言。中央政府對農民是十分公道且友善，但失控的地方幹部實有待加強教育。共產黨將藉加強黨校教育培訓，以減少反抗活動，藉著讓公務員更瞭解農民生活處境，將有助於消弭農民的反抗動機。

令我們驚訝的是，讓農民有表達意見的空間、擇選代表發言、與共產黨幹部對話等措施，居然完全不在共產黨考量之內！由此可以看出，在黨即國家的體制下，雙方根本沒有對話及尋求共識的空間。中央政府自認為知道什麼事對人民有益，思考方式總是從上而下，以為：好的政黨所訓練出的好公務員，將能夠建構一個好的政府。

在聽取簡介時，我曾提及坊間流言說，在浙江省似乎有農民組織的代表，準備與共產黨代表對話，交換意見。想不到党國英竟表示：「我們所掌握的資訊顯示，他們有意圖共謀之情事。」在中國，任何共產黨以外的組織行為，都可能會被認定

是意圖謀反。

黨國英的策略可能無法消弭農民反抗之源。但農民的整體力量，足以發起一場革命嗎？對此，我們持保留態度。共產黨在公安、民兵、軍隊的協助下，要驅除暴動，可說是易如反掌，但暴動可能會讓反抗者及共產黨反制鎮壓，均流於暴力行為。而從某個角度來看，暴動不僅無法撼動共產黨根基，反而會被其所用，以維安至上為藉口，行強化中央政府職權及共產黨無可替代之實！

共產主義者會變成社會主義者？

10月初，正逢國慶、渡假及「黃金週」放假時期，北京適逢秋天。氣候溫和，光線柔和，空氣污染程度較不嚴重，沒有太多沙塵及排煙，一眼望去，雄踞北京北郊，阻擋北風侵襲的高山，還依稀可見。而秋季也是個能做出好決議的時機。雞年期間，共產黨領導突然態度丕變，注意起城鄉不平等的嚴重性，繁榮富庶的城市與慘絕人寰的鄉間，形成強烈對比。而中共在秋季所發表將進行社會民主革命的談話，至少曾一度讓我們相信。

從國慶日開始，中共國家主席便向「在中國經濟發展中，居功厥偉的外省移民」，致上最高敬意。儘管農民平日與市民共處一地，但卻遭僱主鄙視成隱形人，突然間居然有了人樣！

中共所發佈的2006至2011年之五年發展計畫，確有社會民主革命的影子，該計畫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以來，所訂定的第11個發展計畫。但這實際上不能算是個計畫，倒像是個綱領，其遣詞用字之間，倒可嗅出市場經濟至上，公權力介入次之的訊息。中國以此「綱領」，設定「促進社會和諧」，作為未來的雄心壯志。這個儒教意味濃厚的字眼，係指在城市/鄉村、市民/農民、鄉下省份/工業省份、中國中部/西部等之間，重建尊嚴平等對待的相互關係。在25年「經改」期間，遭鄙視的農民，應能在5年之內，享有教育就學、醫療照護、繁榮富庶等權益。好偉大的雄心壯志，但該如何做才能達到此一目標？可用「科學」的方法啊！但只在「綱領」中，以正面報導評論佐證，一直不斷復誦「科學」方式，這樣就行了嗎？何謂「科學」的綱領？有人認為，「科學」是革命及後退之相反詞，如擇選市場經濟，就可被視為「科學」；對迷戀國家經濟及昔日大躍進活動的駁斥，亦可稱為「科學」。但當國家隱退及市場完全自由化時，該如何引領這個「科學」經濟走入窮人群中呢？解決之道也是「科學」的，可從民主之中創造新和諧社會！

我們得擦擦眼，豎好耳朵，是否有聽錯，是民主嗎？

在發佈五年綱領的同時，中共同時也在10月，做一革命性創舉，發表中國民主白皮書。有人激動翻閱，期待獨裁政體自我批判，走向言論自由及多黨政治。結果，當然是失望的。我

們又怎麼可能有其他的期待？

該白皮書是以中、英文版出刊，雖以西方世界及中國民眾為訴求對象，但中國人可一點都不會在意。白皮書內容生硬八股，對共產黨 1949 年以來的各項政績，洋洋灑灑，對眾多流弊則毫無悔意。白皮書並解釋，既然民主制度有兩黨制、多黨制及單黨制等多種模式，中國實無從國外學習經驗之必要。因為中國共產黨黨內（非向外）本身就是注重自由交換意見，所以中國共產黨即是個民主政黨；而中國共產黨又是人民於 1949 年所自由推選，因此中國亦是個民主國家。這本白皮書，雖沒有針對防止共產黨專斷，研擬任何配套措施，但已允諾權力下放，讓地方選舉選出的村長或區長們，擁有更多權限。只不過執行政策責任的定義權，還是由共產黨主導……。

除了盛讚外省移民、誓言促進社會和諧、開發科學經濟及浮誇實施民主外，在北京太陽底下，別無新鮮事，僅有一場秋季例行煙火秀而已。顯見，中國自由主義者對該白皮書興趣缺缺，充滿懷疑。在中國現存有一群相信共產黨更甚於中國人民，及為佐證其前進中國眼光精準，隨時大肆宣揚好消息的西方人士、傳播媒體及企業顧問。他們認為，中共已坦承有社會不公不義、農民抗爭及民主請願存在之事實，可喜可賀；同時，他們也認為「經濟改革」已從 1979 年實施至今，未來勢必會實施「政治改革」。但中共國家主席及總理等溫文有禮的改

革派，不是向來以充分掌握訊息著稱，為何會受共產黨內的保守派所阻擾？更令人難以啓齒的是，以上不就是蘇聯垮台前，衆多學者專家們針對共產政體未來可能演進，所下過的分析見解？但與蘇聯不同的是，中共現正處於繁榮曲線之顛峰。除了北京自己，我們實在看不到有其他任何人、事、物，足以引領中共削弱自己，走上正確改革之道？在民主體制下，政黨會根據綱領，設立學校及衛生機構。但是沒有選舉機制，有何動機能促使中共將獲利的工業投資，轉投資至無法立即獲益的社會建設？要靠倫理自律，還是奉獻義務？由那些專靠殘酷詭詐手段，登上權力高峰的領導人們，所提出的新儒家馬克思主義，又有誰會相信呢？丁一凡是一位接近北京權力高層的政治評論家，且負有哄騙西方訪客之任務。他則向我提出另一種更具說服力的觀點：共產黨的確很畏懼民間發生暴動，十分害怕失去政權，在此壓力之下，勢必會同意實施社會政策綱領。我們實在很願意相信丁一凡所言，希望共產黨雖權謀至上，但恐懼仍可令共產黨凡事三思而後行。但把「馬基維利《君王論》^②」用

譯註2：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義大利政治家和政治理論家。其代表作《君王論》（*The Prince*）主張爲了取得權力，可以採用一切手段，而被統治者也會以背叛來報應統治者的惡劣行徑。教宗曾經批評此書，後人則將「馬基維利」作爲不擇手段的形容詞。

在促進社會和諧的綱領中，似乎沒有比用「經濟決定論」來的更具說服力：為什麼共產黨將不會改變路線？對此，馬克思可比孔子或馬基維利都解釋得好！

共產黨是不可能改革的！

中國新生的國力是植基於高額經濟成長率之上。而此成長率，乃是由企業剝削鄉間勞力，再轉銷到世界市場所致。假如為促成此一制度有所演進，可能會導致部分生產力轉銷到國內市場，並進行一些無法立即獲益的公共投資，如促進鄉間教育水平、注重公共衛生、建造鄉間連結道路等，但如此一來自然會造成經濟成長率的下降。共產黨的黨員結構，是以文職及軍職等幹部階級為主，並無法反應人民的組成結構。他們會同意在促進社會和諧的口號下，犧牲自身豐厚的收入？這不太可能，而且根本完全不可能！共產黨已被其黨員結構及自己所創立的政經制度所綁架，因此進行任何改變，對中共都可算是自殺行為。

2005年10月的社會民主偽革命，則在煙火助興下，以中國式的方式完成了！在發表科學和諧綱領及出版民主白皮書的同時，中共發射火箭並成功搭載2名太空人，漫遊太空。我們只看到電視不斷重播中共國家主席，在火箭發射前、後及抵達目的地時，不斷恭賀太空人的畫面。中國傳媒以大標題顯著報

導：「中國順利完成太空壯舉，讓舉世驚豔！」但單投注在這火箭的建造金額，便足以建造數百座醫院及學校，假如反其道而行，促進了中國社會和諧後，舉世是否仍會同樣驚豔？

同樣是發生在10月，廣東太石村有2,000名村民連署要求罷免貪腐的村長。但他緊急收買一批民兵，暴力痛毆村民，直至村民放棄連署為止。12月，同樣在中國最繁榮富庶的廣東，居然發生東州武警槍殺民衆事件。

該如何解讀中國的未來？請願及示威此起彼落，是否代表中國已具公民社會雛形？還是我們該擔憂民兵暴力相向及武警槍殺人民毫不手軟的事實？假如中共要這些遭羞辱的農民一直被羞辱的話，共產黨是不會放棄對公安、軍隊及民兵的掌控：因為中國經濟就是建立在此，以及建立在剝削無產階級農民的利益之上！

「歡迎投資勞力資源豐富的廣東省！」斗大字眼高掛在廣東中山市民森紡織企業公司的門牆上。廣東對外省移民而言，是個淘金地：廣東總人口約1億，而外來勞力即佔1/3強。另一個大型標語則寫著：「招募勞工！工作平穩，薪津穩定！」民森紡織以當地風評論之，尚稱合理善待勞工，也堪稱模範企業。2005年初，中共曾慎重其事要求所有僱主即日起至當年年年底，需將積欠勞工的薪津還清。由於他鄉盲流勞工隨時等待工作機會，某些國營或私營企業，一直以試用方式招募勞工，且可2年內不需支付薪津。這也就是為何民森紡織要以上述條件吸引招募勞工，以及為何地方共產黨部要推薦我參觀該企業的原因了。

上述標語其實反映了許多當下的重要議題。「此地招募勞工！」這句話意味著廣東經濟發展如此迅速，就連盲流勞工也滿足不了其招募需求。企業間彼此挖角情形普遍，受薪者頻繁更換僱主，或期望努力賺錢或期望改善工作條件。而在盲流勞工世界，也存有一僱主好壞排行榜：最糟的是大陸的中國人，其次是台灣、香港、南韓及日本；以尊重勞工著稱，最令人嚮往的，首推歐洲的僱主，美國次之。企業間的競爭激烈，尤其是中國企業間更為明顯：不但產品彼此抄襲，在相同的地方生產同類的商品，而且削價競爭，直至將對手割喉為止。中國確有市場商機，卻毫無法律章法規範！

單廣東一省，就吸納約 1/3 外商投資，其貨物出口量更佔全中國 1/3。但現在中國其他省份也採「世界工廠」策略，對廣東形成強大的競爭壓力。民森紡織創辦人高老闆十分重視歐洲及美國客戶們的人道要求，歐美雖以全世界最低廉的價格，向其買入商品，但也要求中方不可過於「剝削」勞工。販賣商品八成為中製品的美國沃瑪商場（Wal-Mart）¹連鎖店，則定期派員赴中國視察，確認中方是否善待勞工及抽查商品品質。

中國外銷企業端賴西方消費者為生，美國市場尤為重要！美國國內市場蓬勃與否，與中國經濟榮景休戚與共。美國消費者堪稱是促動中國經濟的火車頭，無論是美國之外的市場或是中國內部本身的市場，均無法與之相比。美國單就沃瑪商場一家，在中國所購入的商品總額，就比澳洲或加拿大還多。在正式參訪民森紡織工廠前，高老闆堅持先帶我參觀宿舍、餐廳、運動場，及專為員工所準備的醫務所及菜園。除每月薪津約 100 歐元（約合新台幣 4,400 元）外，並免費提供 4 人合住一間房間之福利，惟薪津係按件計酬，並不固定，遇有成品瑕疵或

譯註 1：沃瑪商場（Wal-Mart），是美國最知名的百貨超市連鎖店，也是全球最大的連鎖企業。創辦人山姆·華頓（Samuel Moore Walton, 1918-1992），被《富比士雜誌》選為二百年來最有影響力的 20 名企業家之一。

布料損毀，則科以罰金。

高老闆開一輛昂貴的美國悍馬（Hummer）轎車載著我，參觀一間間廠房。在廣東，人民對功成名就並不會指點議論，至少，以他為例，大家都知道其成功致富之道為何。在廠房內部，最常看到的標語就是「奉獻」一詞，而30年前，則是「革命」。在衆神庇蔭下，悉心奉獻企業。在每一廠房，都有上香供奉財神爺，令我們不禁聯想道教與企業精神間，存有曖昧關係。此與三、四十年來，亞洲評論家們不斷向我灌輸的理論，恰恰相反。法國漢學家凡德米契（Léon Vandermeersch）及美國戰略分析家凱恩（Herman Kahn）總是將日本、南韓及中國的經濟成就，歸功於儒家精神。但儒家並無法解釋企業間所盛行的紀律精神，何況儒家是美化威權，又鄙視商業行為。孔子的門徒只會想在公職佔有一席之地，而不致於想販售紡織品。南韓及日本，只有在昔日政治體制專斷時期，才會主張企業威權主義；而現今的中國，則以獨裁手段，迫使勞工遵守紀律，剝奪相關權益及禁止組織工會。這些根本與孔子無關。因為沒有企業主，就不可能有企業之存在。而且，在中國幾乎所有外銷企業主均信奉道教，如高老闆信奉的是財神爺，而非道貌岸然的孔夫子！

真正成功之因

民森紡織除投資歐洲、美國、孟加拉、菲律賓、墨西哥外，也剛在日本、南韓及台灣等3地投資。其成功之道在於，勞工品質佳、勞力低廉及配合度佳：除每週固定工作45小時外，還需另加其他加班時數及斷電工作停頓之補班時數。至於設備部分？最新引進的機器雖是日本製，但是屬於高齡的二手貨；不過，勞力的機敏靈巧是比機械性能更為重要。中國雖缺乏資金，但勞力充沛；而歐洲則恰好相反。在中國，勞工只要工作稍有懈怠，就會被解僱取代。

但我們是否能說，中國經濟完全植基於剝削鄉間源源不絕的廉價勞力呢？我們不能如此快速地下結論吧。因為不知善用本身豐沛人力資源的國家，還有很多，民森紡織開發世界市場的真正成功之因，的確包括善用廉價勞工，但若沒有沿海各省企業主的幹才領導，就沒有中國經濟奇蹟！高老闆除擅長引領勞工專心工作外，其開拓海外市場、接收鉅額訂單（襯衫需求量，係以百萬計）的能力，更是一絕！他重然諾、價格合理及準時出貨等特質，在中國企業界可並不常見。

但高老闆並不是個偶發性特別人物。廣東昔日曾出了許多傑出商人，只不過自共產黨禁止經商後，許多人便紛紛避居香港，並在英國自由市場下，創下佳績。中國實施經濟改革後，海外華人也扮演決定性的角色。倘無香港、台灣、新加坡、美

國、法國、澳洲及加拿大等地華人的襄助，就沒有中國經濟奇蹟。執外銷企業牛耳的民森紡織企業，其外（港）資佔六成，而且老闆就是港人，並建構海外華人外銷網絡。自由的華人引領較不自由的華人，著手幹活。

工業繁榮重返廣東，是否應歸功於共產黨呢？廣東共產黨成員的大老闆即佔 1/3，中共聯合企業主及實施市場經濟的措施，的確有助經濟復甦，如建造道路、興建港口與地方機場、服務外商、充實地方建設，及便利外銷等。由於能源供應不甚穩定，企業自行建造發電廠，其所排放的環境污染，亦被視為經濟成長的必要之惡。勞工部分呢？共產黨保障溫馴人力不虞匱乏，而此無產階級人才庫，對中國經濟成長，實具決定性的貢獻。至於在公共衛生領域，醫院設施又是如何呢？這點，廣東省政府可就忘了興建醫院。該省的富人都遠赴香港就醫，而當地窮人，則自求多福。

工業革命之先例

鄉間盲流勞工衝往工業城市，不也是歐美等已開發國家先前發展所必經的一個階段？每當經濟改革遭抨擊為粗暴，中共即會援引歐洲發展前例：既然歐洲歷史已有先例，任何問題均將迎刃而解，因此中國經改也將毫無問題，正常運作。中國正處於過渡時期，經濟發展終究會化解目前所引起的所有疑慮，

而這個市場經濟鐵律不是也已先後為十八世紀自由經濟學家及二十世紀的馬克思所接受過？但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真能與十九世紀的歐洲相類比嗎？

這兩者之間的確有以下共同現象，如傳統農力轉往工廠，經濟立即成長，以及運用機械比農田鐮刀創造更多附加價值等。中國「奇蹟式」的經濟成長，其實是鄉間勞力轉移至城市的必然結果。中國目前的經濟成長率之所以會比昔日的歐洲高，其實是因為昔日中國鄉間的生產力，根本是出奇的低，而在今日引進西方技術後，才會有相對大幅成長的現象。如同50年前的南韓、日本及台灣，中國目前亦運用西方成熟技術，縮短經濟起飛期約百年，而「奇蹟」總是對後來者較為有利。綜上所述，中國經濟成長的奇蹟，係歸功於鄉間人口外移及遲遲起動的經改列車。此一說法並不會使該成功的事實褪色，反而可讓人更瞭解其成功的原因。

跟歐洲工業革命相比，也凸顯了中國經濟成長的另一項特色：殘酷！無論是法國或是英國，其鄉間人口外移曾被視為是人間慘劇，並飽受基督教社會主義及社會主義抨擊，於是促使馬克思主義的崛起。而有數以億計的無產階級湧向城市近郊的中國，單就所影響的人數就與歐洲有很大的不同。但中共卻宣稱：「中國所發生的一切，均跟西方類似，只不過所影響的人數更多及發展的速度更快而已！」關心環境污染及勞工的工作

條件，而忽視經濟改革的成果，可能會被視為是偉大中國的敵人。但這根本是兩碼子事！昔日歐洲及今日中國的差異，實並不僅止於數目及速度而已……。

工業革命時期的歐洲，已有「社會緩衝機制」的存在，如在行政機關尚未親力親為之前，教堂及慈善機構便已發揮相當的功能，但在今日的中國，此項機制或遭遺忘，或遭詆毀，甚至這些中介機構，早在中國文革期間便被損毀殆盡，至今尚未解除重建禁令。在孤立無援的大海中，只有幾個靠西方資金支撐的慈善機構苟延殘喘。今日，中共當局也開始注意到他們的存在，如六〇年代曾遭共產黨殲滅的佛教徒，今日亦在中共鼓勵下，重建了醫院及養老院等。另外，在天主教重獲影響力的上海，衆多窮農夫或窮漁民（其中多為天主教徒），則藉此獲得醫療照護及孩童就學之救助。

但這些社會救助力量仍屬微小。整體而言，中國農民離鄉背井赤裸面對市場力量之衝擊，就如同昔日的法國人或英國人一樣。當時英國有恩格斯出現，今日的中國發展現況，應也會出現另一個中國恩格斯吧？中國堪稱在既無法律規範，亦無建構集體慈善網絡的人類歷史中，創立了舉世唯一的勞動市場。往昔的經濟學家們只在紙上談兵，論述提及此種情形外，可從未真正思考過它可能會真實地存在。中共領導以身示範，證實這些古典主義學派的經濟學者，論述正確：勞動市場愈不受羈

絆，經濟成長愈能自其得利。但那些經濟學家可從未擁有像現今中共領導般如此大權在握。

認同「過渡時期」說法的樂觀主義信徒認為，中國現階段野蠻的資本主義，終將於文明化後，逐步邁入法治國家之林。中共頒佈許多法令，從字面上看來，與西方無異，如私有財產權、契約、會計、安全、保護受薪者及社會保險等，雖有所規範，惟實際根本形同具文！遇有援引該等法條時，通常或為幫助有政治靠山的企業主，或為擺脫外銷競爭對手。當然，在外商以利益至上的壓力下，中國市場有可能會逐漸遵循可預測的法律規範；但在歐洲，這些人民權益早在資本主義誕生前就存在，而中國則恰巧相反！當西方進行工業革命時，曾就地採行既有相關權益、注重環保及尊重契約精神；而中國則是，利益第一，其他次之。中國此一史無前例的經濟革命前景，仍充滿變數。

一位尚不足以危害他人的競爭者

這個「中國工廠」是否會讓歐美感到驚駭？西方是否應拒買中製品？當然不可以，尤其中國的存在，可讓西方更為富有。每一個西方人均可以更低價買到衣服、鞋子、玩具、運動用品、電子物品，無形中提升了西方的購買力，而此可得歸功於中國製造商呢。自十八世紀工業革命初期以來，經濟發展雖

被公認係植基於國際分工之上，但製造商不斷尋求更好商機的作為，總會引發主張自立更生派的議論、憂慮及反撲。直至今日，最有效的解決之道仍是，接受可創造相對利潤的國際分工現實。以紡織業為例，這家廣東最具生產力的民森紡織，無法在3個月內，將新產品行銷至西方市場上，而法、義某些製造商，則有辦法在3天內便完成此一任務。但先決條件是，歐洲製造商也必須要仿造高老闆在廣東的成功經驗，只不過由於根本找不到萬名任人奴役的勞工，所以實際上絕無可能。因此西方人是否應該以十倍、百倍價格，來購買歐洲製衣服呢？面對此一窘境，西方到底是變窮了？還是變富有了？

隨著中國向西方購入的機械、飛機、汽車、化妝品的數量及金額日益龐大，西方對中國經濟成就的興趣，也日益大增。倘若西方要更繁榮富庶的話，中國則必須更富有。儘管此一論述基本為真，但此卻說服不了那些遭西方企業為投身中國市場而遺棄的西方紡織業勞工們！他們是否終將在國際分工的旗幟下被壓垮？這或許是那些無法成功重整經濟活動、或無法放棄老式思想，迎向未來的國家們的最後下場吧。惟此與中國競爭力無關，只不過相形之下，更凸顯西方國家的沒落早就開始了。

歐美敵視中國市場的人士則認為，應要摧毀不具道德性的經濟。但此端賴所處之地域與道德之間的關係而定：假如我們

認同中國人有權跟西方同樣享有進步與開發的權利，經濟則可入列人道科學之林。不是也有人預測中國經濟有一天終將超越西方？從該角度來看，上述充滿人道主義的論述及對中國人慈悲為懷的作法，豈不是自殺性的行為？

上述論述，不用太相信：因為中國每人平均所得低於西方20倍，總產值與義大利差不多，根本還只是個經濟「侏儒」。侏儒要蛻變成一威脅歐美日的巨人前，可還有數以千計的難關要克服，如政治機構的不可預測性、缺乏法治精神、民衆困頓潦倒、能源缺乏、銀行倒閉、資金外移、疾病警戒等。而此還僅是威脅中國未來發展之冰山一角而已。假如西方繼續放任而無所作為的話，中國可遲早會真正地「威脅」到西方！

中國經濟抄襲仿冒的多，改革創新的少

就算中國經濟沒遇上前述所稱的難關，由於改革創新的少，對西方其實並不甚具威脅性。中國企業只是將別人的設計，加以組裝或複製。想想中國昔日曾商業「入侵」西方兩次，那時的中國可比現在更具威脅性，如兩千年前的蠶絲及十八世紀的陶瓷。那時的中國人可具備了西方人沒有的專業知識，惟當時中國並無商標或改革創新概念。假如我們相信中共官方統計數據的話，其半數外銷品不就都是高科技產品嗎？但這些數據根本是將家電產品或任何涉及電子的產品，灌水充數

而成，其中很少是由中國本身自行設計的。

事實上，電子產品、服飾、家電用品、汽車等，中共一律均採組裝、分包及模仿政策。中共有時候會尊重智慧財產權的規範，但絕大部分根本是棄如敝屣。大陸仿冒情形十分普遍，走進任何一家商店，均可低價買到任何西方奢侈名牌或電子產品的仿冒品。在中國參訪一間製造襯衫的工廠十分容易，但要參訪黑社會掌控的DVD、藥品、毒品等仿冒品的工廠，則非易事。沒人知道仿冒業究竟在中國經濟成長中，佔有多少比例，但絕不可小覷！另外，電腦軟體仿冒品也透過網路行銷全世界，而網路的虛擬環境亦挫敗打擊非法交易的士氣，讓西方企業十分擔憂。中國仿冒者的創造性無窮：2005年夏天，在中國居然已公然販售《哈利波特》第七集，但英國原著作者根本還沒開始寫，更遑論出版。或許有人為中國人辯解，認為這根本是淵遠流長的傳統：西班牙傳道士納瓦雷特（Navarrete）於一六六〇年代曾表示，廣東的工匠根本就是「仿冒歐洲藝品後，再以真品價格於中國販售。」

直至今日，中共每隔一段長時間，便「殺雞儆猴」，打擊仿冒行動，滿足一下國際期待，但仿冒根本是結構性問題，無法根絕。保護智慧財產權的概念，不僅無法內化在中國人心中，甚至還被視為是西方保護主義的手段之一。就如上海大學智慧財產學系系主任，雖擔負教育中國新世代企業家的任務，

卻表示：「國際名牌太過昂貴，阻絕全人類共享世界經濟的好處。」換言之，對他而言，智慧財產權像是竊取不當利益，而仿冒者反倒成了人道主義者！

面對中製品到處湧現的現實，我們必須瞭解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的意義：大部分的出口商品雖在中國組裝，但很少由中國自行設計。以民森紡織企業為例，其布料及零件則分別進口自菲律賓及南韓，但款式設計卻是出於美國人或歐洲人之手。此種國際分工雖與全球各行各業雷同，但中國企業依賴他國的決策、資金及原料的情形，尤為明顯。大部分的中國企業，是依賴廉價勞工，而非創造力，來賺取商品的附加價值，但這終究不是長久致勝之道。

或許有人抗議說，南韓及日本在創造國際知名品牌之前，不也曾經歷過前述階段，為何中國遵循此一模式，就無法產生正面效應呢？那是因為就目前而言，由於缺乏革新創造力及體制過於僵化，中國根本不太可能會有正面效應產生。

另外，中共發展經濟策略的方式，就是獨尊「剝削勞力，快速致富」之道。共產黨不僅禁止籌組任何工會組織，還與國內、外企業主共組神聖聯盟，剝削勞力，將薪津壓減至最低。但南韓及日本的經驗，則與之相反：工會請願及鄉間人口外移，均迫使企業主採用機械化生產及強化革新創造能力來因應。中共無窮盡地剝削廣大的勞力，讓企業短視近利，而不思

改革創新。為何企業主們會如此呢？因為在共產黨營造汲汲營利及立即致富的整個社會氛圍下，沒人會想要永續經營，而漠視環境保護及衛生醫療的重要性，也是短視近利的表現。近年來為舉辦奧運，中共只選在北京使盡全力改善環污問題，但因不是一項放諸四海皆準的政策，無法立即獲得成效，而其他地方也根本毫無動靜！

此外，共產黨政體的本質也讓人不習慣長期規劃，例如：法律的不穩定性、智慧財產權的不確定性、財稅的不可預測性及共產黨政策的反反覆覆，均讓人只想在最短時間內致富，並將所得利潤移至中國境外。既然研究開發無法立即獲利，為什麼要投資其中？在中國申請商標專利，可能無法像外國智慧財產權般受到尊重，倒不如把研究人員送往美國，以合法或非法手段，引進某一革新創新的概念來牟利，獲利反而會更快更多。另外，中共向外國購入貨物，要求技術移轉的作法，實很精明，如中法空中巴士交易，即是一例。儘管上述所有方法，均大開仿冒之門牟利，但終究只在西方後面，當一名永遠的跟隨者而已。

這在共產黨發展的歷史中，有軌跡可尋。六〇年代，毛澤東為發展核武時，即認為仿冒俄、美、法的既有經驗，比鼓勵中國自行研發，更來得快速有效。結果也證明，中國間諜圓滿達成任務，並促成中國於1964年成功發射第一枚核彈。中國是

否已有所改變呢？從官方統計數字看來，工程師的數目，的確不斷攀升。這其實是個非常好的現象，但在自滿於數字遊戲的同時，是否也要探究其培訓品質的良莠。中國現行大學教育，並不鼓勵思考創造：學生被動聽講、政治禁忌束縛討論內容、表現傑出的學子遠赴海外留學，而追求學問、具思考創造力的留學生則歸化美籍。因為少有留學生返國服務，偶有一例，則被視為愛國英雄。

中國威脅論者主張，一個繁榮富庶的中國將會威脅世界。但開發程度不夠的國家，遠比滿足繁榮富庶現況的國家，對世界秩序的威脅要大得多。我們對中國威脅論實持完全質疑的立場。而以「開發」一詞，形容中國現今所發生的一切，是否適當呢？除開發中國外，中共想建構的是政軍強權，全中國二成的城市權貴，宰制其餘八成的鄉間農民，均是為此野心在努力。整體而論，中國某些省分的確富庶繁榮，但絕大部分的地區尚處於停滯開發狀態。

面對香港，上海兵敗如山倒

無人會質疑中國現有為數2億的富足人民之事實。但中國是否有一天會如其領導人所願，睥睨全世界？屆時恐怕亞洲各國，得首當其衝面對此一衝擊了。但從上海失敗的經驗看來，實還有段路要走……。

上海，真是個失敗的經驗嗎？這座光彩炫目的城市，高速公路蜿蜒處處，摩天高樓林立，本身不就是中國挺直腰桿的象徵嗎？首先，這是一個北京及上海領導們專門為吸引外資，甚或吸納香港外資的櫥窗。

昔日的上海，經濟停滯蕭條，歐式建築斑駁，根本是個晦暗無光的城市！1990年中共所提出的建設大上海計畫，其目的即是要與香港相抗衡，甚或取而代之。香港曾經是上海追求成功之標的，但在15年後的今天，上海很明顯是打輸了，現在有誰還會重提上海昔日想超越香港的雄心壯志呢？

上海是否能稱得上亞洲財經中心？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面向來觀察。首先，上海股市吸耗數百萬投資人的血本，中國大企業紛赴香港掛牌上市後，已淪為次要股市投資市場。在服務業的表現方面，上海跟中國其他地區一樣，無論是旅館業、商業或服務業，實無服務文化可言。在城市規畫方面，除了幾棟外國建築師所設計之成功建物外，整座城市的建造根本毫無章法，一切急就章，且犧牲通訊及公共衛生網絡的建構。上海1,700萬居民中，居然有一半人口無淨水設備可用，這可從黃浦江江水顏色便可窺知其問題嚴重性。而在創造性、時尚、設計及廣告部分的表現，儘管幾家藝廊的中國新一代藝術家作品，確具美學天賦，且在歐洲傳媒宣揚下，似有中國創新文化誕生之趨勢，但大體而言，創意乏善可陳。造訪的西方記者們

只針對12位明星級藝術家，不斷強化報導，營造有利氛圍，硬撐上述立論而已。至於上海在電影、音樂上的表現又是如何？由法國建築師所設計的上海歌劇院，除上演美國百老匯歌舞劇時門庭若市外，平時根本門可羅雀。

上海的領導們曾相信，只要直接抄襲香港硬體城市規劃建設，便可蛻變成香港。但香港所代表的意涵，不僅局限於是個城市，而且還是個融合的文化體，正如同時在香港及上海兩地投資的匯豐銀行老闆，就曾很技巧地形容，在香港生活是比上海「自在」的多！相對於香港法治、法院及新聞自由的「自在」，實施共產主義的上海，根本還是個叢林世界！共產黨領導們認為，市場經濟需屈從叢林法則，銀行家雖不受該法束縛，但銀行家們還是比較喜歡法治香港，而非叢林上海。上海除表面光鮮的建築外，其他根本未變：上海還是1990年以前的上海，上海依然是毛澤東心中的那個工業城市。

1949年共產革命以前，上海曾是座繁華的財經大都會，共產黨為懲戒上海，便強迫轉產重工業。今日，上海外灘區雖佇立一排排保存完好的歐洲式建築，但離黃埔江頭不遠處，即可瞥見代表上海幅員廣大的傳統工業區，該區則佈滿鋼鐵、通訊材料、化學、汽車業等上海「四大經濟支柱」產業。其實，這才是真實的上海。前述工業，無一私有化，均由上海市直接掌控，聘僱上海半數的就業人口，提供市政主要預算財源。上海

所賴以為生的是工業，而非服務業。上海市政府，一切以保障就業及穩定預算為考量，對創意、時尚或服務業，興趣缺缺。

上述公營工業，雖素以管理良善著稱，讓社會主義者感到滿意，卻讓自由主義者坐立難安。但他們是否真是管理良善？1990年以來，上海市政府借重外國專家改善生產模式與技術，但這些企業似無自由管理勞工之權力。企業所聘僱的多餘職工人數，均由地方政府所裁定。聘僱勞工政策係屬穩定社會之一環，惟此並不符合經濟生產效益。另外，這些企業獨佔市場，地方當局以各種藉口，阻擾任何中國或外國的潛在競爭者與之競爭。但這也使得上海企業的真正效率，更深不可測，無法衡量。

上海與香港的發展，正好相反。昔日確保香港繁榮的組裝業、紡織業或電子業，均在八〇年代轉赴中國或其他亞洲國家設廠，僅有設計、經貿及金融等服務業根留香港，聘僱一群比工業時期為數更多、能力更佳且薪給更優的人力。

上海是否能跳脫宿命？未來實仍有可為：中國幅員夠大，可比照歐洲倫敦及法蘭克福兩大財經城市共存模式，發展出一套香港與上海共榮的未來藍圖。惟上海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符合匯豐銀行前述所提「自在」的條件，一切均遵循習慣法及法律之規範？上海在此之所以會表現遠落後於中國其他城市，實因中共公安及文宣部緊密監控有關。無論是北京或是廣東的記

者、作家及律師們，還得以逃脫中共警網監控，有機會表達心聲；但上海風聲鶴唳，一有異議傾向，即身陷囹圄。上海堪稱是全中國最不自由的城市，鑒於上海係許多工人或學生反抗運動之起源地，致現今的上海領導者仍禁錮言論自由。在雞年所造訪過的中國城市中，只有在上海，我根本無法跟任何一位異議分子接觸。我只要說及人名，對方即遭公安網路及電話監視並軟禁在家。上海之所以會比不上香港，除了地方政府重視重工業發展外，嗅不到任何自由氣息，亦是主要原因。上海只是依照共產黨憧憬中的中國，所虛擬出的現代櫥窗，致任何到訪中國的外國人，立即喪失批判精神，並為上海刻意營造的繁華假象所迷惑。

是否必須投資中國？

吸引西方資金對中國經濟至關重要，沒有大量的外資挹注，中國經濟可能無法開發。但這些西方企業是否能在中國賺到錢？這個問題，我針對相關的企業領袖或銀行家，問了好幾遍，但獲得的答案大多是：靜默不語！為何靜默不語？若以複雜會計為由來切入解釋，應會是個好理由。由於事涉跨國企業在中國所生產的商品，與日本或西方設計、中國組裝、他國包裝及銷往未知之地的同種商品，其銷售管道一致，其實很難將剝削中國勞力之因素，單獨抽離審視。

但針對外商在中國靜默不語，一般的說法認為，投資中國其實毫無真正利潤可言：每個投資者，是懷抱致富希望前進中國，而非為了要致富才前進中國。簡而言之，只是為了前進中國，而錢進中國！匯豐銀行認為，外商一入中國之境，便喪失基本判斷能力，視普世的財經規範於無物。外商的中方合夥人的確也無所不用其極地規避法律規範。中國經濟模式亦毫無誠信可言，如作假帳、已認簽的契約無約束力、司法不獨立、貪腐橫行、侵害智慧財產權頻傳等。而同樣喪失基本判斷能力的匯豐銀行，也就在2005年引發一股西方投資中國銀行風潮，但這些銀行可是聲名狼藉、管理不善及呆帳累累。無論是匯豐銀行，還是所有其他追隨者，則異口同聲表示：中國市場龐大，必須洞燭機先，此刻前進中國，是為等待中國新一代中產階級之興起，期盼他們屆時已有西方消費模式習慣。假如這個賭注無法實現，西方企業便會血本無歸。有些企業可透過保險理賠，彌補損失。但若以「政治風險」搪塞的企業，其損失可能就要轉嫁到其母國的所有納稅人身上！不過有人向我保證，這種情形絕不會發生，他們認為中國商機無窮，終究會融入西方體系之中，成為一個正常國家。但任何投資都是項賭注：投資所引發的貪婪之心及取巧投機，難道就唯獨不會在中國發生？事實上，目前研究中國的專家可分為深信派及質疑派：深信派認為，一切會愈來愈美好；質疑派則反駁，一切如昔，毫無改

變！儘管雙方所依據的資料來源相同，零散且無法驗證，但因為對中國未來的看法不同，導致「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狀況。有位專家就說，愛慕中國之情不容分割，只要愛上了，就毫無保留的付出吧。

就連歐洲經貿專業媒體，也遭中國蠱惑：他們只著重報導中國商機無限及中方許諾約定的正面消息，但並無針對投資中國成功或失敗案例來深究其因，諸如義大利投資者在中國的表現，究竟如何超越法國投資者？係應歸咎或歸功於歐洲企業主，還是中方的合夥人？中西雙方採行的方法，是否南轅北轍？當藉由上述觀察經驗的傳承，我們將可更瞭解歐商在中國的投資行為，以及中方的對應態度。因為這實在是個罩著神秘面紗的國度……。

西方銀行家及企業主在中國耗費或投資自身股東資金時，是否有濫用股東信任而昧於一面倒的正面報導？在投資中國的熱潮氛圍下，的確有些西方股東蠢蠢欲動，認定必須前進中國，而主張錢進中國。只要西方企業前進中國，其股價指數立刻在股市上揚。在這股投機泡沫風潮的驅使下，不前進中國將遭孤立；而對前進中國持謹慎態度的企業們，在下次西方首長正式訪問中國時，將冒無法入選隨團參訪之險了。

Chapter 6
虛假的發展

公認的社會地位，甚至參與社會公益活動中且發揮了極大的影響力。在社會中，個人和團體的虛假行為，往往會導致社會的混亂和不安。在這種情況下，個人和團體的虛假行為，往往會導致社會的混亂和不安。在這種情況下，個人和團體的虛假行為，往往會導致社會的混亂和不安。

Chapter 6

虛假的發展

虛假行為的定義，是指那些與事實不符的行為。在社會中，個人和團體的虛假行為，往往會導致社會的混亂和不安。在這種情況下，個人和團體的虛假行為，往往會導致社會的混亂和不安。在這種情況下，個人和團體的虛假行為，往往會導致社會的混亂和不安。

茅于軾雖是中國最具洞察力的經濟學者，但也為此遭到公安監視。他對個人安危並不甚在意，反而對中共派遣4名大漢及2輛車子全天候跟監的花費，無端嚴重耗損國庫，憂心不已。他認為，已屆80高齡的他，能逃到何處？中共耗費如此多的人力物力，根本毫無效益可言。

他就像中國其他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一樣，過著儉樸生活。他在北京的住所破破爛爛，是一棟六〇年代的建物，冬寒凍，夏酷熱，空間緊絀，設備陽春。他跟妻子所住的公寓，除書本、紀念品到處可見外，還可看到遇雨集水的臉盆。如果他選擇服務共產黨之路，其生活將可大大改善。而中共刻意收買知識分子的作法，可會比派員跟監更為划算。共產黨賄賂得逞後，大多數的知識分子不再是反抗分子，但有些「專家」則是依然故我，堅持原則。「知識分子」此一西方用語運用在此，是否適當？長期旅居美國的小說家陳君，在比較中西文化後，認為中國「文人甚多，但少有知識分子！」

身體欠佳，有點重聽的茅于軾，自認根本沒有顛覆共產黨統治的能力。他的政治論述，既非暴力訴求，也無革命意涵，充其量只能算是個膽大妄為的人吧！2004年，適逢六四鎮壓事件15週年之際，他致函中共領導人，要求共產黨承認屠殺罪行，並向全中國人民道歉。他認為，唯有這樣才能讓人民忘卻昔日苦痛，迎向未來，空等只會加深怨恨。該信函雖在網路廣

為流傳，獲得其他具相同理念的知識分子連署，並引起國際傳媒注意。但這一切均白費力氣！這些中國偉大的領導們根本無法容忍任何異議聲音。當茅于軾在2005年再次將舊作結集出版《把自由給你愛的人》一書時，也遭封殺而無法流通販售。因為無法控告中共文宣部，茅只好跟出版社打官司。結果出版社敗訴，此種結果有時會發生的。但法治理念是否有因此而逐漸真正落實？或是共產黨故意讓人民相信中國未來將往法治方向發展？儘管茅官司勝訴，但市面上還是看不到這本書！焚書雖在中國已不復見，共產黨卻也樂於私下運作，讓異議書籍消失於無形。

哪種經濟奇蹟？

茅于軾還有其他更勁爆的言論。他認為，中國經濟發展不是奇蹟，根本是個災難！

難道他對中國每年9%或10%的經濟成長還不夠滿意？話說回來，假如這個數據是千真萬確，他或許會滿意吧。但事實顯然相反！只有中共掌握得到統計數據，而這些數據根本無法供人檢驗。這些資料來自一個不把數字精確當一回事的政府，實在難以讓人信服。從1960年到1980年間，中共毫無統計資料；1980年的統計資料則怪象百出；1990年，中共統計中國可耕地有9,500萬公頃，平均每人只有0.08公頃，甚至比孟加

拉還少。這個未經檢驗的數據顯示，中國人無法自給自足，籠罩在饑荒的陰影下。但一張衛星空照圖卻讓數據破功，指正統計訛誤，中共在2000年的中國可耕地實際上是1億5千萬公頃，但中共為讓平均耕地產值提升，故意降為1億3千萬公頃。中共類似的荒誕不經的統計數據，還不是僅此一例，類此情事到處可見。

此外，中共還有將不利的統計數字刪除的習慣。基於此，茅于軾年復一年，除了將官方統計數字的不合邏輯及斷章取義等缺失一一指出外，並重新計算統計，提出他的看法：中國每年實際的經濟成長約有8%，而此成長應歸功於將農民、無生產力或無業人民，引導轉入工業開發所致。此成長率與同一時期的日本、南韓相當，不僅談不上神奇，甚至連數據本身也毫無意義可言。首先，需要把中國經濟成長模式所帶來的生態浩劫、土地衰竭、環境污染、疾病蔓延、社會動盪等負面效應一一扣除。被國際經濟學界喻為此學派先驅的茅于軾，估算相關負面效應產值約達10%，理應扣除後才能體現真正的成長率。除了中國之外，可無任何專家會質疑此種算法。

茅于軾也承認，鄉間人口外移及自然遺產損毀，是追求經濟成長的必然結果。但他質疑的是共產黨野蠻的管理模式！由於中國無論是能源、原料或是水源均短缺不足，上述經濟成長速度根本無法永續存在。能源、原料可以進口，但水源不行。

中國水源稀少，卻又管理不善，如免費供應、浪費水源，以及污染嚴重等問題，毫不處理。而中共不認為淨水廠是項值得的投資，造成數千萬人民無飲用水可喝，甚至有許多民衆因此喪命。

在扣除負面效益，重新估算出真正的經濟成長後，茅于軾轉而批判有許多產品，或因品質低劣，或因無銷售市場，根本找不到買主，效益為零！此種現象在國營企業中，尤為明顯。中國尚有為數 10 萬間遵循毛澤東模式運轉的國營企業，而這些企業只為達成共產黨所訂生產目標而生產，產品產量一達成後，其餘一概不管。另外，這些企業也招募一群共產黨無法解僱或無法運用於新產業開發的無效人力。

這樣的企業居然能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生存，令我感到十分驚訝。茅對此反駁道，中國根本不是市場經濟體制！大部分的國營企業並無真正的會計程序，我們實在無法判斷其營運榮枯，而且另有銀行提供資金填補缺口，會計健全與否根本不重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要求銀行提供借貸，但因政治或個人因素，銀行通常不敢要求償還。

對此，北京有人則認為，銀行業終將蛻變成真正的企業。但我在雞年期間所觀察到的現象並非如此：在政治力介入銀行後，不僅興建的一堆建物、住房及辦公室，少人居住，而且還大興土木，建造一些毫無用途的公路、機場等大型公共建設。

上述不具生產力的投資，既無法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還吞噬掉經濟成長利潤，尤其是貿易外匯盈餘。茅于軾認為，扭曲市場經濟的政治性投資，所造成的失業率居高不下，令中共顏面無光，堪稱是中國經濟主要缺失。

二成失業者

失業率不是控制在3.5%嗎？中共每年年初所發佈的官方失業數據，十年如一日，一成不變。而其中所透露的真正訊息是，失業率根本無從預估！在中國為數10億流竄各地打工的盲流勞工，我們是該視為就業人口，亦或失業人口？另外，那些為數數百萬計，而無所事事、或無耕地可種，或僅靠狹小耕地過活的農民們，倘有機會赴城市轉業，早就背井離鄉了。凡此，我們也無法將之計算在內。不過，依照合理估算，此類失業人口約佔二成。但上述失業問題不僅局限在社會底層人士，約有2/3的工程師及大學生，也因一時找不到適當工作，只好繼續就學。這種現象是因中國經濟發展，一向不重視專業能力的服務業，而偏重於眾多非專業勞工的雇用所致。此即說明了為何有如此多的大陸學子遠赴美加留學的原因。

姑且不論中國經濟成長率多高，但因投資不當，根本無法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而外商企業通常是高產能、少僱員；至於紡織、資訊的外銷廠商，因應短期合約，僅僱用些無具專業

的妙齡女工。至於那些貧農、學生或遭公營企業解雇的勞工，則是前途黯淡。

對此，茅于軾有何良方建議？他認為，除了學習日本、台灣、新加坡、香港及南韓的昔日經驗外，別無他法，也就是只能將外銷利潤轉換成盈餘投資，促使就業機會與經濟成長，共存共榮。投資地點應擇選在中型城市，而不要一味集中在沿海大都市，造成巨大人口吸磁效應。此外，注重學校教育及衛生醫療等有助提升人力資源的投資，除可減緩社會衝擊外，並有助於引領中國從準資本主義，邁向持久的經濟發展。中國倒可採行亞洲「四小龍」模式，致力提高人力素質，專注開拓外銷市場。

但茅于軾的苦口婆心，能否上達天聽？當然不能！因為中國的經濟模式與政治體制乃互相牽制，在這城市階層獨大、官僚體系把持共產黨，以及農民毫無任何擇選代表發聲的國度裡，經濟也只能是服務政治權力的工具。

定時炸彈－銀行

目前威脅撼動中國的各种預測中，哪一種最有可能發生？茅于軾認為，當然是鉅額呆帳，引起銀行破產倒閉。目前中國資金淹腳目，銀行資金進帳收入遠高於呆帳支出，一時無虞，但中國最近曾發生幾起大型金融恐慌事件，如2002年，廣東銀

行主管虧空公款逃逸，中央銀行立即介入，平息擠兌風潮。茅于軾坦承，中國人一般十分信賴銀行。但銀行卻在政治壓力下，常作出不合經濟效益的借貸。銀行此一繁榮景象究竟能持續多久？他認為，只要有世界市場繼續支撐中國經濟成長，外商仍然迷戀中國市場，以及中國人依舊習慣將金錢存放在郵局及銀行的一天，此項經濟榮景便可持續下去。由於上海股市慘跌造成投資者大失血後，資金禁止外流，存戶除將資金置放在銀行外，根本無所選擇，銀行所匯集的儲金，可是既多且穩。另一項投資之道，即是房地產，但這可需要足夠資金才行。中國存戶們將資金，或存銀行、或炒作房地產，造就數百萬間天價的公寓及辦公室榮景；而只有世界因中國發生衝突或流行病而拂袖而去，或是中國人擔憂積蓄泡湯的恐慌席捲銀行及全中國時，此一榮景才會破滅。茅于軾結語道，中國人可能會同意放棄全部或部分自由，但要讓他們吃虧賠本，這可就無法再原諒共產黨了。共產黨也深諳此理，所以當然會不遺餘力，防堵銀行破產倒閉的情事發生。

2005年，中共進行銀行改革，期盼能符合西方財經標準規範。儘管共產黨邀請外商銀行見證此項進步改革，卻又不鼓勵他們投資中國銀行，運用既有商業通路、開發數百億中國人信用卡及投資理財市場商機。中國銀行是否真能改革蛻變成功？儘管議題有點技術性，卻直瞄共產黨體制的紅心！

中共中央政府需要管理良善的銀行輔助，金援確實且必要的商業活動；但虧空存戶儲金，甚或導致銀行破產倒閉，則又可能使共產黨垮台。真是一個兩難的決定。不過，一個具理性的銀行，是不會屈從共產黨高幹提供免費借貸的指令，因為借貸不僅支撐住那些不具生產力的國營地方企業，而且還成了提供工作機會及保障薪津的財源。沒了財源，國營企業的幹部影響力及工作機會，均將無以為繼。這涉及另一敏感議題。假如銀行有理性，將不再借貸給莘莘學子們。現在儘管銀行深知學生無償還能力，但基於他們有可能搖身成為未來的共產黨幹部，因此根本不敢向他們索討銀貸。綜上所述，進行銀行改革可能會導致學生暴動、數以千計的國營企業倒閉，以及地方共產黨高幹喪失影響力。

但在維持經濟效益理性、避免銀行倒閉與維持社會穩定、保持地方共產黨對借貸的影響力之間，中共將如何自處擇選？下列那一項原因會首先引爆危機，是地方共產黨勢力？未獲補助金的學生們？前述的失業族群？或是整個財金體制？中共領導及外商期望透過維持經濟成長、匯集資金、馴服存戶等方式，讓錢淹腳目的事實化解掉前述矛盾。茅于軾的「共產黨未來端賴銀行」之主張，確是真知灼見。

中產階級根本找不到

中國是否會自動「過渡」到民主體制？隨著經濟成長，是否會產生一群既不受權力掌控，且會要求政治自主權的中產階級？

茅于軾對前述推論前景並不看好。他表示，會有一群靠經濟購買力籠絡共產黨的「新貴」階級產生。但基本上，這個階層係由官僚、高幹及其相關親友所組成，端靠其職務所衍生的開銷、利益及薪俸為生。這群假中產階級的命運與共產黨休戚與共。他們通常屬於官僚階層，其收入豐盈端賴共產黨領導賞賜。除一小撮個人企業主外，這些「新貴」階級都為公務、軍隊、國營企業或受官股掌控的私有企業等體系所聘僱。他們蒙共產黨恩惠，可所說是「企業階級」！

這批新貴奢華生活的財源，並不是來自自身薪津，而是靠合法或非法的對價關係！他們以豪華進口轎車代步、手機隨身，而他們出入聲色娛樂場所及餐廳、公關公主環繞、海外考察、赴澳門或拉斯維加斯賭場豪賭等帳單，均由中共公務機構或國營企業買單。在中國，無論是土地、住所或企業大樓及廠房，人民擁有的只有居住使用權，而這個「灰色地帶」引起住戶極大疑慮。一般而言，人民可獲得建物本身使用產權，但卻無法擁有建物下的土地所有權，而土地所有權係由國家、軍隊或地方政府，透過短期契約轉讓建商。一旦租約到期，地上建

物，無人可預測其未來。地產的不可預期性，促使這批「新貴」階級熱衷追逐快速致富、有效投資及外移資金的遊戲。外商們或許是因有保險可依恃，自認受中共威脅的程度較低，反而紛紛投入這些長期看來較具危險性的產業。

另一項「新貴」階級致富之道，是累積銀行呆帳：透過關係運作，很容易獲得銀貸。他們辦理借貸，需支付5%銀行仲介費及15%共產黨幹部仲介費，利率似乎偏高。依據規定，借貸資金後，應再轉投資於地產業或工業，不過無論是否有轉投資的事實，只要共產黨繼續給予關愛的眼神，而共產黨也適時從中獲得回報，那麼這些銀貸可就永無被償還的一日了。共產黨藉此法平息了異議聲音，也讓主張中國經濟體制可以產生一批支持民主中產階級的理論，受到質疑。目前，此種韓式民主階段式的理論，根本無法適用於中國。這些「新貴」階級，既稱不上是獨立政治體制之外的公民社會雛形，也不會為爭取社會自由解放而與當權對抗！事與願違，他們反而是與保障其榮華富貴的政治體制，互相緊密結合。

上述兩者之間的關係，並不僅限於物質層面。除茅于軾上述分析外，我個人觀察認為，中共教育所培育出的依存心態，亦影響甚鉅。中共教育本質專斷，不喜歡學生參與，只要死記背誦，無須獨特見解，即可通過考試。只要教育依存共產黨心態一日不除，學生便無獨立思考的能力，民主根基就無法扎根

落實。

一切均以過渡理論解釋

「您批評得對，但我們現正處於過渡時期！」這句回答是我與每一位中共領導對話所獲得的標準答案。他們自認無需茅于軾之流或是任何西方觀察家來評判中國現有的經濟發展模式。儘管共產黨坦承確存缺陷，但全都以「過渡時期」輕描淡寫，一語帶過。

盲流流竄、人倫悲劇、傳染疾病、出賣靈肉、投資失準等均被統稱為「過渡」現象。為終結此一現象，我所獲得的標準答案是：「唯有持續經濟發展，別無他法！」船到橋頭自然直，這可真是個擺脫批判困擾的良方。如果你批判心態依舊堅定，你不是被視為中國的敵人，就是與中國現實脫節，想跟共產黨高幹對話，根本行不通！或許是因我們彼此之間，已隔了一條意識形態的鴻溝。尤有甚者的是，自認有理的共產黨高幹認為，所有針對他們的批評，都是愚蠢不堪或懷恨在心？他們這種樂天知命，無論好壞，船到橋頭自然直的心態，事實上也可能被某些市場經濟的學者所認同。

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知名的經濟學者貝思坦（Michael Berstam），在觀察比較昔日專制政體邁向市場經濟的演進後表示，專制時代的教育或是衛生醫療設施，通常較能維

物，無人可預測其未來。地產的不可預期性，促使這批「新貴」階級熱衷追逐快速致富、有效投資及外移資金的遊戲。外商們或許是因有保險可依恃，自認受中共威脅的程度較低，反而紛紛投入這些長期看來較具危險性的產業。

另一項「新貴」階級致富之道，是累積銀行呆帳：透過關係運作，很容易獲得銀貸。他們辦理借貸，需支付5%銀行仲介費及15%共產黨幹部仲介費，利率似乎偏高。依據規定，借貸資金後，應再轉投資於地產業或工業，不過無論是否有轉投資的事實，只要共產黨繼續給予關愛的眼神，而共產黨也適時從中獲得回報，那麼這些銀貸可就永無被償還的一日了。共產黨藉此法平息了異議聲音，也讓主張中國經濟體制可以產生一批支持民主中產階級的理論，受到質疑。目前，此種韓式民主階段式的理論，根本無法適用於中國。這些「新貴」階級，既稱不上是獨立政治體制之外的公民社會雛形，也不會為爭取社會自由解放而與當權對抗！事與願違，他們反而是與保障其榮華富貴的政治體制，互相緊密結合。

上述兩者之間的關係，並不僅限於物質層面。除茅于軾上述分析外，我個人觀察認為，中共教育所培育出的依存心態，亦影響甚鉅。中共教育本質專斷，不喜歡學生參與，只要死記背誦，無須獨特見解，即可通過考試。只要教育依存共產黨心態一日不除，學生便無獨立思考的能力，民主根基就無法扎根

落實。

一切均以過渡理論解釋

「您批評得對，但我們現正處於過渡時期！」這句回答是我與每一位中共領導對話所獲得的標準答案。他們自認無需茅于軾之流或是任何西方觀察家來評判中國現有的經濟發展模式。儘管共產黨坦承確存缺陷，但全都以「過渡時期」輕描淡寫，一語帶過。

盲流流竄、人倫悲劇、傳染疾病、出賣靈肉、投資失準等均被統稱為「過渡」現象。為終結此一現象，我所獲得的標準答案是：「唯有持續經濟發展，別無他法！」船到橋頭自然直，這可真是個擺脫批判困擾的良方。如果你批判心態依舊堅定，你不是被視為中國的敵人，就是與中國現實脫節，想跟共產黨高幹對話，根本行不通！或許是因我們彼此之間，已隔了一條意識形態的鴻溝。尤有甚者的是，自認有理的共產黨高幹認為，所有針對他們的批評，都是愚蠢不堪或懷恨在心？他們這種樂天知命，無論好壞，船到橋頭自然直的心態，事實上也能被某些市場經濟的學者所認同。

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知名的經濟學者貝思坦（Michael Berstam），在觀察比較昔日專制政體邁向市場經濟的演進後表示，專制時代的教育或是衛生醫療設施，通常較能維

持在一定的水平，如古巴、前蘇聯、毛澤東時期的中國均會針對代表國家門面的上述領域投下重金，使其臣民平均壽命大增。他們儘管身陷囹圄，但身體狀況較佳，亦受過教育。這些國家一旦投入市場經濟，凡是無法直接有產能的醫院或學校，則在工業至上下被犧牲。過渡時期的教育與衛生醫療水平，日益降低，要耐心等待，直到經濟發展蓬勃，自然會讓政府及個人再度關注教育及衛生醫療的投資議題。過渡時期前，中共公營醫院或學校的服務均免費提供，但要享受更優質的服務，目前的中國富裕人家可得要自掏腰包。

貝思坦亦以同樣的邏輯，推論環保議題：環境品質，在經濟蕭條的專制社會，通常較為持穩；一旦邁入過渡期後，則開始走下坡。過渡期結束後，企業及社會自然會試圖找到環保、節水、省源良方，透過較高昂的生產方法，減低環污衝擊。

這位美國知名的自由主義經濟論者，同意中國現有的策士之見，請世人針對「康健的停滯」或是「危險的發展」，擇一表態。無論哪一項階段，均有贏有輸，只是輸贏的對象不同而已。就因為不是只有贏家，因此作任何選擇均需有人仲裁；但要由誰仲裁？在中國，由中共一黨定之；而與中國人口幅員相仿的印度，則是以民主程序決定。

中印之類比

為什麼要與印度比？將中國與印度類比的想法，可是我在雞年期間所得到的靈感。這兩個國度雖相互比鄰，但彼此十分陌生。15個世紀以前，佛陀的信徒翻山越嶺從印度來到中國傳教，中國人將之充分融入後，反而跟道教比較類似。除了中共為確保共軍優勢，曾在六〇年代與印度在喜瑪拉雅山發生過零星衝突，此後中國採行革命體制，印度則奉行保守主義，各行其道，互不相涉。惟至二十世紀末，無論是中國或印度，均曾發生成長停滯與民生悲慘之困窘。蘇聯瓦解後，市場經濟的獨大促使中、印兩國奮起改革：甘地、鄧小平則分別於1989年、1992年改行自由主義。儘管全球化經濟雖具效益，並非完美，印度人及中國人還是同時接納。

在這場追逐經濟成長的賽途中，中國表面上以9%領先印度的6%。從表面上看，兩國經改起跑點相當，15個年頭過去後，每人年平均所得，中國人以1,200美元，領先印度人600美元。但這裡所指的是哪些中國人？這個總體平均數，除無法呈現收入分配不平等外，也未將民主、宗教自由、尊重生命的非經濟價值考慮在內。

中國的經濟成長多歸功於外商（而他們本身通常是華裔人士）。經查喜歡投資中國的外商平均有12位，但喜歡投資印度的外商僅有1位，為何喜好比例是如此懸殊？因為他們在中國

比在印度更容易致富：中共迅速擬定相關法規，提供大量的溫馴受薪勞工，既忽視勞工的社會權益，也不重視環保，此即為獨裁體制之優勢。而在主張公民有權的民主印度，一切都變成十分緩慢。就長期而言，印度比中國更具可預期性，且無受政治力干擾。惟在中國的獲益，則快速累積中……。

另外，中共領導的文宣技巧也比印度好得多。每一家西方大型企業均不由自主加入開發「大中國」經濟市場的「偉大行列」。只要對中國市場表現略微遲疑，即被某些西方傳媒批為落伍趕不上時代，或是敵視中國！

甚至到2005年，不僅沒有任何中國經濟學家對印度產生興趣，而且也少有印度人正視中國的存在。直到英籍印裔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阿米亞塔·森（Amartya Sen）審度中國經濟現況後，中國昔日對印度的漠視態度始有改變。此後，中共派遣許多考察團紛赴印度取經。阿米亞塔·森結語道，中國只能靠不確實的數據，來領先印度。但訪印之行讓中國人發現，印度模式也是可供參考的另一種經濟發展模式。

從印度角度來看中國

我們能否將印度與中國一起比較？這個問題如果單考量經濟成長單一因素，而不論歷史及文明的差異性，將失之偏頗，毫無意義。比較兩者的主要作用，是因他們實有比較之必要，

而且可從中啟發思考。阿米亞塔·森也藉此撼動了中共的自信心，認同不將人文因素考量在內的經濟成長率是錯誤的！而中國人平均壽命停滯不前，甚至西部各省還有下降之態勢，係因犧牲教育、醫療衛生及環保，專注於量化經濟成長的結果。印度的情形剛好相反，如注重底層人民，無論從全國各地或是總人口來看，平均壽命均有增長。1979年，中共開始進行經改時，中國人平均壽命比當時的印度人長14歲；此部分係歸功於中國到處有基本醫療設施所致，而印度根本無法與之比擬。20年過後，中國人平均壽命沒有變化，而印度人卻從57歲增長到64歲。甚至在印度某些省分，如卡拉省平均壽命達72歲，遠超過印度人口總平均壽命；另卡拉省的幼兒死亡率也降到1/3，而中國在此方面則毫無改善。

另一項重要人文的因素，係從男女比例，也可觀察到一國虐殺女嬰及尊重生命之程度。在此，印度表現比中國好：印度是100:107，而中國是100:94。卡拉省的男女比例，甚至與西歐相當。

儘管阿米亞塔·森的樂天主義也需稍作修正，探討中國及印度等多元複雜的國家，過於重視個例或通例，可能會產生誤導，如有人可能質疑選擇卡拉省作為整個印度的代表性，而上海人及北京人的平均壽命又比卡拉省人還長！惟整體概勢仍不容忽視，從平均壽命、幼兒死亡率、男女比例等角度所呈現的

生活品質而言，民主印度的進展速度是比共產中國快速！

中國是富有了。但假如我們考量上述人文因素後，我們還能認為中國已開發了嗎？而對開發較慢的印度，難道她不會進步得比較快？

此端賴我們對發展及進步之定義為何？阿米亞塔·森將人文因素視為比經濟成長更為重要的衡量進步標準，這不就是一項印度哲學色彩濃厚的選擇？但兩國對發展模式意見歧異，是否係因文明差異或是否信仰民主所致？中國犧牲教育及醫療衛生而專注於經濟市場，是否係因禁止相關討論所致？遭犧牲的通常是為數眾多的窮人，但他們的心聲是無法在中國被人所傾聽的；而在印度，窮人有投票權及新聞媒體揭弊，政府在選舉時有求於窮人，根本不敢犧牲窮人的利益。此外，印度民主重視有助於改善人民福祉的非經濟性及無法量化的價值標準，如家庭、傳統、宗教等。而中共則將那些無法體現在經濟成長率的文化或精神價值標準，均視如敝屣。

中國自認發展比印度快速，但致富最快的國家是否就是發展最好？一位自由信奉宗教及注重傳統的印度窮人，與收入相同的中國窮人，兩者相比，誰會感覺較不窮困？一個是保存了傳統價值，另一個則是被完全剝奪一空。

我們承認此種注重發展品質的分析觀點，對習以為常的印度人民佔有優勢，但卻也令部分中國人不禁擔憂起來……。

從中國角度來看印度

北京社會科學院經濟學者陳新自從考察印度後，便以另種角度看待中國的經濟發展。

1989年以前，該學院堪稱共產體制「自由化」的實驗室，曾構思提出國營企業私有化及中國向世界市場開放等理念。但六四事件後，受學生擁戴的研究員均紛遭罷黜，而被較謹言慎行的新一代研究員所取代。從其談話中，也感受得到共產黨願意傾聽建言的局限性。

陳新堪稱新一代研究員代表：英語流利，不打領帶（在中國知識分子界中，可會被視為準異議分子）。儘管我與他在辦公室獨處交談，但還是會有第三者藉送茶水之便，趁機註記及監視。我們能自由的談天說地？這是個多麼天真的想法！監視任何細節的跟監註記作法，早被針孔攝影機所取代，顯見箝制手法也與時俱進。

陳新在實地觀察印度的經濟發展速度與中國相當後，表示中、印兩國30億人口，根本不可能一起擠身發展出西方的消費模式。因為假如經濟不斷成長，每位中國人及印度人進出均以車代步，享有西方式的舒適生活，屆時將導致環保及實務上的死胡同！因為即使採取嚴厲的能源政策，也不夠所有西方人及亞洲人使用。屆時全球可能變成一座汽車停車場。儘管目前中國平均每70人，1人有車，而美國是每2人，即1人有車，但

上海及北京等城市的交通根本就已寸步難行。或許西方出讓現有的能源配額，才能促使一個中國或印度消費生活型態的形成吧？不過陳新對此則不抱希望，西方哪會為了與中國及印度共享能源，而自我限縮？此外，假如中國人或印度人影響到美國人的生活水平，屆時主宰世界原料及能源市場的美國，就會抵制中、印兩國的經濟成長。

陳新強調：「以上所言，係屬觀察心得，絕非反帝國主義式的言論。」他藉此想引導出什麼理念？中國應該以東方「和諧」概念為軸心，採行另一套發展模式。他的談話內容幾近異端邪說，因為中共目前傾全力追隨全球化腳步，建構消費型社會，根本沒有想到還有其他替代方案可行。陳新闡述道：「中國東部沿海各省採行的是西方模式，而中國中、西部各省則是東方模式，中國人應就上述兩種生活模式，做出抉擇。」政府應該大量投資，教育農民及改善其衛生醫療水平，導引他們就地就業，從事有報酬性的活動，始能讓他們做出真正的抉擇。陳新認為，唯有創造較具和諧性的中國，政治自由及自主管理始能落地生根。而這個自然主義者之夢，的確受印度文明及烏托邦社會主義影響。

和諧社會，陳新認為已在卡拉省找到實際典範，這個卡拉省是多麼美好。這個國度令試圖尋求發展替代方案的人士，心生嚮往。卡拉省教育普及、男女平等、宗教和諧相處、平均壽

命長，簡直是社會淨土！更美好的是，卡拉省還是由印度地方共產黨所統治，政治正確。那裡無工作壓力，生活更顯美好。當地政府之所以能投資教育及衛生醫療，讓卡拉省「舒適美好」，一切均歸功於該地僑民回饋鄉里的貢獻。其僑民則多選擇移居英國或波斯灣國家。金錢循環效應通常不為人所知，且對上述的烏托邦主義者而言，也忽略卡拉省海外僑民衣錦榮歸的事實。印度和諧之道，可不一定要植基於禁慾苦行之上。

綜上所述，卡拉省根本是個難以複製的神奇典範。但中國新一代學者們會親赴該地考察追求和諧之道，更具重大意義。此是否能成為中國模式的發展方向之一？還是代表中國下一大步經改方向的先兆？陳新追求「和諧之道」、文人們時興追求「道德價值」，以及許多中國人民「追逐宗教」等現象，我們將試圖拉近三者因果關係。惟陳新的主張卻碰上了一條難以跨越的共產黨紅線，即：無論是否有受允許，追求和諧之道，亦無須借助民主。只不過假如捨棄民主，世人將無法瞭解印度了。

實施民主與否，差異可大了！

民主制度引領印度邁向和諧之道；中國因非採民主制度，故追逐強權之路。印度農民透過投票機制，鄉村可獲得電力、道路、學校、醫療機構之回饋建設；但中國農民則否，一無所有。在印度，不把鄉民需求當一回事的議員，通常無法再次當

選；而中共地方書記則是以驅趕鄉民前進工業區為職志。中、印兩國運用不同的合法性權力，所造成的經濟策略也有差異。的確，兩國的市場勞力需求，造成鄉間人口外移、個人消費至上及生活物質主義化，但印度實施民主，減少市場衝擊並賦予人民自由選舉權利，而中共則是什麼都沒有給予人民。

在印度的發展模式中，其領導人從不考慮建立帝國強權，假如受到誘惑，選民會迅速引領領導人正視地方發展現實。2004年，當印度執政黨過於偏執崇尚國家主義時，即被選民唾棄，改以社會主義聯盟政府代之。窮人選民是決定印度政治走向之多數。印度藉政黨輪替、新聞自由、不完全摒除貪腐及受強權政治理念誘惑等現實，不斷凸顯和諧之道的重要性。印度農民盼根留故鄉，投入生產農產品謀生的心聲，民意代表們只能支持。而此作法並非為追求印度之強權地位，而是為改善印度最卑微人群的福利。印度聖雄甘地曾說：「經濟進步與否，必須要由最貧賤的印度人民來評斷。」

印度與中國間最大的不同是，印度係以服務業及資訊產業為主，而中國則是工業。這是因為兩國民族特性的不同，還是政治選擇的歧異所造成？民族傳統影響很大，但政治性的擇選，則又更強化此一趨勢：印度採行地方分權，而中國則是資本集中。中國之所以選擇工業至上，是因共產黨想藉此強化強權地位，而非以蒼生為念；只需為數約二成既得利益或認同民

族尊嚴至上的中國人，支持提升中共強權地位即可，其他人都只是為達此目的而被利用的燃料而已。

儘管資訊產業的新革創新（尤其是軟體）及政治文化間的關係，通常無法具體論述，卻是真實存在的，如有創造力的北美、西歐、南韓、台灣及印度等，均屬民主國家。

印度不僅是個和諧之國，而中國也不只是追求強權地位。雖然單透過民主，並無法解釋兩國為何發展模式如此歧異？但若沒透過民主，兩者間的歧異點，則更無法釐清。

雞年期間，中共文宣首次使用「和諧之道」字眼。或許是擔憂引起社會混亂？但中國人又不是傻子，「和諧之道」套用在上海復旦大學學生身上，就是所謂「不可批評老師及共產黨。」在此，中共追求強權的野心昭然若揭。「和諧之道」的呼籲根本不具公信力，簡直白費力氣！在此種共產黨體制下，根本不會有重要財源挹注於鄉間，以改善教育及衛生醫療水平。共產黨只有口惠之便，但其優先目標依然未變。中共追求強權乃是共產黨存在的原因，因此10億辛勤的中國人注定只能為其做嫁。

征服世界

在追求中共強權地位及改善中國民生問題之間，應如何取捨？自毛澤東時代起，共產黨早就選擇就算犧牲人民的安和樂

利，也要建立一個具征服世界能力的中國，因此才會奴役農民勞力，凡事以發展重工業及軍力為主。而今日此一目的仍未改變，操弄手法則日益精進。比起毛澤東時代，上述意向甚至遭大肆宣揚，毫不避諱，如共產黨便於雞年期間，特舉辦鄭和下西洋特展，向世界展示中國昔日國力。

鄭和於1405年，奉明朝永樂皇帝（明成祖）之命7次下西洋，動員300艘船隻及3萬名船員，足跡從中國到東南亞，遍訪印度及阿拉伯半島，並遠至非洲東岸。鄭和下西洋之後，明朝就採取鎖國政策，昔日的豐功偉績便僅留存在歷史的記憶之中。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才迫使中國門戶大開。600年後，中共領導憶起這位明朝宦官的豐功偉蹟，便於國家博物館舉辦「鄭和下西洋600週年特展」。惟隨著明朝當時刻意毀屍滅跡，相關見證實物已所剩無幾，只有重建當時船隻模型，但文獻不多，只配上幾張當時船隻到達各地的現今照片。因缺乏實際古物，特展提供許多書面資料供參考，內容充斥著共產黨褒揚歌頌式的字眼。大幅海報則以顯目字眼提醒遊客，鄭和比哥倫布、麥哲倫及達伽馬等人早約100年便完成繞行世界一周之壯舉。鄭和的船艦不僅比哥倫布的大3倍，其船隊乘載的船員3萬人亦比哥倫布的88人多的多。另外，並針對那些可能不瞭解特展緣起的遊客們強調，鄭和係「第一位最偉大的航海家！」中國昔日曾超越西方，比之西方可毫不遜色……。

這項特展亦傳達以下訊息：「當時身為世界超強的中國，無任何可與匹敵之國，藉下西洋之便，所到之地應皆被征服。但卻捨行此道，避免傷及任何無辜。」既然當時中國有能力卻沒作，「為何今日或明日就會侵略他國？」舉辦特展的主要目的，是要將中國嶄新的雄心合法化，並給世人中國「和平」崛起之印象。共產黨習慣藉辦理歷朝特展，試圖重寫歷史，為當下特定目的所用。


該項特展的目的，根本不在探究鄭和下西洋的真正原因。我們知道，鄭和率領如此龐大的艦隊，並不是以遊山玩水為務。當時明朝甫立，藩屬國藉機不再朝貢，於是派遣鄭和下西洋，展示中國國力及招納海外藩屬。雖號稱以和平展示國力，但如果遇有反抗，仍不排除以武力相抗，如鄭和在錫蘭開啓戰端，蘇門答臘君王也因對中國不遜而遭斬首。這些暴力行徑，雖與歐洲征服者的訛詐勒索相比，僅屬小兒科，但此特展則毫無述及。

哥倫布與鄭和之間的真正差異究係為何？是帝國主義？其實，中國人與西方人的行徑根本如出一轍！明朝兼併西藏、金朝、新疆。可見當時中國明朝跟西方一樣，均自認比所有其他鄰近民族優越，但不同的是，西方會將其「基督教義」之普世價值輸出海外，但中國輸出的只是蠶絲及陶瓷。另外，西方堅持宣揚人權理念，而中國輸出僅是貨物，毫無普世雄心。今日

的中國人是會像明朝時期一樣，只賣商品，比西方人更謙卑？還是在堅信文化優越感後，比西方人更為虛榮？假如由一個多元化國家舉辦類似特展，可能會針對其特殊性及歧異性加以探討，但中國對此議題則不加聞問。

在參觀完該特展後，遊客根本不知鄭和下西洋最後被迫終止的原因，因明朝根基穩固後，官員們即禁止海外探險的風氣：是因為耗資過高，或因為杜絕引入外國思想進入中土之險？究竟為何，無人知曉。鄭和下西洋的相關文獻均已被摧毀，其相關航海技術亦遭人遺忘，而此次特展對此亦毫不提及……。

我們可從鄭和下西洋獲得哪些啟示？曾經超越過西方的中國，是否可能恢復昔日的光榮年代呢？鄭和以和平方式宣展國力，是否意謂中國未來也能和平崛起呢？現代的中國是否跟明朝的中國一樣，面子及裡子均需兼顧？中國是否會再度鎖國？上述疑問似乎均可在相關歷史中找到可能的答案，但在中國根本無人針對上述議題公開討論。



Chapter 7

民主的陰影

儘管吉讓擁有千頭犛牛及穿戴珠光寶氣的嬌妻，但他對中共推行中國式民主的作法，無法理解。他跟其他四百餘位生活於青海高原的察拉居民一樣，都回應了議會選舉活動的通知，但該通知卻用中文撰寫，或許因為不諳中文，致衍生出後來的誤解吧。

歷史上，青海隸屬於西藏的一部份，但自1965年起，中共便藉將西藏分成多省，期能化解藏族爭取自治的情緒。正當2005年初春時刻，青海高原雪融之際，無論貧賤富貴，距離遠近，察拉每戶牧羊人家無人不配合出現。生活在中國的藏族，無人會錯失中共的與會召喚。該年，藏族與漢族聲稱共同慶祝西藏「和平解放」40週年，而所謂「和平解放」只是「殖民」的美稱罷了。中共傳媒報導也宣稱，藏族「浸淫歡樂之中！」

在當地擔任中共書記要職及發出通知的凱朗，雖屬藏族，但諳中文的他卻選擇與當地權貴同謀。中共為感謝他對黨的奉獻，藉提供購買冷凍櫃及發電機銀貸利多，保障他優惠價販售肉品及鹽漬奶油的營收。而其他商家，則飽受漢族中間商的剝削之苦。只要他一日擔任中共書記要職，銀行便不會催討銀貸。從他個人的「奇遇」，即可窺探中共統治藏族蘿蔔及棒棍並用的手腕，或許中共對付藏族的手段稍強硬些，但全中國人不是同受中共同一手段的對待嗎？

藏族的選舉玩偶

藏族牧羊人，扶妻攜幼，盤腿坐在濕草地上，村莊唯一象徵現代化的白磚建物，即是中共地方黨部的所在地。但因牧羊人家庭散居於方圓30公里的帳棚及土茅屋內，「村莊」也僅只是概念，從未真實存在過。深諳統治巧門的中共，藉聲控系統訓練藏人，一聽到國歌響起即起身站立，凱朗接著發表冗長難懂的中文演說後，每人竊竊私語並從所能理解的隻字片語中，自行重組演說的重點。

凱朗廣播演說的大意就是，「察拉已實施民主！」當日，村民被召集來投票選舉地方委員及村長，而且還是採秘密投票方式進行。凱朗向村民當面展示糊紅紙並上了鎖的空木箱後，便搖晃選票說，黃色的投選地方委員，粉紅色的投選村長。候選人姓名已預先印製在選票上：5席地方委員，有6人角逐；村長候選人則僅有1位。針對專程來此觀摩的外國觀察家及記者們，凱朗書記表示，候選名冊是經過村民事先協調定案。但藏人聽到後，則眼神茫然，面面相覷！接著，凱朗則說明秘密投票的步驟，而在尿牆角落掛上廉幕，就成為選舉人的秘密投票室。他提醒人們不可賄選（亦即買票稀鬆平常），並介紹兩名遏止賄選犯罪任務的省會公安。

凱朗認知到中共權貴雷鳴似的演說方式，已不再引起人民注意，期間，藏女七嘴八舌，藏男則飲酒作樂。直到凱朗播放

流行曲風的藏歌，才吸引了民衆的注意力，藏女們笑顏逐開，展示鑲金貝牙。選舉活動也隨之開鑼。

首先，凱朗介紹經共產黨推選的候選人，他來自西藏，以豢養犛牛為生，而且還是察拉唯一擁有轎車的人家。他也是一位藉銀行貸款享有冷凍櫃的實例。儘管他身穿傳統藏服卻外披中共軍用二手綠大衣的搭配有點突兀，但因應當地動輒15度溫差的保暖，可是令人羨慕。他雖慢條斯理以中文發表政見，但他的濃濃藏音，應可讓聽眾知其所指吧。他承諾不同流合污（此亦凸顯貪污係普遍存在）、慎用公款、鋪造連結村莊中心及國道的石路，及以最好的方式解決藏族牧羊人家土地劃分之爭。最後，他矢志奉行共產黨意旨，打擊貧窮及與時俱進。但無人對這些照本宣科的聲明有興趣。競選活動一結束，凱朗書記隨即分送選票單。

但這一切卻被吉讓給破壞了！他起身站立，自行發言，除感謝共產黨德政，賦予察拉牧羊人家自由參政的機會外，並宣佈要參加村長選舉。他氣定神閒且語氣和緩地用藏語表達心中所思。話畢就座，嬌妻鑲金貝牙的笑容即迎面而至。聽眾們似乎心滿意足，但從一個日曬黝黑的臉龐表情，卻可嗅到玄機處。

略顯困窘的共產黨書記，隨即走進白磚土屋中，與地方當局協商因應之道。1小時後，當地權貴全部現身，宣稱：中國

政府尊重民主機制，選民可在粉紅選票上，自行寫上表態參選的異議分子吉讓之名。但大多數的藏族牧羊人家根本不識字！共產黨書記愠色不悅地道：「就讓識字的人幫助那些文盲吧！」整個選舉過程原本要按照數月前的劇本，照本宣科進行，結果半途出現個程咬金，徒增複雜度：官方媒體攝影師則停止拍攝此際的混亂場面；那些為外國觀察家準備，負責烤牛及奶茶宴的廚師們，也方寸大亂。

大家投票後，開票雖採公開方式進行，且無作票機會，但藏族似乎已將殖民性格內化，官方村長候選人以2/3多數票大幅領先；而冒失鬼吉讓則當選地方委員。他掩飾失望之情說，這就是民主的精神！然後秩序隨之恢復。

突然間，在草原中看到一輛中製美規的別克（Buick）黑頭車，一位「重量級」幹部隨之下車。在中國若要凸顯身分地位，通常是身穿深色西裝，搭配白襯衫、紅領帶及一頭烏黑濃密的頭髮。共產黨權貴，無論年紀大小，絕無一根灰髮或是禿頭。這位高幹既沒自我介紹，也沒報上名號。眾人則竊竊私語認為，他一定是來自青海省會西寧的「高官」。他抓起麥克風，以共產黨鏗鏘有力的慣常表達方式，恭喜了察拉的民衆，在遵守中共16全會指示下，往民主更邁進了一步。此次選舉不僅促進了中國的整體發展，也是民族融合的完美典範。他另宣佈提供3,000人民幣利多經費，供當地委員會自由運用，惟仍

需經當地共產黨書記細心督導。而這筆經費對青海而言，根本少得可憐。這位「高官」上車前，同意入境隨俗將手指浸在鹽奶鑲邊的白酒杯中，向周圍彈灑3滴祈福後，將白酒一飲而盡。一時熱意襲身，趕走了高地的寒凍及暈眩之苦。

瞬間，太陽下山，寒雪籠罩。藏族牧羊人在滿飲奶茶及飽餐烤牛後，或騎馬或開車，迅速一哄而散。察拉重返寧靜的黃昏時刻。此種共產黨施行「民主」的樣板村莊，計有65萬個。

桀驁不馴的吉讓下場將會如何？或許他僅是個小人物，還不致遭到共產黨騷擾，但他雖擔任共產黨紀律委員會成員，卻可能無法如願得到無償銀貸購買冷凍櫃了。

在告別察拉重回西寧的路上，中共地方官員則向外國代表們提議順路探訪觀光勝地：鳥島。鳥島毗鄰中國第一大湖青海湖畔，堪稱候鳥必經之地。我們則循例拍照留念。隔日，國際傳媒報導，在鳥島所採集的鳥屍，已被證實為禽流感帶原者。由於禽流感、非典型肺炎（SARS）及愛滋病，均列威脅中國之重大流行疾病，只要路經該區域的旅客，一律需隔離檢驗！但我們卻無遭此待遇，或許是作業疏忽所致吧。但事實絕非如此。這只顯示，中共毫無衛生安全的警覺性，任務優先順序錯置，只想在藏族及外國人面前保住顏面，一意孤行並堅持選舉如期舉行。或許認定流行疾病並不危急，致中國傳媒在4個月後才報導此一流感鳥屍新聞吧。

共產黨絕不會邁向民主體制！

在一個一黨專政、無反對黨、教條淹沒資訊、相同論點一再重述及查禁反批判言論的國度裡，選舉又有什麼代表意義？非民選的北京政府及習於自我任命的共產黨，自1980年起，制訂中國所有村莊均有權舉行地方選舉法令的作法，究竟有什麼真正目的？假如共產黨認為民選地方村長及代表是件好事，為何此種地方民主只能限於鄉間？城市因無法適用該法令，只能在一言堂主導下，任命區域委員會的代表。反之，鄉間選舉倒已成北京政府之優先任務。此種策略令人不解，甚至在中國也引起正反兩派意見，支持者樂觀以對，反對者則批評虛偽。

事實上，65萬個中國村莊，每一個情形各異且複雜，實無法逐一演繹。北京「世界與中國研究所」所長李凡認為，從多元展現到邪惡擺弄的見解，不一而足。一般而論，華北地區的選舉行為受地方角頭勢力所主導，而華南地區則是賄選決定結果。經濟利益籌碼愈大，貪瀆情形通常是愈嚴重。對毫無資源的藏族村莊而言，實無籌碼可言。但在繁華省份的村莊，則是擁有眾多企業，村長簡直等同一個掌握實權的老闆。

在民選的村長及自我任命的共產黨書記間，究竟是誰才有領導權與決策權？實務上，並無定律。端賴誰的靠山大，誰的財庫多。根據中共民政部表示，約有1/3的村莊，共產黨書記身兼村長職務。這是否是中共鼓勵角色任務錯置，還是希望藉

由民選，強化職務代表的正當性？或許這不失為是個強化中共在鄉間正當性的作法。對共產黨而言，這也不失為藉農民之手，除兇剔惡，清理門戶的良方！

這項策略聽來似乎很理性，但各省對此見解各異。有些省份的共產黨鼓勵旗下書記參選，強化民主的合法性及減輕地方政府的行政負擔（村長及共產黨書記二職均是由村民所供養，此即意謂需雙重薪津支出）。有些省份的共產黨則主張嚴守村長及共產黨書記的職權分際，可限縮獨裁專斷之險，迫使雙方協商尋求共識，落實真正民主的分權體制。但也有許多省份的共產黨，藉完全不舉行或擇選部分村莊舉行地方選舉，壟斷村民的選舉權益。

總之，中共的中央政府似乎並不如人民所想像般的強大。儘管中央擬定實行方針後，地方共產黨代表則考量個別利益得失及背後靠山，合縱連橫，以便各行其事。中共的中央集權，根本就是北京當權者與地方共產黨大老間不斷討價還價的過程。

此外，為撫平800萬農民日益高漲的不滿情緒，中共才對地方選舉產生興趣。派駐各地的共產黨書記生活起居，端靠農民血汗供養，平均每20名農民，才能養活1名共產黨書記，而農民供養負擔也日益沈重…地方「高幹」們隨意向農民課徵稅務、科以罰鍰及施行勞役，導致農民群起抗議。只有大規模的

抗議，才會由國際傳媒披露，而其他憎恨中共的此起彼落之聲，則是永不被世人所知。施行地方選舉或許稱不上是民主，但還是代表「中共願意傾聽民意」的弦外之音。

但根據我們的所見所聞，礙於中共沒有與人民對話的傳統，有意傾聽民意的訊息並不為多數人接受。地方選舉的籌辦方式過於笨拙，簡直污辱農民！前述這名察拉藏族牧羊人臨時參選當選後，是否真有「被共產黨傾聽之感」、「會更愛共產黨」，甚或「對共產黨更有向心力」，我很懷疑。中國人自1949年以來，被迫參與了不可勝數的例行性群眾運動，或許他會認為只不過又參與了一次類似的運動罷了。地方選舉如同「大躍進」、「文革」、「經濟改革」，已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留下紀錄。西藏的地方選舉，讓人聯想起中共昔日刻意安排的樣板工廠、模範村莊等實例。自1960年後，宣傳口號雖變更，但表象仍重於實質。儘管人民屈從，但其中的應付彈性，仍是劫後餘生的最佳自保之道。

民主化過程的理論

我坦承以上有關村莊選舉的論述，是有點悲觀，但還是有另一種普受中共及中國觀察家接受的樂觀論點，此種論點則是西方色彩較濃，我們姑且將之稱為「過程理論」。共產黨的辭彙從未正式將「民主」字眼排除在外，如毛澤東專政時期的

1954年，中共便曾舉辦過多元化的選舉。後來只是在史達林主義推波助瀾下，毛澤東主義於是放棄維持多元民主表相，而採單一民主制。此後，中國人少有投票機會，但只要有機會，一定是一面倒的支持或反對！鄧小平在1981年曾發表，並不排除中國在未來50年後成為多元民主國家之可能性。但為何要等待如此之久？除了共產黨害怕失去政權之疑慮外，鄧小平還提出以下兩項論述。

不成熟的多元主義將可能讓中國分崩離析，甚或內亂連連，如1911年辛亥革命後所舉行的自由選舉，便造成地方權貴及軍閥勢力坐大，讓國家動盪不安及內戰頻仍。舉辦自由選舉，是否會像昔日內鬥般導致分裂，我們持保留態度。現今的中國，其國家融合的同質性，堪稱歷史之最，絕非1911年的中國可與比擬。除各省間關係緊密，民族融合順利及經濟制度一統化外，職場、商場、電視及學校，均逐步採用國語，讓各地風土民情日趨一致化。另外，如同西方觀察家所言，中國如要採行民主，應採行邦聯制。比起不擇手段的中央集權制，邦聯制應較易回應多元主義的需求呼聲。

有感於中國人尚未做好負責任公民的準備，共產黨提出實施自下而上的漸進式民主制度。這種倨傲心態，也讓人瞭解共產黨為何對村莊選舉要施行各項強辯預防措施。只不過我們實在難以想像，為什麼在1913年或1954年已知如何投票的中國

人，需要在2005年再學習如何投票？無論是印度或巴西，這些土地及人口均可與中國比擬的國家人民，已會投票選舉，可不需一個政黨在旁協助50年？該學習投票選舉的，根本不是中國人民，而是中國共產黨！中共高幹們才需要學習自我思考，不要盲從。有朝一日，他們可能也要學習，如何因應敗選的結果。

那些與共產黨既無淵源，亦非華裔人士的外籍觀察家們則認為，中國的地方選舉已是條不歸路，共產黨可能無法掌控，最後終將會被選舉邏輯之必然性所擊倒，如在中國十分活躍的福特及卡特等兩家美國基金會，便持此樂觀看法，支持中國的村莊選舉活動，提供地方政府後勤支援及諮詢服務。察拉即是在此機制下的產物，共產黨幹部似亦樂於向我呈現藏族自由生活面貌。美國卡特基金會曾捐贈數台電腦供該地方政府使用，但中國實際上並不缺乏電腦，究竟是誰上了誰的當？是思想單純的卡特，還是陷入選舉機制泥淖的中國共產黨？

就我而言，從中共採取此種村莊選舉模式看來，根本無意邁向民主之路。沒有資訊自由及結社自由的民主，其合法性尤令人質疑。

共產黨路上的一粒沙

儘管貴州與青海間隔約2,000公里遠，氣候景象各異，但

貴州農民與青海牧羊人家卻同受貧窮之苦。在察拉，人們勉強以飼養犛牛及販賣奶油餬口；而在馬官村，每戶人家則端賴小田種稻過活。在中國經改後，貴州的旅遊業開始熱絡起來。貴州每人平均年所得僅約100歐元，境內缺乏電力及機械化設備，學校嚴重不足，且毫無醫療機構。對那些熱衷異國情調的旅遊愛好者而言，則會很高興置身在永恆的中國意境之中：午後立著一農夫，農婦在田中整地，岩山峻嶺如同碑石般處處環繞。巨大的中國，其實是歷朝各代及不同文化之累積成果，唯獨共產黨則是一成不變。

在察拉觀摩選舉後，我在馬官村參與一場委員會會議，見證另一項難以抗拒的地方民主成果。這場會議頗具重要性，除帶點瑞士小鎮式直接民主的味道外，還選在黨部所在地前的露天公共場所舉行。而這個共產黨建築風格，就像在察拉及其他各地的一樣，均是白磚土屋建物。儘管這是為了呈現現代化的進步，但毫無風格與品味可言。

在黑板上，用粉筆註記著當地有多少懷孕婦女、她們的姓名及懷胎進展情形。我們不要誤以為貴州官員特別關心孕婦，他們只是要藉告密及峻罰來嚴格執行一胎化政策。為規避此一政策，貴州孕婦通常會喬裝成藏族或夷族等少數民族，但因公安深諳其道，根本是白費力氣。

在馬官村主持會議的高幹，跟在察拉所看到的高幹，簡直

是同一模子刻出來：同樣的濃密烏髮、相同的抑揚頓挫及得意揚揚的辭藻。鄭如同其他地方黨員一樣，均出身自城市且受過教育。共產黨完全無法反映社會組成民衆之多元性：6,000萬名黨員中，為數佔全中國人口八成之多的農民僅有5%；工人黨員數不僅無足輕重，還日益減少；婦女黨員僅佔10%強。而無論是農民、工人或是婦女黨員，均沒有被賦予重要的全國性或地方性的實權。

就像凱朗在察拉的所言所行，曾在馬官村議會中也如法炮製發表官方說法，對「增進民主意識」及「殲滅貧窮」二項成果，感到滿意。略有所思的地方委員，只顧抽菸，沒表達任何意見，鄭便敲定會議的討論議程。在中國，大多數的民選議會每年僅開會1次，而其開會目的並不是要交換意見，而是藉此對共產黨秘密的決議來背書。

一進入馬官村，迎面而來的是一幅類似中國水墨畫的山水景緻。但這個人類共同的遺產，卻成了公共垃圾場：魚屍處處、水塘佈滿浮萍及保特瓶。鄭宣稱：這幅破敗景象已嚴重影響馬官村聲譽，必須開會解決水塘的未來。共產黨書記則建議填平水塘，改建成供老人休閒的公園。之後，大約有5至6位與會人士舉手發言，都讚揚共產黨書記的睿智英明。儘管開會過程初期，一切均如預期，但也發生類似察拉程咬金事件。一位身穿藍色毛裝的耆老，沒被邀請就逕自發言，並從口袋中掏

出一篇事先準備好的詩篇，讚揚水塘曾為村莊之耀的光輝時光。他主張只消鑿深及清理水塘，即可讓魚兒復育，重回昔日馬官村的優美景緻。鄭盛怒不已，來自貴陽省會的長官們，則召開密會尋求解決之方。鄭宣布以填平及深鑿兩案併呈，由投票方式處理。儘管採秘密投票，但奇怪的是，居然無人對開票過程有興趣。最後，鄭宣布填平案獲勝：進步建設派獲勝，不僅奪走馬官村的未來，也擊敗了毛裝詩人。要將他視為反抗分子，可能太過誇張，他只是對已消失的中國朝代充滿憧憬而已，只不過誰知道他懷念的是歷代帝王，還是毛澤東？他不就是那顆卡住共產黨專權機制的沙粒？類似的沙粒在中國到處可見，有時會聚沙成塔，瞬間結成對抗共產黨勒索與濫權的武器。

這同時，還發生一件鄭沒預期的小插曲：負責播放音樂的音效師，居然未如預期播放國歌，而以《國際歌》取代。這首1970年的大合唱曲，令人想起毛澤東時代。參與會議的代表及村民們則呆若木雞，不知是否該起立致敬？聽到國歌，是該起立，但對這首20年來沒聽過的《國際歌》，不知如何應對。因此，代表們紛紛離開現場，當日適逢馬官村市集日，《國際歌》的歌聲則被商販叫賣的大嗓門所淹沒。下次會議，期待來年再相見囉。

假如馬官村沒列入中國最貧窮的省份之林，高層的權責不

自視為民主分子，讚揚民主進步的話，世人對馬官村的印象，可能還是停留在「風景秀麗」而已。當地的村民當然不笨，只是用自己的方式，謹小慎微地向當權者示意。

有幾位較具膽識的出席委員則向我表示：他們贊同採行民主制度，但更期盼能拓展至縣級，而非局限在村莊層級；縣級共產黨才具有真正決策權，而馬官村村莊級的共產黨書記只是個橡皮圖章。因此，他們此一呼聲並非僅是技術性層面的問題，而是具高度政治意涵。他們也希望能有參與討論設定議程的機會，而非任憑鄭來擺佈。另外，馬官村既缺電力、道路、飲用水，也缺學校及醫療機構，卻利用每年一次的會議，來討論是否填平水塘，備受眾人譏評！而當地政府建造橫貫全貴州省的東西向高速公路，顯示其財政並不緊絀，只不過這條付費公路只有共產黨官僚們在使用，一般的車輛還是取舊道而行，儘管坑坑洞洞，但免付費用。當地則一直流傳著「貴州共產黨高幹侵佔公路公款致富逃往澳洲」的傳聞。

如同中國所有的村莊，由於醜聞事件不被官方傳媒所報導，因此相關資訊均藉謠傳方式四處流傳。農民們透過實際經歷，體認到共產黨體制的本質、思路邏輯及漫天大謊。但中國幅員廣大及各地片段資訊，根本無法讓各地的親身經歷與國家體制現狀的整體概念相連結起來。

「你們期盼中國政府民選嗎？」我經常向農民們提出此一

問題，但通常的回應是：沈默不語。為何會如此呢？對共產黨的恐懼是其原因之一，但共產黨阻止中國與民主議題作心靈式的接觸，才是主因！

小步前進理論的改革主義

外圍的觀察家曾試圖以西方歷史與習慣，來分析中國的現狀，但我們是否過於低估中國邁向自由進程的重要性？儘管共產黨態度強硬，但地方選舉難道沒有激起農民對自由的渴望？如同前述，美國派駐中國的基金會組織即持此一信念。以「改革家」自居的中國維權主義分子，也持相同看法。他們之中，不乏執業律師。律師跟法律一樣，在中國是項新興行業及新穎事物。中國絕大部分的律師雖從事處理少數涉及政治的商業及民事案件，但極少有人會為堅持法治理念，而不惜對簿公堂。

北京一位專精新聞法的職業律師浦志强坦承：「我幾乎每打必輸！」針對企業及共產黨冒險揭弊的新聞界，如不屈服於中共公安及文宣部施壓，常遭致反控毀謗，索償鉅額罰金或被迫停刊。浦律師儘管官司打輸，但自許為雷鳴巨人，可不是個易受恐嚇封口的平常人。他剛正不阿的個性在新聞界獨樹一格，有人打趣道：「若他沒被公安逮捕，則需10名大漢才抓得動他！」

浦律師強調：「重點是永不妥協！」他藉上法庭打官司，

將法治、訴訟及正義的概念，注入中國社會之中。他也希望藉其法律論述，撼動一味接受共產黨指示辦事的法官權威。浦律師採取的訴訟策略，係善用中國法律理論與實務的矛盾。儘管中國雖立有憲法、法律及法規，但從未真正落實過。基於徒法不足以自行，他即援引憲法於2004年所增列的人權法條，開始民主教育之路。在這個凡事預先定案及決策藏鏡人從未曝光的國度裡，他只能藉與企業主或政治領導打官司，推展「為自己所作所為負責」的概念。他指名道姓揭露貪贓枉法之徒，有時候還打了勝仗呢！

他捍衛的某些雜誌刊物，甚至還打贏毀謗官司，獲得補償金。另如那些城市公寓及鄉間土地遭不當手段徵收的受害者，最終甚至也如願以償獲得金錢補償。浦之所以贏得了官司，完全是共產黨下令法官放水所致。從這個角度，他不僅成了共產黨人質，他的少數官司功績，也成了證明中共司法獨立、保障新聞自由及私有財產的樣板。他也承認，這根本是場戲！這手法跟地方選舉簡直如出一轍。但是共產黨終究不會因人民初嚐民主滋味，而對法治訴求讓步。因此任何有助於人民瞭解民主的一小步，都是值得鼓勵。

六四工人運動領袖韓東方也認同浦律師的改革論點。韓東方遭中共監禁2年後，目前避居香港。1989年的中國工人運動係他發起，經常被譽為「中國的華勒沙」⁹。但他駁斥此一類

比，他要捍衛的是中國受薪者們的權益，而「團結工聯根本是個以推翻共產政權為職志的政治性組織！」韓在香港密切關注大陸工作衝突事件，試圖透過中國現有法律，來化解紛爭。遇有衝突性強的爭端，他則自港致電勸告示威者放棄武力，勇於在法庭捍衛理念。透過發行《中國勞工通訊》集資，來金援聘僱北京的執業律師，與省級法官相抗衡。在中國，約有七成的訴訟進行，是無律師在場旁聽。對於那些遭遇工安事件及無預警裁員的工人而言，藉由媒體壓力及辯護協商，有時還可爭取回應有的補償。

從整個中國的角度來看，這些官司勝利，在比例上根本微不足道，但的確可讓某些原告的人生起了變化。浦與韓對此種引領工人將反抗情緒，轉移成追求法治的教育功效，均感到滿意。但這些受他啟發的工人，或是遭與共產黨同為一丘之貉的企業主剝削的外鄉移民，他們對此是否真心信服？在信任無獨立思考能力的法官、援引模稜兩可的法條，及接受外資金援的非政治化活動三者之間，其合作空間根本十分有限！

譯註1：華勒沙（Lech Walesa, 1943-），波蘭前總統。曾任汽車工人及造船廠電工，1980年領導罷工，掀起全國大罷工的風潮，主要訴求是爭取工人的權力。1981年當選第一屆全國團結工聯主席，戒嚴時期被逮捕軟禁。1983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1990年波蘭的共黨政權下台，華勒沙當選為波蘭總統。

無論是由權謀或信念，韓東方也堅稱奉行左派理念。他並闡述道，這就是「不與中共敵對，卻又能引領中共棄惡揚善，重回真正社會主義之道」的中國新左派主義。

不管別人如何看待，韓東方和浦志強仍屬堅信中國有實施法治未來的思想前衛者。他們觀察到，中國出了一批新世代法官，且以女性居多，通常秉持司法獨立及抗衡貪腐為職志。法國政治學者布列姆（Stephane Blame）則將他們比喻為1980年義大利對抗黑手黨勢力的「潔淨之手」世代法官。但當時的義大利已是個多黨制民主國家，這個比喻似乎有點過頭。此外，長路漫漫，終點難測。2005年，中國有75%的刑事犯遭判刑定讞，其中，2/3無律師從旁協助辯護，出庭人證只有公安。顯見，中國法庭目前的要務是維持社會秩序，而非維護司法正義。

但上述現況並不足以動搖支持改革主義者的信心。目前任職四川成都大學的王怡則以最明確的方式，將實際作法加以理論化整理。他認為，在中國的共產黨政權根本毫無合法性，他們既無意交出政權，也無意自上而下進行戈巴契夫式的改革。若要引領中國回復到「民主常態」，有下列兩種方式：一如中國境內、境外的異議分子余杰及魏京生等為首的「自由主義派」；另如王怡所贊同的「改革主義派」。改革主義派主張採取各種合法方式，避免與共產黨正面衝突，來喚醒人民對法治

及公民社會的渴望。因從不採直接方式與共產黨對幹，有打贏若干官司的回報。改革主義派可能化解憤怒人民及共產黨間可能發生的暴力衝突。在邁向法治這條漫漫長路時，中國人或許可籌組自覺性的政治社團，讓過渡到民主體制成為中國現代化後的自然成果。但此需耗時多少年？預估需時30年的王怡，屆時他可是已屆60高齡。

於是，有人反駁說，這套改革式的理論，實在令人費解。因為，他們不僅認為30年內不會有任何星星之火，撩撥改革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敏感神經，而且還認同共產主義者及新儒學主義者的看法，主張人民在下民主最佳決定前，仍須接受專家及知識分子的引領，根本就是對人民的「孔式」傲慢心態！

對我們局外人來說，該如何看待這兩種觀點？小說家莫言向我表示：「人民的苦難日子捱得夠久了，任何邁向光明的一小步，都是意義非凡的解放。」未親身經歷這些苦難的我們，也許應該傾聽浦志强、韓東方、王怡及莫言之言吧。

當中國人票選超女之時

關注中國民主前景的我，經常自問，是否應該凡事正面思考？無論是法條主義、改革主義、抗爭、抗議，還是異議，是否可成為促使中共蛻變的關鍵？靠傳送一篇網路攻擊文章、一則簡訊、一張文宣單、一起訴訟或一場地下彌撒，是否就足以

撼動中國？改變中國或許不如民主主義者及共產黨所想像的快，但另闢蹊徑或許可促使獨裁政權蛻變成自由民主吧？有人認為可藉宗教之力促成，但為何不善用新聞傳媒之力呢？對於這一連串的疑問，在尋找答案之前，一個電視歌唱比賽所引發的現象，卻更值得我們深思。

來自四川年僅20多歲的超女李宇春，向中國人民所指出的自由康莊大道，是否比任何一位知識分子，或是民主鬥士所能引領的方向，更為清晰具體？在雞年夏季期間，有4,000萬中國人在追逐崇拜偶像，無論共產黨、檢審者及知識分子根本不知有這號人物的存在。美國《美國偶像》(American Idol)節目舉辦歌手比賽的模式，風行世界各國。中國湖南衛視電台也趕上風潮模仿，在蒙古優格私有企業贊助下，舉辦超女歌手比賽，總計吸引20萬名候選人參加。週復一週的分組歌唱比賽，觀眾與日俱增，直至總決賽，吸引4,000萬名觀眾，透過簡訊票選，計有400萬人投票支持李宇春。這個得票數紀錄，在中國根本無人能比，所向披靡，尤其是需透過付費簡訊投票，形同設置選舉門檻，限制了投票者的人數。

假如我們沒有剛好在中國實地觀察，且中共也沒被這數字所撼動，而試圖採取立場導正超女真正意涵的話，李宇春傳奇可能只是條影劇版的新聞。但就在李宇春贏得超女頭銜的隔日，中共官方社論卻發表抨擊民主危害社會論，文章中說：李

宇春「無藝術素養卻自發性」參選的行徑，「教壞中國青少年！」她一身牛仔褲配上黑襯衫，用西班牙文及英文高唱的舉止，根本是個壞榜樣，不值仿效！而她的歌迷們犯下的錯誤更大，居然票選支持這位既無專業、「也不諳唱歌技巧」及「不具美麗外貌」的鄉野村姑。這篇社論在飽受香港傳媒抨擊後，社論作者周黎民在談論時，則強調其文章見諸報端前，已事前徵得「文化界」同意。經抽絲剝繭，周黎民在中共官方英文報刊《中國日報》（*China Daily*）發表大作，表達中共文宣部的官方立場。李宇春帶點男孩氣、不修邊幅及頭髮凌亂的風格，實與中共中央電視台（CCTV）每週六晚上節目所推崇的藝術審美標準，相去甚遠。共產黨眼光甚為敏銳，還將「票選李宇春」視為是人民頑抗的行為。如同中共文宣部社論結語所稱，「未預先準備的民主行徑」，不謹慎因應，終將激發人民反抗政府的意志。然而，與其接受機械化的美女標準，不拘小節的中國人，寧可萬中選一代表他們發聲。



Chapter 8

野蠻國度

中國這個國度與世界其他各國並不相同。對西方觀察家而言，由於中共隱藏革命背景，順應世界注重經濟效率及社會秩序之潮流，因此並無法立即感受到其特殊性。而且，這個政權也採行國際通用的政治、外交與行政的語彙，似乎像個正常國度。中國不也有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人民大會、憲法，以及法律規章？但所謂法律，根本是個門面、裝飾品。真正在這個門面下運作的，其實是透過一種無形也不為人熟知的機制，而掌控國家運作的權力，且又專屬中共的統治階級所有。真正權力核心的中共中央委員會，又有誰曾真正的參與過？大多數的中國人民根本不知其中成員有哪些人，而中委會的決議又密而不宣？統治階層的神秘面紗，除使共產黨領導們令人難以捉摸及無需為任何人負責外，並能完全掌控那些負責監控，甚至恐嚇人民的黨工及共產黨機器。雖說這世上沒有任何國家是完美無缺，但像中共如此殘害生靈、搶奪劫掠以及漫天說謊的國家，實在令人難以置信！丁女士於1989年6月4日清晨，便深深感受到中國是個野蠻國度。

丁子霖毫無懼色反抗劊子手

6月3日晚間，假如17歲的蔣捷連沒有違反母親的叮嚀，而執意赴天安門廣場聲援示威抗議的同伴們，丁子霖女士今日應是個白髮蒼蒼，普受敬重的退休教授。但6月4日清晨，她

在北京的醫院裡找到身中多彈的兒子遺體，卻從此改變了她的命運。16年後，這位母親依舊想瞭解中共為何要屠殺他的兒子？是誰開的槍？是誰下的令？這些疑惑至今均未獲得任何回覆……。

在愛兒遭槍殺後的頭兩年，丁子霖內心一直自責未能阻止他赴險境，甚至一度想自殺了結餘生。同時，她也思索是否愛兒犯下不可彌補的大錯，才導致命喪。由於中共禁止談論六四天安門事件，丁子霖根本不曉得這世上還存有一群跟她境遇相同且自我封閉的父母親們。就在這兩年，她得知「國際紅十字會」曾估算六四受難者約達2,800人，傷殘者亦大約此數字。究竟這些人是誰？出身何處？許多家庭自此絕口不提涉及事件的女兒、近親及朋友。大部分的受難者遺骸則憑空地在這世上消失。治喪無望，除使這些靈魂永遠遊蕩人間外，更令他們的至親感到無盡絕望。這種情形並非僅此一例。在2005年12月，中共武警開槍鎮壓廣東汕尾東洲的抗議村民後，也採同樣手法，讓人民無法探知受難者人數，亦禁止人民瞭解他們喪命的原因。

1991年，那位曾與中國真正的領導人鄧小平共同作出槍殺示威民衆決策的總理李鵬，以受難者家屬想保持沈默與秘密為由，宣告中共拒不公佈受難者人數後，官方立場至今仍未鬆動。這個漫天大謊反讓丁子霖化悲憤為力量，決定走出悲情，

蛻變成一位英勇的女戰士。她曾致函總理李鵬強調，六四受難者的家屬不想保持沈默，不放棄追求事實的真相，並透過香港記者筆下傳達家屬的悲憤之情。自此中共的打壓動作不斷，以「傷害中國人民情感」為由，對她與教授夫婦展開逮捕、訊問、威脅、騷擾、監控與強迫退休等行動。儘管丁子霖與她同一世代的人，內心的「恐懼」夢魘，實非旁人所能體會，但他們已歷經太多的恐怖惡行、殲滅運動、革命與政治鬥爭，早已練就一身無畏之心。

丁子霖以她微弱的力量，矢志建立完整的六四受難者名單，但這卻是件既艱鉅且難以完成的任務。因為大多數的受難學生均來自不同省份，相關受難家屬也就遍佈全國各地，此外，受難者不僅有學生，還有路人、鄰省工人、運送蔬菜至北京的菜農，以及聲援學生的醫生，他們都在槍林彈雨中相繼罹難。這根本不是鎮壓行動，而是有計畫的屠殺。當丁子霖有機會與受難者家屬晤談時，總是會儘量勸說他們同意出面為六四受難者作證，詢問是否有親眼見到遺體，還是已遭軍方掩埋。丁子霖的一舉一動都遭中共公安嚴密監控，受訪的受難者家屬也逐一遭到便衣訊問、威脅與騷擾。

直至雞年，丁子霖只能蒐集到 189 名六四受難者名單，連同照片準備透過香港出版。這令人想起阿根廷或智利所發生的失蹤者母親的事件。而當全世界都支持阿根廷及智利失蹤者母

親的同時，未獲西方任何聲援的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則益形孤單。她孤獨一人在偌大的中國，試著在物質上幫助那些經濟陷入困境的農工受難者家屬。丁子霖為他們在中國募款，但籌募情形卻不理想。難道是中國同胞們欠缺悲憫之心？對此，丁子霖則緩頰道：「中國人民是擔心中共迫害才有所卻步。」共產體制破壞昔日宗教互助管道後，崇尚物質成就便取而代之，已讓這個社會日益喪失慷慨施與之心。丁子霖的金援大多來自海外華人，她與夫婿還因此被控以從事外幣走私勾當為由，而入獄兩個月。丁子霖將這些捐贈重新分配給需要幫助的家庭後，中共公安隨即造訪受援家庭，並試圖勸服他們相信，丁女士根本藉由外援來假公濟私與中飽私囊。除飽受威脅外，丁女士還要對惡意中傷自清。

雞年期間，西方高層首長絡繹不絕造訪北京，法國總統席哈克不僅是其中之一，而且還主張解除對中國武禁的禁令。而這項禁令係六四天安門後，西方對中國所施加的懲罰。為了說明法國立場丕變，席哈克解釋道：「六四天安門已成過去式了。」但事實上六四天安門根本還未成為過去式！只要丁子霖與其他受難者家屬未能蒐齊六四罹難者名單，且未能為他們舉行喪禮的一天，不僅六四天安門永遠都不會成為過去式，而且中國也無法名列正常國家之列！

以家庭計畫之名，行絕對殘酷之實

中共多年來，努力向世界呈現以人性化方式控制人口生育成果的神話，居然被一位年僅34歲的山東盲眼農夫陳光誠所戳破，令北京的官員郝林娜沮喪不已。

身為中共政府高層極少數女性主管之一的郝林娜，舉止優雅，通曉英語，現任中國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的國際部主任，她幾乎已讓中外人士相信中國計劃生育措施，純粹是為了避免人口爆炸。另外她也讓人遺忘中共在1980年的強制結紮、強制墮胎、拷打威嚇等駭人舉措，使得至今只剩下反對墮胎的美國，持續關切中國強制性計劃生育的政策。從該政策之目的與實際措施而言，強制化特性的確已淡化許多。如30年前中共曾強制所有中國人採行一胎化政策，而今則考量民衆養兒防老的心態，稍作調整。一胎化政策僅在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及人口稠密的省份（如四川省）等地施行。其他地方，第一胎是女嬰者，有權再懷一胎。人口密度不高的地區，就算第一胎是男嬰，亦有權懷第二胎。而少數民族則可懷三胎，惟藏族則毫無上限。

過去強制性的舉措已逐漸被鼓勵避孕及罰金等勸說方式所取代。郝林娜自豪地說：「在中國農村，奉行一胎化政策的父母親們，自60歲起每人每月可獲得60元人民幣退休金，取代日益喪失的養兒防老傳統。」至於罰金部分，由於隸屬地方政

府的權限，且係農夫飽受恐嚇威脅之源頭，郝林娜在這方面的說明，則顯得有點含糊其詞。

她繼續說道，中國經過為期30年的計劃生育措施「教育」後，每戶家庭平均出生率已從5.9人降至1.8人。出生率方面，中國堪與歐洲相比，且自2033年起人口將出現負成長。「由於施行計劃生育措施，中國現今人口約維持在13億之間，假如沒有管控的話，可會飆升至16億人。」而所「節省」的3億人口每年可能會增進國家經濟成長率約4%。不過郝女士這些精算的統計數字，並不一定是精確無誤，我們就把它當作是統計月報的資訊吧。中國當局所宣佈的統計數字很少是準確無誤，而且人口數的推斷論也不可靠。西方每對配偶平均出生率約2.3人。另由於婦女教育程度日高、注重經濟發展，以及嬰兒死亡率降低等因素，已造成全世界的人口成長趨緩，因此我們無法斷言人口數一定是正向成長。自1975年起，中國停止施行強制計劃生育措施，使得印度人口現狀，也無法與中國相提並論。此外「這些沒出生的3億中國人口」也可能是產值貢獻者，所以少掉他們可加速經濟成長之推論，也是無法成立的。

但這天，在北京的「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談論上述重要議題，並不是適當的時機，如何把陳光誠這個惹人厭的傢伙處理掉，才是當務之急。由於陳光誠事件已引起國際關注，郝林娜明知我見她就是要問此一事件，但她顧左右而言他，僅談中

國人口政策。

2005年9月6日下午，陳光誠在妻子陪伴下搭乘火車抵達北京，並在人權分子及美籍記者護送下，往請願辦公室前進。但是途中，公安以未事先向居住地山東臨沂及前往地北京報備此次行踪為由，攔截逮捕陳光誠。此事件隨即受到美國媒體關注，並波及郝林娜。根據陳光誠在臨沂所進行的調查中，最近3個月，至少有7,000名育有2位幼兒的婦女遭強制結紮，另有數百名懷胎8個月的婦女被迫墮胎。對此，臨沂市的醫療人員坦承，相關作法是將受精體置放入滾燙沸水中，蓄意讓之斃命。

而郝女士對此有何反應？她聞之憤怒不已，親赴臨沂調查本案真實性後，除譴責不人道的行為外，也肯定了陳光誠反映的情況屬實，並宣佈計劃生育委員會的地方官員需再教育。她說：「這些地方官員不瞭解法令真義。」郝女士並刻意向我強調，我們也不應過度渲染本案的嚴重性。應該「不至於有7,000名婦女」會遭強制結紮？而且「有些案例是自願」，這個數字應是臨沂市每年萬名出生數中所推論而出的。但這究竟算不算是地方政府的「處置失當」？

對中共而言，追求真相永遠不會列為第一優先。郝女士還睜眼說瞎話，聲稱「臨沂事件」不算處置失當。而事實正好相反，此事件不僅揭發了計劃生育政策在中國農村所造成的恐怖

惡行，並揭露了中國出生率降低的真正原因。更令人吃驚的是，資訊在臨沂，均遭過濾。強制結紮或墮胎是直接經由法令公告，由鄉市鎮政府下令執行的。另為合理化這些極端作為，相關當局曾指稱臨沂市婦女有生育3胎的趨勢。為逃避地方政府的監控，這些懷孕婦女們只好遠赴他鄉。此外，假如北京得知地方政府坐視出生率飆高而無所作為的話，將會嚴重危害相關官員們的政治生涯。為免前途不保，只好先下手為強了！臨沂市的公安與支領共產黨薪水的「民兵」，於是針對育有2子的婦女及孕婦，大肆展開獵捕行動。凡是不予揭發的相關親友，都會遭到囚禁、毆打或每日科以百元人民幣之罰鍰。整個村莊完全與人世間隔離斷訊，直到他們透露逃亡婦女們的行踪為止。而向地方當局抗議綁架妻子的先生，亦遭嚴重毒打。受害婦女被引導至醫院後，即被施以麻醉，並用我們難以想像的粗糙手法，逕行開刀手術。臨沂市就是以上述手段達成人口限額成長的目標，而這些共產黨官員也自認藉此可拯救他們的公職生涯，只不過萬萬沒想到出了個陳光誠這個盲眼程咬金。

多年來，陳光誠在中國自學法律，協助農民伸張微弱權益。他的農莊已變成那些屢遭虐待、為罰鍰及恐嚇所苦的村民們的「司法諮詢中心」。自強制結紮醜聞爆發後，這位地方人權分子已成國際媒體熟知的英雄，實讓郝女士十分難堪，不知該如何化解此一僵局？

結果，他們以中國慣用的手法，將陳軟禁在家，讓他噤聲不語。為確認陳光誠生命無虞，北京的人權分子們北上卻無法與其會面，甚至還遭地方民兵痛毆。儘管郝林娜對本案憤怒不已，但沒有針對強制結紮及墮胎罪行，採取任何懲處措施。事實上，郝女士想採拖字訣，讓世人淡忘。於是她突然面帶微笑向我問到：「中法人民之間，不是應該共為限制全世界人口成長及保存自然資源，而共同努力？」

不，我無法認同此種說法。因為至今毫無任何具體事證，可以佐證中國假如沒有實施這個專橫的計劃生育政策，就不能讓人口成長遲緩，而我甚至認為此種政策只會強化中共對人民的監控，卻無其他任何正面作用。受害父母們的苦痛及官僚體系的迫害行徑，更是血證斑斑。中共一胎化政策導致人民虐殺女嬰及全球男女比例嚴重失衡等反常效應的確存在，而其效益卻不可預期。強制性計劃生育亦將使人口加速老化，讓養兒防老的年邁父母親們陷入絕境。歐洲或日本的人口老化問題，尚可靠退休俸支撐過活，但在貧窮的中國，這可是史無前例。此外，一胎化造成中國獨子們像「小皇帝」般養尊處優，他們未來的社交行徑實令全體中國人感到茫然。

主張廢除死刑論者的孤獨

十月間，長沙市安排2,000名學童在學校目睹一場集體處

決死刑犯的震撼教育。有6名走私毒販被捕後不久即遭處決。中共每年十月國慶日期間，都會籌組類似場景，或許是為誇耀共產黨國家的萬能無敵吧。

一般而言，中國人並不反對以死刑來懲處犯下血案的罪犯。但問題是實際上遭判刑處決的人究竟是誰？他們是否真是長沙的走私毒販，或是這些指控只是藉口？每年究竟有多少起類似案例？這是國家機密！中國境外的人道組織團體估算，每年大約有3,500至15,000起。而廣土眾民的美國及彈丸之地的新加坡則約有50起。中國的統計數字通常是無法探知的，而判決及判決理由均不可考。在法律明文規範的16種處決理由中，法官的裁量權有犯下血案、逃稅、貪腐、獵殺貓熊、走私文物以及企圖顛覆政府等罪名。控訴理由既如此五花八門，這些隸屬共產黨高層管轄而毫無獨立審判權的法官們，會如何闡述運用，我們應可想像。

到底有多少罪犯，是因政治立場不同及反抗專制，而遭到處決？有多少藏人及維吾爾人，在無律師陪同下即遭判決、囚禁，並以陰謀破壞國家團結為由處決？而在這個人人都逃稅且貪腐情形十分普遍的中國，居然有人會為此遭槍決，而其他人則逍遙法外繼續興旺發達，豈不怪哉？處決示眾，究竟是為了讓學童們引以為戒？還是警告共產黨內同一陣營的失意派系？

中國的死刑判決不僅是專橫，其中還商機無限！處決前

（不是處決後）幾個小時，罪犯體內的主要器官就先被摘除，以因應那些依靠注射活體細胞延壽的老年人及外科移植的需求。罪犯遭摘除器官後，再快速縫合傷口，送往刑場處決並焚屍結案。中共此一行徑，可是鐵證如山。

商機還不僅於此。2005年夏，30具塑化的人體標本所組成的「人體大探索」教育展，不僅在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巡迴展出，甚至也遠赴台灣。展品在美國展出時，有人質疑那些來自中國的人體，是否有遭處決後被回收製作成標本之情事。儘管中國政府對此避而不答，造成展出中止，而在歐洲則認為中西人體均同等重要，對此仍議論紛紛。

但在反對死刑的歐洲，有人為此出面抗議嗎？法國新聞媒體及知識分子每年會例行性地發動請願活動，吸引藝文界人士連署，共同譴責美國等施行死刑的國家。儘管死刑如此令人厭惡，但眾人皆知在美國死刑的判例稀少，且相關判決是透過民主共識及司法獨立程序後，所達成的一個令人遺憾的結果。身為連署成員之一的我，近年來均簽署同樣的連署書，試圖譴責美國與中國，但均未能如願。有人則向我駁斥，為何要針對中國？

這些遭開膛破肚的處決犯難道就沒有絲毫可怪罪之處？不為美國所接受的死刑，對中國人就不能適用？中國的暴力犯罪已氾濫到非以死刑不能遏阻？中國政府所擁有處決人民的行政

與司法之合法性，與美國有何不同？中國人的命就比不上美國人的命？人權價值為何就不能適用於黃種人身上？有些人則不以為然地說，請尊重中國文化的差異性，不要把西方人命價值的概念強加於中國。但中共憲法現不也已將人權價值納入其中了嗎？難道「親中」及「憎美」兩種愛憎情緒交互運用，已使人們對要求中共廢除死刑的所有正面意義給消磨殆盡？究竟為何要針對中國人賞議批評？

賀衛方雖是中國人，卻主張廢除死刑。他主張的理由與西方人士沒有兩樣：國家沒有殺人的合法性、判處死刑無法嚇阻犯罪。此外，那些深具政黨偏見及易受金錢誘惑的中國公安及法官根本不稱職，而且瀆職嚴重。但回應贊成主張廢除死刑並不如預期踴躍，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賀衛方年約四十餘歲，只好形單影隻地繼續為理想而奮鬥。他戒慎恐懼自我提醒：他的祖父母曾出於理想主義而投入共產革命，而後卻備嘗專制苦果；他的父母深信文化大革命，最後卻因內亂鬥爭命喪黃泉。如同許多中國人一樣，他不提倡政治暴力，而改循教育之道。但向學生及網友們解釋為何要廢除死刑，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中共雖同意可酌修死刑條例，但反對完全廢止，因此在法律上談論廢除死刑仍是個禁忌。賀衛方只能採取迂迴方式宣揚廢除死刑之理念，如抨擊明顯的司法疏失、無（事）證處決，另並建議至少要有全國性訴訟更審之程序：因為高等法院的全國性法官

比起那些地方法官，無論在能力或是審判獨立性，均要强得多。不過賀衛方對他們仍無法完全寄予厚望，因為中國的法官僅是個職業工匠，不像西方的法官擔任三權分立之捍衛後盾。法律無法強制國家接受，反被國家當成「吝惜」授予給法律主體者之工具，而且法官們從不會與國家唱反調。

更需賀衛方費勁的是，要如何勸服法學院及人權組織中那些思想前衛的中國人。賀衛方坦承，儘管現代法律概念來自西方，與中國淵源不深，但並不會因此讓它喪失其普遍性特質，或是不適用於中國。中共對它的接納程度大概就是如此。但人權概念有兩種：一種是強調食衣等物質權利的中國式概念，另一種則是著重資訊及結社自由等抽象權利的西方式概念。將西方式人權概念強加適用於中國，就如同中共文宣部所言，是一項反對偉大中國的帝國主義陰謀，而這項充滿沙文主義的論點，挑動中國人民民族自尊心的神經。因此，賀衛方獨立反抗共產黨文宣機器，否定上述道德相對論述的立論性，只好在小團體裡及學生堆中，或是與其他透過網路得悉其論點的不知名人士，宣揚其人權主張。作法假如更積極或是論調更激化，均可能讓他教職不保，黯然退隱。改革之路雖有，但仍十分有限！

面對賀衛方這位滿臉笑容、怡然自得、正義凜然但卻不浮誇的大學教授，我們自覺卑微與渺小：在中國安全無虞地漫

遊，能做的僅是注意傾聽，面對這些無力感，不禁讓人心生羞愧。我們生活在安和樂利的西方，到底能為他盡些什麼心力？目前，反抗中共對西方領袖的施壓、遏止中西互媚合污，以及在下次巴黎或紐約的反對死刑請願連署書中，同時譴責中國與美國等作法，是我們在中國境外唯一擁有的有效制衡中共的利器。

共產黨與貪腐共存共榮

由於貪腐事態嚴重，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領導們，為此召開會議因應。出席者清一色男性，確認了婦女在中共決策機構中的無足輕重，惟只見端茶接待的侍女。一入會場，位居中間主位、蓄有一頭長官級慣有的烏黑染髮的副書記劉峰岩，首先映入眼簾。牆上斗大的時鐘正值兩點整，正是我們事先所約定的時間，讓我倍感榮寵。由於中共在雞年鼓吹反腐倡廉，於是我便要求拜會相關主管機關——「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更讓我喜出望外的是，他們居然同意接見，就連安排此次參訪的法國使館，也同感驚訝！沒有任何一位記者可達成此一使命，幸好我的身分不是記者，讓我在中國參訪便利了不少。事實上，中共期盼的是向來訪者「傳達訊息」，並以主觀認定我是來聽講的。我的確是如此，但我不僅對相關事實有自己的看法，而且與中共官方說法大相逕庭。

於是，兩點整是聽這位副書記發表反腐倡廉新政策的時候了。他無預留討論時間讓我發問：中共慣用的手法是鏗鏘有力的陳述政策，而非集思廣益討論。至於，我是否有自己的看法，或此次拜會是否有符合我的期望，無關宏旨。儘管如此，他們仍是以接待外賓的規格，來看待我此次的造訪。副書記發表的內容贅言冗長，實在可以簡潔些，真正想要傳達的訊息其實是：「反腐倡廉對中共是件生死攸關的大事！」因為許多中國人均認為，貪腐是憎恨中共幹部的主要原因之一。

這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可完全不符合西方政治的運作邏輯。在西方是以一個獨立於行政機關的機構負責監督事宜，並藉由三權分立的架構，打擊行政機關的濫權行為。但在「黨國合一」體制下，這個紀委會所做的卻是如副書記所言的：以「自律」抗衡「個人致富的行政濫權」。無論是地方領導、市長、縣長及省長們，都身兼行政部門官職、人民代表、公營企業老闆及雇主等多重身分。外在的誘惑是如此的龐大，只有聖人才能抗拒身兼數職所牽涉的龐大利益吧！但副書記並不願深究此一議題。他表示，2004年計發生162,032件貪腐案件，處分了5,916名幹部，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機關的有4,775名共產黨成員，並將其中的900名判刑定讞。凡此均展現紀委會執行反腐倡廉之堅定決心。但他還是沒就身兼數職所引發的職權混亂問題進行批判。他續道，對一個擁有6,000萬黨員的

共產黨而言，900名所佔的比例，可說少之又少，共產黨之清廉，實可見一斑。今年，共產黨通過300餘件法規及數千條條例以反腐倡廉，預計至2010年應可讓這些「壞俗」、「壞行」及牟取私利等情形，消弭於無形。2020年，甚至可讓「全中國人民剛正不阿」，並摘除這個中國古老的「貪腐」魔咒。

面對副書記完美無瑕的演說，我中途多次利用侍女奉茶打斷之空檔，藉機詢問媒體所扮演的角色。他神態自若地回答我說：「當它正確報導事實時，效益宏大，但如果誇張報導，則禍害無窮。」甚至有「外國媒體據以報導，企圖顛覆中國政府」，但「沒有法國報刊參與此次反中國之圖謀。」我對此則不做回應。

在聽講這篇充斥馬克思、毛澤東及鄧小平用語的長篇闊論時，幸好目光還可偶而飄向窗外，觀賞公園的樹木。江青自命女皇時，便是在這個公園練習馬術。「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便是坐落在她這個鍾愛的娛樂場。衆所皆知，共產黨自尊心甚高，且慣用兩面手法。

劉峰岩稱頌中共對抗此一中國古老陋習的同時，我們卻從中國報刊中得知，幾乎在所有私有的煤礦田，專責礦田管理與安全工作的，均歸共產黨幹部配偶或親友所包辦，而在能源短缺嚴重的情況下，更讓這些煤礦田賺滿荷包。但媒體卻經常報導礦田忽略公共安全，只重視生產力的提升，導致塌陷災變時

有所聞。對此，「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有何具體反應？他們沒有進行任何調查，也無任何共產黨幹部遭到罷黜，而自2005年初起，礦工死亡人數已達3,000名。

這個發生於雞年的悲慘時事，讓世人得知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真相：中共反腐與自腐，根本是一體兩面。中共當然嚴詞駁斥與貪腐間難以分割的關係。而西方人士不就是藉此與中共幹部維持良好關係？瞭解中共幹部需求的西方企業家與政客們，試圖以另一種理論來為中共辯解。貪腐不就是中華文化與生俱有的東西嗎？這也是劉峰岩告訴我們的說詞。自古以來，中國官員便對買官鬻爵、收受賄賂及販售服務習以為常。由於薪俸不高，公務員需靠人民供養過活。中共不就是把這個古老的傳統「文化」加以發揚光大而已嗎？稅務稽查員依據納稅人所提供的賄賂酬金多寡調整繳稅額度，中共幹部為子女購買大學文憑，部長任意任用私人，還有人在澳門賭場揮霍公帑，凡此種種不都是這種中國特殊習性承繼者的具體表現嗎？有誰敢甘冒大不諱大肆批判？又如何能信誓旦旦於2010年將貪腐習性根除？

但上述所謂文化決定論根本經不起檢驗：假如中共掌權是為了對抗貪腐，但貪腐情形卻因昔日儒家道德規範淪喪而益形嚴重。另外，無論是台灣、新加坡或香港的華人官僚體系，都不像中共如此腐化。而且，中國人對中共幹部的貪腐深惡痛

絕，因此中共絕不是中國高貴傳統的捍衛者。

有一種解釋中國貪腐現況而普受西方人士接受的說法是：在這個複雜的社會中，法治觀念尚未深植人心，「走後門」可讓人迅速找到解方而不致迷失在龐大的官僚體系中。藉由這個後門，外商也獲得循正常途徑無法獲得的利多優惠。中國的經驗驗證了貪腐減緩專制政體的緊迫叮人，昔日的蘇聯亦是如此。惟「後門」只供有力人士與富貴人家獨享，平常百姓不僅不得其門而入，反而常為了安排孩童入學、爭取國宅、辦理身分證件，或是需要官僚體系核准程序的任何事情，散盡家財。

另一種普為西方親中人士及中共領導所慣用的說詞是：中國正處於發展過渡時期。從國有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濫權亂象難以避免；且從公有財產制轉型至私有財產制，有國營企業主使用銀行貸款，甚至以公帑購置股票堆積個人財富。一旦完成私有財產制，這些亂象終將停止。主張此種過渡論述者認為，中國統治力量會被市場經濟力量所削弱，因此必須要强化管制能力。更多的國家管理介入，是為了實現更開放的市場經濟：這就是中國政府目前的論述。

只不過過渡時期轉眼已25年之久，而貪腐情形則日益嚴重。從中共不時地殺雞儆猴懲處共產黨幹部，便可一葉知秋了。而在一個國家機器無所不在的國度裡，如何再強化其管制能力？在中國假如沒有經歷一連串的審核許可程序，是什麼事

都無法達成的？情形恰好與上述的過渡論述者的看法相反，由於中共所採行的私有財產模式，已將貪腐陋習納入體制之中，結果只會讓貪腐更加猖獗而永續生存下去。因為在中國所進行的私有化從不完整，它只是一種在公權力永久控制下，讓渡予私人的一個生財權利而已。共產黨透過監控私有市場機制及權利讓渡式的私有財產制，而讓那些特權享有者心存「感激」。這也就是回歸到我們此節的標題：中共創黨至今，與貪腐共存共榮。

中共是個權力機器，也是個征服中國及確保共產黨成員致富的經濟機器。1934年至1949年間，中共便在陝西省延安創立多家企業公司，自給自足並滿足黨員日常所需。毛澤東不認同經濟與政治迥異之分野，從不認為民間社會有創造財富的能力。因此他鼓勵黨員自謀財源，甚至走私亦可。在中共內部，自始主張及譴責牟利之聲便此起彼落勢力相當。中共以正直著稱的黃克誠將軍曾於1946年抨擊：「中共幹部只嚮往城市的紙醉金迷及繁華富裕。」1949年中共掌權前進北京後，這些幹部同時獲得紙醉金迷及繁華富裕的回報。而王朝的創建者及後宮滿佳麗的毛澤東，則帶頭享樂。他的太座江青對此也不遑多讓。但同一個毛澤東亦於1963年使用中共最擅長的隱喻，要求革除貪腐的「老虎」及「蒼蠅」。這便是共產黨貪腐與反貪腐雙重性格之起源。

除了要賴以維生之外，人們為什麼要加入共產黨？無論是中共創黨農兵，或現代雄心壯志的學生，加入共產黨最主要的考量即是經濟溫飽的需求。6千萬黨員當中，又有多少人還抱持理想而加入共產黨？在共產黨只重視牟取私利的當口，黨員又能抱持哪種理想？

致富至上政策已讓中共陷入兩難的境地：如何鼓勵人民競相投入「商機大海」，而不讓負責執行的中共幹部有牟取私利的空間？新加坡的作法是：公務員薪俸比照私人企業幹部辦理，遇有貪贓妄法情事則嚴懲。新加坡深受英國法治思想影響，且公務員人數亦不多，採行此種監控之法，相對容易得多。而在中國，解決貪腐則採遮掩之方：中共幹部紛向1979年的「自由革命」靠攏，漁翁得利。當時的鄧小平難道有其他選項？每一位認同前毛澤東主義的共產黨幹部，都無法抗拒財產私有化後所帶來的龐大利益。26年來，共產黨上下一心推行自由化政策，而幹部及相關親屬不是自己當起企業主，就是收授企業主給予的好處，獲取龐大利益。

同時，共產黨雖必須譴責貪腐歪風，但這只是例行公事，實際上與貪腐併行不悖。自1949年以來，大概每兩年就會推行情一場反腐倡廉運動，一連串不同的運動口號，可讓中共文宣創意展露無遺：1980年推行反特權及反歪風運動、1982年終結經濟犯罪運動、1988年推行「清廉」政府運動、2005年推行

「小眼瞪大眼」運動（此即鼓勵孩童揭發父母罪行）。政府不斷地印製反腐倡廉手冊、反腐法律彙編、案例研究報告、文宣廣告。劉峰岩向我們宣稱有 300 個反腐法律，儘管不清楚內容為何，但光是相關法律可就有 300 個。

無論是上述反腐倡廉運動、手冊、法規及廣告，還是那些大張旗鼓審判起訴中共領導幹部，甚至判處極刑，都不過是想讓人民相信共產黨掃蕩貪腐的決心而已。這些訴訟及文宣，並非真要杜絕貪腐亂源，而是把貪腐維持在一個能為人民所忍受及共產黨幹部可接受的範圍之中。假如中共掃蕩貪腐太過徹底，反而會傷及自身，讓共產黨幹部無誘因進行經改，甚至起而反抗經改。

貪腐與改革竟是如此牢不可分嗎？自社會主義轉型至市場經濟，是否一定要有貪腐這個過渡時期？前蘇聯的每一個成員國，藉由實施企業私有化讓共產黨領導們有改變信仰的契機，但在實際的過渡期間，共產黨通常會將機會平分給行政官僚體系及企業主新階級們。而在中國則並非如此：中共沒有蛻變成超然的行政機構，法治也沒能取代「走後門」的人脈關係，再加上缺乏民主機制，因此除靠自律外，毫無制衡力量，中共本身的墮落當然隨之而至。

以下即是例證。在雞年的五月間，南京市政府下令請市府幹部提交婚變報告書。南京市府似乎已察覺到中國 95% 遭懲處

的貪腐共產黨幹部都有「包二奶」之陋習（中共最喜歡精確的統計數字了），想藉此遏阻貪腐蔓延，或至少集中貪腐的打擊對象。中共官方報紙於頭版評論：「共產黨反腐倡廉具創意！」該文提及，為達殺雞儆猴之效及滿足人民倡廉需求，共產黨於2000年執意將中國人大副委員長成克杰判處極刑，遏阻貪腐歪風。此例不僅是因貪腐遭處死的中共最高階官員，同時他也是大搞婚外情的代表。

由於中國對結婚及離婚均由個人自由意志決定，幾名北京法學專家據以質疑南京市府要求部屬提交婚變報告的合法性。南京則有人以「打擊貪腐歪風乃國家當前要務，婚變報告合法與否有何意義」反駁。

雞年一整年，南京市政府所設立的婚變報告登記所，毫無斬獲。中共幹部是否因此而返璞歸「貞」？而此類婚變報告又能發生什麼作用？南京市府領導們是否真會相信他們自己的指令可以貫徹執行？在經歷六十多年共產黨所倡導的一連串難以理解的反腐倡廉運動後，應該沒有任何領導真會相信。主張民主論述者則語帶嘲諷認為，中共終將自行終結，瓦解於貪腐之中。只不過中共總攬政經大權，要讓他自行瓦解，實在不太可能！

中共大哥講話了！

「中國面臨肥胖問題的新威脅！」這就是雞年8月10日《中國日報》(*China Daily*)的社論標題。該報係屬中共文宣部官方喉舌報刊之一，只不過研讀該報，只能嗅出共產黨國家的本質，對中國真實社會的瞭解，毫無助益。

當日，在一個毫無特別意義的日子裡，中共文宣部發覺，或更明確的用語應是發佈，12%中國人患有肥胖問題，必須節食。未具名的社論（該文出自共產黨擬稿小組）呼籲發起對抗肥胖問題運動，而飲食卻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罕被准許享有的娛樂之一。生活樸實一直是共產主義言論所慣用的語詞：要求人民反璞歸真及生活樸實的陳腔濫調，也是中共控制人民追求個人主義及享樂主義的一種妙方吧。只不過共產黨幹部實在很少以身作則。經拼湊所硬掰出的肥胖問題，只是要讓世人相信，中國只有飲食過量的問題，同時並否認1億中國人有營養不良及瀕臨饑餓邊緣的問題（我們可在多家科技刊物找到相關統計數字）。中共否認饑餓問題的存在，與低估愛滋病及其他流行病變肆虐中國的手法根本是如出一轍。在中國要永遠生活在無憂無慮之中，才算是個優秀的共產黨員啊！

《中國日報》(*China Daily*)於同週也是一個毫無特別意義的日子裡，又發表另一篇社論呼籲「傳統上，中國領導們總是把人民利益置於至上。」3世紀前，孟子不就寫過「民為貴，

社稷次之，君為輕」嗎？這位同樣受僱於中共文宣部的不具名作者續道，1911年孫中山則進一步闡釋成民生主義、民族主義及民權主義之「三民主義」。最後，毛澤東主張「服務人民為領導唯一之報償」，則徹底改變國家與人民的關係。

毛澤東陳義過高，根本遠離中國人民實際生活體驗，「服務人民」早已成人民閒談笑柄。

中國報刊每日儘寫些無趣文章，幾乎已成人們茶餘飯後之笑談。中共文宣部是否想藉不停重複，達到洗腦目的？這些官方無聊文章主要目的係為灌輸中國人民正確的意識形態，而非要讓中國人民麻木不仁。這些撰寫社論專欄的「記者們」，身負反映當日文宣主軸之任務，儘管文章與現實社會脫節，但對所撰內容卻仍深信不疑。

同週另一個不起眼的日子裡，中國官方喉舌又掀起另一議題：打擊間諜活動。我們從文中得知，4個月前持英國護照遭中共公安逮捕的新加坡《海峽時報》駐中國特派員程翔坦承，替境外情報機關在中國蒐集情報，服務台灣。他並承認，「收取大額佣金從事間諜活動。」文中所說的程翔，身陷囹圄且無辯護律師，根本無機會替自己辯白。依據香港報刊披露，程翔是因獲得中共內部派系鬥爭之機密文件而遭逮捕。對此，《中國日報》(China Daily)如何看待呢？該報則認為，那些「長期遭受香港殖民主義壓迫，自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後，始獲自

由」的香港記者們，有濫用言論自由之嫌。

在英國殖民國期間，港媒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媒體之一，但自從回歸中共統治後，香港媒體自由度已不若以往，這是舉世皆知的事實。而中共文宣部的「記者們」對他們筆下所描述的「間諜」程翔及香港現狀，是否也像對肥胖問題及「領導服務人民」等文章一樣深信不疑？這些刊載中共大哥自言自語的中文報刊，也只有中共大哥自己，還有一些西方親中人士會相信吧？他們任何人無論是出於深信間諜指控或是有利便宜行事，都不會支持釋程翔。中共到底要一意孤行至何境地，西方的中國友人們才會起而反抗呢？

中共平日鎮壓事件簿

雞年期間，在中國地方報刊或網站所刊載的一些訊息，雖不比前述議題更具神秘性，但沒有一家西方傳媒以頭版頭條方式加以報導。或許是因為相關新聞議題過於平庸吧。還是這些新聞議題根本不符合西方想瞭解中國的角度？

54歲的上海律師鄭恩寵因為協助上海拆遷戶控告親中共富商周正毅，而被當局以洩露「國家機密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鄭恩寵遭囚禁在戒備森嚴的牢房裡，無權與律師面晤。

中國建設部資料顯示，2005年第一季約有4,000個組織及18,000人控訴中共非法徵收人民土地。單是該年9月份，即有

36,000名請願者在北京遭逮捕。

河南石家河莊，公安在地痞流氓協助下施放橡膠彈，驅散上街抗議當局非法徵收及非法損毀家園的農民。

上海公安部成立緊急小組，專責鎮壓「政治威脅」，成員有80人，配備有「高科技監測器材」。

向上海盧灣法院控告地產大亨非法損毀土地的受害者及相關律師們，被禁止參加法院旁聽，並遭判敗訴。

中國國營電訊公司——中國電信以避免傳送「色情訊息」為由，廢除簡訊功能的22項服務項目。在中國透過網路或是簡訊傳輸不法訊息，有被判處終身監禁之虞。電信簡訊功能遭過濾審核軟體之監控，除色情暗語外，亦無法搜尋「法輪功」、「天安門」、「政治犯」、「勞改營」、「台灣」、「西藏」、「新疆」、「中俄邊界」、「貪腐」、「極端民族主義」、「真理」、「理念」等近千句關鍵字。

內蒙古庫倫大日如來興源佛寺透過外國金援捐贈整修完成，寺方住持原本要主持相關典禮，卻遭公安以「指使迷信」罪名逮捕。

前重慶明光儀器廠職工——杜紅旗，為維護被解僱工人的權益，遭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名」判有期徒刑3年。

福建公安破獲販嬰集團，尋回53名男嬰。每名男嬰以2,000元人民幣成交，再以15,000元人民幣賣出。該集團也販售

不同年齡層的女孩，充當配偶、娼妓或女僕之需。

廣東《東州工今》雜誌總編輯蕭維賓，因刊登前共產黨員呼籲中共學習西方進行三權分立政改文章而遭罷黜。

安徽蚌埠紡織廠萬名退休工人走上街頭，抗議退休俸減少及缺乏醫療給付。

《中國日報》預估中國公私營企業計積欠民工工資達36,000億人民幣。中國副總理曾培炎要求大陸各級政府，至遲需於2005年底前清償完畢。

記者黃金欽在網路傳送捍衛人權文章，卻遭江蘇常州法院以「顛覆罪名」判處12年有期徒刑。

北京大學網路論壇「一塌糊塗」，因探討貪腐、人權及台灣等敏感議題遭禁止。

中共頒發消滅貧窮獎，表揚9個民間組織，並宣稱10年內將完成消滅貧窮之任務。

最後，終於有件好消息！中共最高法院檢察長以違反人權為由羈押1,780位公務員及法官，罪名如竊據財產、非法持有、施虐犯人、刑求致死、選舉舞弊等。這些係因應2004年中國憲法引進保護人權修正案後，所促成的正面結果。中國的人權終於嶄露一絲曙光……。

中國政權是否依舊厲行共產主義？而共產黨本身是否是個真正的共產主義政黨？蘇聯共產體制尚存時，我們就曾討論過這一議題：理想化的共產主義與現實中的共產主義是不同的，後者只是前者的邪惡版。唯有透過此項區別，始能保存住共產主義的理想性。但對那些曾深受蘇聯共產體制統治苦楚的人們而言，對上述說法則無法認同：因為存在這世上的就只有這種邪惡的共產主義。蘇聯倒台前曾堅信實施共產主義之必要性，而中國則因其領導者自稱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徒，所以至今仍是採行共產主義。

經濟起飛發展並不會減少中國的共產主義氣息，因為無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本身、獨裁統治者或是整個共產黨，自始以來就否定個人自由意識的存在，而經濟發展只是為了讓馬克思主義續存而已。中國共產黨並不打算換塊招牌，拋開意識形態的牽絆，或是放棄專制權力壟斷政治。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是共產黨工幹部的入門必修課程，除了浸淫在教條主義的學習外，尚須定期至共產黨黨校實習。究竟在這些共產黨黨校能學習到哪些東西？學習管理現代化中國的方法嗎？這當然是他們的官方任務，但現在從其外在命名，我們亦可嗅出端倪。2005年3月，中國上海浦東幹部學院正式成立，並開設「領導幹部經濟管理研究班」，俾訓練各地黨工幹部學習「國際型創新領導風範」之道及「經濟與社會發展諧和」之方。這些幹部

學院或共產黨黨校所教授的課程宗旨是否真能達成？可惜的是，我們在這些學校裡只見識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教條的背誦能力而已。而中共運作方式較像是個邪教，根本不像是個學習「國際型創新領導風範」的地方啊！

如何學習枯燥無味的官方說法？

這世上早已少有會在公開場合懸掛馬克思及恩格斯兩位思想大師的肖像了，而他們卻曾長期懸掛在天安門廣場上，後來因妨礙交通才被撤走。因此現在天安門廣場上，只能看到毛澤東的肖像。但就在中共上海市委黨校的玻璃門外，有兩座巨大花崗岩材質的大鬍子雕像矗立在前方。我問該校教務主任陳熙春：「黨校開授哪些課程，讓黨工幹部得以學習到『經濟與社會發展諧和』之方？」這個用語只是我不想讓對方將我視為中國的讎寇，所臨機想到的。在此次的訪談中，我瞭解陳君表達的邏輯，也儘量使用其詞彙，俾達賓主盡歡的目的。

陳主任頭髮灰白而整齊，戴副金屬框的小眼鏡，外表不像教員，倒較像個官員。他能言善道，對我「想瞭解共產黨教育之道」滿懷感激。他並問我「是否也喜歡中國共產黨？」雖然我給予的答案模糊有點令他失望，但他仍對我以下的「直率提問」有問必答。

他說：「為充分瞭解馬克思主義學問之精深」及重新喚起

對該意識形態的學習意願，以免遭過多的日常俗務薰染而退步，因此共產黨幹部每2至3年必需重回黨校重點學習。原來，學習馬克思主義竟是管理現代化中國的必經之途啊！對此，我十分瞭解。我問：「中國的真實現況除與十九世紀馬克思及恩格斯所描述的景況迥然不同外，也跟他們昔日論述不再相吻合了。難道您對此從未產生懷疑嗎？」這個重要問題一提出，讓他感受到我是位嚴謹的參訪者。於是他便請其他3位教授一起作陪，茶水服侍，不急不徐，將我這位浪費他整個下午的不速之客奉為上賓。在這個促進中法友誼交流這個大帽子下，他們實在無法擺脫我的詰問。

陳解釋道：「黨校教育宗旨係為讓共產黨幹部們針對社會新興要求，找到正確的馬克思主義解決之方。」何謂社會要求？陳回答：「您根本無法想像中國人民現對中國共產黨的要求是如何嚴厲？他們要共產黨代表人民發聲，並回應人民所求。」

這些在民主國家中根本就是司空見慣的事情，而陳似乎發現到，在獨裁統治下，權威至上的原則已不敷使用了。

「針對人民這兩大要求，共產黨有三大回應。」這是共產主義的特色，也是中國傳統的慣例：遇嚴肅議題，均會引經據典說明。熟記條列說明往往比內容更為重要。針對人民代表性這一個要求，前任國家主席江澤民曾以「三個代表」思想（代

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回覆過了。每個中國人民均熟知代表有3個，如同文革期間的「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以及鄧小平的「四個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但無論是3個或4個，能熟背內容所指為何的中國人，實在少之又少。「一個中心，二個基本點」是句民間口號，我們或許忘了其前身即為1987年的中共口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及忠黨愛國為基本點。」儘管如此，陳續道：「三個代表」已「徹底」解決了共產黨與人民間的矛盾，因此這個思想非常地重要。或許這也是為何在中國所有媒體、重要談話以及「具有非常重要思想」特質者，自然會引用「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

在「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這神奇用語一直被重複使用，是為了思想教育共產黨黨工）形成之前，中共曾是工農軍無產階級的領導先鋒隊。那時中共只是個革命性政黨，尚不足以代表全中國社會。他未提及「社會其他優秀分子先鋒隊」，因我已猜知答案，就不針對此節提問：此處優秀分子係指昔日共產黨設有禁止入黨禁令的私營企業主。共產黨看好這些「資本主義者」來發展祖國的經濟，但該如何將之納編，實是傷透腦筋。還好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才使共產黨從革命先鋒

代表，成為「各種最先進生產力（此即指私營企業主）、最先進文化（這我可就滿頭霧水不知所指了，或許是考量中國文化日益平庸，因此所指應是教員們吧！）以及全中國最大多數人基本利益的代表。」由於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之故（又是這個重覆性神秘詞語），共產黨得以代表「工農軍先鋒隊」、「社會其他優秀分子們」，以及「整個國家利益」。一件我只消用四句話便可表達完畢的事情，陳先生卻講了一小時！

在黨校裡，共產黨幹部們伴隨冷氣轟轟作響聲，長時間聆聽課程。陳繼續說：「由於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之故，企業主階級亦可加入建設祖國行列。」簡而言之，私營企業主陸續入黨，而共產黨內的農工階級卻已日益凋零。由於這些私營企業主們是現狀的受益者，當然不會請求訴願，也不會要求民主，這可就讓共產黨高枕無憂了。那麼婦女代表性議題？自始以來，只能是個充數樣版罷了！除各方紛雜人馬加入共產黨外，沒人敢承認「昔日革命性的政黨已轉變成技術官僚機器，紅五類階級已陸續被其他優秀分子所取而代之了。」此一事實。陳結語道：既然已代表了全中國社會，「共產黨就是要以永遠執政為職志。」既然共產黨已代表了全中國人民，其他政黨就無存在之必要，多黨政治也無法代表任何人。陳向我強調，「我對此是瞭解透澈的！」

共產黨已依據「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傾聽民意並滿足所

求」，西方所謂的「民主議題」，對共產黨而言只是個「良善政府議題」而已，而且中共也已找到解決妙方。環繞在陳一旁的3位教授突然興致勃勃說：「哦！我們可舉請願辦公室為例吧，這可是一個良善政府如何因應複雜社會的最佳寫照啊！」

在中共每一個組織部門裡，均設有所謂的請願辦公室，任何不滿現狀的中國人民均可前往訴願並錄音存證。這簡直是棒透了，不是嗎？這個用資訊科技將人民訴願一一錄音存證的中國，實在令我們感到驚訝！一個在地方小鎮不滿意的小小請願者，可向其上級單位請願，從市鎮越級到縣，甚至從縣越級到市……某位研修請願議題的王姓教授則建議其共產黨幹部學生們到請願辦公室實習，體驗現實人生。而本身即在上海市請願辦公室裡實習半年的王老師續道：「從合法成案率達9成的各種請願案件中，可瞭解人民『喜愛上海市府及中國共產黨！』」為何有如是推斷？「假如公民們對現有體制不信任，就不會利用此管道請願發聲。」對此說明，令我無言以對。

究竟有多少中國公民有勇氣現身請願？又有多少請願案件確實被錄音存證了（相信相關資料應非常完備）？而又有多少請願案件獲得滿意的回答？王教授認為我這一提問提的好，值得「長期觀察，研究研究」。事實上，根據北京社會科學院甫發表的相關研究顯示，僅0.3%的合法成案請願案件獲得滿意的答覆。由於王教授對此並不知情，且此與他自身實際經驗並

不相符，因此質疑該研究之科學正確性。而共產黨幹部學生們是否遵循王教授建議，擇選至請願辦公室中實習體驗真實人生？王教授則遺憾的回答：「他們實在『太過忙碌』了。」

我們的訪談似乎迷失在過於具體的枝微末節之中。陳重拾發言主導權：「重點是共產黨已針對『中國民衆日益不滿情緒』此一明確的社會議題，找到正確意識形態性的解決之方。」陳曾提及公民有「重要的要求」及「立即性的要求」，何謂立即性的要求？陳承認說：「哦，是的。中國已是個『公民社會』。」他特別以宣佈口吻道：「共產黨透過實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及請願辦公室機制，適應社會所需，其力量可如磐石般鞏固。」王教授補充道：「深諳社會演進之道的共產黨將執政久遠。」

替我逐字翻譯的隨行傳譯曾私下向我問到，他們言語索然無味，為何卻要有聞必錄？直到這個訪談結束後很久，我才對她解釋：他們對共產黨真正的思想毫無觸及，只是不停重複背誦那些朗朗上口的教條詞句而已，內容根本乏善可陳。她問道：「他們真的相信自己所說的話嗎？」只要是集權政體者，都會用這句話捫心自問。或許人民是出於野心而非信念來決定加入共產黨，而外在世界的派系化讓他們喪失心智，隨著意識形態詞彙的大張旗鼓，淹沒了自我批判的心聲。儘管本身並非篤信不疑，但已很難從中脫困了。

陳擬以「您是否還有問題要問呢？」擺脫我的糾纏。我還有一個人權議題想請教。陳試著消磨時間道，六月的上海天氣燠熱，讓我們清涼一下吧。他請人送上濕紙巾，讓我們的臉和脖子好好的涼快一下！

深諳歐洲人習性的陳，對我這個提問並不驚訝，而且早有預備。他向我介紹：「這就是楊老師！」楊老師自我介紹他的經歷，他現任共產黨黨校教授、律師、人權議題及愛滋病專家。愛滋病？楊老師目前是中國出席國際會議探討愛滋病的代表。中國在打擊愛滋病方面成效不彰，但楊老師總是仗代表團人多優勢，癱瘓所有對中國可能的批判。

認定西方對中國人權毫無所悉的楊老師一開頭就說，尊重人權可是中共憲法所明文規定的。的確是，中共為取悅西方世界，終於2004年將保護人權條款納入憲法之中。楊老師答道：「但這個對歐美人道主義的讓步舉措，對共產黨確是毫髮無傷的。」

我問道：「一個自認權益遭威脅的中國公民，究竟是要前往請願辦公室訴願呢？還是援引憲法法條，告上法院？」楊老師雖認為我對中國毫無所悉，但仍樂意引領我一窺其中之奧。在中國，憲法係「法律母法」，而其條文「過於神聖，少有人會援引。」那麼憲法有什麼作用呢？楊老師解釋道：「憲法可『照亮人民代表的康莊大道。』」人權概念是否有被一般性的法

律所納入，俾利中國公民援引使用？楊老師答道：「還沒有。中國現還處於過渡時期，時候還未到呢。」我差點忘了，西方習慣於輕信中國的承諾，而且「過渡時期」這個詞彙，在中國也是任何事情都解釋得通的萬靈丹啊！

在貴賓室裡，共有陳、王、楊、鄧4人，但鄧先生至今未發一語。比起其他3位頭髮泛白，鄧年約40，年紀最輕。共產黨黨校由書記負責監督校務運作，因此他的不發一語正顯示，他才是學校真正的老闆。這種設計在中國所有的組織機關中，乃司空見慣。陳請鄧發表結語。鄧則虛情尊老，並假意婉拒。老闆的矯情舉止，在中國也是屢見不鮮。他就是共產黨書記，英語流暢，而其他3人僅諳中文。他說：「或許西方難以承認，但共產黨所預訂的目標，進度均超前。我們不需要西方式民主，因為現在的中國比您們的民主更先進。共產黨傾聽人民心聲，回應所憂。採行西方式民主，對中國簡直是倒退！」

該說都說了，於是訪談結束。由於中法友誼剛倒退一級，我們幾乎不相道別地離去……。

如何在共產黨升官晉爵？

在西方，我們經常認為每一個中國人都長的很像，但中國人對西方人也抱持同樣的想法。不可諱言的，中共幹部們還真像是一個模子印出來的一樣！我在共產黨黨校裡，看不見女性

幹部學生。或許有一、二位吧，但她們舉止過於低調，簡直像是送茶水的女服務員。男士們可是個個穿上代表現代化精神的西裝，甚至盛夏時分，也穿著晦暗色系列的西裝，配上白襯衫與領帶。非共產黨幹部很少如此穿著，就連西方也很少人會有如此的品味。至少目前，西裝—襯衫—領帶如是穿著，應可算是中共幹部們的制服吧。

從共產黨幹部們大搖大擺的舉止，有點特色獨具，又有點不甚起眼，狂傲中又帶點矯情的謙虛與過多的禮節（這在中國可算是特例），傳達的訊息是：他們可是有權之士！這種應對的舉止是無法透過學習而來的，而是不斷的模仿刻意外露的。同質化樣版的學習，共組團結陣線，這即是共產黨黨校的主要目的。

流行交換名片。在中國各地，與有力人士交往時，就要交換名片。而我們的名片存貨可要帶夠，免得用罄被視為魯莽之徒。在共產黨黨校裡，交換名片尤其頻繁，因為這是個累積人脈網絡（中共既像神秘宗教組織，又像幫會人脈網絡）及強化社會交誼本錢（關係）的方式之一。由於「關係」之故，共產黨幹部們在高層圈裡長袖善舞，藉由「關係」，晉陞封爵大有人在。「關係」良好的共產黨幹部，受到下屬、同儕、市民的尊敬；假如後台「關係」不夠強硬的話，可能無法號令別人，甚至遭到譏笑。要在機關組織裡順利解決問題，共產黨幹部們

就要展現其後台的「關係」，而這個「關係」是具有神奇功效的。在共產黨黨校裡，可同時重拾意識形態之記憶（如同用共產黨的詞彙——「維持先鋒隊的地位」）並累積人脈「關係」。在一個視法律如蔽屣的國度裡，「關係」的威望能量將宰制所有行政及法律的決定。這是明文所允許的。但為了升官晉爵，共產黨幹部圈裡，還有3個可暗做而不可明說的要訣。由於中共像極神秘宗教或幫會組織，一入黨便難脫身，為此我可要感謝一位少見的共產黨叛節者所提供的內幕消息。他說：當我們入黨時，需宣誓「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產黨，擁護黨的綱領，遵守黨的章程，履行黨員義務，執行黨的決定，嚴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對黨忠誠，積極工作，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原來中共還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曹思源位居共產黨高位，是中國破產法的執筆起草人，被喻為「中國破產法之父」。他對1988年藉此法完成了國有部門的重整，至今仍與有榮焉。曹說：「要在共產黨內出人頭地，必須要謹守三大鐵律。」第一個鐵律是：要「喜歡你的上司」，你喜歡他，他才會喜歡你。只能對他唯唯諾諾稱是，與他英雄所見雷同，而不要對他批評或是唱反調，對他講話時輕聲細語、態度謙卑。第二個鐵律是：無論是對上司、其眷屬或是朋友，逢年過節均要私下送點小禮。一般而言，他建議將

「上述兩大鐵律均適用於與上司關係頗近的親友們。」第三個鐵律是：「避免上司頭痛傷腦筋。」上司不喜歡麻煩事，不喜歡聽無意義的空話，不喜歡他的直屬上司們談論到他。為了要讓上司安心無虞，下屬們可就得小心翼翼地處理，而不讓任何抗議、請願、或其他形式的活動訊息上達他的天聽。無論人民異議的聲音多麼無傷大雅，指揮公安的市委會下屬們依然會處理到完全的寂靜無聲為止。在共產黨裡，只要出發點是要讓上司高枕無憂，就算要動用公安力量維持社會秩序，也絕不會手軟。只要奉行上述三大鐵律，要封官晉爵攀登頂峰，絕對是指日可待！

我驗證過，曹以上對我講的確是事實。黨校有人向我解釋：請願辦公室所錄音成案的件數，與黨工幹部的官運前途息息相關：成案件數少者，考評優良。共產黨黨校教員以此作為評斷組織機構運行良好的依據。而照曹的說法，這是黨工幹部恐嚇市民斷絕請願之念的最佳動機。上述哪一種說法較符合實情？當然是曹語新解的看法囉。

共產黨如何自我美國化？

由於我們剛剛從訪談者所描述的中共言論與運作模式中，實在無法對共產黨未來的遠景有清晰的認識，於是我也就順勢批判共產黨新世代領袖養成教育，徒具西式的現代化外觀，內

在則乏善可陳。而陪同我參訪黨校的人士居然認同我的看法，讓我大吃一驚：「的確是的，共產黨幹部的培訓確實無法配合新中國社會的複雜性與時俱進。」於是他便建議我參訪另一個既可展現象徵共產黨璀璨遠景，又具教育性與「前衛性」的機構。

中國浦東幹部學院，是為了引領中共高階幹部迎向二十一世紀挑戰而設立的。該校主任表示：期待藉該校的設立，能讓中共脫胎換骨成「能因應國際潮流」的法式行政技術官僚體系（Enarchie）。一聽到對法式管理風格的褒揚，令我不好意思反駁。因為法國也正想擺脫行政技術官僚體系的束縛啊！這間幹部學院坐落於上海新興開發區的浦東，位於黃埔江右岸，那裡有辦公大樓、住宅大樓、高速公路交錯林立，帶有點美式曼哈頓都會區的風格。或許為崇尚法式行政技術官僚體系之故，共產黨幹部學院由法國知名建築師貝舒（Antoine Béchu）設計，除了可展現中共的國際觀外，又可向世人誇耀連知名西方人士也仰其鼻息的訊息。有人向我說明道，會議中心上方一整排鮮紅色的異性鋼架構，即象徵中國古代文人的書桌；垂直挺立的方形高塔，則是象徵中國文人不可或缺的筆筒。要建造這個結合美式稱謂與法式建築，所建構而成的現代古典融合體，所費當然不貲，令我不敢詢問建造這個周圍為中式、英式、法式花園所環繞的建築物，究竟花了中國人民多少血汗錢？或許這個

建築體現了共產黨所自許為是的外在形象吧。但在外在炫麗現代的外表下，實找不到任何實質的內容。中國這種盲目現代建築追求風，俯拾即是。在北京由法國知名建築師安德烈（Paul Andreu）所設計的「巨蛋」國家大劇院，也犯了同樣的毛病，徒有外在硬體設施，但無人真正關心未來到底要上演哪些有意義的劇碼。

在這個稱謂具美式風格的幹部學院裡，除了公關人員，我所遇見的人均不諳英語或是其他外語。至於學生，由於幹部學院係針對培養那些政治前途看好的中級以上共產黨幹部，但他們的德高望重已對學習興趣缺缺了。幹部學院針對那些公務繁忙的高幹，所舉辦的這些為期最多數週的培訓課程，到底有何預期目的？或許中共是為了彌補一般共產黨黨校不夠國際化的缺失，於是另立幹部學院讓這些現在或未來的高階共產黨幹部，有機會學習西方的現代化精神：大概包括在學院裡學習西方人的舉止，去除鄉巴佬隨地吐痰及翹二郎腿乘涼的壞習慣吧。為了確實領略其中精義，落後省份的幹部需與上海的大公司老闆及高級共產黨幹部實地交流互動。透過中國與現代之激盪，尋找最佳的模仿之方。實習期間，共產黨幹部學員需到處參訪企業及行政部門，領略「先鋒管理」之道。「先鋒」這個字眼政治意涵十分正確，但對學員而言，「美式管理」似更為精準。由於中共對美國管理模式明貶暗褒，每個人蜂擁學習美

國化的外在舉止外，亦對美式管理風格趨之若鶩。

難道中國內地落後省份的市長，對幹部學院的奢華與上海企業及公部門的繁華不會感到屈辱？幹部學院的主任似乎遺忘馬克思奴役理論而答道：「事實正好相反。」對內地落後省份幹部的震撼教育，是為了要激起他們奮鬥學習上海及浦東精神的意志。幹部學院就如同毛澤東時代，所慣用的毛式共產教育風格之樣版村莊與工廠。昔日是推崇大慶油田艱苦創業的「鐵人」精神，而今日則鼓勵抄襲浦東之美式管理階層風範，惟獨毫無任何鼓勵自我思考與自我檢視的課程……。

我對這些共產黨幹部承平時管理社會活動的能力實感憂心。有人要我放心，因為共產黨什麼都設想了。如位居上海門戶的樣版村莊——吳江市，共產黨幹部對農民請願與現代衝擊的管理之佳，更創造「和平共存」之美譽。這也是學院幹部學生學習參訪的必經之地。

學院主任順道對我提出發表幾場演講的邀約。正當我思忖該談論哪些主題時，他卻告訴我談論什麼主題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可讓那些內地省份的幹部近距離觀察一位知名法國演說家的風範即可。顯而易見地，西方演說者在中國的作用是觀賞用的花瓶，而不是交流傾聽的媒介。於是我回答道，與其盡心演說內容的準備，屆時我會更用心擇選適當的衣著。我也藉此下個結論（或許下得有點快）：中共所夢想建構的未來與昔日相

同，就是依然故我而沒有未來！

重尋昔日統治合法性的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本身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追求昔日統治合法性的過程。在中共官方版的源頭論述中，共產黨可是籌組愛國運動，對抵擋日本入侵及打擊國民黨貪腐，不遺餘力。但事實上，毛澤東的軍隊可是竭盡心力避免與日軍正面交鋒，以免造成共軍過多傷亡損失。1949年，中共奪得政權，重建社會秩序並允諾實施民主。那時就連深受蘇聯殖民切膚之痛的東歐國家之自由活動主義者們，也紛紛響應中共，深信中共會遵守舉行自由選舉之承諾。但毛澤東獨斷獨行稱：中國無須以蘇聯為師，以獨裁政體進行現代化，並以荒誕不經的「大躍進」及「大煉鋼場」理論，將中國陷入萬劫不復之境地。「成功解放全國人民」及「創建現代化國家」後，毛澤東便思忖發動文化大革命鞏固中共統治的合法性。我們對文革是如何摧殘知識分子與中華傳統文化，至今仍記憶猶新。直到毛死後，文革始停。鄧小平繼任，藉鼓勵個人致富，開啓鞏固中共統治合法性的第四階段。

經濟發展是否能確保中共，找到其日思夜想永恆統治中國的合法性？那些輕忽中國人民自由與正義渴望的西方人，似乎相信中共將可藉此永存。宗教請願之聲此起彼落、深受劫掠之

苦的農民及失業者示威頻仍、知識分子的大字報到處可見，令中共體認到全中國尚有 2/3 未能享受到經濟發展帶來之利，認定經濟發展仍待開發。於是中共便另激發人民的民族主義意識，作為鞏固共產黨統治的第五個合法手段。而民族主義總是在國家處於戰亂時刻，最為鼎盛。

如何激發中國人的愛國意識？中國人是很少有愛國意識的。由於久受農業傳統的帝國統治，每日關心的是自己的家人、親朋好友、家鄉與土地。中國人民天性偏好永恆不變之定律，毫無犯他的侵略性。即使數世紀以來，中國經歷多次外來移民的融入，就算是離鄉背井的中國人，依舊保持其原有之習性，對個人或家庭幸福仍十分執著。自 1840 年的鴉片戰爭後，這個夾雜屈膝凌辱與復仇血恨情仇的愛國主義意識才逐漸在中國知識分子中蔓延開來。這個仇外的愛國主義意識紅線，與中國近代史及中共史緊密相連。中國雖為主權國家，但在十九世紀末時，卻遭西方列強的割據佔領，而幾近瓦解。於 1897 年擔任法國福州領事的克洛德（Paul Claudel），在其外交信函中便將中國描述為「如同『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的一具待支解的屍體」。這字裡行間亦透露了這位負有拓展法蘭西帝國版圖任務的克洛德領事之憾恨與狂喜心態。

中共官版歷史及教科書中，只是一面倒地將中國近代所遭受的不幸，怪罪西方帝國主義，而毫無自省批判。在共產中國

裡，從沒有人會問：為何中華帝國會這麼容易成為西方的刀俎魚肉？中國領導人執行現代化的昏庸無能及貪婪腐敗，又該負什麼責任？反其道而行的是，只要是仇外的愛國主義活動，無論是1900年的義和團或是1949年「解放」先賢，均被奉為救贖中國之典範。中共反美日，是為了洗刷昔日屈辱怨氣。但反台灣，則是將台灣打成不採行共產主義的民族叛徒。因為在中共眼中，唯有共產主義始能代表國家與民族。

現在問題是，如何讓中國人民認同這段拼湊的歷史。褒揚某一意識形態，需有歷史聖地相搭襯。對這項新型民族主義，起始地是在延安。我們可別忘了2,200年以前，中國第一個一統帝國的首都便是在延安，而延安還是由那位在人類歷史享有專制血腥獨夫名聲的秦始皇所指定！

愛國民族主義的虛擬

自從毛澤東神話破滅後，秦始皇傳奇似乎日久彌新。八〇年代，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上，來自全中國的朝聖者及學童們有時需排上數個鐘頭，甚至數日，只為在短短的幾秒鐘，繞行這裝載昔日偉大舵手的玻璃靈柩。在守衛的催促下，行列隊伍彼此簇擁，根本沒時間觀察死後的毛主席與在世的毛主席實相距甚遠。有人說，因為蘇聯防腐技術不夠先進，致毛主席死後尊容青白變樣，儘管此與他生前的身體狀況無涉，但敗筆確實

是在額頭上。這座北京陵寢現已成穿堂風處處的冷清宮殿了！

現在同批朝聖者與後代子孫已紛紛趕赴西安。這個位於中國中央西安的第一位帝王的巨型陵寢，正是考古學家與建築師們所修整與重建成的。現在這裡可成了衆多中外旅客必經之地。

中國每個公共紀念性建物均有政治意涵。秦始皇陵寢一望無際及誇耀鋪張的陳設，均為了要強調他自身所代表的歷史合法性。文革之父與之相比，根本小巫見大巫。而秦始皇的泯滅人性比之毛澤東，也有過之而無不及：秦始皇或許是出身蒙古或西藏蠻夷之後，好戰尚武，於西元前3世紀，便完成中華帝國一統大業，宰制全中國人民。他犧牲百萬奴工，只為建造北部長城；焚書坑儒，只為營造始皇元年之虛榮；強迫中國各種各族，認同炎黃子孫，編製大漢民族之神話。死後，除數以千、萬計的士兵與奴婢被迫一同殉葬，伴主同赴陰曹地府外，另建造兵馬俑隨行護衛。

九〇年代，中共比照蘇聯及北韓用巨型物裝飾共產主義紀念碑的作法，在秦始皇陵寢外蓋一系列花崗岩大理石材質的廊柱。為增添中國始皇帝全國性的崇仰魅力，幾乎成為北京政府御用導演的張藝謀，更拍攝一部史詩般的電影《英雄》，惟宣傳意味過濃：影片所呈現的秦始皇為完成一統中國大業，而為其宿敵們所景仰，不過身處其中的中國人民似乎仍懵懂未知。

當遊客們造訪西安，體驗中國文明的偉大時，更顯自身如螻蛄般渺小。儘管西安充斥著中國法西斯主義，但並不妨礙遊客競相拍照留念的興緻。我一時迷失在歷史思考的洪流裡，並對那座白色巨型的秦始皇雕像感到難以忍受。突然間，人群裡有一位諳英語的導遊低聲向我說：「秦始皇根本就是史達林！」話畢，一溜煙，人就淹沒在觀光人潮之中……。

秦始皇雖為中國永久統治之象徵，其實也代表著群雄並起的不穩定朝代。他雖矢志創立流傳「萬代」的帝朝，但死後2年，他的後繼者已被推翻。此後，中國帝王朝代總共輪替了26次，而且還是經常遭非漢族的蠻夷所統治，或許中共要好好的思考一下，與這位帝國創建者保持距離吧！

尋找替罪羔羊：日本

2005年春天，日近天安門起義事件15週年之際，如同每年的例行活動般，外國記者可看見公安進進出出，好不忙碌：任何團體，或是一小撮人聚集，均會被驅離，禁止靠近天安門廣場。年復一年，中共依然對任何悼念活動戒慎以對，深怕重燃民主運動之火苗。但16年來，天安門廣場上的少數集會活動只能集結到法輪功信徒，如今只有香港仍有一些人持續悼念六四鎮壓的受難者。

倒是北京、上海與深圳的學生隊伍，高舉反日旗幟，遊行

街頭的景象，令人十分吃驚。他們攻擊日本領事館、搗毀日本品牌的產品（儘管這些產品在中國製造，為中國人所擁有）。他們是否真如媒體所稱均是學生？對我而言，他們十分年輕稚嫩，而周邊鼓動促擁的幹部們又嫌過於老成。這些真是自發性的抗爭示威活動嗎？官方說法路人皆知。中國的仇日組織當然可以透過網際網路與行動電話，號召有志之士一同共襄盛舉。但中共以管控嚴密著稱，連電郵也不放過，怎麼可能會讓這些活動者自由籌組而事先毫不知情？在鎮暴公安溫和關懷的眼神監視下，反日示威活動順利進行，而無任何出人意表的事件發生。沒有任何示威者遭逮捕，「學生們」示威完畢後，便井然有序地搭載等候多時的公車離去。事發後3個禮拜，中共終於現身呼籲終結抗日亂象，要求校園老師停止學生放蕩不羈的抗議行動。而抗日示威活動如同之前發動時一樣，突然也「自發地」嘎然而止。

在中國各地，通常人民並無示威習慣，或者遙遠省份所發生的示威活動根本也無人關心，因此中國示威活動倘能聚眾到2,000人，其震撼力就十足了。派駐北京的外交官與記者，都對此次示威感到十分好奇：民衆的自發參與和共產黨的暗中介入，究竟有何關聯？共產黨是示威活動的幕後黑手，或是安撫中國民間仇外情緒的調節舵手？還是我們參與了一場脫離共產黨擺佈的公民社會活動？

上述中國觀察家所關切之議題的結論，實令人吃驚：以中共監控之嚴密，任何仇日示威抗議活動絕不可能不在其掌握之中。仇日示威活動劇本是由共產黨所擬定的，仇日訊息是要傳達給全世界的其他國家，而非中國內部的人民。這個訊息十分單純：中國人民已十分憤怒，還好中共發揮中流砥柱作用，控制情勢。因此，西方在擔憂中國民族主義高漲的同時，也要思考支持一個能安撫人民仇外情緒的中國政府。所以只要中共在中國永久執政，無論是對中國、西方與日本人，這簡直是兩全其美。假如中共倒台，法西斯主義與兵亂戰爭可能席捲亞洲！那時西方媒體，特別是法國，可會自嚐苦果。因為西方專欄作家可是堅信，中共能在亞洲發揮維持秩序並壓制人民怨怒之力量。

對反日示威期間待在中国的西方人而言，一定能感受到中共宣傳部門操弄手法之高超：只要上網漫遊，就會看到反日標語與南京大屠殺的可怕畫面。中日第二次戰爭係發生於1937年的南京（第一次發生於1894年），依據中方的說法，日本軍閥冷血屠殺近30萬無辜的中國百姓。在中國各大城市裡，都舉辦紀念南京大屠殺的圖片展。日軍揮刀殘殺中國幼童的可怕圖像在中國的教科書隨處可見。北京國立歷史博物館的海報則強調，日本軍閥屠殺30萬中國百姓，而非日方所稱的24萬人。正當仇日示威活動趨緩平息之際，北京政府又掀爭議，將12月

14日訂為「南京大屠殺的序日」，供全國民眾悼念。而日本並不否認大屠殺存在的真實性，只不過日本史學家對受害者人數及當時發生的情境尚有異見——其實無論如何，這些罪行都無法輕描淡寫。而正當反日示威活動到達高潮，電視新聞上居然看不到任何一則南京大屠殺或是中共解放軍戰勝日本法西斯主義的相關報導。我們需正視此一事實：毛澤東沒有向日本宣戰，反而是在中日戰爭期間，藉保留實力，完成奪權統治中國之目的。

除了操弄中國人民之外，中共到底還想達成哪些訴求？雞年抗日示威活動肇因於日本歷史教科書想淡化南京大屠殺的殘酷性。而這本教科書根本從未問世出版過！但如今有沒有出版已經不重要了，日本歷任領導人及天皇經常為昔日在中國犯下的罪行，被迫向中國人民致歉。惟中共領導人認定日方致歉誠意不夠，所以中方媒體根本從不報導。中國民間則以訛傳訛謠傳「日本從未承認南京大屠殺的罪行，而且日本教科書也根本否定大屠殺存在的事實。」凡此，對無法上網搜尋的中國人而言，根本是三人成虎。中共指控日本「拒絕面對自己的歷史」。這個指控居然出自中共口中，令人有不知今夕是何夕之感。無論是中共或是中國人，不也從來都不曾面對自己的歷史嗎？就在2005年8月紀念「中共戰勝日本法西斯主義」60週年之際，一署名余杰的作者，在香港媒體指稱：「毛澤東雙手所

沾滿的血腥，可比日本軍閥還多！」

日本人的確沒像德國人一樣那麼反省，但日本也拒絕被類比成滅絕人性的德國納粹。事實上，無論是日本的帝國主義或是南京大屠殺罪行，都無法與德國納粹主義及滅絕猶太人的至惡相比擬。而且，日本也經常透露鉅額經援中國，係為彌補過去對中國所造成的損害。但中共則駁斥：這是不夠的！永遠都不夠的！因為除了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樑子外，在近代歷史上，日本的罪在於使中國被塑造成卑躬屈膝的形象。日本這個彈丸之地，自偉大的中國引進了文字、佛教、建築、宮廷文化後，融合東西方之長，蛻變成具有特色的現代化國家。且日本未經革命與內戰蹂躪，沒有一黨專政，國家發展運行良好，也無須藉憑空想像外在敵人，來團結人民鞏固人心。凡此種種，對於中國偉大的領導人而言，這是難以接受的。中共領導人對此焉能不生氣呢？假如中國人民知道歷史真相，應不會這麼憎恨日本：如同雞年的仇日示威活動期間，仍不乏有許多教授挺身指控共產黨操弄歷史，阻止學生們走上街頭。北京一位學生告訴我說：「我憎恨日本，但我不知道為何如此？」然而，在中國有許多知識分子千方百計想進入日商公司就業，也有為數約50萬名具職業技能的中國人旅居在日本。

或許一個民智較開發的中國，較不會動輒仇外吧。而這並不符合中共的統治利益。共產黨掌控憎恨日本這條緊箍咒，可

動員仇日的愛國意識情緒，成為永久宰制中國的第5個合法性基礎。為什麼挑日本，而非美國呢？攻訐日本，風險成本較低：頂多日籍觀光客不來，日商投資停滯，而且自有其他人會陸續取而代之。假如挑美國的話？美國或許是個危險的敵人，但其支持與否也牽涉到中共能否「和平崛起」的關鍵！這當然是指太平洋地區……。

中共虛晃的替代方案：新儒學主義

「當共產黨瓦解後，民主並不會取而代之。相信我有阻止此事發生的能力！」發出此語的潘維，年紀雖不到40歲，卻是北京清華大學社會科學院的教師，但我並不認為他的能力有大到可以影響歷史潮流。不可諱言，毛澤東發跡前也僅是個圖書管理員而已。在清華美式風格的校園中，大部分的學子穿著酷似年輕的美國佬。他們絕大部分想赴美國留學，海外就業。每年約有60萬名中國學子負笈留美，但只有半數不到的比例選擇返國就業。同樣這批學生也興致高昂參加返美示威活動：因為教科書將美國描寫成十九世紀英法殖民帝國野心橫行的背後藏鏡人。中共似乎已針對未來的中美對抗局勢先預作準備了。

潘維在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留學近10年後，毅然決定返鄉報效祖國，可說是中國新知識分子中的代表。但他本身卻深陷於眾多外在矛盾的誘惑之中…「在美國學習可能在中國學以致

用的學問」後，潘維衣錦還鄉，並發表〈民主迷思〉，批判中共與民主。潘維說：「民主根本就是脫序亂象。」在中共文宣部大力宣導下，這種信念可說在中國俯拾可尋，比比皆是，可算是宣導得利，功勞一件！他語氣堅定地說：「民主造成了俄羅斯、印度、菲律賓、印尼及台灣的脫序亂象。」那日本呢？他答稱：「日本雖井然有序，但非是民主國家。」無論俄羅斯或是日本，這些國家在他的口中像是張遊戲用的撲克牌，無任何實際確實之含意。在中國，我們經常聽到：俄羅斯之所以陷入萬劫不復境地，肇因於太快施行民主制度，且不應在經改未成前，先執行政改：這些似是而非的論點，只是用來堵住世人的嘴，強化中共固有信念而已。

我這個對話者坦承，不喜與人討論：儘管這是所謂新儒學思想信徒的風格，但我還是不想入鄉隨俗。孔子厭惡歧異與譏諷，而潘維臉上則冰冷毫無笑容。

潘維說：「共產黨是該離開權力的時候了！原因有二：首先是貪腐，這是中國傳統亂象的極致表徵。其次是經濟模式不當，造成中國經濟成長遭西方所牽制。」潘維指著電腦說，這是由中國勞工所拼裝的，但卻要靠美國的軟體才能運作。他說：「假如我們仿製這套軟體，美國會研發功能更强的軟體來抵制盜版軟體。」為讓中國達到西方創作力之水平，「中國人民需要自由及批判精神！」對此，我們心有戚戚焉。但他頌揚

自由後卻摒棄民主，可令人百思不解……「在研讀西方政府組織之後」，潘維結論是：「西方的優越性並非植基於民主之上，而是法治奏效。中國人將法治與選賢與能的模式搞混了！中國是應實施法治的，但透過選舉選擇領導人到底有什麼好處呢？既然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使用更具效率的科舉制度，足讓優秀人才學而優則仕啊。」

民主或許無法擇選出最佳的人才，但至少可以調合偏見思想及以和平方式排擠政敵？潘維雖認同我的論點，但並不認為此適合中國的國情。「中國人民同質化高，不像西方階級區分嚴明。」多數與少數的概念無法在中國適用。藉由選舉制度在社會團體中權衡折衝，或許在西方有用，但在中國則顯多餘且不必要。

潘維說：「看看我們周邊這群優秀的孩子們，來自中國各地各個階層。他們犧牲青春，通過大學聯考，只為來此就讀。」他們就是未來的領導者，根本無需經選舉程序。但是他們所歷經的考試，只是驗證平日學問之累積，並無個人省思或是批判精神！而課堂上也是如此：老師無法容忍學生異見，學生也就無參與意願。中國大學殿堂所製造的是高效能機械，而非培育有創見之個體。

潘維仍不為我的批判所撼動。因為他將社會視為領航機械，而非七情六慾的身軀。他的菁英論述計畫顯然與科舉制度

緊密相關，如同法國漢學家巴拉斯（Etienne Balazs）所描述的統治中華帝國之「天朝上國官僚體系」。這個體系以儒學思想為本，掌握極大權力。巴拉斯描述道：「沒有了這個官僚體系文化加持，中國文明或許會黯然失色。但中國人民倘能個別生活時，是否會發展的更好？」我們可無窮無盡地探討「天朝上國官僚體系」優劣得失，但這畢竟僅限於封閉的世界裡，一遇到外力衝擊，如1840年，即樹倒猢猻散！

清朝瓦解後百年的今日，還有人自稱是新儒學主義的信徒？潘維所依仗的這個意識形態，只有中國的學術界、企業老闆與共產黨領導們可接受。可憐的孔夫子幾度起落，曾為中華帝國立基，後被毛澤東貶為中國落後之源，再被鄧小平所平反！如同馬克思從不會認為他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一樣，帝國儒學思想與現在流行的新儒學思想，都尊崇孔子，但究竟哪一個孔子，才是真正屬於中國本土思想？

早在清朝初期（時值西元十七世紀），曾有第一波反清意識文人所組的新儒學運動，反對滿清帝國的統治。而這些新儒學主義者，曾盼藉孔子學說，註解君主良善行為準則及尊重地方自治精神。套句現代術語來說，這個反清活動還頗具自由精神精髓，尤其清朝對統治中國的效率十分自信！因此，現代民主主義論者常舉此為例。但對「新新儒學主義」潘維而言，新儒學主義僅保存孔子的道德觀與階級論。「新新儒學主義」其

實源自美國，此學派的代表性人物通常是任職於美國大學的漢學家，如哈佛大學的杜維明教授，以及哥倫比亞大學的巴利（Theodore de Barry）。新儒學主義者自美國學習理論基礎外，並由美國右派分子將之完備化：按潘維「專制主義化的孔子」論述，其實是翻版自美國新保守主義者「基督至上」之主張。他們均主張道德主義與政治神學。中國的新儒學主義即是美國的新保守主義，它是中國除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以外的第3種選擇：在這旗幟掩護下，較無風險，可反對中共、批判貪腐（每一中國人都如是作），以及將自由主義打壓成外來物。它也可讓中共這批新秀官員規避民主，因為實施民主勢必會將治權，交給那些同受中國大學教授與統治階層鄙視的無知野民。

事實上，潘維主張的由考試擇選專家統治的論述，在法國也是如此……但這些專家們由誰來領導？在這個既非世代相傳亦非民主自由體制下，如何找到稱職的老師？潘維認為，孔門的弟子——孟子提供了3種方法值得現代中國參考：一、君主是由一群睿智賢達所指派。潘維應會擔任引導這群賢達之責吧。他雖年僅40，但一付道貌岸然的智者模樣，展現出沈穩老成的一面。二、由在位者指定繼位者。對此我則異議道：「自行遴選不已是共產黨的常規嗎？」潘維回道：「由於創黨者毛澤東奉行馬克思主義，而非新儒家主義，因此成效不彰。」毛的錯誤即是「將外來思想引進中國」。第三、透過政變，以賢

主取代昏君。顯然不想因此入獄的潘維答道：「因為中共並非完全昏庸無能。」它有效維持了社會的穩定，一統中國，並獲得國際認同，因此第3種方法並非必要。而且從共產主義轉換成新儒家主義的權力過渡時期，仍有待籌劃。

完美的「權力過渡」模式，則是共產黨領導自發性引退，由睿智賢達接棒替代。由他們所指定的明君，引導中國擺脫不必要的意識形態及公安軍警箝制的牢籠。由於人民的認同，這位明君無需保衛政權：基於國家經濟考量，實施私有財產制；公部門，則採行西方的規劃經濟制；而且不再害怕言論自由，無論新聞、宗教、結社等自由均將開放。

上述完美計畫，應是以全中國人民均有同質想法為前提。不過，中國人民是否真與西方人民不同？潘維對此則深信不疑，因為中國社會係以建造道德共同體為己任。

假如在這個新儒家體制下，出現異議分子該如何處置？潘維答道：少數團體是難以根絕的，如果遇到明君，他們將永遠是少數團體。一旦他們日益茁壯，就表示這位明君尚有不足之處。而新加坡的李光耀家族，即是新儒家主義的最佳捍衛者，其反對黨在國會的勢力僅剩一席。向北京舉新加坡為範例，簡直是污辱「偉大中國」。潘維對此則默不回應。

我們對話愈趨尖銳。幸好我們達成下列共識，讓彼此均有下台階而禮貌道別：一、中共讓中國結合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

這兩大最壞之物。二、中國未來3種可能的發展模式是：共產主義永續、自由民主、新儒家主義。惟潘維所定義的新儒家主義，等同於歐洲的法西斯主義：他們的信徒均認為國家秩序的維持超越個人民主的選擇，並強調道德與貞潔之重要性。新儒家主義真的比社會主義或自由主義更中國化嗎？潘認同此說，但其真正目的是為了癱瘓任何批判。我們來賭一賭，奉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中共終將會把新儒家主義納入。因為它與民族主義同是中共的偽裝面具，是另一項較不具威脅性的選項。

毛澤東主義的懷舊情懷

我們應將河清歸類為民族主義者、新儒家主義者或是左派分子？中共將之視為左派分子，但他以保守派分子自居。他的哲學短評曾於法國及香港出版，目前在杭州教授藝術史課程。河清對中共政權的批判十分嚴厲，他認為中共領導者與外國企業透過魔鬼契約沆瀣一氣，圖利少數，犧牲多數，摧毀中華文化。儘管他的言詞浮誇，但頗能反映文革後所出生之文人世代的心聲。因此我們需聽聽他的想法。

他結合少許儒學、一些馬克思思想、以及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與美國未來學家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兩位當代大師解構權力之主張，來分析中國現

狀。自美國杭亭頓的論述，河清借用其「文化衝突論」來說明。相信各民族會往全球和平及民主共識邁進，可能太過一廂情願。尤其世界現狀充滿文化歧異，對抗也就難以避免。特別是杭亭頓認為中美之間，實難免一戰。中共將中國推向世界經濟開放，無視中華文化的特殊性，硬在中國實施資本主義，根本就是犯了反抗固有價值觀的滔天大罪！固有價值觀到底是何指？河清認為，西化導致物質個人主義高張，損害他人，而中華文化並非立基於個人自私的效率上，而是重視主體間的互動關係：儒家特有的家庭、團體及民族的倫常互動關係。接受全球化的主張，會令全中國人精神分裂：每人被迫學習西式效率典範，而內心深處，則根本是完全的中國。為了吸引美元資金，中共幹了出賣全民族靈魂的勾當！

河清也引用社會學家布迪厄的「陰謀論」指出，全球化並非自己出現，而是嗜利的資本主義有心人士強加於中國的。但中國人民不是有從中獲得好處嗎？河清回答：「這些好處只是城市居民獨享，偏遠地區的農民根本無利可圖。」少數得利的特權分子，對中華精神文化所造成的傷害，根本難以估計！不過，難道中國沒有因此而進步嗎？對此，河清駁斥西方進步概念。他認為，中華文化是植基於和諧，而非進步之上。西方人於十九世紀將進步概念引入中國，讓所有中國人感受落後之恥。此後，中國菁英不停地西化，期能迎頭趕上西方，但這根

本是場自殺式的賽跑！為治癒中華民族的精神分裂症，揚棄激進式及物質化的意識形態，會比起唾棄中共來的適切。而讓河清對中國不幸命運深感悲痛的是，中共不僅是個物質主義及激進主義的政黨，而且還是否定自身文化與精神傳統的徹底共產主義者。

河清認為，雖無法改寫中國歷史，但至少可終止中國現行發展方向。透過文筆，河清積極鼓吹中國應實施鎖國政策，重視固有價值觀及內部市場。所言甚是，但該如何著手進行？

採行民主？河清認為，中國人不知民主為何物，他們的需求並非政治性，而是心靈層面。但所謂中華固有的價值觀究竟何指？它們是亙古不變的嗎？在河清眼中，中華文化即是儒家思想，而道教與佛教則屬「迷信」。他傾全力重建其心中理想的政體，但他的典範居然是毛澤東，令人感到驚訝！或許是因為毛重視農民發展、主張經濟自主且憤世嫉俗的國家自主論吧。但凡此種種，僅限於口惠而實不至。實際上，毛澤東甚至是犧牲農民，想讓中國成為工業強國！毛雖失敗，但其後繼者卻成功了。這位年僅40的學者，居然會把毛氏傳奇與毛氏主義的真實歷史混為一談，讓人難以理解。

混淆錯置的事例還不只一端呢。無論是那些懷念美好過去年代的懷舊主義者，還是那些號稱民智開發的知識分子們，也是如此。或許這才是河清所批判的精神分裂症吧。這個精神分

裂症還不至於讓中國人民在固有的集體價值觀與追求個人主義化之間，過於撕裂。但它卻讓中國新世代的菁英分子拒絕面對自己的歷史。中共反對誠實面對中國歷史的行徑，只會加深並惡化這個精神分裂症。我們同意河清所言，精神分裂症無論是對民族或個人，實在是一令人感到痛苦的疾病！

共產黨的末日

中國所呈現的整體形象，並不協調：中共文宣影片所強調形塑的是成功、進步、穩定及和諧，但影像卻是經濟躍進、暴發戶新貴及悲慘平民交叉呈現。當影像出現貧苦的農民、百受凌辱的移民、遭排擠的勞工，以及孤獨老人與病人時，影片都以「我們正處過渡時期」一語帶過。這不正是昔日導致中國帝王遜位時所呈現之民心渙散的景象？在中國最後一個朝代——清朝統治下，當宮廷故步自封，緊守儒家教條時，人民卻在經歷22個帝王統治世紀後，首次於1912年以行動表達支持共和體制的決心，向現代大步邁進。

假如悠久的中國歷史可為殷鑑，中共應當坐立不安。22個世紀間，中國共有26個朝代均因暴亂而相繼殞落。中共內鬥史比起中國歷朝史，可毫不遜色：自掌權起，中共領導不停轉換路線所引起的內部鬥爭，遠比社會動盪來的嚴重。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十年改革等所體現的中共內部政變型態，到底何時

能終止？1979年以來所採行的路線有維持至今否？由於中共內部係採共同指定領導而毫無章法，派系傾軋一蹴即發，讓我們不得不心存觀望。倘若路線持續維持？但此並滿足不了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期望。中共內部現存反對自由經濟的左派勢力，以及反對道德美國化的民族主義勢力二大派系。而這兩大派系的權力鬥爭之激烈，根本毫無協商或妥協契機。中共與人民間的關係，也是如此，因中共所特許的鄉村選舉及請願辦公室等二種讓人民表達心聲的方式，並無法回應人民實際需求。中共具有不喜且不願傾聽與妥協專制的特質，根本無法與時俱進。他只知以鎮壓、禁止與囚禁等手段因應。如同1930年毛澤東所言：「槍桿子出政權。」我看中共也只剩槍桿子可用了……。

中共與人民間的短程競賽關鍵在於：重新分配經濟成長的收益，是否會平緩人民請願之心？然而缺乏民主制衡機制，貧富差距也可能日益加劇，富者愈富，貧者則一貧如洗，生活絕望。只消一地方性抗暴事件、銀行倒閉或傳染惡疾等星星之火，即可讓百萬中國人挺身要求中共下台！屆時解放軍將如何因應？中國人的苦難不會因一個天安門屠殺就畫下休止符，反而會在每一個城市中陸續燎原，數以十計，甚或千計。中國流亡美國的民運分子魏京生認為，屆時解放軍將不會再以槍桿子指向人民了。1989年，解放軍雖由中共指揮，但其屠殺人民的指令曾讓下令的軍官與執行的士兵意見紛歧。假如再發生一次

抗暴事件，可能會讓解放軍離心離德。但如同毛澤東的至理名言：在專制體制下，不開槍者即死！正如當戈巴契夫對下令屠殺波羅的海四小國及東德示威者顯得猶豫不決時，其實已敲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喪鐘！西方昔日對蘇聯此一發展，竟然無力預知，亦缺乏深度研析，而今面對中國居然也持相同輕率的心態。為何法國會對中共如此友好？或許是因法國自身也有崇尚專制的意識形態作祟所致吧。

法國「戀中癖」的意識形態

中國檔案依舊塵封，照片稀疏，影像無存：中共在二十世紀大肆屠殺同胞的惡行依舊渾沌未明，尚未引起普世良知注意。因此，法國對中國的迷戀依舊，稱不上與時俱進。法國歷來的政府，拋開天安門外交陰影，已將昔日對中國帝王的愛慕之情，轉移至中共身上。中共也因帶給中國和平與繁榮，普獲國際信任。惟法國領導人似乎對中共藉警察治國，或利用人民害怕內戰再起的弱點達致上述目的之手段，毫不關心。如同法國漢學家貝菲特在1995年所言：統治這麼龐大的國家，只能採行鐵腕政策。而大多數中國民運分子目前所期盼建立的中國邦聯制，他也根本毫不在意。對於中國民主此一議題，自詡漢學家的前法國總統季斯卡（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於2005年對上述既實用且具文化面的建議，也持反對立場道：「中國幅員

太廣大，可能不適合採行選舉制度。」及「多神論的中國人根本不知個人自由及民主為何物？」一聽到法國前總統竟出此言，我們是否也要禁止加拿大人、巴西人在幅員太過廣大的國度中投票呢？是否也要以印度多神論現象比中國更為顯著，而禁止印度人實施民主制度呢？面對中國時，法國外交圈通常會以尊重文化差異性為基調，中國人與法國人不同，因此不會強力要求中共要尊重人權。這種愛慕中國，卻又輕視中國人民的「文化相對論」現象，在法國漢學界可十分常見。自3個世紀以來，法國漢學界對這個所謂「恆久」中國可一直不停地表達敬意。

法國漢學家沙瓦納（Edouard Chavannes）、卡內（Marcel Granet）、馬斯培洛（Henri Maspero）、德艾米勒（Paul Demiéville）、巴拉斯（Etienne Balasz）等曾出版許多有關中國思想的鉅著，但卻被晚學後輩們抽離其中的歷史意義，而變成考古學。在法國大學裡，我們只對比利時漢學家西蒙·雷思自澳洲所逡譯的孔子《論語》在文義上爭辯不休，但卻忽略探討孔子對中國的影響。2005年，在法國既稱不上哲學家，也不算是漢學家的朱利安（François Julien）寫道，假如不瞭解儒家，就無法瞭解現今的中國。的確，假如我們對基督教義毫無所悉，實在無法瞭解法國。但我們熟讀卡多內神父所逡譯的《新約全書》後，便可瞭解當今的法國嗎？而整個中國是否亦已被

孔子《論語》所涵括在內呢？

法國漢學家通常由那些文學語言系的專家兼任，他們是否又過於神通廣大？我們是否可單靠語言學習，就可瞭解美國或德國呢？

的確，除上述「學院漢學派」外，最近尚有另一種「務實漢學派」產生，其代表性人物為辦文幹（Jacques Pimpaneau，李天祿友人）、侯芷明（Marie Holzman）、多蒙納克（Jean-Luc Domenac）等。他們知道如何分辨「歷史中國」與「現實中國」外，亦瞭解「文學中國」與「社會中國」之差異。但這個新興漢學派尚未能在法國政學界裡找到知音，覓得如前一學派代表貝菲特般同具影響力的代言人。整體而論，法國外交政策基本上是依循「學院漢學派」思維而行。這半個世紀以來，無論是對法國左派或右派外交政策均影響甚鉅的戴高樂主義傳統，即較注重國與國之交往，而忽略人權價值的重要性。此外，法國除在所謂「尊重多元文化差異性」阿諛中共，同時並將捍衛民主及人權等普世價值的任務，盡棄給美國大老粗去負責。

幸好，鑽研社會學、經濟學、人口學、生態學、神學等新興世代對中國興趣高昂，學習中文熱潮也日益普遍，讓研究中國逐漸不再是文學系的專利。惟專研中國社會現實風潮則在中共蓄意阻擾下而進度遲緩。基於愛慕儒學的漢學家，有利中共維持專權體制，將永受北京歡迎。而那些對中國現實社會過於

好奇的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或他們的學生們，在中共刻意封殺下，將無法在中國工作，只能轉赴台灣或香港另謀生機。同時，中共監控記者言論十分嚴密，只要膽敢批判北京，或揭發醜陋實情，即被驅逐出境。此外，中共審核記者報導並向報刊主管施壓，逼得這些主管得自行過濾報導，以避免觸怒北京，並從中獲取經濟利益。直至2005年12月間發生中共武警開槍鎮壓廣東汕尾東洲抗議村民事件後，中國人民此一抗暴事件始能再登上法國報刊的頭條新聞。更遑論那些支持中國民主及人權的政治學者們，可更難獲得入境中國簽證之許可了……因此，法國學院漢學派與中共，基於共同推崇古典漢學，一致漠視現實中國之理念，自然永存某種聯盟關係。

如同法國總統席哈克2005年參訪北京時曾表示：「在中國，時間步調比起其他國度慢了許多。」這句美麗詞句除肯定了那些親北京的學院漢學派外，並讓中共據以作為「以拖待變」的藉口。鄧小平早已說過，要評斷共產革命之成果，現仍太早。倘遇有人批判北京，中共官員會異口同聲的以「中國正處過渡時期」而虛應故事。只不過這個所謂的「過渡時期」似會永續地存在。中共與法國學院漢學派間「以拖待變」的默契，讓我們無法純以意識形態來評判。在對伸張人權價值不甚熱中的法國，連左派現實社會主義者魏得林（Hubert Védrine）亦擔憂中國假如實施民主選舉，恐會選出比中共對世界秩序更具危

險性的民族主義者。而這個普受法國左派社會主義者認同的論點，似乎傳達中共並不危險的訊息。但無論是對生活在恐懼下的全體中國人民而言，或是遭北京兼并的藏族、維吾爾族而言，甚或是對那些北京聲稱主權擴及台灣、南韓、越南等鄰國而言，中共難道不具危險性嗎？在中國成立一個民主政府，到底會在哪些層面產生更令人害怕的後果？

難道法國無論左派或右派，均較喜歡開明專制，而非自由民主嗎？到底中國人與西方人有哪些不同，以致於無法享有自由民主呢？至於「過渡時期」之藉口，根本不值一提。有心做什麼事，難道還會永遠嫌早嗎？對那些一直活在過渡時期且期盼「千年幸福」的中國人民，我們究竟該說些什麼？請他們稍後再來嗎？法國政學界居然會無視中國人民的存在，而贊同這個反歷史的恆久中國論述，實在令人費解！中國之演進將超乎這些「戀中癖」的想像。



Chapter 10

共和主義者

赴約早到的習慣，到處皆然，但在以保存中華文化著稱的台灣參加晚宴，尤需早到；但李昂卻遲到了……。

我與李昂相約在台北市中心一家既吵鬧又通俗的酒吧相見。在這裡，可呼吸到民主氣息，人們高談闊論，受訪的一方無需擔心遭到逮捕，身為採訪者的我，也無受監視的疑慮。從北京剛抵台北，突然感覺如釋重負。生活於民主之地的人們，每日泰然應對日常事務，凡事無須思慮再三，我們是否知道，這就是所謂的民主氣息？或許我們需在被剝奪後，才能體會其中之妙吧。

她終於來了。因為剛從支持女同性戀的抗議活動現場趕來，所以氣喘吁吁、眼神憤怒，頭髮略嫌凌亂。她是同性戀者嗎？當然不是，她只是為其新書遭禁而發不平之鳴。台灣女性十分時尚，惟李昂非此族類。她雖身材嬌小、清淡粉妝，充滿憤怒及諷刺的眼神，但卻魅力盡現。如今已歸籍台灣的吾爾開希曾警告我：「當心點！她可是會把你生吞活剝的。」1983年，李昂時年25歲，即撰寫《殺夫》一書，此書雖讓她一炮而紅，卻給人揮之不去的刻板印象。該書是描述台灣一名農婦被迫與屠夫結婚，嗜好強暴老婆與屠宰豬隻的老公，最終卻被老婆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宰殺了。現在，她是否仍會依據社會真實事件，撰寫顧及女性地位的類似小說？「當然不會囉！」李昂回答。「台灣的民主除讓政治鬆綁外，也讓女性在法律上

及實務上完全解放了。」她們有投票權，也可自由表達意志。「我們有關女性地位的訴求及目的已完全達到。」她補充道。但台灣男性欺瞞老婆、金屋藏嬌的惡習不是依舊嗎？李昂笑斥說：「他們現在養不起了。」心懷多妻美夢的台灣男性，如今以投資為藉口遠赴對岸，另尋廉價野花去了。現只剩女同性戀者的權益待爭取……。

李昂表示，男同性戀者在台北藝文及影視界，早已執牛耳，惟獨女同性戀者仍遭鄙視，有待撰寫新著伸張，並親赴相關主管單位抗議。「我有點孤單。」她抱怨道。因為女同性戀者往往不敢隨同現身，也怕現身後遭僱主或家人報復。

悠遊自在，女性與中華女性

捍衛女同性戀者雖號稱為李昂爭取女性權益的最後一戰，但此是否意味她先前所有其他的戰鬥都已戰勝？當然毫無疑問。生活在台灣的華人是最自由的。因為台灣除女同性戀者外，任何意見或態度均可表達或表態。但隨著李昂的新著，相信仍會有改善的一日。

我向李昂強調：至今尚有許多歐洲人仍認定「華人不知個人自由為何物？且與生俱來就是不自由。」李昂氣道：「或許有人應對『何謂人類』下個定義吧？」尤其馬希歐西（Maria-Antionietta Macciocchi）及克莉絲娃（Julia Kristeva）這兩位歐

洲知名的女性主義者，更讓她動怒。前者曾代表法、義道德良心，卻將毛澤東的中國視為夢想國度，並於1971年出版《來自中國》一書，除讚揚毛澤東為「舉世天才」及認為文化大革命只是「三年苦換千年福」的過渡期外，並對他廢除體力勞動與智能勞動的分野，達致普世平等大為讚嘆！不過因該書充斥著為中共宣傳的八股事蹟，而早被世人所遺忘了。而身為法國心理分析師及知名作家的克莉絲娃女士，則深信已從同一中國找到兩性「恆鬥」之解方。克氏將《中國女性》一書中的女主角——王女士（或趙女士），因老公在勞改營再教育而長期獨守空閨的情況，視為「解放之方」，因為如此，女主角才有在白天以農婦自食其力，晚間則蛻變成藝術家之契機。但克氏在2001年再版該書時，卻於自序中強調，「該書文中無任何字可改！」若非如此，該書恐亦已為世人所遺忘了。克莉絲娃認為，自己並無觀察到毛澤東統治的中國有任何暴力的存在。她並強調，毛澤東統治的中國或許專斷，但仍容許別人有批判空間。或許她認定中國女性解放比歐洲更徹底吧。

無論是1976年或是2005年的克莉絲娃，都令李昂氣憤不已。為何她當時會對中國女性屈服於共產黨指令，而扮演「解放的」女人角色的事實，視而不見？克莉絲娃女士雖沒有藉建造西式避暑山莊，或用中文及滿文遙譯大部頭文集以方便傳教，但卻承續十七世紀耶穌會教士「什麼都看不見」的傳統。

這點著實令李昂感到不解，也許歸咎於年少輕狂吧。1976年，克莉絲娃尚未滿30歲，才會受偏好文化大革命的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及索勒斯（Philippe Sollers）所影響。但李昂對克莉絲娃30年後，卻「一字不改」再版舊著之行徑依然感到不解：難道她一直都對悠遊自在生活於台灣的中華女性視而不見嗎？

當我談到李昂下個戰鬥訴求時，她似乎覺得有點氣餒。於是我另提議道：是否可爭取中國大陸數百萬名娼妓權益？就如同在中共所稱「具有中國式社會主義特色」的新中國，人蛇集團、公安、共產黨幹部狼狽為奸，娼妓更形氾濫複雜：妙齡女子逃離鄉間，卻只能在城市出賣靈肉為生。我們實在很想知道，這是否就是中共所謂的「社會主義」或「中國特色」所具有的特質？李昂當下承諾研究研究……。

台灣堪稱藝術寶地。身為最知名華人小說家之一的李昂並不孤單。台灣人民約2,300萬，但對文學、電影、造形藝術、美食等現代中華文化的貢獻，實遠超過人口數達13億的中國。對岸，共產黨體制只鼓勵歌詠亙古不變的中國民間創作及巨型表演。現代藝術家均於邊緣苟活，如果遇到特例，都是依賴西方為生。假如李昂生為對岸的中國女性，是否能有機會出版《殺夫》一書？今日或許可以，但25年前可絕對不行。她的下場不是噤聲失語，就是身陷囹圄。高行健流亡法國後，才能靠

撰寫小說，獲諾貝爾文學獎肯定之殊榮。今後，他如果執意要繼續創作戲劇或歌劇，也只能在法國及台灣了。不幸的是，專制獨裁會扼殺數以萬計藝術家表達及發聲的權益，而這簡直犯下「謀殺莫札特」般的罪孽啊！

共產中國不僅持續謀殺莫札特、李昂及高行健般有才華的人民，也耗費鉅資到處建造表演內容貧乏的演藝廳堂。2005年，百老匯音樂劇在上海演藝廳上演；法國建築師安德烈所設計，外型類似「幽浮」的北京「巨蛋」劇院即將完工，卻是一間毫無映演內容的空盪演藝廳……自稱愛好中華文化的歐洲人，接踵而至赴中國觀光，卻很少有人前往台北一遊。

台灣是否真具中華特質？

台灣是否會因民主化而減低其中華特質？我們是否因中國主政者陸續為皇帝、獨裁者、或政委，而認為中國已專制化？中國是否因長期受以儒學或馬克思為名的鐵腕統治而同質化，甚至偉大化；只要不認同此說者，非異議分子，即分離分子。

中共政權故意讓西方錯認「維持領土統一」與「獨裁政權」是中國固有傳統。在中共主導與西方政商名流的配合下，造就出一個招搖撞騙者：共產黨領導昔日處處破壞文化，今日卻以文化傳承延續者自居。李昂解釋道，中共玩弄詞彙，故意將中華與中國搞混：在西方語詞中，僅有一種表達方式。但以中

文，卻可將之區分成中國與中華：前者意指國家，後者則謂文化。或許如同西方政商名流所說：面對「偉大中國」時盡露窘態，害怕冒犯「中華文明」，只好對「中國國家」逢迎拍馬。這種心態正好被北京當權者利用，因台灣拒絕臣服於一個不具合法性的國家，便指責台灣背棄「中國文明」。

華人本身並不會搞混。因為不論是李昂，或是生活在北京、台北、巴黎或洛杉磯的華人，均拒絕臣服於目前北京的當權者。生活在台北的李昂學識豐富，甚至比北京的文盲統治者更中華。當然我們也瞭解，質疑中共對中華文化的專有權，是會讓高幹們跳腳的！

我們應學著區分中華與中國的不同外，更應進一步從個別的历史、語言及文化面切入觀察不同的地域：中國應類比整個西方世界，而不應把他單一族群化。中華文明就像西方文明。西方人，可以是法國人、基督徒、英國人、義大利人、猶太人或回教徒…，華人亦可指道教信徒、佛教信徒、儒學信徒、回教徒或基督徒，無論是講廣東話或是上海話（廣東話與北京話的差異，就如同法語與義大利語般）。李昂堪稱為真正的華人，她在台灣出生，諳華語（華北語言）及台語（華南語言），儘管主張無神論，卻相信鬼魂的存在（正如同她所說，這是普遍現象，尤其在農曆七月尤甚），而身為現代公民的她則又諳英語。

台灣的神祇

現在場景換到基隆，一個位於台北北方的港都。1885年中法戰爭戰敗後，法國將領孤拔（Courbet）及數以百計的法國水手命喪之地。陳道士說明自身如何從藥劑師轉換跑道成立道壇的經過：因應小城鎮人們渴求心靈寄託比藥物強烈，於是將西藥房改設成道壇。道壇裡有道教的神祇，還有辦理道教儀式的相關物品。身穿華麗道服的陳道士，相貌堂堂，深具神力，撫慰遭遇不幸的信徒，並指引他們向適當的主管神祇許下誓願。他學識豐富，子承父業，精通道教各項儀式。因應信徒工作、健康或是愛情的誓願，都有特殊解方。陳道士解釋道：誓願是無須事前付款，只要在實現後，自由捐獻即可。他表示，他只負責生者，往生者，請向佛教另求高明。佛道可謂各司其職啊！但道教與台灣到處可見的乩童之關係，並不那麼好。陳道士抗議道：「這是因為乩童沒受正規神學理論教育之故，但是台灣人卻十分珍視他們通靈的服務。」

西方人似乎對中國社會存有缺乏憐憫心的主觀定見，為釋此疑，於是我問道：「憐憫與慈悲在道教中具有何種地位？」儘管問題似乎讓陳道士有點措手不及，但他仍找出一強而有力的事證，來佐證道教具有憐憫精神：「中國唐朝瘟疫橫行，道士挺身免費作法消災解噩，終平息瘟疫之災。」唐朝，距今不是已千年之久嗎？陳道士於是另提近例：2002年台灣適逢

SARS 肆虐，道士們亦是慷慨解囊，免費作法，為民消災解厄。

西方人基本服膺基督教「情感與愛護他人」的教義，或許是因為中國宗教與西方宗教教義不同所致，我們對此回答並不感到滿意。在基督教義影響下，西方人的行為模式較易受情感與愛護他人所指引。中國的宗教認為情感與愛慾都是瞬間之物，無法永續持久，只有宇宙的法則（天道）始能持久永恆：西方認為愛是正面的事物，而中國則認為依循天道至上。或許藉此可說明為何共產中國會滅絕儀式，少以愛為訴求，冷酷總是位居社會關係的制高點吧。

中國打壓宗教約達 50 年，此刻堪稱稍有宗教自由，並令西方旅客為之神往。但與台灣相比，這根本只能算是受高層緊密監控下有條件式的宗教自由。因為一個真正宗教自由的中國，必須要像台灣一樣，有道士、法師或是乩童。幾乎所有台灣人都會參訪各式廟宇，祈禱、諮詢或祈求願望，並在請示神意、永生者或乩童後，始會下重大決定。此外，台灣的天主教、基督教或猶太教信徒也像道教信徒般，會向上帝提出實用性的請求。台灣的神祇間競爭激烈，中國人與印度人對神祇都採「隨性發展」的輕鬆態度面對：中國人對宗教觀心中自有認知，無論外界將他們的信仰視為狂熱、虔誠或是迷信。

與一般認知相反的是：經濟現代化對台灣宗教影響甚大，

成功的企業家心中惦記著要建造光彩耀眼的新穎廟宇回饋神明。如同在古代中國，廟宇通常是商業同業公會、商務中心、養老儲金會的所在地，信徒們則透過廟宇地利展開商業攻堅行動。

台灣跟日、韓、美等國一樣，印證了宗教的天敵是反教權主義者，而非經濟的進步發展。台灣人對宗教的態度，反而更拉近與美國的距離：美國人透過傳教者各自與神祇溝通的習慣，與台灣人藉由乩童向祂們表願，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對一位不想討論中國神祇的西方旅行者而言，在台灣也有機會遇到一些將道教貶成通俗迷信的儒學論者。有一位曾派駐歐洲國家擔任大使要職的旅客，便對十八王公廟譏言道：「您能想像那些人居然會將犬狗化為神祇而加以膜拜?!」我也曾親自參訪過這間面對海洋的神壇：信徒們在神化的銅造犬前上香，用一疊黃色的銀紙，在其身體每一部位摩擦，祈求不同的賜福：「摸狗嘴，你會大富貴；摸狗頭，你會起大樓；摸狗耳，你會順心順意；摸狗肚，你會好頭路。」信徒們是對神犬有所求，或是為神犬的以身殉主精神所吸引？

儘管道教的不馴與儒家的官僚體係衝突，在中國歷史上層出不窮，但令人驚嘆的是，從未藉信仰之名，釀成流血憾事：多重世界觀的和平共存，係政治多元化的根基。

多樣民主如何誕生？

馬英九市長一股腦兒地向我上了堂中國民主課程。因姓「馬」之故，台北市政府市長辦公室內，馬的圖騰到處可見，無論是雕塑、繪畫、立燈、壁毯……馬市長當選台北市長大多歸功於婦女的選票，他年近60，仍享有台灣最具魅力政治人物的美名。

馬市長分析了華人世界不同民主理念的多樣性。為方便闡述，他就自由、法治及民選等角度切入研析，不過截至目前，尚沒有任何華人國度或地區同時具有上述3項要件。

英國創建了香港法治制度，儘管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管轄後，無論是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或是企業自由，均能確保，但港府特首卻非民選產生，而僅透過約1/3議員民選的立法會建議後，再由北京當權指派。因此，香港只能稱為部分民主的華人地區。

英國另也創造新加坡的法治制度，但新聞自由或企業自由均受限頗多。儘管政府經民選產生，但要取代自1963年建國以來即當權的執政黨，根本是天方夜譚！如同馬市長所說：「中國的民主僅是個程度差異的問題。」

在台灣，無論全國性或是地方性人民代表均經民選產生，昔日執政的國民黨已在野，儘管選舉充斥賄選傳聞，但仍受嚴厲檢視。經濟享有完全的自由，新聞的自由似有過度，令人難

以招架。惟台灣離法治距離尚遠：賄賂、貪腐、封建充斥，傳統的派系與人情壓力勝過對法律的尊重。馬市長認為，這並非屬中華文化的特質，而是歸咎於公權力的不彰。自他當選台北市長以來，在警察確實執法及高額罰金雙管齊下，市民遵守交通規則的情形良好。馬市長表示：華人跟每一個人一樣，只要確實執行罰則，就不會闖紅燈，跟中華文化毫無干係。

至於中國，無論是自由、法治或是民選，均付之闕如。面對多樣的中華國度、多樣的經驗及多樣的民主模式或缺失，否決了「文化決定論」。馬市長結語道：「民主是需要學習的。」

假如馬市長不是華人的話，上述言論堪稱適切。為讓中國人民行為符合領導們的道德標準，在中國為維持秩序，有另一套觀點：統治者只要公平，即可維持社會和諧。此一不知是否曾實現過的古典中國夢想，則被某些漢學愛好者們視為替代西方秩序觀的另一種選擇。就東方觀點而言，法治概念，西方是顯露於外，而中國則是蘊藏於內。實屬有趣的哲學辯論範疇，只是現代的華人並不熱衷討論。馬英九本身雖為道德化身並以打擊貪腐著稱，但除西方法治概念外，他並無思考法治是否以其他模式存在。對他而言，法治似乎是一種普世標準，至於起源於何方，並不重要。或許我們可以聲稱：法治概念本來就是中國固有的特質之一，因為昔日帝王頒佈過刑罰讓庶民有所依循。馬市長並觀察到另一決定性的事實：自一個世紀以來，中

國便一直與西方交流互動。中國係屬西方所勾勒的世界共同體之成員，因此並無任何現實的替代性方案，可取代現有的西方標準。

馬英九是否為民主使者？我曾於1986年與他有一面之緣，當時他擔任執政的國民黨的副秘書長，如今他已陞任主席一職。馬市長或許忘了昔日曾發表過的言論，但我仍保有當時談話要點的註記。1986年，台灣的研究均強調「經濟奇蹟」，民主議題尚未形成風潮。那時我們來到台灣，是想瞭解為何中國經濟停滯不前，而台灣卻能成功地擺脫貧窮。其實，台灣成功的方法很簡單，就是以私有財產、向國際開放市場、企業自由、稅制溫和，與貨幣穩定等所達致。在昔日的研究中，我曾稍稍提及過法國農業學專家杜蒙（René Dumont）（杜蒙係法國生態環保運動的創始人）的理念，30年後的今日他終於出版一本探討台灣土地改革的專書，文中並指稱台灣土改經驗堪為第三世界國家學習典範。台灣土改政策雖在美國施壓及國民黨主政下完成，但其本質卻是完全的自由：地主土地雖遭徵收，但藉政府所發給的補償金，搖身變成工業企業家。農民藉貸款購地，瞭解土地的經濟價值與理性開發之真義。杜蒙盛讚土改政策造就了台灣經濟、農業及工業的發展，而同時期的共產中國卻是藉血腥謀殺地主的手段，達成土地集體化之目的。

當時，甫從美國學成返國的馬英九，一開口即用「孫中山

博士說」引言，這和儒家「言必稱孔孟」及毛澤東主義論者言必引用《毛語錄》之慣習類似。他當時承繼國民黨創始人孫中山的論述認為，僅存一個真理。國民黨遭毛澤東解放軍驅趕而偏安台灣後，曾專制統治當時的台灣民衆。遷移至台灣已數世代的人民（其中九成為華人），雖曾多次反抗國民黨統治（最後一次為1979年的高雄美麗島事件），但都遭強烈鎮壓。惟國民黨遷台後儘管獨大，但從不是一黨專權，按其中心思想一直以共和主義論為主軸。2000年總統選舉中，在野的民進黨擊敗執政的國民黨。此後，獨大的國民黨逐漸轉型為民主的政黨，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亦服膺民主輪替理論的常規。依靠台北市長的超人氣，馬英九可能出馬角逐2008的總統選舉。

台灣的專制者如何終結？

期盼中國大陸學習台灣經濟自由自然演進到政治自由經驗的論述，實具吸引力：不僅具歷史意義，也讓西方感到安心。既然台灣及南韓的經驗顯示：經濟發展會讓民主水到渠成，促使許多國家樂於與中國經貿交往。但別忘了西方鼓吹與蘇聯經貿交往的人士，在八〇年代曾對蘇聯也有同樣的期許，但卻無法讓柏林圍牆消失：讓蘇聯或東歐的共產獨裁政權垮台的因素，與西方經貿交流無關，而是他們無法抵擋美軍壓境的壓力所促成的。台灣經驗無法施行於共產中國，而台灣昔日的獨裁

政權比起中國共產黨的專制，根本小巫見大巫。如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的智利、蔣介石的台灣或是南韓等獨裁政權可演變成民主政體，但納粹、蘇維埃社會主義論者等極權政權則從未演進。極權的獨裁者只有在外在的經濟或是軍事壓力下才會消失。

蔣介石並非毛澤東。蔣氏排拒任何與台灣自治有關的聯想，但除了一統中國的教義外，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並無相同之處：國民黨並不否定民主原則，只是在動員戡亂名義下有所「延遲」。台灣公民社會從未遭摧毀，植基於土地、商業與企業私有化的台灣經濟，堪稱自由。台灣藝術工作者從未被要求為意識形態或是屈從官方美學標準而創作。無論是道教、佛教或是基督教等活動，從未被脅迫。台灣眾多的教會，尤其是長老基督教會，甚至積極鼓吹民主而毫無懼色。尤其蔣氏身為基督教徒，又與美國交好，於是對此異議活動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跟南韓及香港一樣，台灣教會對社會正義、捐助窮人、醫療研究、掃除文盲等，均扮演重要的現代化角色。

因此台灣社會在獨裁年代裡，仍得以保存了自治及多樣自由。從台灣經驗，我們或許可下個結語：藉由經濟繁榮，從獨裁步上民主是無法抵擋的？南韓不也是循相同的模式嗎？但依據國民所得高低來作為邁向民主必經階段的論述，並無法讓世人瞭解為何新加坡可為一繁華的華人國度，卻無法被視為一民

主國家？而印度雖貧窮但仍入民主國家之列。事實上，台灣之所以會邁向民主化，完全歸功於美國的外在施壓：自美國在1976年承認中國以來，台灣只能藉轉化成民主國家典範，以道德中國與對岸的專制中國相抗衡。蔣介石的繼承者——蔣經國對此了然於胸，而南韓的獨裁者亦認知到：假如未能轉化成自由陣營以對抗北韓的專制政權，美國是不會支持首爾對抗平壤的。

六〇年代以來，台灣菁英分子赴美留學風潮對民主亦有促進之功。而中國大陸是否也有如是發展？中國赴美留學生，返國服務數量有限，大多選擇滯留他鄉，就算返國服務，年紀又太輕而未能賦予重責大任。20年後，這些政治菁英能否自外於革新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有人看好中國共產黨會溫和質變演進，但此仍僅是個賭注選項。

台灣與中國大陸間，經濟、社會或宗教的條件實在無法類比，中國共產黨不是國民黨，而且毫無任何施壓北京揚棄專制的國際勢力。更有甚者，中國共產黨已與西方政治領袖或外商共組聯合陣線，並以國際穩定為名，行剝削中國內地廉價勞工之實。昔日美國對台灣或南韓採行民主化的堅持，並沒有一體適用在中國共產黨身上。因此，要看到北京如蠶蛹般愉悅且立即蛻變成多元化的彩蝶，可能性實在不高。

亞洲價值之迷思

現在我們來談談民主此一議題。台灣雖有民主化成就，但卻被西方政府視為賤民或是雞肋般無足輕重。如梵諦岡雖高舉道德旗幟，但私底下卻已做好與台北斷交，前進北京的準備。西方對中國極盡阿諛奉承，但對台灣人權毫無關愛眼神。台灣人常自問民主化究竟帶來什麼好處？他們因不滿選舉貪腐及立院全武行，對內政期望產生失落感。而北京電視台則一旁虎視眈眈，從不會錯失轉播台灣立院亂象之機會。

台灣人是否會因為對民主期望過高而產生失望？浸淫於儒學教育的華人們，有將其領導人神格化的傾向。台灣是否對民主制度的平庸層面準備不足？施明德對我說：「這只是個時間問題，台灣終究會習慣的。」

施明德21歲時就被指控密謀推翻國民黨而遭囚禁與凌虐。那時他只是個有感政治禁錮而參加學校社團討論會的學生。一直到1990年重獲自由，施明德已從昔日少年成長為年紀已屆49歲的中年。我向他問與魏京生同樣的問題，如何能抵抗凌虐、黑牢、絕食等不人道待遇？他的回答是，基督信仰居功頗大，他並因感激基督長老教會的捍衛，而從天主教改信基督教。施明德表示，他比較喜歡與上帝直接溝通，而非透過那些學識不及他的教士們擔任媒介。而「熱愛生命」的信念，也讓施明德得以度過漫漫長夜。他就算面臨禁錮的最壞時刻，也對

此信念深信不疑。因此，重見天日後，施明德決定享受生命。與曼德拉或華勒沙不同的是，施明德並無擔任任何重要公職，他舉止優雅，神態有點像花花公子，身邊總不乏美女環繞，整體外在形象比較像個明星。

1995年，面對昔日壓迫的國民黨劊子手們，施明德當選立委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原諒你們。」而今日，這些劊子手們只能扮演反對黨的角色。

原諒是否因為基督徒之故呢？施明德認為此一問題愚昧。「因為西方人對找尋歷史、文化、宗教與民主間之因果關係，一直是樂此不疲。亞洲人採行民主制度，只是因為該制度能運行良好，與是否是西方人、印度人、日本人或是韓國人無關。」

有關中國是否適宜採行民主之議題，流亡美國的魏京生亦給我上述相同的答案。亞洲的民主主義論者主張採行民主制度，只是因為該制度能運行良好，而西方則有某些人以「亞洲價值」為名，否定民主制度的普世性。

施明德對台灣政治低壓及人民失望現象並不否認，而這些現象係針對台灣運行的體制，而非質疑民主制度之真義。台灣或許思考不周或受美國影響，而採行一個與本地生態無法契合的總統制。台灣是個族群分裂，而不是意識形態的社會：在成熟的民主國家中，民意是根據意識形態之不同而競和，但在台

灣卻是本土與外省的族群意識掛帥。選舉成為族群鬥爭：代表台灣本土的民進黨鼓吹「遠『中』獨立」及強調本土意識；而國民黨則強調其中華特質，並期待有朝一日重回永恆中國之懷抱。施明德認為，唯有採行內閣制，透過協商機制，始能化解「族群」陣營的僵持，而總統制只會激化雙方之對立。

上述爭議似乎顯得有點技術性，但民主制度運行之爭議大都起源於此：我們在許多國家可看到因一昧移植西方（以美國尤甚）民主經驗，忽略自身地方民情，致民主勢力式微。民主此一議題本身，不能僅局限在探討採行內閣制或是總統制、聯邦制或一統制之差異。同樣的，魏京生認為中國民主除聯邦制，別無他途，而施明德則認為台灣民主需植基在內閣制上：施明德希望透過內閣制，讓台灣人忘卻族群，齊心共議經濟及社會發展議題。在台灣政黨是否有左派、右派之分？施明德笑道：「不可能！台灣根本沒有左派政黨之生存空間。因為左派就是社會主義，也就是北京政權的共產主義。」

中華民國是否會消失？

這世上是否存有另一個像台灣同遭威脅的民主國家？答案應該是以色列，而且台灣經常舉以色列自喻。以色列的敵人們絞盡腦汁要將之從世界地圖中抹去，而北京當權只聲稱要併吞而非摧毀台灣。這種論述上的區別，對每日生活在中國福建沿

岸飛彈威脅之中的台灣人而言，似乎已無什麼意義。

我們在擔憂台灣甚或整個亞洲遭中國軍事威脅之前，讓我們檢視北京的要求是否合理。從法理言，似乎站不住腳。台灣在1895年成為日本殖民地以前，自十五世紀起，已陸續遭大陸的中國人所侵佔。1945年，日本戰敗將台灣歸還當時的中國——而此中國係指蔣介石國民黨的中國，或4年後取而代之的毛澤東共產黨的中國？事實上，台灣幾個世紀以來靠自己的努力，發展成一個自治國家。儘管華人意識濃厚且形象鮮明，但從未被中國所真正統治過。因此中國共產黨所要求的兩岸統一，實是象徵性大於法理性：或許解放軍想與國民黨軍算個總帳，或想收回台北故宮的中華文物寶藏，或想繼收編藏族、維吾爾族後，再次擴及台灣的中國至上狂妄心態所導致吧！如同對西藏及東土耳其斯坦（新疆）般，中國想納編台灣的心態，純係昔日帝國慾望在作祟。假如中國非共產政權，可能會停止此種帝國主義行徑，甚或亦較容易隨和妥協。台灣的民主主義論者期盼，中國能比照美國或是歐盟成立邦聯制，並以理性協商取代軍事威脅，但此主張離國際現實尚遠……。

中國對台灣的威脅是否真實存在？中國解放軍絕對有摧毀台灣的能力，此點實毫無疑問，但只能摧毀台灣，而無法征服台灣民心。中國飛彈或許能摧毀台灣，但其艦隊似無法佔領台灣，且解放軍也無力遏制台灣人民的反對聲浪。尚有另一種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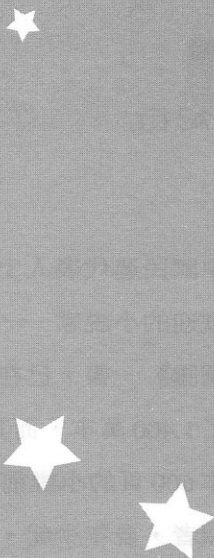
觀主張認為：摧毀一個對任何國家均不具威脅性的台灣，對中國毫無利益，而中國又無殖民台灣的能力，因此中國最終也只能騷擾台灣而已。儘管北京的浮誇之士對台灣玩弄神經戰術，但威脅不了台灣的共和國體制。上述心態在台灣充斥，也使台灣人將中國視為一個虛擬的實體，而非可怕的近鄰，就這樣日過一日。

然而上述論述卻只能在中國為理性政權之前提下，始能成立。目前北京是理性的，因為他深知軍事攻擊除會摧毀台灣，也會讓中共國際信譽掃地。不過，中國共產政權的思維深不可測，例如過去，儘管解放軍於1960年及1979年先後發動中印與中越戰爭的初衷，只是為了恫嚇對方，但中越戰爭後來卻失控而釀成大災禍。雞年期間，中國的參謀長曾發表言論：一旦台海開戰，北京已準備首先使用核子武器癱瘓美國。中國此舉對那些支持「中共為一理性政權，無須擔憂北京對台灣挑釁或是其國防預算激增」之論述者，究竟有何想法？難道他們真的認為，中共國防「現代化」只是為了保護中國沿岸的經貿發展？中共軍隊及導彈裝備並無軍事用途，而僅是個「現代化版」的防禦性長城而已。但我們需思考的是，這個長城究竟是為了要防禦哪些「蠻夷之邦」？是日本或是美國？或是中國內部的民主主義論者？別忘了，鄧小平發動天安門軍事屠殺後，曾以「鋼鐵的長城」感謝解放軍。

還有另一樂觀論述認為：中共解放軍只想讓全世界能正視中國的存在而已。因為中國雖為聯合國安理會之成員，但因無像歐美俄有部署海外軍隊之真正實力支撐其立場，因此在國際事務上的發聲仍嫌薄弱。假如中國解放軍除擔任外交及防禦任務外，還別有他圖的野心，屆時難保不會對世界產生威脅。

上述令人安心的論述係植基於中國解放軍之理性。我們得好好的回想，中國解放軍的過去行徑實無法掌控，其未來的舉止更難預測。無論是中國的中央或鄰近省份，均已遭中國解放軍勢力控制。而且解放軍是與中共平起平坐，共享權力，而非仰賴共產黨鼻息，甚至於1989年搖身一變成為鎮壓民衆，捍衛共產政權的最後依靠者。由於解放軍目前僅威脅中國的漢族、藏族及維吾爾族，我們根本忽略了他們有一天也可能會威脅全世界。美日保障了台灣人的自由生存權固然是好事，但又有誰會為保護中國的漢族、藏族及維吾爾族們，而抵抗中國解放軍？

與其遠憂中共入侵西方自由世界的禍害，我們倒不如好好近慮一下，西方自由世界如果繼續支持一個將13億人民押為人質的共產軍事複合體，將會產生哪些後果？



Chapter 11

人世間的道路

我以中國民運代表人士魏京生為起點，撰寫雞年專書，在中國最受歡迎的小說家——姜戎陪伴下，對此書作一完結。姜戎的《狼圖騰》一書，已在中國連續兩年榮登最暢銷書籍排行榜，銷售了1,400萬本，而其中有1,300萬本盜版。姜戎花了10年撰寫這本600頁的小說前，從未從事過文學創作。他也是個反抗的歌頌者，自年少起，就與中共衝突不斷，以「姜戎」為筆名似有軌跡可尋，我們可衍述為一個挑戰「古典中國」的「北方蠻夷」。中共之所以沒將該書像其他異議書籍般查禁，主要是因該書十分暢銷，而且姜戎本身從未接受媒體訪問或是現身螢幕。

中國兩個圖騰：狼與龍

如何解釋《狼圖騰》這本書的寓意？首先，這只是本描述蒙古草原獵狼的故事，而姜戎在六〇年代曾應「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號召，主動下鄉至內蒙古。雖縱橫蒙古草原10年，但卻學習到與中共期望相反的啓示：中國並非僅存一個文明，而是由游牧民族（即一般正史所稱之蠻夷）文明與漢族農業文明所共組而成。姜戎認為，前者自比為狼，認同「狡猾、自由、威嚴、獨立」的狼性特質，並以狼為圖騰；而後者則是像一群先後被儒學思想、馬克思主義等意識形態牢籠所套牢，且「溫馴如羊群般」的被動農民。由於神龍呼風喚雨有利農耕，漢族

農民向來將之奉為圖騰。

姜戎依在內蒙的親身經歷及所見所聞，撰寫此一中國歷險記般的文學史詩。姜戎解釋，當中國人舉止似「狼」時，將更偉大，而他們假如依然沈浸當「羊」，就很容易遭野蠻民族、西方列強、大和民族或共產黨的禁錮。對這位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作者而言，是文化決定民族未來的命運，而非經濟。

姜戎是否是中國的索忍尼辛？《狼圖騰》除描述蒙古草原狼群傳奇外，並藉歌頌狼圖騰，褒揚游牧民族文明的自由，貶低漢族農業文明的懦弱。藉狼與龍的對比，呈現兩種不同文明的特質，展現中國真實面，這也是該書對自比為狼的中國青年讀者們，造成巨大迴響的真正原因。

同時，還有不可勝數的網站，響應該書號召，共赴理想，藉隱喻創作以逃避中共的審查管制。從全中國人民對《狼圖騰》的熱烈迴響，姜戎結語道：中國人終究會拾回其真正本性的，「在中國羊群中，已有狼群甦醒了！」中國人想要從「羊」蛻變成「狼」，只消揚棄儒學思想及馬克思主義等庸俗之物即可。

我向姜戎表示，狼在西方文明中，可是聲名狼藉：他會啃噬小女孩，而現在，狼又被視為「新野蠻自由主義」之象徵。姜戎本人即是支持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與世界全球化等「狼群文明」。而中國共產當局較喜歡維持溫和羊群的社會，而

夢想自主的中國青年們則有些受夠而按耐不住了。如同姜戎所說，他們藉李宇春之「母狼」形象，抒發胸中鬱悶。

李宇春是何許人也？她就是八月間在湖南衛視《超級女聲》節目奪得冠軍的業餘女歌手。身為李宇春粉絲的姜戎夫婦從沒有錯失任何一場「超女」比賽，而這個模仿自《美國偶像》（*American Girl*）或法國《明星協會》（*Star Academy*）的節目，創下中國有史以來收視率新高。當然，這是世界全球化之必然。《超級女聲》及《狼圖騰》堪稱中國在雞年中，兩件最值得大書特書的現象。為讓世人瞭解中國未來何往，姜戎請我們要好好探究其中所呈現的深意：《超級女聲》所代表的是一位平凡樸實、自由不羈及精力充沛的中國女子，透過網路的民主選票，擊敗了中共官方長期透過國家電視台所傳輸之漂亮寶貝型女子形象。

適逢「雞」逝「狗」起之際，姜戎以中國新興標的——「麥當勞」為例，作為狼與龍對話傳奇的結尾。麥當勞正蓋於圓明園對面的停車場旁，而圓明園係耶穌會建築師於1750年仿凡爾賽宮所建造的皇室居所，卻於1860年遭英法聯軍所蹂躪，破壞殆盡。中國已不再自外於我們所熟悉的世界很久很久了，她已是我們的一分子！中國人與歐洲人間的憧憬或論點，或許如「龍」與「狼」般的歧異，但他們本質上根本沒有什麼不同。中國人並非生活在另一個星球的異類，他們的慾望、痛

苦、喜樂均與我們無異，因此我們無權將中國人視為異類，甚至否決他們享受如同美國咖啡般廉價的基本言論自由。中國的異國情調已不復在，唯有共產體制對中國本身才稱得上異國情調。但這個「異國情調」將會支撐多久呢？

中國將何去何從？有從革命到維持現狀等四套劇本

由於中國難以捉摸而拒絕預測，西方漢學家於是自滿地對中國寫了以下四套未來劇本因應。但該等劇本對我而言都不可行，或許可藉第五套劇本強制，但這套劇本又尚未開始動筆……。

再進行一場血腥革命嗎？如同本書雞年所觀察的，中國人民不滿情緒到處充斥，並會撼動整個中國。但這些不滿是否需以繼 1911 年推翻滿清、1949 年推翻國民黨共和國之後，於百年間發動第 3 起血腥革命而作為終結呢？遠景論者雖深信此說，數以千萬中國人民情緒日益不滿雖如是深，但他們只是像盤散沙一樣，無法合縱連橫共組團結一致的巨大反對勢力，以對抗中共公安或解放軍勢力，因而遭一一個別擊破。

宗教活動是否會對中共造成嚴重的威脅？中國昔日朝代遭神秘宗教推翻之歷史前例將不復見。宗教派系的興盛滿足了中國社會中個人或是團體的集體救贖心態，但不會以千年禍害之姿來呈現。中共出其不意且強力鎮壓法輪功活動的技巧日益專

精，已充分展現不讓宗教顛覆的決心。中國反對勢力易受暴力威脅之懼而癱瘓，採取血腥革命之途可能性甚低：中國人害怕爆發內戰的恐懼，更甚於對中國共產黨之憎恨。儘管他們深信中國共產黨為北京政權的罪惡淵藪，但中國沒有任何反叛者、反抗的農民、罷工的勞工或是宗教的殉道者敢向中共提出另一條解決之道。只有中國知識分子敢對自由民主的慾望有所期待，但中共對此則如履薄冰般謹慎。

第一套劇本既然不可行，我們就討論第二套可怕的劇本：中共破產倒台。中國勞工缺乏勞動動機、素質欠佳、居住衛生條件差可能引發疾病蔓延。另水源短缺、污染嚴重等管理不善現象，將使中國經濟發展瓶頸難以突破。因此，中國未來無法保持目前高額的經濟成長率，實可預見。而中國共產黨又無法掌握經濟成長的兩大動力：美國消費者的需求與中國人民的儲金率。只消美國消費者與中國人民儲金琵琶別抱，另擇他人，則會引發一連串的銀行倒閉風潮，而讓中國陷入一蹶不振的境地。理論上，在長期的過渡發展之後，中共假如將經濟發展植基於內需市場上似乎會較穩固，但同時卻會喪失高額經濟成長率所帶來的合法性。

第二套劇本會引導中國採行民主制度？我們寧可相信中國會有一個軍事政權取而代之，來平定社會亂象，並阻止嚮往香港及台灣體制的西藏、新疆、福建或廣東等省份離中國而去。

由於西方世界經濟需要中國廉價工廠的支撐，假如全球經濟成長過慢，西方將自食苦果，而中國共產黨也就是在此互賴立論下而暫時倖免。因此第二套劇本並不會比第一套劇本更具可行性。

我們現在探討其他兩個較為人接受的溫和劇本。第三套劇本即是：透過漸進與組織的過渡手段讓中國邁向民主。此說吸引了中國及其他世界絕大多數人們的目光。根據改革派論者的預測，面對中國社會的日益紛雜與擇選多元之態勢，中共自身將認知到與中國人民對話的必要性。與人民對話的風潮將壓倒維持共產黨威權之固態，而使中共內部因裂解，而產生擁護自由主義及國家干涉主義等不同派系，甚至會因而促使不同主張的政黨之產生。而中共本身亦產生質變，從革命政黨演進成專制政黨，再從極權政黨演化到專制政黨，再從專制政黨蛻變成民主自由政黨。這不就是中國地方選舉制度、法律司法正義藍圖、媒體所出現的社會公論、以及民主白皮書等等所指引出的方向嗎？

但這套樂觀劇本，實現之日恐遙遙無期。中共掌握上述所有演進的生殺大權，將中國人民民主化心聲置於「中國特色」之下，而其所謂「過渡期」僅是「無限延宕」及「永久執政」的代名詞而已。

短期內，要期盼中共自我改革，由佔大多數的農民取代現

有的技術官僚，揚棄追求國力展現之頑念改以民生經濟為念，以斷尾求生，可能性不高。以歷史為鑑，無論是法國路易十六或是戈巴契夫等威權體制之所為，均在在顯示進行過渡期的改革實是讓政權最岌岌可危的。因此無任何誘因可讓中共改尋此道而為。溫和改革主義論者之主張，只能算是個崇高的理想吧。

現在檢視第四套劇本：中共維持專權統治現狀。我們可以不喜歡中共、擔憂北京國力擴張慾、對中共鄙視其人民之行徑感到震驚，但我們仍須同意中共應會理性地達成下列既定的特別目標：

第一個目標：維持中共統治權力。一般而言，獨裁者會因互鬥或繼任者難尋而亡。但中共現在透過世代交替和平移轉政權，儼然已成一個無須繼承者的朝代。另也透過改善共產黨經濟、國防、社會活動的管理及管控能力，成功地從烏托邦理想主義向經濟發展現實演進，以及從昔日戰鬥主義至上，演化成凡事深思熟慮而後動之專業。

第二個目標：中共共產黨黨員致富。此點，中共透過國富手段，達成鞏固權力與個人致富之目的，實不得不讓人讚嘆其能力高超。

世人是否應對中共達成上述兩項目標之壯舉而感到驚嘆呢？我們不是質疑中共的管理效率，而是不信任北京的帝國野

心。該目標僅是共產黨一黨之私，根本不是廣大中國人民所渴望達到的夢想。一般平常人日常生活所期盼的是個人幸福、幼有所養、老有所終、無需為五斗米離鄉背井、少點官僚體系的欺瞞、言論自由、少點軍購預算，相信世人對此應不會懷疑吧。但是這群為數眾多的中國人民心聲，根本毫無被國內或海外的世人所傾聽。這群為數十餘億的沈默人民，實是中國共產黨神奇般統治效率下的第一線的受害者！

除了那些仰賴中共共生共存的人們外，中國人民對此心知肚明。假如他們有如同香港、台灣及海外華人世界同樣的機會，中國人民就會擇選自由民主之道，來證明共產體制根本不是個普世典範，而所謂的西方價值同樣也適用於中國人民身上。

西方人權關懷的義務

第四套維持中共統治現況的劇本，具可行性，但卻令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民感到難以忍受。尤其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完全不是中國內部人民，而是外在的西方民主世界所賦予的。因此，中共未來的發展全繫於西方世界的一念之間。西方與中共交往時，應切記中共根本不能代表全體中國人民。

如同有些流亡海外的中國民運人士所言，是否應對中共經濟抵制？經濟抵制中共並不為西方所樂見：超過10億的中國人

民藉此而擺脫貧窮，重建文明。而且透過此波經濟文化的全球化，亦讓西方獲益良多。西方應深思如何才能讓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民獲益，而非僅讓心存軍事技術官僚的中共獨享，並要有具體行動。

假如西方世界相信尊嚴存於所有文明之中，至少應言行一致，並傾聽中國民運人士之心聲。此種作法，是有成效的。我們回想蘇聯尚存的年代，那時西方世界把支持蘇聯異議分子、將經貿交往與人權議題結合、扼制蘇聯軍事擴張野心等作法，視為理所當然且正義凜然。同樣地，我們是否應抵制中國雅虎網站，直到遭中共禁錮的記者——師濤釋放為止呢？我們能想像師濤只因發了一封支持民主的電郵，就被這家美國網站公司出賣，而遭中共公安判刑10年嗎？中共這種特殊的行徑實與西方平日所捍衛及深信的人權理念完全相左。就讓我們像支持蘇聯異議分子般地傾聽中國民運分子們的心聲吧！或者就停止高舉人權道德偽善的旗幟，直接對他們的心聲來個充耳不聞吧。

前述建議對西方政治人物或商人或許有點脫離現實。但是這個建議實與昔日西方發動支持遭共產黨壓迫的蘇聯或中東歐國家人民的人權運動般，同具可行性。我們是否需對人世間的道義行為及批判義務來辯護呢？付諸行動的時刻已來臨！就在雞年將逝的時刻，我們重申本書先前所期盼，西方因應2008年北京舉辦奧運之作為。西方要讓北京奧運成為柏林奧運或是漢

城奧運的翻版，全在一念之間。讓我們深思一下，西方應參加納粹「害人危世」的1938年柏林奧運，還是參加南韓「還權於民」的1988年漢城奧運呢？

因為北京政權對其國際形象十分在意，而且外商亦掌握中國經濟成長之關鍵，因此支持中國人權的外在力量，定會發生效益的。請別忘了中國人也是我們大家庭的一份子！

巴黎-北京，2006年

感謝後記

《帝國謊言—中國雞年紀行》一書是本人2005年1月至2006年1月間，一整年參訪中國的旅遊調查實錄。在此之前，從1977年起，本人幾乎每年以同樣的手法出版相關專書，如1988年出版《民族新富論》探討中國經濟發展、1989年出版《當代真正的思想家》探討中國宗教現況、1991年出版《資本論續集及完結篇》探討中國大陸及台灣的政經改革、1997年則出版《世界是我的部落》探討中國與鄰邦之關係。

在此次撰書期間，本人想藉此特向下列人士致謝：馬丁（Claude Martin）、沛松（François-Marcel Plaisant）、雷歐（Jean-Paul Réau）、薛聶爾（Gérard Chesnel）、巴胡（Pierre Barroux）、夏皮（Nicolas Chapuis）、夏歐堤（Paul Jean-Ortiz）、布烈茲（Daniel Blaise）、卡皮亞克（Bruno Cabrillac）、帝莫尼耶（Christian Thimonier）、王華（音譯），以及陳德元（音譯）。

趙復山、戴巴利（Theodore de Barry）、杜維明以及席波（Kristofer Schipper）啟發了本人對中國宗教議題之興趣。另威爾（Pierre-Etienne Will）及趙儀文（Yves Camus）則引領本人認識現代漢學之精深。

與貝菲特（Alain Peyrefitte）在中國及法國多次面晤，對本人撰書本書助益頗多。

此外，本人還感謝於 2005 年伴隨參訪中國的楊漢生（音譯）、歐陽章同（音譯），以及安沙（音譯）。

另侯芷明（Marie Holzman）及魏延年（René Viénet）協助校對文稿，也在此一併致謝！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謊言帝國！中國雞年紀行／索爾孟著；許益源譯。

--初版。--臺北市：允晨文化，2006[民95]

面；公分--(當代叢書；8)

譯自：L'année du Coq

ISBN 978-986-7178-26-8 (平裝)

1. 中國-政治與政府 2. 中國-社會生活與風俗
574. 109 95020738

當代叢書 ⑧

謊言帝國——中國雞年紀行

作者：索爾孟

發行人：廖志峰

譯者：許益源

責任編輯：周汝婷

美術編輯：劉寶榮

出版：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6樓

網址：<http://www.asianculture.com.tw>

e-mail：asian.culture@msa.hinet.net

服務電話：(02)2507-2606

傳真：(02)2507-4260

劃撥帳號：0554566-1

初版日期：2006年11月

法律顧問：蔡欽源、邱賢德律師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版臺字第2523號

電腦排版：凱立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欣佑彩色製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裝訂：聿成裝訂

定價：新台幣300元

ISBN-13:978-986-7178-26-8

ISBN-10:986-7178-26-2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一本學習正視美國的書。在《美國製造》中，索爾孟將由來已久的落差公諸於世。

——日內瓦論壇

為什麼美國的文明與歐洲的文明差異如此大？讀者在仔細閱讀了這本書之後，自然會有一些想法與答案。很多想法將是台灣讀者第一次接觸，必須仔細玩味。這除了是來自歐洲新觀念的吸收之外，也可能是台灣深受美國文化影響的最佳證明。然而，這正是本書的價值所在：了解歐洲人的想法，並且從歐洲的觀點看美國。

——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 吳志中

2005年起，中國各地發生難以勝數的反抗事件：農民暴動、宗教造反、工人罷工、民運份子請願、環保運動等。隨著中國日益向世界開放，藉網路資訊之助，消息更為靈通的人民，紛紛挺身反抗共黨獨裁統治。共產黨不公不義情事日增，權力貪腐、訊息箝制、無時無刻監視、教條文宣以及鎮壓等，已讓越來越多中國人感到憤怒難耐；在中國，無論是知識分子，或是未能因工業發展獲利的10億農民們，均吶喊抗議。但在西方，又有誰傾聽這些中國人的反抗心聲？西方國家元首及商人，在共黨及其經改典範下迷失，寧可與中共妥協，而不願支持中國民運人士：此一嚴重短視近利不僅昧視中國的真實面，還踐踏了中國的未來。作者於雞年期間親赴中國，傾聽這些追求自由的反抗者心聲；他藉此書讓他們暢所欲言，引領我們深入瞭解中國真實現況，造訪內地各村各省，打開潘朵拉的盒子，為我們揭露一個與西方想像全然相反的中國。

「謊言帝國——中國雞年紀行」顛覆我們過去習於對中國的想像；索爾孟此書讓我們體會探究事情真相之必要性、蒐集資料之豐富，以及觀察與省思間之密切結合。

法國人類學家暨哲學家
勒維斯特勞斯 Claude Lévi-Strauss

很久沒看見討論中國的書，這麼有良心、這麼從個人尊嚴立場出發的觀察了。作者的洞見和拒絕鄉愿的勇氣，很讓人警醒和敬佩。

卜大中

本書揭露了中國成長神話的背後，潛藏的人民慘狀。中共靠壓榨人民來壯大自己，它當然拒絕變革與進步。

索爾孟認為上海浦東燦爛耀眼的燈火，以及中國驚人的高成長率，都是一派謊言。對於已經把經濟命脈繫於中國的我們（韓國），實在不能不認真傾聽索爾孟這位歐洲知性評論家的忠告。

東亞日報

朝鮮日報



978-986-7178-26-8 00300

ISBN-10: 986-7178-26-2

2005年起，中國各地發生難以勝數的反抗事件：農民暴動、宗教造反、工人罷工、民運份子請願、環保運動等。隨著中國日益向世界開放，藉網路資訊之助，消息更為靈通的人民，紛紛挺身反抗共黨獨裁統治。共產黨不公不義情事日增，權力貪腐、訊息箝制、無時無刻監視、教條文宣以及鎮壓等，已讓越來越多中國人感到憤怒難耐；在中國，無論是知識分子，或是未能因工業發展獲利的10億農民們，均吶喊抗議。但在西方，又有誰傾聽這些中國人的反抗心聲？西方國家元首及商人，在共黨及其經改典範下迷失，寧可與中共妥協，而不願支持中國民運人士；此一嚴重短視近利不僅昧視中國的真實面，還踐踏了中國的未來。作者於雞年期間親赴中國，傾聽這些追求自由的反抗者心聲；他藉此書讓他們暢所欲言，引領我們深入瞭解中國真實現況，造訪內地各村各省，打開潘朵拉的盒子，為我們揭露一個與西方想像全然相反的中國。

「謊言帝國——中國雞年紀行」顛覆我們過去習於對中國的想像；索爾孟此書讓我們體會探究事情真相之必要性、蒐集資料之豐富，以及觀察與省思間之密切結合。

法國人類學家暨哲學家
勒維史特勞斯 Claude Lévi-Strauss

很久沒看見討論中國的書，這麼有良心、這麼從個人尊嚴立場出發的觀察了。作者的洞見和拒絕鄉愿的勇氣，很讓人警醒和敬佩。

卜大中

本書揭露了中國成長神話的背後，潛藏的人民慘狀。中共靠壓榨人民來壯大自己，它當然拒絕變革與進步。

索爾孟認為上海埔東燦爛耀眼的燈火，以及中國驚人的高成長率，都是一派謊言。對於已經把經濟命脈繫於中國的我們（韓國），實在不能不認真傾聽索爾孟這位歐洲知性評論家的忠告。

東亞日報

朝鮮日報



978-986-7178-268 00300

ISBN-10: 986-7178-26-2